

与安那其主义

巴金



] 樋口进 (Higuchi Susumu) 著
] 近藤光雄 (Kondo Mitsuo) 译

在文艺理论方面，巴金站在左翼作家联盟的对岸，未能摆脱革命浪漫主义。而从他的信念来讲，他当然也不会支持蒋介石政府的路线，必然要考虑到第三种立场。巴金以自己的方式，把他的立场、文学理念寄托于自我信念之中。……他在文学上找到了安那其主义的道路。

——樋口进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
樋口进 著

ISBN 978-7-309-11468-3



9 787309 114683 >

定价：38.00元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

[日]樋口进(Higuchi Susumu) 著

[日]近藤光雄(Kondo Mitsuo) 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日]樋口进著;[日]近藤光雄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
(巴金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1468-3

I. 巴… II. ①樋…②近… III. ①巴金(1904~2005)-人物研究
②巴金(1904~2005)-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6553号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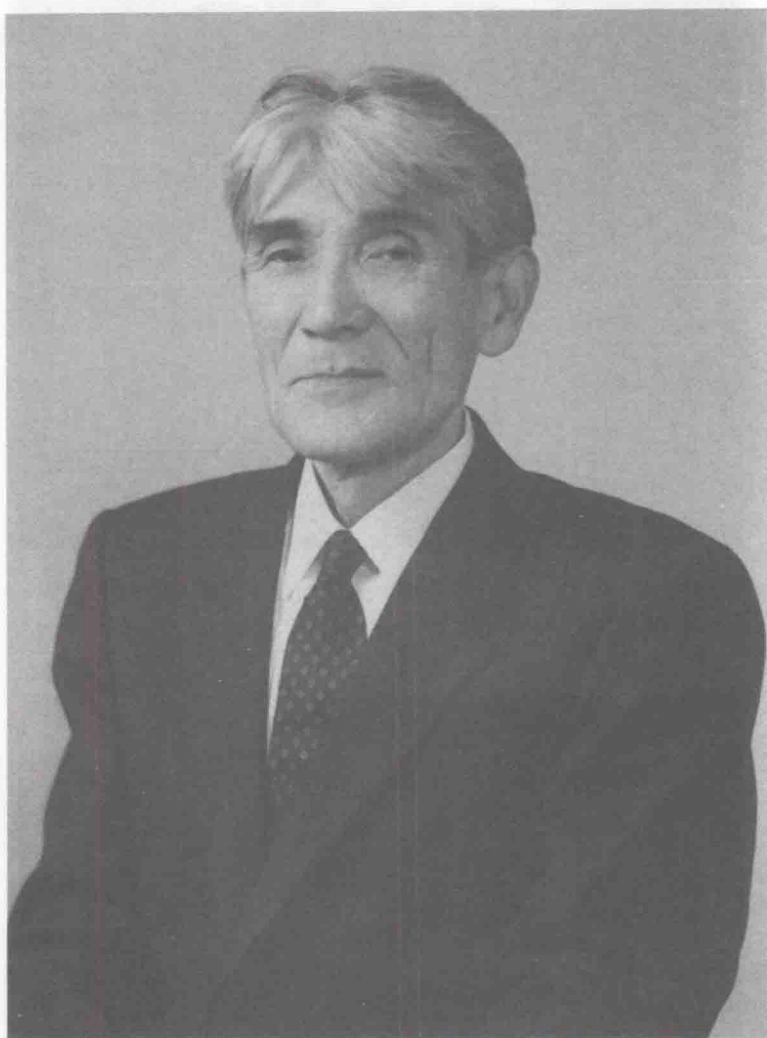
[日]樋口进 著 [日]近藤光雄 译
责任编辑/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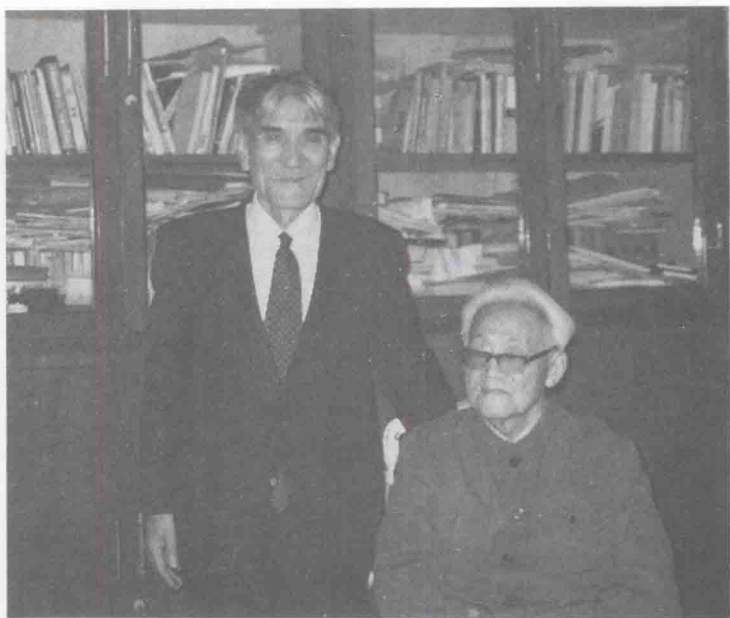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5 字数 314 千
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1468-3/K·536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樋口进先生（一九二〇—一九九一）



樋口进与巴金。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出席巴金学术研讨会期间，探望巴金，摄于巴金寓所



樋口进与《随想录》日译者石上韶夫人到华东医院看望巴金



一九九〇年，巴金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第一届）创设特别奖，儿子李小棠赴日领奖，回国时，樋口进与李小棠摄于福冈机场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出席第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的部分代表拜访巴金，前排右三为樋口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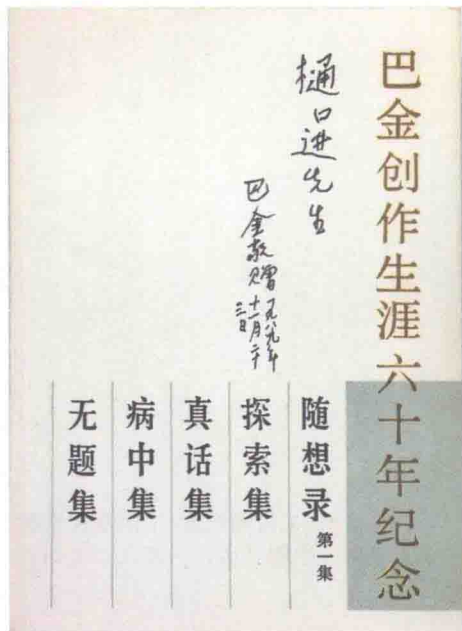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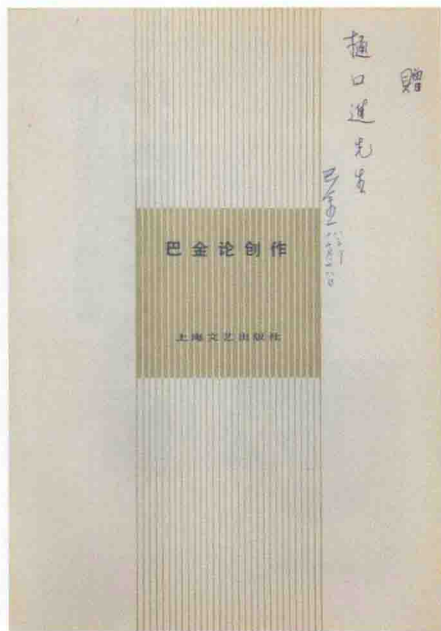
日本西南学院大学图书馆二楼展柜,藏有《随想录》《寒夜》《家》等著作的签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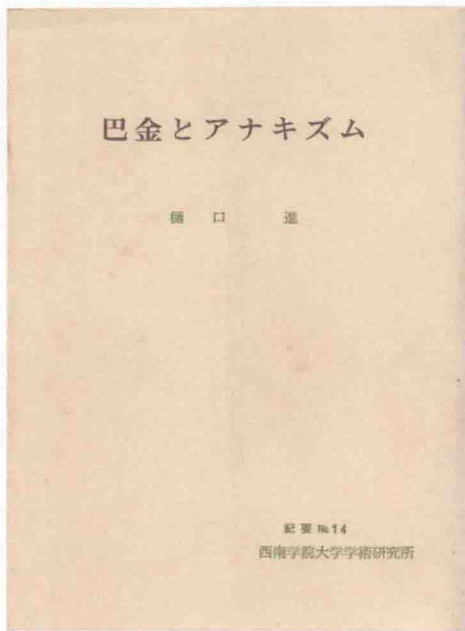


日本西南学院大学图书馆书库“樋口文库”的部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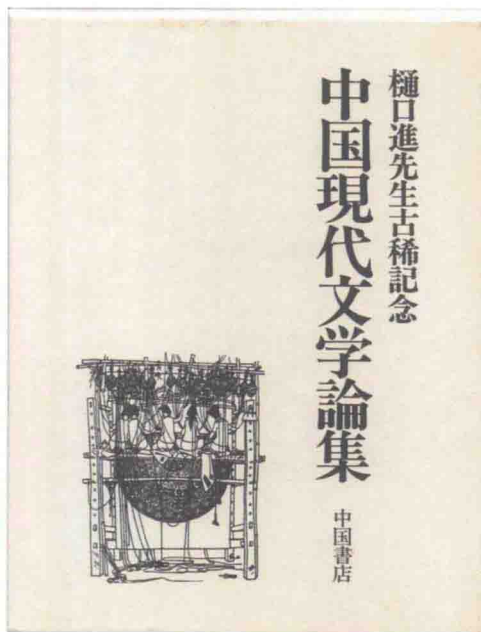


巴金赠送给樋口进的部分著作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书影（西南学院大学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十四号，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



《樋口进先生古稀纪念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书影（中国书店，一九九〇年四月十日）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

巴金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1957年10月

（上海）

1957年10月

巴金研究丛书

策划：巴金故居 巴金研究会

顾问：李小林

主编：陈思和 周立民

编委：孙 晶 李 辉 李存光 李国焯
陈子善 陈思和 周立民 臧建民

英 远 电 报 FACSIMILE

1. OFFICE OF ORIG. DATE TIME 2. WEIGHTS 3. NO. OF LINES REMARKS

新 SH/Tok 1. SHANBAH1 24 13:2 ppp

日本國 福岡市 早良區 西新 六丁目 2-92
西南大學 轉 樋口進先生家屬

樋口進先生家屬：

驚悉 樋口進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望家屬節哀。

巴 金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巴金致樋口進先生家屬的唁電

译者说明

1. 正文、引文中的作者原注均用方括号〔 〕标示。
2. 内容较长的注解均改为各章节或各篇章的尾注。正文中关于文献信息的注解均改为脚注。
3. 引文中明显的错字、衍文、脱落字、外文误拼、标点符号误用等均已修正，不逐一标注。
4. 引文中残损或辨识不清的文字均以□表示。
5. 引文、正文、注解中现较陌生的外国书刊名、城市名、人名等，均以（）标示外文名，不逐一标注。
6. 原文中关于书刊的出版、发刊日期、页码等信息不完整之处，译者已查阅资料并适加补充，不逐一标注。
7. 文中“アナキズム”“アナキスト”均译成“安那其主义”“安那其主义者”；“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均译成“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未作统一。
8. 译注与原注一同放入脚注，未另单设译注栏。内容简短的译注直接附在正文中。

目 录

译者说明	1
第一辑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	1
序 章	3
第一章 幼年时代	9
第二章 五四运动时期	16
第三章 从成都到上海	48
第四章 泉州民团训练所	103
尾 声	119
附录一 关于巴金的出生年月日、本名、笔名	121
附录二 巴黎的邵可侣家族 ——从芥泽光治良《爱、知、悲》谈起	131
第二辑 论文篇	141
巴金的信念 I	143
作品的秩序与现实社会的秩序 ——以巴金短篇小说《白鸟之歌》为例	157
巴金论 ——有关一九三五、三六年前后的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问题	164

巴金与西班牙内战(上)	
——关于巴金写于一九三六年九月的《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	181
南京时期的巴金(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	192
关于巴金小说《灭亡》的若干事	209
巴金的演讲《我和文学》	225
巴金小说《灭亡》中的爱与憎	240
《芾甘(巴金)致袁诗荃的书信》(一九二一年)解说	253
巴金《灭亡》论	276
第三辑 史料篇	303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前后的巴金	
——巴金文学的萌芽	305
五四时期巴金的诸篇论文及致袁诗荃的书信	316
译后记	341

第一辑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

序 章

本书标题为《巴金与安那其主义》。但严谨地讲,本书汇集了关于巴金与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方面的著作以及巴金与安那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来往的信息,这样讲会更加贴切。

第一章至第三章为传记式的记述。描述巴金成长成安那其主义者的过程时,这是最理想的写法。

本书内容及结构如下:

一九〇四年,巴金生于四川成都的官僚地主家庭。年幼时,他通过李氏家族公馆里的“上人”(像他的家庭与亲属那样过着富贵生活的人们)与“下人”(忍受贫苦、侍奉主人的佣人们)的对比,初次认识了“社会”。用巴金的话来讲,他能够具备这种意识,是因为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使他受到了启发。关怀别人,是表达“爱”的具体方式;互助的世界——包括帮助别人、得到别人帮助,则

是他所志向的世界。他通过母亲的“爱”理解了伦理的基本问题——人应该怎样活下去。不久，他开始把目光渐渐转移到允许“上人”的世界存续下去的社会本身。

正是在这一时期，巴金迎来了一九一四年五月四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接触了安那其主义并受其影响。他在年幼时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为此打下了基础。（第一章《幼年时代》）

在五四运动时期，巴金阅读了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书中指出了人世间的平与不合理并号召年轻一代创造维护正义的社会，渴望自己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能够为创造这样的社会做出贡献；同时，巴金又接触了廖·抗夫的戏剧《夜未央》——书中描写了在帝俄统治下为贫困人民献身工作的青年们，把这些青年的行动视为自己的指针，超越“上人”与“下人”的对比，踏入了“家”这一领域的外界。（第二章《五四运动时期》第一节《接触安那其主义》）

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春天来到上海之前这段时间，巴金参与了三种杂志的出版工作，从此，他与安那其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几篇直接讨论了安那其主义，介绍了外国安那其主义者所涉及的事件。此外，他还在这一时期成立了秘密结社“均社”，同时加入带有同一倾向的组织重庆“适社”。巴金就是以这种方式接触了安那其主义。巴金曾在《我的幼年》^①中说：“我被人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是从这时候起的。”也许他从事杂志编发工作所呈现的形象，给他带来了如此称呼。笔者认为，巴金呈现安那其主义者的形象，是在他能够通过与他者的对比，鲜明地认识到自我立场的下一个阶段，即上海时期。

就这样，巴金在这一时期展开了这些活动，当然，其历史背景则是五四运动。此外，他就读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时受到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当时，学校正在发行学艺讲演会主编的杂志《威克烈》(Weekly)，知名人士吴虞等人也在该校任教，不难想象，学校师生已对当时的社会动向以及新文化思潮表现出极为

^① 《中流》第1卷第1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5日，第8页。

敏感的反应。这即是他当时的生活环境。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在成都成立，成都的学潮逐渐开始扩大。（第二章《五四运动时期》第二节《杂志〈半月〉〈警群〉〈平民之声〉等》）

一九二三年春天，巴金与三哥（李尧林）离开成都，赴上海，后到南京，一度赴北京，又回到上海。一九二七年一月，巴金从上海起航，赴法留学。关于他在这段时间的行踪与工作，巴金的发言极为有限，只有一小部分。但其实，他在这段时间发表了多篇论文、译作、（书信、）传记。除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之外，笔者还没有查到原著，但关于知名安那其主义者的著作，以及记述了他们的动向或与安那其主义者相关的重大事件的文章和常识性相关信息，笔者已参考其他资料加注并增补内容，进而尝试讨论。（第三章《从成都到上海》第一节《上海、南京、上海》）

通过这些线索，笔者从巴金与爱玛·高德曼的关系入手讨论了《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第三章《从成都到上海》第二节《巴金与爱玛·高德曼》），并通过参考种种资料综合讨论了《黄庞死后的第四年》（第三章《从成都到上海》第三节《黄庞死后的第四年》），指出巴金由此呈现了安那其主义者的自我形象。

一九三六年时，巴金说他依然喜欢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仍旧信奉安那其主义，这是因为他对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献身工作的形象依旧念念不忘。因此，为了尽量掌握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动向，以考察其与巴金之间的关系，笔者以泉州民团训练所及其他为例展开了讨论。（第四章《泉州民团训练所》）

关于巴金最初接触安那其主义的时期以及他成长成安那其主义者的时期，大致可以从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角度概括如下。

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即刚刚进入二十世纪不久，中国的各种杂志开始介绍安那其主义的相关信息。然而，正式介绍安那其主义、从安那其主义的立场谈论中国政治及革命，还是始于李石曾等人于巴黎创办的《新世纪》

(一九〇七年六月至一九一〇年五月)以及刘师培等人于东京创办的《天义》(一九〇七年六月至一九〇八年三月)。

此后,刘师复等人继承前人的业绩,创办了安那其主义杂志《民声》(一九一三年八月创刊,由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刘师复去世,该刊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停刊;一九二一年三月复刊,同年七月停刊^①)。除了宣传活动之外,刘师复等人又在广州、上海等地展开了规模虽小、零散,但有组织性的活动。

那么,这一时期的欧美安那其主义运动又是如何?安那其主义产生思想影响并给具体活动带来影响,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至安那其主义者在一八九六年伦敦大会上被开除前后这段时间。除了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意大利总工会(Confederazione Generale del Lavoro)、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西班牙的劳工总会(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之外,具共产主义式社会主义倾向的势力逐渐开始扩大,安那其主义运动因此走向衰落。继承了安那其主义的具体实践活动的也只有工团主义(激进的产业工会主义,排除所有政治活动,要求以总同盟罢工、直接行动来实现产业管理,完成社会改造。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到了安那其主义被介绍到中国的二十世纪初期,在欧美,工团主义仍有影响,但安那其主义已经走向衰落。上述刘师复等人以工团主义为工会组织的宗旨,正符合这种历史潮流。

刘师复之后,一九一七年五月,“实社”在北京大学内成立,创办安那其主义杂志《实社自由录》。(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爆发。)一九一九年一月,实社联合南京群社、太原平社、上海吴稚晖等人的团体,成立了进化社,创办安那其主义杂志《进化》。(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巴金住在成都,初次接触了安那其主义,并在他所参与的三种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安那其主义的相关文章。这些文章,与其说是巴金依据欧美安那其主义运动的现状或是依照师复所标榜的工团主义写成的,不如说是他抓住安那其主义——试

① 同年8月15日,发行第34号,《民声》以此停刊。——译注

图实现没有统治者、绝不拘束个人自由的社会——将给当时他所所处的历史环境带来的有效性、革命性撰写的。巴金希望自己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理由亦在于此。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安那其主义者黄爱与同事庞人铨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劳工会，信奉工团主义。（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二年一月，黄爱与庞人铨因领导第一纱厂工人罢工，遭到军阀赵恒惕下属杀害。之后，湖南劳工会被查封，干部们逃往上海、天津、汉口等地，企图在各地重建组织。例如在逃往上海后成立“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的谌小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际，谌小岑等人与马克思主义派激烈争论，后把各种体系的因素引进组织，终于被编入国民党的劳动政策路线之中。

此外，当时发行的刊物有一九二二年七月创办的专以反苏反共为旗帜的安那其主义杂志《民钟》（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在巴金赴上海、南京、上海期间，即在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如此展开的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多篇论文、译作、（书信、）传记。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巴金从上海起航，前往巴黎。（关于巴金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的行踪及主要工作，附录三《巴金略年谱》已有简要概括。）

附录一《关于巴金的出生年月日、本名、笔名》

笔者意外发现，在日本与中国出版的人名词典、文学词典中，关于巴金的出生年份（月日）、本名、笔名的记载大不相同，因此特设此章。

附录二《巴黎的邵可侣家族——从芹泽光治良〈爱、知、悲〉谈起》

一九〇七年，李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吴稚晖（一八六五——一九五三）、褚民谊（一八八四——一九四六）等人在巴黎创办杂志《新世纪》。笔者在了解其成员之一褚民谊的生平事迹的过程中发现，把日本安那其主义者石川三四郎介绍给邵可侣家族的人即是褚民谊。石川三四郎也偶然把芹泽光治良介绍给邵可侣家族。芹泽光治良《爱、知、悲》（愛と知と悲しみと）描述了邵

可偈家当时的主人札克·邵可偈在中国所经历的充满波折的命运以及芹泽光治良在邵可偈家结识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芹泽光治良还在该书序言中说，他侨居法国时“也许[与巴金]在他[邵可偈]家里见过面，所以越来越对仁兄[巴金]感到亲近”。

上述这些人物虽然后来走过了各自不同的人生，但笔者却觉得通过信奉、关注安那其主义，他们像是被一根透明丝线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该书也与巴金有关，为此，笔者以芹泽光治良《爱、知、悲》为例讨论了巴黎的邵可偈家族。

附录三《巴金略年谱》^①

书末附简略年谱，供读者参考。

记述顺序为：公历（中国、日本的年号，年份），虚岁，居住地，与巴金相关的事项，著作，最后在括弧内略述历史背景。

底本为巴金有系统地编纂的《巴金文集》（第一卷〔一九五八年三月〕至第十四卷〔一九六二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另又增补了与本书相关的几篇文章。当然，除此之外巴金还有很多著作。

历史背景内容简略，主要从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记述。

巴金迁居广元县的年份为一九〇八年。这是根据巴金在广元县住了两年半后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回到成都的时间关系倒数推算得来的。“之前”不知具体指何年何月，故只好如此记述。

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的日期为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写作生活的回顾》中为“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②，而《我的幼年》中为“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到上海”^③。由于需要考虑到巴金赴法所需要的单程时间，笔者便采用了后者。

由于本书的性质，《巴金略年谱》只编到巴金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代表大会的一九四九年。至于一九五〇年以后的部分，笔者只列出了较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供作参考。

^① 译者翻译《巴金与安那其主义》一书时已删除附录三《巴金略年谱》。详见本书《译后记》。——译注

^②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开明书店，1936年2月，第7—8页。

^③ 1936年8月深夜。《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20页，1959年5月注。

第一章 幼年时代

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十月十九日）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在李家男孩中排行第四。

在他出生时家庭成员有：祖父，李某，名不详^①；父，李道河；母，陈淑芬；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另有两位姐姐（二姐与三姐）。关于二哥与大姐，他在著作中没有具体谈到，故二人身世不详，但估计是夭亡^②。

包括他的家庭在内，李氏家族住在同一所公馆里。这是一个大家族，他的叔父、叔母等长辈有二十余人，亲戚中堂兄弟、堂姐妹也超过了三十人。此外，

① 李镛（1854—1920），号皖云。——译注

② 巴金兄弟次序的排行是按照大家族的大排行，并非按照小家庭的排行。因此，“三哥”李尧林实际上是小家庭中的“二哥”。——译注

公馆里有男女仆婢三四十人。在李氏家族中，巴金一房属长房。

曾祖父在他出生时已过世，曾出任某县知县，著《醉墨山房仅存稿》^①一卷。

祖父是个既有才干又有本事的人。他继承了曾祖父积累下来的财产，结束了漫长的官僚生活后，辞去官职，购买田地，新建房屋，并搜集了大量的书画与古董。除了两次婚姻之外，又娶了两位姨太，生下很多儿女。作为李家的一家之长，祖父掌管了这个大家族。著诗集《秋棠山馆诗钞》^②一卷。

父亲也有出任知县的经历。大概从一九〇八年前后起，巴金在父亲的任地四川北部广元县衙内住了两年半。不久，父亲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辞去广元县知县的职务，回到成都，购买了四十亩田地，加上祖父分给他的二百亩土地，依此来维持家计。人们称他为清官。

母亲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女子，也是在巴金幼年时代对他影响最深的人。

他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度过了幼年时代，备受家人宠爱，兄弟间也很要好，这使他自由茁壮地成长起来。

① 《巴金自传》（自力出版社，1955年9月）第101页附有关于《醉墨山房仅存稿》的注解，如下：

我没有见过曾祖，但我读过他的醉墨山房仅存稿（一本诗文，一本公牒，是祖父刊印的，有一大堆木板藏在我们家里）。公牒中有着一段曾经使祖父和父亲感动而使我发笑的话：“……卑县城中之勇只存二百余名。欲请援兵，非但缓不济急，且旬日以来，饷银已竭，即有兵到，无饷给发，亦必生变。卑职现在计穷力竭，惟有激励人心，守一日，尽一日之职，一朝力尽，即偕同职妇××职女××××同时殉节，以仰我大人知遇之恩。所有八旬老母张氏及职子××拟临时派人送赴叙州，不知能否逃出，只好听命于天。此后能否具禀，尚不可知……”从这里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和为人。

巴金应第一出版社的请求创作了《片段的回忆》，后被改题为《巴金自传》，于1934年年底出版。引文出处为《巴金自传》复制本。

② 《家庭的环境》（《忆》。《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51页）中写有：“祖父也是诗人，还印过一册诗集《秋棠山馆诗钞》送人。”此外，《巴金自传》（自力出版社，1955年9月）第101页写有：

祖父还刊印了一部李氏诗词四种，包含着他自己的，我的两个祖母的，和我的姨姨的诗词，校对人名下排列了我们十几弟兄的名字，其实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校对是怎么一回事。

同父亲住在其任地广元县衙时，他看到有人在公堂上受笞刑便痛心难过，看到《烈女传》的插图会想起姐姐的身世，发现他最喜欢的大母鸡在厨房已被宰割便放声大哭。可见，他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

自一九〇八年前后起，他开始读书识字。在广元县衙内的私塾里，他与大哥、三哥、两个姐姐一同接受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为人温和的先生的辅导。不久，一位自称姓刘的先生开始正式指导他们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随着父亲辞去广元县知县一职，巴金也回到了成都。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他受到龙(或为“邓”)先生的指导。这位先生是维新派(新党派)的支持者，曾以激昂的语气向他诉说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意见。然而，巴金能够强烈意识到“家”外面的世界，还需要一段时间。

辛亥革命爆发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成立。军阀依然割据在成都一带，因此经常发生动乱。但这并没有给李氏家族带来巨大的冲击。

例如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袁世凯刚刚掀起复辟帝制不久，六叔等人听说士兵将被派遣到四川，于是组织了一支所谓侦察队，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巴金作为第一号侦察员接到“派遣”令，每天要向上汇报由仆人、马夫提供的不着边际的“军事情报”，可见生活还算是宁静。从表面上来看，李氏家族至少是平安无事的。李氏家族也许没有毫不关注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但他们的确缺乏认真面对这些情况、采取积极行动的姿态。

此时(一九一六年一月)，巴金还是一个刚刚满十一岁的少年，当然不会踏入“家”外面的世界。但在他内心，已经有了一种徐徐萌生、膨胀、成长起来的东西。

巴金用“爱”这个字形容它。笔者在上面说过，住在广元县时的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多愁善感的少年联系着他的“爱”，首先注意到了住在李家公馆里的仆人们。

自年幼时起，他就经常到仆人屋里去玩。在那里，这个感受性很强的少年了解了仆人们的欢乐与悲哀，目睹了他们忍受贫苦侍奉李氏家族却不得回报、被摧残而死的宿命。

可怜的赵升为主子操劳公馆里的琐事，但因病死去；有烟瘾的仆人周贵因偷了祖父的书画被赶出家门，沦落街头成了乞丐，终于悲惨地结束了一生；还有老轿夫悬梁自缢，等等。仆人们这些悲惨的形象与他们绝望的叹息，撼动了巴金的心。然而，他身边的人们则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归宿看待而不予过问，对此，他产生了实在难以言喻的焦急感与焦躁感。

在同一所公馆里，除了像他的家庭与亲属那样过着富贵生活的“上人”之外，还有生存在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的“下人”。通过双方的对比，他开始强烈意识到“下人”的存在。于是，他发誓要站在“下人”那边，为他们做些什么。

他的“爱”是这样萌生的，这种“爱”主要是通过他与母亲的沟通建立起来的。他的母亲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女子，这在上面已经说过；身为读书人阶层的子女，她同时又是接受过教育的聪明女子。同丈夫住在任地广元县时，她亲手养蚕，在日常生活中，她经常留意陶冶孩子们的情操。比如，她教孩子们学南唐后主《望江南》，给他们吟诵舒梦兰撰《白香词谱》等。

在这位聪明、充满慈爱的母亲的抚养下，他渐渐地理解了“爱”。他在《我的几个先生》中说：

……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极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叫我去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①

他又说：因为得到了母亲的爱才认识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之后才想到应该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他还在结尾说：“把我和这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②

^① 《短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3月，1945年5月再版，第23页。

^② 《我的几个先生》，同上书，第25页。

巴金经常使用“爱”字。看到他诚恳而又朴质地使用“爱”字时，笔者常常会感到羞愧，有时甚至会感到困惑。笔者的思考经常会在这里停留下来，自问：他的所谓“爱”到底是什么？巴金在《我的几个先生》中说“把我和这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那么我们就从“全性格的根柢”出发，讨论巴金的所谓“爱”。

笔者认为，他所说的全性格，指的是在他的生存过程中，通过一切具体行动表现出来的意志主体之某种基本特质；其根柢，则是意志主体之某种基本特质的发源深处。巴金是以“爱”字的首要意义，形容了这种构成他全性格的根柢的因素。

然而，仅以这种方法下定义却依然无法令人满意。这是因为尽管把“构成他全性格的根柢的因素”与“爱”字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仍然欠缺一种能够确认“构成他全性格的根柢的因素”亦即“爱”本身这一存在的依据。如果除了小小的期待或信以为然的姿态之外而毫无依据的话，那么我们将难以理解他的所谓“爱”的意思。

其实，他是用以下方法来确认它的：首先，假定人类天生赋有“构成他全性格的根柢的因素”即“爱”的特性；其次，把它上升为信念，并通过反复挖掘意志主体的发源深处的“爱”来重新确认“爱”。这样一来，它只能是一种通过实感来把握的东西了。其实，他也是把“爱”当作一种实感来把握、确认的。

巴金说他因为得到了母亲的爱才认识了爱，指的正是这种确认方法。他所得到的“爱”本身就是一种实感，一种实际存在。当他自己把意志主体的发源深处的因素以具体方式表达出来，并以具体行动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他的所谓“爱”的意思。而对当时的他来说，表达“爱”的具体方式即是关心别人，其具体行动即是彼此相助——包括帮助别人、得到别人帮助。

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这句话已经包含了这种意思。

另外，他又期望这份爱能够以充足的状态上升为社会的共同课题。即便它无法得到全面展开也无妨，但至少他向自己布置了一项任务——以具体方式去表达意志主体的发源深处的“爱”。

“把我和这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说明的正是这一点。

对于确认了这种“爱”的他来说，面对同一所公馆里“上人”与“下人”的差距而不予过问，这的确是件难堪的事情，可他却无能为力。这种意识发展了他拒绝“上人”的世界的态度。另外，为了便于以具体方式表达他的“爱”，他立誓站在“下人”那边。

他所说的“爱”，可以说是在他今后生存过程中的意志主体的原点。

正因为母亲是他的“世界的中心”，所以年幼时失去母亲（一九一四年八月）一定是他无上的悲哀；尽管如此，他通过母亲的“爱”，朴素、纯粹地理解了伦理的基本问题——人应该怎样活下去。

母亲去世后不到三年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他又遭遇了父亲的死。这给他的前途带来了一些意外。此外，他亲眼看到了父亲去世后，作为李家长房长孙的大哥为调和亲属间的关系而伤脑筋的样子。从此，他超越了上述“上人”与“下人”的对比问题，开始亲身意识到他对大家族制度本身的看法已逐渐在发生变化。

由于父亲去世，上中学的希望落空了。这种结果，与其说是经济条件带来的，不如说是祖父的观念所造成的，因为祖父原本就不喜欢子弟们到外边的学校读书。虽说要服从祖父的威令，但是大哥与三哥已经进了中学，所以当时巴金一定对父亲的死感到遗憾，渴望他依然健在。不久，他在家里开始跟香表哥^①学习起英语。

翌年（一九一八年）秋天，他开始在基督教青年会于成都创办的“英文补习学校”^②学习。得到祖父的允许也许会令人感到意外，其实祖父是别有理由的：到这所学校学习英语也许会在邮局就职；邮局的工作比较稳定，不会受到社会动荡的影响；另外，舅父在邮局的职位很高，是周围的人们所羡慕的对象；等等。

可是他在就学后，一个月里就病了三次。祖父担心他的健康，叫他退学，在

① 母系表兄弟，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生。曾向巴金提供了新知识，三年间热心指导他学习英语。

②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直属。该校是当时中国各城市的基督教青年会作为教育事业的一个环节创办的学校，在成都都是以英语教育为主。见外务省《西洋人的文化事业在中国》（欧美人ノ支那ニ于ケル文化事业），1925年12月，第488、489、492页。

家静养身体。于是,他开始在家里重新跟香表哥正式学习起英语了。

而在另一方面,父亲死后,家庭的重任便全部落在大哥一人的肩上。但最伤脑筋的不是他自己家庭的事情,而是怎样站在长房的立场来调和亲属间的关系。

大哥本来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为了调和这个大家族中其他亲属间的关系,他绞尽了脑汁。巴金通过大哥苦思焦虑的样子发现:乍一看,李氏家族表面上是一个平静、充满爱的亲属团体,其实,背后却暗中蠢动着各房之间的怨恨与对抗。对于渴望自由发展的他来说,李氏家族的这种亲属团体似乎是一块紧紧压住他的重石,于是他逐渐对大家族制度中的生活产生了厌恶感。

他一边跟香表哥学习英语,一边专心读书。

由于得到了母亲的“爱”,他开始意识到他与“社会”的关联;但对这一时期的他来说,“社会”不过是他通过公馆里“上人”与“下人”的对比关系所理解的“社会”。之后,他开始把目光渐渐转移到允许“上人”的世界存续下去的社会本身。

正在这一时期,巴金迎来了五四运动^①。

^① 笔者写作本章时主要参考了以下几种资料:《最初的回忆》《家庭的环境》(《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我的幼年》(《中流》第1卷第1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5日);《我的几个先生》(《短篇》,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45年5月再版);《家庭的环境》(《忆》,《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巴金自传》(自力出版社,1955年9月。1934年,第一出版社将巴金《片段的回忆》改题为《巴金自传》出版)。关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详见本书附录三《巴金略年谱》。

第二章 五四运动时期

一、接触安那其主义

巴金在《觉醒与活动》中谈到了他接触五四运动的经过：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①

^① 《忆》。《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71页。该篇原题为《信仰与活动》（1936年）。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的北京学生示威运动波及中国各地后，全国大规模地展开了工人罢工、商人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一些运动。

创办于一九一五年九月的《青年杂志》(翌年九月改名为《新青年》)所提倡的批判儒教、白话文运动以及一九一七年提倡的文学革命等，广泛促进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觉醒，而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反帝反封建的潮流也逐渐开始渗透到人们之中。一九一九年四月末，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的交还山东权益的要求被拒，消息传到中国后，舆论哗然，不满达到极点，终于爆发。

五四运动如此爆发后，广泛波及全国各城市。当然，成都的巴金的家族也受到了影响。

巴金如饥似渴地饱读了报上由北京发来的关于学潮的通讯以及有关上海“六三运动”^①的报道。

在他家里，大哥、三哥、香表哥、三婶女儿还有他，五个人组织了一个“研究会”，轮流阅览《新青年》等杂志，互相探讨杂志中论及的种种问题。

通过之前香表哥带来的消息以及大哥买给他的新刊图书等，他已经积累了一些新知识，或多或少已察觉到社会的动向。然而，他真正自觉到应该吸收新思想，走出“家”这一领域，接触外界社会的动向，还是在五四运动时期。

自此，他一本又一本贪婪地阅读了各种杂志。从是年到翌年间，他读过的杂志有《新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实社自由录》^②(一九一七年七月创刊)、《每周评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创刊)、《新潮》

① “六三运动”是指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决议，在北京各处举行街头讲演，造成一百七十八人被捕的事件。为响应这一风潮，上海学生举行讲演会、示威游行，七万工厂工人罢工。

② 1917年5月，以太侔、震瀛(袁振英)、竞成、超海等人为发起人，在北京大学内成立了实社。7月，创办《实社自由录》。编辑组有黄凌霜、区声白、震瀛(袁振英)、华林等人。系安那其主义不定期刊物。1917年7月发行第1集，1918年5月发行第2集。

(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创刊)、《进化》^①(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日创刊)、《星期评论》(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创刊)、《少年中国》(一九一九年七月创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②(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创刊)、《少年世界》(一九二〇年一月创刊),等等^③。

而仿佛是要响应这些杂志,在他的居住地成都也发行了各种杂志。如《星期日》^④(一九一九年七月创刊)、《四川学生潮》^⑤(一九二〇年创刊)、《威克烈》^⑥(一九一九年创刊),等等。杂志每出一期,他都会买来阅读^⑦。

就这样,巴金迎来了五四运动,“从睡梦中惊醒”,“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接触了安那其主义。

笔者认为,巴金在五四运动时期至一九二三年春天离开成都赴上海这段时间的处境,以及他与安那其主义的接触等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讨论。

一是,在一九一九年前后,他阅读了克鲁泡特金《告少年》、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以及爱玛·高德曼的著作(关于爱玛·高德曼,本书第三章另有综合论述)。如果用他的说法来讲,这些著作给他“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⑧。

二是,有关他出版杂志的具体活动(见本章第二节)。

① 安那其主义杂志。1917年5月,实社成立。1919年1月,实社联合南京群社(发行《人群》)、太原平社(发行《太平》)、上海吴稚晖等人的团体,成立了进化社,同月创办《进化》。1919年1月20日发行第1号,同年2月20日发行第2号,同年3月发行第3号。第3号为《师复纪念号》。同年5月被查禁。

② 1920年1月创刊。到同年5月,发行第1号至第17号,北京大学学生会出版。该刊原根据北京大学学生会章程第二条规定“本会以本互助之精神,谋学术之发展与社会之改造为宗旨”(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241页。——译注)编成,但由于编辑部中有“实社”成员黄凌霜、黄天俊、陈友琴等安那其主义者,约从第6号起,逐渐开始显现出安那其主义倾向。

③ 《信仰与活动》。《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17页。

④ 周刊。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会员主编,1919年7月创刊。首任编辑为李劫人。

⑤ 周刊。四川学生联合会编,1920年创刊。

⑥ 周刊。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艺讲演会主编,1919年12月创刊。“威克烈”即“Weekly”,周刊之意。

⑦ 《信仰与活动》。《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17页。

⑧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爱情的三部曲之一——雾》,开明书店,1938年11月,第54页。

《告少年》

巴金阅读的克鲁泡特金(Peter Alekseevich Kropotkin, 1842—1921)《告少年》(*Aux Jeunes Gens*),是真民(李石曾)^{〔注1〕}译自法文版的节译本^①。

巴金这样讲述他读完《告少年》时感到的震撼:

……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用一颗颤抖的心读完它。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那书后面附印着一些警句,里面有着这样的一句话:“天下第一乐事,雪夜闭门读禁书。”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这时起,我才明白地意识到正义的感觉。这正义感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②

巴金又说: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③

克鲁泡特金《告少年》分设医生、律师、工人、有学问有才能的人等几个部分,揭露了人世间各个领域中不合理的现状与原因,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呼吁青年们要从全人类的视野出发为获取自由与平等而奋斗。

我们先来回顾巴金读完《告少年》时感到的震撼。他说:《告少年》准确地、很有逻辑地替他说出了他至今想要表达却无法表达的一些想法;这使他开始意识到正义感,认识到要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使他在心里描绘出这即将到来的

① 克鲁泡特金《告少年》(1880年),真民译,“新世纪丛书”第1集(3),1907年。

② 《我的幼年》。《中流》第1卷第1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5日,第7页。

③ 《信仰与活动》。《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18页。

世界。

然而，仅以巴金的表述难以明确掌握他具体怎样理解《告少年》。因此，以下从《告少年》中选出几段与巴金感到震撼的表述相互符合的文字来讨论这一问题，但这不过是猜测。以下依据真民（李石曾）节译本对各部分内容加以概括，括弧中的内容为其摘要，为笔者所加。

* * * * *

讲给要当医生的青年的部分。

一位医生来到贫民街，看到一个因贫困、营养不足、缺乏新鲜空气而卧病不起的病人。关于医生这时的态度，作者说：难道你能够叫她吃些有营养的东西，到外面散散心，换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吗？如果她能够做得到，那么就根本用不着你来指教。相反，一位贵妇人因夜晚游荡而睡眠不足。作者将两者对立起来说：

……这世界上的事太不公道。他不应如此的苟且过去。不要先讲什么治病，所要防备的是那得病的原因。如果人要是稍为舒服些，稍为有点知识，天下病人要减少了一大半。……暖暖……好空气！好吃食！不过于辛苦！是要从这里做起。什么医生，那一半全是骗人的事！^①

（这里指出了贫富之差所带来的人世间的平与不合理，同时唤起要当医生的青年的觉醒。）

讲给要当律师的青年的部分。

作者从佃户因付不起地租所引起的租佃纠纷谈起：

^① 《告少年》，“新世纪丛书”第1集(3)，第3页。——译注

……便要受那法律的罚。这法律是永远偏护业主[地主]。那业主永远理长。你的良心未死,你将如何做去?若照法律做是驱逐乡人,照公理做要酬报乡人出的苦力。所以这法律与公理不能相容并立的。你到底照那样去做?①

之后,作者又谈到工人罢工以及失业工人从肉店偷去一块肉等事情:

……总而言之,一个人犯的罪是社会上众人给他作成的。……

如果你细细思量那法律,总是那强权得胜,弱小的吃亏。从此你便要不满意起这法律来了。你晓得守法的人就是莫有良心的人。这时你要同我们来改正那钱财上、政治上、一切社会上不平的事了。如此你便成了社会党、革命党了。②

(这里指出以下几点:行使法律很少会考虑到实际情况;人们已经成为法律条文的奴隶;它带来了经济、政治、社会上的不公正;我们要从更人道的立场出发,努力改正法律本身,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是社会主义者、革命家。)

讲给工人的部分。

雇主想设法降低工人的工钱,他们当然不会同意。但雇主会说:“如果你们不肯照这个价钱,你就滚去吃草罢了。”③雇主把工人当作禽兽看待……这时,工人会发现社会主义者的话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者曾劝告工人:

……“反对那奴隶经济的主义。因为这是一切奴隶主义的原因。”如此你便入了社会党,帮同他们打破那经济、政治、社会上一切奴隶主义。④

(这里说的是工人应该加入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一起割断工人与雇主间形成的经济隶属关系,这是年轻工人应该做的事情。)

① 《告少年》,“新世纪丛书”第1集(3),第6页。——译注

② 《告少年》,同上书,第7页。——译注

③ 《告少年》,同上书,第16页。——译注

④ 同上。——译注

讲给有学问有才能的人的部分。

关于应该怎样利用学问与才能的问题,作者说:不要作官长,而要作朋友;不要作制人、教人的人,而要作唤醒别人的人,勤奋、诚恳地帮助别人。作者又说:“我们所作的全是为求真理、求公道、求平等。人生一世那还能寻得比这个再好的是么?”^①

作者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全部要为真理、公道、平等付出。

最后,作者在总说部分指出:

你们一切的少年,或是男、或是女,或是农工、或是兵丁,你们全晓得你们的权利,你们当要来与我们[社会主义者]同心竭力做那革命的事。惟有这法,可以胜那奴隶主义,破除一切旧习,开通那条新路,成了那社会上的真平等、真自由。众人合力去工作,众人同享幸福。这才是那正当的人生呢!

在文章结尾,作者又指出:

……总而言之,我们这班多数的苦人如同一个大海似的,无论什么东西全可以被沉灭。只要我们有一点志气,一刻的功夫可以作出那公道来。^②

* * * * *

以上内容可以概括如下:医生的部分指出了社会的不平与不合理;律师的部分指出了我们要从人道的立场出发改正法律,为此奋斗的人才是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工人的部分指出了工人应该加入社会主义者的队伍,割断经济隶属关系;有学问有才能的人的部分指出了一切工作全部要为真理、公道、平等付出;总说的部分指出了以上所有的人只要有意志,即可创造出维护正义的社

① 《告少年》,“新世纪丛书”第1集(3),第13页。——译注

② 《告少年》,同上书,第17页。——译注

会——一个实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众人合力工作、同享幸福的社会。

如上所述,年幼时由于得到了母亲的“爱”,巴金才认识了“爱”,才知道同情别人、帮助别人或彼此相助才是表现“爱”的具体行动。对这种“爱”的自觉,又使他意识到住在同一所公馆里的“上人”与“下人”的差距。他希望铲除它,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于是他开始拒绝“上人”的世界。而在父亲去世后,他逐渐对大家族制度本身产生了厌恶感。

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巴金阅读了《告少年》。在此之前,他认为或多或少要以“爱”去铲除“下人”不平的生存状态;但读完《告少年》后,他开始意识到“家”这一领域的外界(社会),认为如果要想铲除“下人”不平的生存状态,不能只把问题局限在“家”的范围内来处理,应该把它放在外界(社会)的问题中去理解,为此,他开始思考一种能够同时解决“家”的内部问题(爱与恨)的方法。《告少年》告诉他,企图改革社会的人们只要有改革的意志,即可创造出维护正义的社会——不平已被铲除的社会。他用“正义感”一词形容了这种自觉。

此外,巴金通过《告少年》认识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这使他重新确认了年幼时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去创造一个众人合力工作、同享幸福的社会……充分具备这种意志的行动需要一种前提,即所有的人都要彼此相助。

前面引用了巴金读完《告少年》时感到震撼的两段文字,但至于巴金自己究竟怎样理解《告少年》的内容,怎样把它联系在他自身的问题上,这些层面尚不清楚。笔者之所以把巴金与《告少年》联系起来特意展开推论,其意图也正在于或多或少试图揭示这些层面。

通过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巴金初次正式接触了安那其主义。由此他意识到正义感,渴望自己成为一名《告少年》所讲的“社会主义者”。

《夜未央》

关于廖·抗夫(Leopold Kampf, 1881—?, 波兰人)的戏剧(三幕剧)《夜未

央》，巴金在小说《春》的注解^①中说：这部戏剧曾于一九〇七年在巴黎上演，一九〇八年巴黎世界社出版中译本，一九二〇年有人在上海翻印过，我在《申报》上看到广告，于是买了一本^②。

巴金这样回忆他读完《夜未央》时的心情：

……我形容不出来这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③

巴金又说：

……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④

① 《巴金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月，第382页）中关于《夜未央》的注解如下：

《夜未央》是波兰人廖·抗夫（1881—？）写的三幕剧，1907年在巴黎公演，中译本1908年由巴黎世界社出版，1920年有人在上海翻印过。我当时看见《申报》上的广告，用邮票代价买了一本来。朋友们见到它，曾借去抄录了几份，作为排演的底本。后来他们就演出了这个戏。

小说《春》中提到了排演《夜未央》的计划，又举出了剧中人物的几个名字。至于戏剧内容，小说只提供了部分信息，并没有展示戏剧全貌。

② 《巴金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月，第382页。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店，1954年12月，第319页）写有“波兰部分 夜未央 廖亢夫作 李石曾译 1908年广州革新书局版”，估计巴金阅读的译本是李石曾的译作。

③ 《我的幼年》。《中流》第1卷第1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5日，第8页。

④ 《信仰与活动》。《水星》第2卷第2期，文华书局，1935年5月，第117—118页。

笔者没有查阅到《夜未央》的李石曾译本及巴金译本^①，但以下两份不完整资料——（一）《夜未央》梗概介绍；（二）一名观众在巴黎观赏戏剧后写下的《观剧记》——或多或少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巴金初次阅读《夜未央》时深受感动的表述。

（一）杨家骆《民国以来出版新书总目提要（上册）》（中国辞典馆复馆筹备处印行，一九三三年七月南京初版，一九七一年一月台北再版）第八一二一—八一三页介绍了李石曾译、开明书店版《夜未央》的梗概。

（二）《新世纪》（周刊，发行所位于巴黎侣濮街〔Rue Broca〕四号）于第三十号（一九〇八年一月十八日）、第三十一号（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二号（一九〇八年二月一日）共分三次连载了《夜未央》的观者来稿《美术学院观剧记》。

关于剧中人物的名字，与（一）相比（二）略有不同，但在戏剧内容方面二文基本一致。由于（一）的梗概较为完整，引如下，供作参考。

……《夜未央》波兰虚无主义的作品。全剧分三幕。一个俄国虚无党的实事，党人玛霞、苏菲亚、昂东、华希里等共同在秘密条件之下工作着，有的在黑房中印刷着机关报光明，有的在忙着折报。

当军警来会同检查的时候，他们都抱着不干涉的态度。

华希里的爱人光明报的女通信员安娜，带着几个文件进入黑房来。那是两张传单：一个是关于罢工，另一个是为了骚动，要赶快印刷的。他们感到要使黑暗的俄国变为自由的俄国，非把血钟响起不可，因此在加紧工作着，尤其是青年华希里，更积极地布置着机密的行动。他是在巴黎暗探监视之下不能活动的一个人，最初才从那里匆匆回来的。在他的影响之下，有一个青年学生苏沙向他表示愿意参加

①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店，1954年12月）所收卷2《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第287页“八 波兰”中写有“薇娜 蒂甘 开明”，左侧附记“薇娜，夜未央（剧）”。此外，扬风在《巴金论》（《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1957年7月8日）第166页中说巴金重译《夜未央》后将其改名为《前夜》。此外，余思牧《作家巴金》（南国出版社，1964年8月）第170页“四 巴金的翻译”中写有“夜未央（廖抗夫著，1936年文化生活版）”。尽管版本如此丰富，但笔者都没有查阅到。

工作,但正当活动之中苏沙在一阵惊天动地的枪声中,被刀头刺伤,流血的人,被流放的人,也不知有多多少少。恐怖震撼着整个的社会。

华希里下着很大的决心,忽探得巡抚将于某夜观剧的消息。一方面便动员了其他同志打听那巡抚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便准备炸药。这时一切都已布置完竣,因戏院靠近安娜的姑母家,便特来这里和她谋最后的一面,同时要她在窗畔窥观巡抚的出院而为他设备灯光以为信号。

安娜为着她对他的爱,是不忍这样干,但为着明天的光明,她终于答应了他对她的要求。华希里和安娜便相对吻别。

当夜,安娜看见巡抚上车的时候,顿即擦亮火柴,燃上蜡烛,刚才举到窗畔,街头的一声轰炸的巨声便把安娜都惊倒地上,爱人的名字从她的口唇中叫喊出来。……

《新世纪》(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载有一篇与(二)《夜未央》观剧记相关的文章。该篇预告了波兰人创作的革命剧近日将在巴黎美术剧院(Théâtre des Arts)上演一事。杂志编者在文中简单地写下了戏剧内容,如下:

……日前内部大臣已遣人往索剧稿。盖因此剧之表面情节。其主要,系一女子,助轰一警吏。或谓实则此女子,即暗指苏菲亚。而警吏即为亚历山大第二之代表。盖一切关目,皆与当时实事,吻合无间。……^①

说起苏菲亚,当时人们会想起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公历三月十三日)领导成员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苏菲亚·佩罗夫斯卡娅(Sophia Perovskaya, 1853—1881)。杂志编者又说:本想上演苏菲亚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但法国内部大臣正在搜索剧本,因此剧情表面上略有改动,希望观众能够看出剧中的暗示^②。

^① 真《苏菲亚》。《新世纪》第27号,第3页。——译注

^② 作者的说明与原文内容略有出入,详见注^①所引原文。——译注

如上所述,自《新世纪》第三十号(一九〇八年一月十八日)起连续三次(一月十八日、一月二十五日、二月一日)见刊的上述观者来稿《美术院观剧记》对剧情的介绍,与李石曾译本梗概^①内容大致相同。作者采用了直接再现剧情的手法,内容比李石曾译本梗概还要详细。由于内容上有所重复,不逐一介绍,而第三十号(一月十八日)“前言”中的文字值得留意:

……又贵报前云此剧系暗相影射,借演苏菲亚助刺亚历山大第二故事。恐传闻略有所误。剧中实有苏菲亚其人。然仅及其居莫斯科秘密印刷社一事,以为陪衬。此剧之主要,乃为安宜娥女士[李石曾译为“安娜”],助华西礼君刺莫斯科之巡抚也。……^②

这位观众所要强调的是:他没有从这部戏剧中看出有关苏菲亚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任何暗示,这部戏剧的故事与事实完全不同。假如现在,我们把该剧剧情与据说是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亚历山大二世刺杀事件的薇娜·妃格念尔(Vera Figner, 1852—1942)的回忆录《俄罗斯的暗夜》(ロシアの夜)^③加以对照便会发现,这位观众的话是正确的。上面已经说过,《美术院观剧记》的剧情与李石曾译《夜未央》的梗概大致相同,可是李石曾译本中的剧中人物的名字如华希里、安娜、苏沙,在《美术院观剧记》中分别为华西礼、安宜娥、少年;此外,《美术院观剧记》中没有出现玛霞与昂东的名字,但增添了江毕道等两三个配角。

《美术院观剧记》中的“安宜娥”在巴金小说《春》第三八六页中为“安娥”,巴金另在该处附注说明“‘安娥’是旧译本的译名,原文全名是:安娜·利堪斯卡

① 即杨家骆所写的李石曾译《夜未央》的梗概。——译注

② 《新世纪》第30号,第3页。——译注

③ 《世界纪实文学全集》(世界ノンフィクション全集)第21卷,金子幸彦、和田春树译,筑摩书房,1961年10月15日。

雅”，因此李石曾的译名“安娜”更恰当^①。

巴金通过《告少年》渴望自己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又通过《夜未央》“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通过“上人”与“下人”的对比，巴金以本能抓住了正义感，这又使他向往成为《夜未央》中的“英雄”，走出“家”这一领域。此后，他开始从事杂志出版工作。

注解

〔注 1〕

李石曾(1881—1973)。

本名煜瀛，字石曾，笔名石僧，在《新世纪》中署笔名真、真民。1881年5月29日生，河北高阳人。1895年，拜齐令辰为师。1902年，以随员身份与张静江一同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途中在上海与吴稚晖、蔡元培相识。1903年，进入蒙塔日农业实用学校(École Pratique d'Agriculture du Chesnay à Montargis)，历三年毕业，后进入巴斯德学院(Institut Pasteur)，在柏尔唐(Gabriel Emile Bertrand, 1867—1962)教授指导下研究生物化学，特别注重大豆研究。同一时期，又接触了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1744—1829)的生物进化哲学以及克鲁泡特金(Peter Alekseevich Kropotkin, 1842—1921)的互助论等。1906年，发起组织“世界社”，筹备编印《新世纪》。经张静江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创办《新世纪》(自1907年6月22日发刊至1910年5月21日停刊，共发行一百二十一号)，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安那其主义学说，又从安那其主义的立场讨论中国政治与革命的问题。

^① 作者根据杨家骆所写的李石曾译《夜未央》的梗概做出了如此判断，然而，梗概中的“华希里”“安娜”“玛霞”，在李石曾译《夜未央》(革新书局，1908年10月初版，1928年5月四版)中则为“桦西里”“安娥”“马霞”。——译注

题。另出版《世界画报》。1908年，张继赴法，与吴稚晖、褚民谊一同寄居在《新世纪》宿舍。1909年，在巴黎设立“豆腐公司”，提倡素食，并毕生坚持素食。出版著作《大豆》。1911年夏天，归国。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与黄复生、赵铁桥等人在天津组织京津同盟会，出版《民意报》。1912年，与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发起进德会，又与唐绍仪、宋教仁等人发起社会改良会。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设立留法预备学校。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赴英，后赴法。1914年，与蔡元培在法国组织留法西南维持会，救助留法学生。1915年，设立勤工俭学会，任华法教育会副会长（会长为蔡元培）。1916年，创办《旅欧杂志》。1917年，归国，任北京大学生物学、社会学教授。1919年，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先后协助学生两千余人赴法工读。1920年，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任董事长。同年，赴法，在里昂设立中法大学。1923年，以中法大学理事长兼代校长。1924年，一时任冯玉祥顾问，后与政界建立关系，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其后连任至第六届。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被段祺瑞执政府下令通缉。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清党运动。4月18日，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4月27日，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5月9日，蔡元培、张静江、褚民谊等十一人，同被任命为国立劳动大学筹备委员。1928年，北伐告成后，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及国立北平大学校长。1929年，任大学委员会委员。同年，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任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几次往来欧美、香港、重庆间，致力于国民外交。1945年，归国，主持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并督导复员。1948年，任国民政府总统府资政。1949年，赴瑞士，后将他于海外创办的文化事业迁移到南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1952年，中国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评议委员，加入主席团。之后数年，往来国内外，从事文化活动，恢复世界社等组织。1956年，于台湾定居。1973年9月30日，病逝。（参考：李书华《辛亥革命前后的李石曾先生》，《传记文学》第24卷第2期，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2月1日，

第 42—46 页；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18)》“李煜瀛”，《传记文学》第 25 卷第 4 期，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 年 10 月 1 日，第 100—101 页。）

二、杂志《半月》《警群》《平民之声》等

一九二〇年夏天，巴金与三哥一同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①，秋天入学，接受外语(英语)及社会科学等教育。当时，学校正在发行外国语专门学校学艺讲演会主编的杂志《威克烈》(Weekly)^②，而该校又是因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③等文章成名的吴虞的任教、活跃之地。不难想象，学校师生已对当时的社会动向以及新文化思潮表现出极为敏感的反应。

巴金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后，念了两年半，但不料校方因他没有读完正规中学的四年课程，没有拿到中学毕业文凭，中途便把他的身份改为旁听生。于是他才知道，校方已不承认他的正式学生的身份了，即使与其他同学一起读完课程，也拿不到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毕业文凭。

这件事改变了继母(一九一四年八月，母亲陈淑芬病故，不久父亲再婚)与大哥的意见，成为他们同意巴金去上海的一个原因。但这是在一九二三年年初的事情，从是年秋天算起还有两年半的时间。

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春天，在巴金去上海之前的这段时间，他在成

① 据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 1 册》(商务印书馆，1935 年 5 月，第 51 页)介绍，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创办于 1913 年。该校于所谓“壬子癸丑学制”(壬子为 1912 年，癸丑为 1913 年，该学制于中华民国成立后修订而成)颁布后成立，教育内容与校名相同，以外语课程为主展开社会学方面的教育。按“壬子癸丑学制图”(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 10 月，第 231 页)的说明，进入专门学校需要初等小学校四年毕业、高等小学校三年毕业、中学校四年毕业。专门学校的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三或四年。巴金就读了补习科、预科、本科，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半。

② 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59 年 4 月，第 169 页。

③ 《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1917 年 2 月 1 日，第 1—4 页。

都参与了三种杂志(《半月》^①《警群》《平民之声》)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他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直接讨论安那其主义,介绍外国安那其主义者所涉及的事件。

下面依据巴金《小小的经验》^②《觉醒与活动》^③等几篇回忆录来勾勒他与这些刊物的关系。其情形大致如下。

巴金最初参与的杂志是《半月》。《半月》并不是他创办的。大概在该刊发行到第八、九号时,他向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之后他收到了复信,编辑又来他家里做客。从此他们结为朋友,不久他成了杂志同人,并开始从事编辑工作。

《半月》第十号发行不久,成都的学生会为创办“平民学校”^[注1]筹措款项上演戏剧时,遭到成都军人骚扰,与军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结果,学生深受打击,但风潮则逐渐扩大起来。《半月》马上报道了这起事件,巴金的一位朋友发表了一篇有关事件始末的笔锋锐利的文章。不料,当局寄来一份公文,说如不立即删除那位朋友发表的那篇文章则将禁止《半月》发行。于是他们在文章上盖了“本文奉×××××命令抽去”的朱红色字的图章,又把文章前后两行用墨涂去,蒙混官方继续发行。

一九二一年,《半月》发行第二十四号。在他们准备举行周年纪念活动时,当局突然下令查禁杂志,是因为《半月》提倡女子剪发。当时,女子剪发被看成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巴金也在第二十四号发表了一篇文章,用他的说法来讲,文章内容“对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予以否定”。

① 1. 据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汇文阁书店,1972年9月,第56—59页)介绍,自1921年至1925年,大东书局发行了周瘦鹃编辑的半月刊同名杂志《半月》,但这份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当然不是巴金等人曾参与的那一种。

2. 据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第70页)介绍,自1937年10月起,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了郑森禹、魏友棻编辑的同名杂志《半月》,共办三期。由于发行时间较晚,该刊也当然不是巴金等人曾参与的那一种。

② 《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19—130页。

③ 《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71—80页。

正在《半月》被当局查禁前后，四川三个女学生^①剪发的消息在社会上哄传开了。

位于成都的四川省会警察厅立即发出布告，禁止女子剪发。《半月》不顾查禁命令，又刊载了两三篇批判文章，其中一篇是一名剪了发的女学生的文章。这又刺激了四川省会警察厅，《半月》再次成为取缔对象。巴金等人几次向警察厅写信质问，最终还是受到查禁处分^②。

尽管被逼迫到如此处境，他们还是秘密发行了一期停刊号。在这一期上，他们对杂志不得不停刊的经过做了详细的说明，尤其是一位年纪较大的朋友^[注2]所写的慷慨激昂的两篇长文，读起来会令人热血沸腾。

这位朋友不久于成都的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为谋生离开了成都，之后巴金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他获悉这位朋友于一九二八年在动荡的环境中被军阀杀害。

巴金与《半月》的关系大致如此。巴金说他在《半月》上发表过三四篇文章，但他谈到的文章只有上述载于《半月》第二十四号的一篇，以及介绍 IWW

① 张秀熟在《五四运动在四川》（《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59年4月，第170页）中提到剪发的女学生有“益川女学、蓉城女学、女子实业学校的几个学生”，不知她们是否就是巴金谈到的三个女学生，但可作旁证。此外，作者又在同书同页介绍了1920年5月发行的《威克烈》第19期所载“小燕女士”《我剪发的经过》的摘录。从时间关系来看，这比巴金等人在《半月》上提倡女子剪发还要早些，所以当然应该像《半月》那样遭到当局查禁，但文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在笔者看来，这也许是因为“小燕女士”不是四川人，人们没有对她产生亲近感，或是因为该篇是从其他刊物转载而来，被视为常见的“女子剪发论”而没有得到注意。

巴金在《谈〈家〉》（《巴金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第349页）中说：“三个剪了辫子的女学生在成都还站不住脚，只得逃往上海和北京去。”

② 以下资料可作旁证。张秀熟在《五四运动在四川》（《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59年4月，第170页）中说：

……1921年，军阀刘存厚手下的省会警察厅竟张贴皇皇布告，禁止剪发，《半月报》提出反对，警察厅竟把它明令查封了。五四运动中查封报馆，这还是第一次，而罪状是为了反对禁止剪发。……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篇。

其次,巴金参与的杂志是《警群》。《半月》被查禁后不久,《警群》——几位较为年长者准备出版的杂志——编辑邀请巴金等八人参与,于是他们成了杂志同人,并开始从事编辑工作。巴金等人在该刊发表了两篇关于女子剪发问题的论文,以及两篇有关社会问题的论文;巴金自己也发表了一篇有关社会问题的论文,题为《中国人的到幸福的路》。之后因与杂志编辑意见不合,巴金等八人离开了该刊。不久,《警群》也停刊了。

大约在半年后(估计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巴金等人创办了《平民之声》^①。与上述两种杂志不同,这次由巴金担任编辑,通信处也设在他家。

第一期清样印好后,应印刷局的强烈要求,他们把清样送到警察厅接受检查。警察厅马上寄来复信,先提到杂志言论过激,对于国家安宁恐有妨害,不能许可发行,后又举出一些条件,结尾则写道:“庶不背乎造福社会之主旨。”于是巴金等人以半公开的方式继续发行杂志,再也没有向警察厅提交清样接受检查。之后,杂志文章又多次被警察厅检察员删除、开天窗,遭到多种妨碍,但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巴金等人就换印刷局,总之把杂志继续办到第八期。

巴金在《平民之声》上发表的四篇文章是:《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第四期)、论述托尔斯泰社会思想的文章(第五期)、从北京的杂志转载的《支加哥殉道者》(第六期)、“心社”社约解说(最后一期,《师复纪念号》)。

以上是巴金在这一时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年初前后)与三种杂志(《半月》《警群》《平民之声》)之间的关系。下面重新整理排列巴金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1) “对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予以否定”的文章(《半月》第二十四号)

(2) 对 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介

^① 刘师复等人创办的杂志《晦鸣录》(1913年8月20日创刊)又名《平民之声》,但当然与该刊不同。巴金等人为杂志取名时或许受其启发。

绍(《半月》,期数不详)^①

(3)《中国人的到幸福的路》(《警群》,期数不详)

(4)《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平民之声》第四期)

(5)论述托尔斯泰社会思想的文章(《平民之声》第五期)

(6)《支加哥殉道者》(《平民之声》第六期)

(7)“心社”社约解说(《平民之声》最后一期,《师复纪念号》)

笔者没有找到这几份杂志,当然也无法准确指出巴金的文章的内容。特别是(3)与(5)的内容根本无法推测。至于其他几篇文章的内容,大致可以依靠上述资料提供的巴金与杂志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材料加以推断。

巴金写于这一时期的文章,可以说是为下一个阶段(一九二三年春天至一九二七年一月,上海、南京、上海的时期)的写作打下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辨别此后巴金的动向以及他与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之变化时极为重要的资料,是不能忽视的部分。因此,笔者在所能掌握的范围梳理了以下几点。

(1)“对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予以否定”的文章(《半月》第二十四号)

这是发表在提倡女子剪发的第二十四号的一篇。当时在四川一带,按一般家庭的常识来讲,女子剪发还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半月》却敢于率先挑战这一问题。巴金的这篇文章也许与《半月》同人们的干劲及热情的气氛有关。回顾当时情形时巴金本人也曾说过:“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很会写些感情的话语,我大胆的凭着个人的直觉否定了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②在女子剪发作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已成为人们的共同观念的那个年代,巴金通过社会制度这一观念掌握了支撑着这种共同观念的社会背景,大胆地予以否定。

(2)对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介绍(《半月》,期数不详)

^① 《IWW与中国劳动者》。《半月》第21号,成都半月社,1921年6月1日,第8—10页。——译注

^② 《小小的经验》。《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21页。

关于一九〇五年在美国成立的 IWW 的相关信息,巴金说他是从其他刊物(不详)上抄来的,因此,我们难以判断巴金撰稿时写了 IWW 的哪些方面,文章的焦点又放在何处^①。但如果根据本节结尾另要讨论的载于《民声》(第三十一号)的《美国同志 L. H. Roueche 来函》以及(6)《芝加哥殉道者》来推断的话,估计巴金围绕 IWW 的革命性以及 IWW 内部的安那其主义团体写了这篇文章。

关于 IWW 的创建与性质及 IWW 内部安那其主义者的动向这两个方面,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安那其主义 II 运动篇》(アナキズム II 运动篇)^②中有客观、简洁、完整的总结。

首先,该书第三一二页谈到了 IWW 的创建与性质。

……这是一个由于广大工人对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改良主义不满,从职工工会转向产业工会联合、社会主义方向,再于一九〇五年成立的具有战斗性的工会组织(当时拥有四万成员)。当初,偏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左派掌握了领导权,但自一九〇八年前后起,与 CGT 交流,深受安那其主义的影响,于是远离政治活动。世界产联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一贯坚持急进、战斗的立场,指导直接行动、总同盟罢工,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但由于展开反动立法、恐怖主义等活动,失去了领导人,历经几度分裂后走向衰落,其中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③

文中“自一九〇八年前后起,与 CGT 交流,深受安那其主义的影响,于是远

① 巴金在《片段的记录》(《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68页)中说:

……我还写了介绍 I. W. W. 的论文,自然免不了抄书,不过那时完全没有表显自己的意思,只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点东西,让别人也知道。……

② 白井厚译,纪伊国屋书店,1968年7月31日。

③ 该处为日译本译者附加的译注,并非伍德科克本人的文字。——译注

离政治活动”是说：自一九〇八年前后起，因与法国 CGT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法国总工会) 之间的交流, IWW 受到了 CGT 的工团主义^①倾向的影响, 面对其内部偏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左派, 偏向安那其主义的势力否定了政治活动, 提倡采取直接行动。

其次, 该书第三〇二页又谈到了 IWW 内部安那其主义者的动向。

……一九〇五年以后, 关注工人组织的一些安那其主义者逐渐加入了受法国工团主义影响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但在这派别复杂的组织中, 他们不过是在多数团体中构成了一小团体, 未曾支配过全体组织。尽管 IWW 从美国开垦地的严峻传统获得了充分活力并吸取了许多方法, 但实际上仅展开了类似于安那其主义的运动而已。由于组织拥有多数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终究未能形成真正(强调自由意志的)组织; 而世界产联中心思想的一大工会 (One Big Union) 又与安那其主义者满怀激情提倡的地方主义、反中央集权之理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对立。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 IWW 的理解, 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说明巴金介绍 IWW 的方式, 界定其内容的范围。

与此相关的资料有《美国同志 L. H. Roueche 来函》, 该篇估计写于巴金介绍 IWW 的前后。

这是美国同志 L. H. Roueche 寄给《民声》的书信, 作者以 IWW 为例, 讲述了布尔什维克与安那其主义者团体的联合的可能性, 内容如下:

此间之所谓布尔扎维克党人多从事于议会运动, 只有“世界生产者同盟 I. W. W.”是

^① 激进的产业工会主义, 排除所有政治活动, 要求以总同盟罢工、直接行动来实现产业管理, 完成社会改造。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主张革命的。[主张革命的]真正的共产党仅居少数。在我意见以为无政府党和布尔扎维克党都可以联合起来的,但是有一条件,就是无政府党人要承认当中产阶级的政府仍然能发生危险的时候,劳工专政是一定要的,虽然马克思和巴枯宁所采用之手段略有不同,但求达革命之目的则一。在本国[美国]无政府党和布尔扎维克党想大部分都已联合起来了。我们的同志美那 Robert Minor 当他初到俄国的时候,觉得专制 diktaturo[独裁权、独裁]是魔鬼的事业,后来他和列宁辩论之后,他回到美国到各地方讲演,都说劳工专政为达到我们目的的一种有效力的方法,无论布尔扎维克社会党无政府党都是一样。……^①

读完该信可以发现两点。一是,IWW 这一组织当时强调革命性的程度,比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还要激烈。IWW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估计也是被这样议论的。这也可以通过一种曲折的对比——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党员只会从事议会活动——推断出来。

巴金对 IWW 的介绍也一定呈现了这些因素。

二是,该信作者 L. H. Roueche 同志——《民声》称他为同志,估计是美国安那其主义者——的同志美那赴俄,与列宁展开辩论后提出的观点:既然实现革命的目的相同,我们应该支持无产阶级专政,至少在中产阶级政府即将诞生的危险时刻,安那其主义者团体应该对此表示支持。可见,L. H. Roueche 与美那,同乔治·伍德科克《安那其主义 II 运动篇》关于 IWW 的创建与性质中的“加入了共产党”的“一部分人”,是站在同一立场的。这与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和亚力山大·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1870—1936)的体会——在美那赴俄前后,二人也于同一时期回到俄国,但感到失望便离开了俄国,关于他们与巴金的关系本书另有讨论——完全相反。

顺便要提到的是,《民声》第三十一号附载了杂志编辑复 L. H. Roueche 这

^① 《民声》第 31 号,1921 年 4 月 15 日,第 13 页。

位美国同志的书信，文章起首写有：“扑灭一政府以建立一政府，无论什么形式的政府，无政府党人都不敢赞成的，因为一有政府就发生少数人专权之弊病，即如现在俄国名为一阶级专政，其实不过一党专制罢了。”可见文章意在批判 L. H. Roueche。

(4) 《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平民之声》第四期)

关于这篇文章，巴金说：“这自然说不上什么研究，唯一的秘诀只是抄书。”^①

以这篇文章的撰稿时间——即从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至进入一九二二年不久的这段时间——为起点，向前追溯几年，查找与该篇标题相似的文章，会找到黄凌霜^[注3]的论文《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②。这篇论文后来转登在《实社自由录》^③上。巴金撰稿时估计参考了这篇论文。如果是这样，巴金在黄凌霜论文的哪些方面找到了与自己的主张相同的论点？笔者没有查阅巴金的文章，当然无法准确指出这一点，但巴金这篇文章至少有可能含有黄凌霜论文中的“(四)著述之性质”的部分。引如下，供作参考。作为列夫·托尔斯泰的“著述之性质”，黄凌霜首先提到了“诚”“爱”“真”。

关于“诚”，黄说：“托氏尝言曰，吾人苟知一事之合理，则当放胆行之，外界阻碍，不必顾也。”关于“爱”，黄说：“世界由爱而相合，人类由爱而相群。托氏主张情爱，以为耶之爱仇如己，佛之舍身救世，皆此爱字有以鼓荡之。”关于“真”，黄说：“托氏反对社会恶劣之制度，颇为激烈。而事事以真为号……托氏著述，皆论真理。”

这里所讲的“爱”与笔者在第一章提到的巴金年幼时得到的“爱”是有关联的，而“诚”与“真”又关系到巴金在(1)中对女子剪发问题表明态度。因此，如果说巴金撰稿时参考了黄凌霜的论文，那么估计文中至少会含有上述托尔斯泰

① 《小小的经验》。《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27页。

② 《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第1—9页。

③ 第1集“传记”，1917年7月，第1—10页。

的“著述之性质”的部分。

(6)《支加哥殉道者》(《平民之声》第六期)

巴金说这篇文章是从“北京的杂志”转载的^①,但不知究竟是哪一份刊物。

“支加哥殉道者”是指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干草市场(Haymarket)事件发生后被送上绞架的四个人,他们分别为:帕尔森司(Albert R. Parsons)、司柏司(August Spies)、斐失儿(Adolph Fischer)、恩格尔(George Engel)。

一八八六年五月三日,芝加哥麦考密克收获机公司(McCormick Harvesting Machine Company)工人发动罢工。为此,厂方封闭了工厂,并为解除罢工安排了警员。工人在厂外举行集会时,警察向群众开枪,造成工人数人伤亡。翌日五月四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集会。集会将要解散时,约有二百名警察涌向广场。正在这一刻,有人从岔路向广场投掷一枚炸弹。警察立即开枪,广场陷入大混乱。事后不久,警方开始搜捕安那其主义者。

当时,中国的安那其主义刊物似乎经常提及这起事件,最早见刊的文章是载于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一日发行的杂志《民声》第五号的《美国无政府党之历史》(涓声译)^②,该篇相当具体地描述了干草市场事件发生的经过。此外,见刊时间比巴金从“北京的杂志”转载文章还要晚些的有载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发行的《学汇》^③“五一特刊号”的《支加哥殉难者的故事》(潜译)。

因干草市场事件而被处刑的这几个人给巴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巴金共三次谈起他们。

一是《支加哥的惨剧》^④。

二是巴金在《死》^⑤第十四页中说“我突然想起五十年前支加哥劳工领袖

① 《小小的经验》。《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28页。

② 作者不明,第6—7页。原文为世界语,原题为“Historio de Amerikaj Anarĥistoj”。

③ 北京《国风日报》副刊,日刊。1922年10月10日创刊,第1期至第237期,1923年6月30日停刊。

④ 《民钟》第1卷第13期,1925年9月,第33—44页。

⑤ 1937年3月在上海。《梦与醉》,南国出版社,1960年1月。

A·帕尔森司上绞刑台前作的诗了”，并附注介绍帕尔森司，转载了他的诗^①。其附注如下：

帕尔森司(一八四八—一八七七)^②是美国的安那其主义者，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Haymarket发生炸弹事件。帕尔森司是当日群众大会的一个演讲人，因此被法庭悬赏五千元通缉。后于六月二十一日到法庭自首。第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同志司柏司(A. Spies)、斐失儿(A. Fischer)、恩格尔(G. Engel)同受绞刑。一八九三年伊里诺斯省新省长[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John Peter Altgeld)]就职，重查此案，发见真相，遂发出理由书，宣告法官枉法，并替帕尔森司等洗去罪名。……

三是巴金在《沉默集》的《序》中解释短篇小说集《沉默集》的标题来历时说这是借用了司柏司的一句话，并附注介绍了司柏司，如下：

阿·司皮斯：美国芝加哥劳动运动的领袖，原籍德国，一八八六年五月因为草市场群众大会中工人与警察冲突事件被捕，法官受贿，构成“莫须有”的罪名，将五

① 该诗共五节，现只介绍其中两节。

到我的墓前不要带来你们的悲伤，/……

……

不要用你们的怜悯来侮辱我的死灰，/要知道你们还留在荒凉的彼岸，/你们还要活着忍受灾祸与苦辛。/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里面，/只有我才应该来怜悯你们。

……

可怜的东西，这样惧怕黑暗，/对于将临的惨祸又十分胆寒。/看我是何等从容地回到家园！/不要再敲你们的丧钟，/我现在是意足心满。（见巴金《梦与醉》，南国出版社，1960年1月，第15—17页。——译注）

巴金在引文后写道，这篇短文不是死之礼赞，而是为了确认自己对生的渴望才写了死，并以阿尔志跋绥夫《朝影》中的英雄奈司拉莫夫的话表达了他的心情：“我爱那阳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爱那青春，以及自然母亲所给与我们的和平与欢乐。……”

② 帕尔森司歿于1887年。——译注

个[原文如此。实际上,有七人被判处死刑,上述四人被处以绞刑]劳工领袖判处死刑。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司皮斯在绞刑架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今天被你们绞死的声音更有力的时候快到了。”^①

正如标题中“殉道者”一词所示,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二年前后的这段时间,热情奔放的巴金把帕尔森司与司柏司塑造成安那其主义的殉道英雄。

(7) “心社”社约解说(《平民之声》最后一期,《师复纪念号》)

刘师复^[註4]组织的“心社”(一九一二年)之社约是指所谓“心社”“十二戒律”。

“十二戒律”为:“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

关于“心社”,见《民声》第十四号(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三日)所载《心社意趣书》。

吾人处今日不正当之社会,受一切伪道德恶制度之薰习,所作所为,恒日与非礼为缘而不自觉。顾吾人各具良心,苟明知其非,又何忍以己身甘犯良心之不韪!用特举最显最大之数事,凡吾人良心上认为违背真理者,相与戒而不为。设为信约,名曰心社……^②

上述“十二戒律”排在这段文字下面。

在第一节,笔者讨论了巴金通过克鲁泡特金《告少年》接触了安那其主义,以及通过廖·抗夫《夜未央》了解了青年们在帝俄统治下献身工作的意义,并渴望自己也成为他们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成长,是因为第一章

^① 1934年9月。《巴金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第195页。

^② 《民声》第14号,第12页。——译注

《幼年时代》中的“爱”为此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节，笔者讲述了他与杂志的关系，意在掌握第一节所讨论的信仰的具体表达方式。

在下一章第一节《上海、南京、上海》的时期，巴金将更鲜明地呈现出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

* * * * *

张秀熟在《五四运动在四川》中介绍了巴金等人在这一时期成都学潮中的动向。下引原文，以作旁证。

在青年学生向各种主义摸索的当中，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无政府主义信仰者了。其骨干是巴金、张拾遗、吴先忱等人。他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出版了《半月报》，在这个报查封后，又出版了《平民之声》，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此外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只在一些节日张贴点小标语传单，因此影响不大。部分成员亦逐渐受了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发生分化，如袁诗荃同志在不久就转为马克思主义的战士了。^①

注解

〔注 1〕

1. 刘师复等人创办的杂志《民声》第 20 号（1914 年 7 月 25 日）所载《通信讨论栏 答悟尘》中有提倡创办“平民学校”之处。据介绍，平民学校类似于一种私塾，是教工人使其能够容易识字的地方。工人可在工作结束后利用空闲时间自由接受教育，汉字也从简易的入手渐次提高难度，以达到可以阅读浅白书报的程度。

^① 《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59 年 4 月，第 173 页。

另一方面,他们还希望这种教育活动能够开阔工人的眼界,最终使工人们提高觉悟,由他们自己来准确判断劳动问题。

此外,这种教育活动的开展过程将有利于传播安那其主义,这也是其目的之一。

以上是《民声》有关“平民学校”的内容。

至于“成都的学生会”的性质,笔者的理解未必准确,因此无法做出清楚的判断,但《半月》中提到的平民学校的内部情况则与此相似(名称与“成都的学生会”相似的团体另有1920年创办《四川学生潮》周报的“四川学生联合会”,可供参考)。

2. 铃江言一在《中国解放斗争史》(石崎书店,1953年9月15日,第66—67页)中说,1924年12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布的中央局报告以及向全国团员颁布的训令与通告中,有一份《关于平民学校的通告》。据此介绍,“平民学校”的性质与“1”中《民声》所描述的状况大致相似,但关于要积极指导,组织青年工人、农民一点,双方差距显著。此外,《关于平民学校的通告》起首部分说“正在开办平民学校,或有机会将开办平民学校的地方,各地已经不少了”(译者没有找到《关于平民学校的通告》,该处只好按《中国解放斗争史》中的日译原文重译成中文。——译注),这会令人推想平民学校早在1924年12月以前就已经创办了。笔者也曾思考过成都的“平民学校”是否也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导下创办的,但张秀熟在《五四运动在四川》(《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59年4月,第175页)中说“1921年11月,[王]右木同志以读书会[马克思读书会]基本会员十余人作基础,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所以从时间上讲,前者还要晚些,估计两者并无关联。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全国团员颁布的《关于平民学校的通告》,见恽代英《最近的中央局》(最近における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について)(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1卷“资料一〇〇”,劲草书房,1970年9月30日)第484—485页所收《附录二 第六十三号通告》(据《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1卷第478页介绍,恽代英《最近的中央局》原载《团刊》

第13期〔1924年12月15日，第17—26页〕，但译者没有找到该刊。——译注）。

〔注2〕

指袁诗堯。提到这位朋友的资料有以下三种：

1. 《我的幼年》（1936年8月深夜。《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20—121页，1959年5月注）中写有：

……从前我在成都办刊物的时候，有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可是后来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终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军阀逮捕枪决了。……

2. 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59年4月）第173页有一处提到巴金等人加入的团体：

……部分成员亦逐渐受了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发生分化，如袁诗堯同志在不久就转为马克思主义的战士了。

3. 巴金在《谈〈春〉》（1958年1月27日。《巴金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第367页）中解释小说《春》的出场人物与其原型时说：

……方继舜的真名是袁诗堯（应为“袁诗堯”。——译注）。他编辑《学生潮》，为了梨园榜痛骂某名流的时候，还是高师的学生。他同我们在一起工作过一个时期，我们都喜欢他。他后来加入共产党，在某中学当教员。在一九二八年的白色恐怖中他在成都被某军阀枪毙了。

〔注3〕

黄凌霜（1889—？）。（生卒年为：1897—1982。——译注）

本名黄文山,字凌霜,广东台山人。1917年5月,安那其主义者组织“实社”在北京大学内成立,7月创办《实社自由录》,黄担任编辑之一。另从事《进化》(安那其主义杂志,1919年1月至5月)编辑工作,发表多篇关于安那其主义、世界语的介绍性文字及论文。获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1年)后,经由日本赴美留学。与山鹿泰治一同赴日,在东京会晤大杉荣。(山鹿泰治在1948年3月12日发行的《平民新闻》所载《大杉の旅券》[大杉の旅券]中说:“黄凌霜君是孙逸仙革命军领导者黄兴先生的侄子,曾去过莫斯科。归国后激烈批判俄国,作为刘师复的后继,致力于安那其主义宣传活动。”)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8年)。留美期间,曾任《民气日报》(纽约)、《民国日报》(三藩市)编辑。1929年归国。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及北京大学教师、劳动大学教务长、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等。

五四时期黄凌霜在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如下(杂志卷号均为译者所加。——译注)。

《新青年》:《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第3卷第4号)、《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第4卷第5号)、《世界语问题》(第6卷第2号)、《Esperanto与现代思潮》(通信,第6卷第2号)、《马克思学说的批评》(第6卷第5号)、罗素《工作与报酬》(译作,第8卷第2号)、《无产阶级专政》(通信,第9卷第6号)。

《实社自由录》:《弁言》、《素食与道德》、高露曼女士《无政府主义》(译作)、《托尔斯泰答日本友人书》(译作)、《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以上为第1集所收,此外另收录《竞争与互助》、《世界语发明家柴门合甫博士事略》、《答思明君》(共两篇)。——译注);《非是非篇》、《克鲁泡特金之进化论》、托尔斯泰《近代科学》(译作)、高曼女士《组织论》(译作)、夏威《嘉利福禄特连女士之生平及其著述》(译作)(以上为第2集所收。——译注)。

《进化》:《本志宣言》、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及其发展之历史》(译作)(以上为第1号所收。——译注);《改造社会的方法》、《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女子自由问题的研究》(以上为第2号所收。——译注);《师复主义》(以上为第3号所收。——译注)。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批评朱谦之君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批评》(第7号)、《两面的道德》(第9号)、《近世无政府主义学者克鲁泡特金 肖像、小传》(第12号)(该篇未署名。该号另收录《批评朱谦之君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批评(答朱君的再评无政府共产主义)》一篇。——译注)。

《民钟》:《克鲁泡特金的社会学说与未来》(第1卷第3期)、克鲁泡特金《新万国劳动协会》(译作,第1卷第4期)。

笔者讨论巴金《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时,作为相关资料引用了黄凌霜《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中的“(4)著述之性质”,原文如下:

(1) 诚 托氏尝言曰,吾人苟知一事之合理,则当放胆行之,外界阻碍,不必顾也。又曰,不诚者非愚则废。凡著作当皆出于至诚。由是而知托氏著作,无不出于至诚,其能感动国人感动世界者,以此。

(2) 爱 世界由爱而相合。人类由爱而相群。托氏主张情爱,以为耶之爱仇如己,佛之舍身救世,皆此爱字有以鼓荡之。彼每出言,无不令人服膺。读其书觉其慈祥之容光,蔼然可掬。彼之主张人类平等,世界大同,种种问题,亦皆此爱字有以致之也。

(3) 真 世界进化,渺无止境,今日以为善,明日或以为非。吾人所求者,即由较不善以达到较为良善是也。托氏反对社会恶劣之制度,颇为激烈。而事事以真为号,去真而谈进化,不可也。去真而谈哲学,更不可也。托氏著述,皆诠真理。故吾敢决言曰,托氏之道德,具诚爱真之美育。托氏之言论,亦具诚爱真之美育。离此而论托氏而论托氏之著作,吾未见其公与当也。

〔注4〕

刘师复(1884—1915)。

山鹿泰治在《平民新闻》(1947年11月28日)所载《上海的“民声社”》(上海的“民声社”)中谈到刘师复(本名思复,后改名为师复)时,提出了颇有趣味的见解,如下:

他的主张是：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与行动是古今中外无出其上的社会思想，但若把最高道德的互助奉为伦理的极致，人也应当把这种德性施与动物。在未来社会中，人类的美德应严格于古代哲学家、宗教家中清高无上之者。换言之，以明智破除迷信发现吃斋禁欲，此乃人的道德生活中必须实践之物。如食肉：从道德上讲，绝非最为文明之食物，故在未来社会中人们必将实践素食主义；又如烟酒：这虽为植物，但对身体有害，不可沾染。尽管他强调若有人想破除现代之恶习，要立刻实践此种卫生原则，但他绝不强人所难，自己却坚守不渝。

自由恋爱，若是真心相爱，绝无必要拘于形式而受一夫一妻所限，但他则律己严格，以防陷入渔色。作为实现万国大同主义的第一阶段，他反对家族主义，废除姓氏。他原姓刘，但常仅称名“师复”。……

山鹿泰治另在《平民新闻》(1947年5月28日)所载《隆盛期的普罗·世界语运动——吾辈与世界语》(隆盛期のプロ・エス运动——われらとエスペラント)(3)中写道：

在中华民国，师复同志联系了1906年前后亡命巴黎的安那其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张继等人，在广东创办世界语、华文杂志《民声》(*La Voĉo de la Popolo*)，致力于安那其主义宣传活动。当时在日本，大杉荣创办了日本第一所世界语学校，亲自担任校长兼教师，一面讲解世界语，一面为住在东京的支那留学生开办世界语讲习会，宣传安那其主义，另又发行纯世界语的机关杂志《平等》，帮助他们与支那本国的同志取得联系。

不久，师复被赶出广东，他与青年男女二十余名同志携带印刷机、印刷品逃往澳门，后遭驱逐，于是潜入上海，继续发行杂志。当时，笔者正因在京都翻译出版世界语著作——鲍尔·柏蒂罗(Paul Berthelot)《平民之钟》(*La Evangelio de la Horo*)触犯了政府的忌讳，服满三年刑期，旅居满洲。通过由东京的同志发来的消息得知此事，便急奔上海，参加了世界语栏印刷排版工作，并与中国的同志建立了关系。直到病逝，师复一直在贫困之中发行这份宣传杂志，终生鞠躬尽瘁。

第三章

从成都到上海

一、上海、南京、上海

一九二三年春天，巴金与三哥（李尧林）离开了处于动乱中的成都^①，赴上海。

^① 1923年春天，熊克武联合边防军赖心辉部，与杨森部、袁祖铭部交战，在成都、梓潼一带展开激战，相持数月。见李白虹《二十年来之川閬战争》，《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4期，中华书局，1963年5月，第70页。

同年秋天^①，巴金与三哥一同考入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②。他们在南京北门桥附近租下一间屋子，住了大约一年半，从这里去学校。

一九二五年春天^③，中学毕业。一度赴北京，后到上海，住在康梯路康益里，后又搬到法租界马浪路。

三哥与他告别后，考入苏州的私立东吴大学^④（后考入北京的燕京大学读书）。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巴金从上海起航，前往巴黎。

以上是从巴金离开成都赴上海、南京、上海，到他不久赴法留学的大致行踪。

从成都到达上海后，除了就读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一九二三年秋天至一九二五年春天）、赴法留学（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侨居日本（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⑤）、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这段时间——之外，另再抛除出外旅游

① 李存光编《巴金著译年表》关于1923年12月的记述中写有：“18日离嘉兴至南京，住鱼市街二十一号，旋入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见《巴金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518页。下同。——译注

② 国立东南大学于1921年创立于南京。文、理、教育、农、工科各设于南京，商科设于上海。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另设置各种附属学校，巴金考入的附属中学也是其中的一所。1928年，国立东南大学与周围其他八所学校被合并为国立中央大学。参考：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开明书店，1934年5月。

③ 李存光编《巴金著译年表》关于1925年的记述中写有“8月于东南大学附中毕业”。见《巴金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519页。下同。——译注

④ 1871年，美国基督教新教的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South）在苏州创办存养书院，后改名为博习书院。1901年，上海中西书院与苏州中西书院合并，创建东吴大学，设文、理科。1915年，于上海另设法科（法学院）。1935年，文、理科从苏州迁到上海，后又迁到曲江；法学院迁到重庆。主要参考：外务省《西方人的文化事业在中国》（欧米人ノ支那ニ于ケル文化事业），1925年12月，第40页。（由于监理会英文名及书院名的记载有误，现均依据王国平《东吴大学简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加以修改。关于该校创建历程，详见该书第1章《东吴大学的筹建》。另外，据该书第4章《烽火弦歌》介绍，该校迁移、辗转各地是从1937年开始的。——译注）

⑤ 李存光编《巴金著译年表》关于1935年的记述中写有“8月上旬自日本归国抵沪”。见《巴金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541页。——译注

的时间,巴金基本上都住在上海,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巴金的多篇文字充分了解他在上海的行踪。然而,关于从巴金离开成都到达上海,到他就读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这段时间,以及从他毕业之后一度赴北京又回到上海,到他赴法留学这段时间,他在上海的行踪如何,巴金的文字为数有限。只有《纪念我的哥哥》^①(谈到巴金就读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时期的生活)、《谈〈灭亡〉》^②(谈到他毕业后住在上海时的情形)算是引人注目的资料。

一九二三年春天,巴金与三哥(李尧林)坐小木船离开成都,赴上海。巴金说,那时二人的心情就像“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③。不久,他们到了南京。据《纪念我的哥哥》所述,他们在南京的生活状况如下。

一九二三年秋天,巴金与三哥一同考入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他们在南京北门桥附近租下一间空阔的屋子,住了半年左右,又搬到附近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在这里住了大约一年。他们的生活费当然要依靠大哥(李尧枚)来接济,但生活并不悠闲自在,毋宁说是苦读寒窗。他们用的坐凳是一只小皮箱,夜晚,借着煤油灯的微光学习。雨天,兄弟二人撑一把伞,夏夜,没有帐子则被蚊虫围攻。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生活状况。

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之外,他们既没有其他朋友,也没有特别的娱乐。用他们的说法来讲,在他们如此寂寞的生活中,唯一能够增色添彩的便是梦想。而在这寂寞的生活中,可以安慰、鼓励他们的心的,则是大哥寄来的家信。他们也常给大哥写信。

不久,他们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巴金回顾这段时间说:

……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

① 《怀念》,开明书店,1947年8月,第68—69页。该篇是怀念三哥李尧林的文字。

② 《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4月5日,第57、61页。

③ 《纪念我的哥哥》。《怀念》,开明书店,1947年8月,第68页。

活。……^①

一九二五年春天，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巴金一度北上赴北京，投考国立大学，但遗憾的是，一个月后弄坏了身子又生了病，不久到上海休养^②。

到了上海，他先住在康悌路康益里，后搬到法租界马浪路^③。

巴金在《谈〈灭亡〉》第六十一页中谈到了这段时间的经历，内容大致如下。

一是，他看到了一些出现在他正式创作的处女作《灭亡》（一九二八年八月写毕）中的像王秉钧那样的人物——他们曾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但后来投靠反动官僚，变成了国民党右派。这一点下面还会讨论（本章第三节）。二是，租给他屋子的房东也许曾是旧政客或旧军人，想在北伐军打到上海时趁机寻找出路，与几位朋友招兵买马，准备迎接北伐军；后来，朋友张的部下被孙传芳的军队捉走，房东发现身临危险，便带上一家人逃走，而张却在被捕后被处决。

以上是这段时间巴金在上海的行踪。此外另有两个零散的因素，下面还会讨论。

如果我们把巴金从赴上海、南京、上海至赴法留学这段时间的经历，与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相互加以对照便会发现，此时巴金至少遭逢了两个事件：一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所谓五卅运动；二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开始后，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所陷入的混乱局势。由于巴金在这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的时期住在上海，所以笔者很想了解他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如何，但如上所述，

① 《纪念我的哥哥》。《怀念》，开明书店，1947年8月，第69页。

② 法·明兴礼(Dr. J. Monsterleet)《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继文译，文风出版社，1950年5月，第38页)中写有：“在1925年中学毕业后，他动身北上，去北京投考国立大学，但可惜一个月后他身体害病，只得回到上海来休养了。”

巴金《纪念我的哥哥》(1946年5月上海。《怀念》，开明书店，1947年8月，第69页)文中一处提到他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那天你[三哥，李尧林]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你温和地微笑着，嘱咐我‘小心饮食注意身体’”。笔者一直以为巴金在中学毕业后马上回到了上海，因此怎么也想不通“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的意思。因为，浦口车站是“津浦(天津—浦口)铁路”的南端起点站，至少不是通往上海的车站。但读了以上资料，疑点才涣然冰释。

③ 《谈〈灭亡〉》。《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4月5日，第57页。

巴金的文字为数有限，难以由此得知。

其实，巴金的小说《死去的太阳》（一九三〇年六月）就是以五卅运动爆发后南京学生的动向为题材的作品，而《灭亡》（一九二八年夏天写毕）也是以此时即一九二五、二六年前后在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的劳动界的一小部分为背景的作品。因此，越过两部小说的虚构性，在一定程度上勉强去想象他生活环境的氛围也并非难事，但归根结底也不过如此。

在这段时间，巴金是否也像在成都时那样与某一组织建立过关系？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他学了什么，又想做什么？尤其是当时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关联又是如何？关于这些问题，从巴金的文字入手则难以呈现出具体的画面。

尽管如此，但还是可以从巴金的文字中找到与上述事件相关的零散的因素，如以下两点。

一是，在就读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时，巴金收到了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的书信，后来又对此做了介绍^①。二是，巴金在《爱情的三部曲之三——电》^②注解中提到了单行本《断头台上》（一九二九年）第三〇一页《论恐怖主义答太一书》。（前者将在本章第二节讨论。）

笔者原想从“巴金本人叙述、写下的文字”来了解这段时间的巴金，但资料却仅有这些。意外的是，虽然巴金自己没有讲过，其实他在这段时间发表了多篇论文、译作、（书信、）传记，列如下。除了“4”以外，笔者还没有查到原著，但由于这些部分至关重要，不可遗漏，所以下面特意加以讨论。

1. 载于杂志《民钟》的文章

在安那其主义刊物中，《民钟》是发行时间较长的一种。该刊于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停刊，先后出版两卷，共二十三期。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之前在广东出版，之后改迁上海出

^① 《信仰与活动》。《火星》第2卷第2期，文华书局，1935年5月，第114—115页。

^② 开明书店，1938年11月，第521页。

版。该刊是专以反苏反共为旗帜的无政府主义刊物，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格拉佛、大杉荣、高德曼等人的文章^①。

以下所列论文、译作、(书信、)传记篇目，均选录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七〇四—七〇九页)所载杂志《民钟》目录。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大正十三年)

(1) 芾甘《大杉荣年谱》。《民钟》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大正十四年)

(2) 芾甘《“欠夹”——布尔雪维克的利刀》。《民钟》第一卷第十期《援俄在狱革命党人专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3) Goldman《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芾甘译。《民钟》第一卷第十期《援俄在狱革命党人专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4) 柏克曼《俄罗斯的悲剧》,芾甘节译。《民钟》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七月。

(5) 蒲鲁东《财产是什么?(旧译名何谓财产)》,芾甘译。《民钟》第一卷第十三期,一九二五年九月。

(6) 芾甘《芝加哥的惨剧》。《民钟》第一卷第十三期,一九二五年九月。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

(7) 芾甘《东京的殉道者》。《民钟》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一月。

(8) 阿利兹[不详]《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芾甘译。《民钟》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一月。

(9) 蒲鲁东《财产是什么?(一续)》,芾甘译。《民钟》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一月。

(10) 若克尔《近代劳动运动中的议会活动观》,芾甘译。《民钟》第一卷

^① 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第242页。(该书同页关于《民钟》发行地点的说明为:“2卷4期以前在广东出版,以后改迁上海出版。”下同。——译注)

第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一月。

(11) 芾甘《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介绍)》。《民钟》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六年六月。

(12) 阿里资[不详]《无政府主义之社会学的基础》，芾甘译。《民钟》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六年六月。

(13) 蒲鲁东《财产是什么?(二续)》，芾甘译。《民钟》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六年六月。

(14) 芾甘《杂感》。《民钟》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六年六月。

(15) 芾甘《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16) 马拉铁司达《科学与无政府主义》，芾甘译。《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17) 芾甘《法国无政府党人的故事》。《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18) 《讨论进行的两封信 格拉佛致芾甘信》。《民钟》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六年六月。

(19) 《讨论进行的两封信 君毅致芾甘信》。《民钟》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六年六月。

(20) 《通讯 太一致芾甘信》。《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昭和二年)

(21) 芾甘《断头台上》。《民钟》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如上所述,笔者查到的只有目录,没有查阅原著,当然无法准确指出文章内容。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通过分析(1)至(21)的标题,这些篇章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根本无法推测内容的文章;二是,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断内容的文章;三是,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内容的文章。

根本无法推测内容的文章有：(2)《“欠夹”——布尔雪维克的利刀》；(8)阿利兹《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芾甘译)与(12)阿里资《无政府主义之社会学的基础》(芾甘译)，二文作者不详^[注1]；(14)《杂感》的内容也无法推测；(15)《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不知是从什么观点讨论问题；(16)马拉铁司达^[注2]《科学与无政府主义》(芾甘译)的原著不详，马拉铁司达是意大利知名的安那其主义者；(17)《法国无政府党人的故事》不知文中具体举出哪些人物；(18)《讨论进行的两封信 格拉佛^[注3]致芾甘信》以及(19)《讨论进行的两封信 君毅致芾甘信》的内容也无法推测。

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断内容的文章有：(1)、(5)、(6)、(7)、(9)、(10)、(13)、(20)。除了(20)《通讯》，其他文章均为知名安那其主义者的著作，或是记述了他们的动向及重大事件的文字，已是安那其主义方面的常识性资料。

(1)《大杉荣年谱》。在这前一年的九月十六日，大杉荣^[注4]与伊藤野枝、橘宗一，同被东京麹町宪兵队逮捕，后遭残杀。该年谱估计是为了整理大杉荣受到的评价以及他的生平事迹而作，写于巴金旅居南京期间。

(5)、(9)、(13)是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财产是什么?》的译作。文章内容不是否定财产本身，而是在说：只要能够把财产归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它是符合正义的；但如果财产被少数特权者占有，我们要攻击它；所有的人都能够拿他所生产的价值与别人互相交换价值相均衡的东西，这才是最符合正义的做法。他与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6)、约书亚·沃伦(Josiah Warren, 1798—1874)同被称为现代安那其主义的创始人^①。

(6)《芝加哥的惨剧》。该篇估计与《芝加哥殉道者》——载于巴金等人创办的杂志《平民之声》第六期，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已讨论过——内容大致相同。

(7)《东京的殉道者》。该篇是关于前一年的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被处以

① 见大泽正道《自由与反抗的进程——安那其主义思想史》(自由と反抗の歩み——アナキズム思想史)，现代思潮社，1962年6月30日，第96、98页。

死刑的古田大次郎^{〔注5〕}的文章。这里用了“殉道者”一词，估计巴金是想把他评价为安那其主义运动的牺牲者。

(10) 若克尔^{〔注6〕} (Rudolf Rocker, 1873—1958)《近代劳动运动中的议会活动观》。我们应该排斥政治家、议会政党、政治性的劳动党，不集中权力，以工人代表大会来组织生产与分配——估计该篇是站在这种观点写成的。

(20)《通讯 太一致芾甘信》。如上所述，巴金在《爱情的三部曲之三——电》^①第五二一页的注解中提到了《论恐怖主义答太一书》，关于书信内容，扬风在《巴金论》中说：“巴金就公开地正式地表明了自己‘反对恐怖主义’的态度。”^②由此可以推断，《通讯 太一致芾甘信》至少会含有与此相关的内容。

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内容的文章有：(3)Goldman《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芾甘译)。(4)柏克曼^{〔注7〕}《俄罗斯的悲剧》(芾甘节译)与(11)《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介绍)》或许应该归类于第二类即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断内容的文章之中，但因(4)是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11)的社会革命党左派以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为代表，在笔者看来二文的意图均与(3)一致，因此决定放在此类，此外不另加说明。(3)将在本章第二节《巴金与爱玛·高德曼》中重新讨论。

(21)《断头台上》。该篇是苏菲亚·佩罗夫斯卡娅的传记，载于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至该期为止，《民钟》在广东出版。该篇估计在巴金赴法留学(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之前就已经脱稿了。该篇共分四期连载，最后一期载于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③。

2. 载于杂志《洪水》的文章

《洪水》，半月刊，共三卷，第一卷为第一期至第十二期，第二卷为第十三期至第二十四期，第三卷为第二十五期至第三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创刊，

① 开明书店，1938年11月。

② 《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1957年7月8日，第168页。

③ 后三期详见本书附录三《巴金略年谱》关于1927年的记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周全平编,光华书局发行^①。以下所列巴金论文篇目出处为创造社出版部《洪水周年增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第二〇二页附录《[〈洪水〉]第二卷人名索引》。

(1) 李芾甘《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洪水》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二六年^②。

(2) 李芾甘《洗一洗不白之冤》。《洪水》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二六年。

根据“1”的(18)《讨论进行的两封信 格拉佛致芾甘信》等文章来思考,估计巴金当时已经掌握了法国安那其主义者的动向,但因笔者没有查到(1)的原文,内容不详。(2)也无法推测文章内容。

3. 载于《上海黄庞四周纪念大会特刊》的文章

芾甘《黄庞死后的第四年》。

该篇载于《上海黄庞四周纪念大会特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③。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劳工会的黄爱与庞人铨被军阀赵恒惕处死,该篇为纪念黄庞牺牲四周年而作。巴金通过该篇呈现的立场将在本章第三节讨论。

4. 单行本

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芾甘译,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于上海^④)。《克氏全集》第二卷,上海江湾自由书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① 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第7页。

② 《洪水》第2卷第16期(1926年5月1日)载有芾甘《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续前)》。——译注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674页。(该特刊所收论文、诗歌,均选录于湖南劳工会编辑、发行《黄庞四周纪念册》[1926年1月印行]。除了芾甘《黄庞死后的第四年》之外,该书另收录了佩竿《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译注)

④ 《译者序》落款日期。——译注

以上大致概括了巴金在一九二三年春天到一九二七年一月这段时间发表的论文、译作、(书信、)传记。由于笔者几乎没有找到原文资料,有些文章根本无法推测内容,但对于知名人物、著作、事件还是大胆地做出了推断。这是因为这段时间是巴金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正在成长的过程,这些资料不可遗漏。下面,笔者将讨论巴金呈现了安那其主义者的自我形象的两篇文章:从巴金与爱玛·高德曼的关系入手讨论《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本章第二节),以及《黄庞死后的第四年》(本章第三节)。

注解

〔注 1〕

作者阿利兹与阿里资除了声调不同,发音一致,所以是同一人物,这一点可以理解。但阿利兹(阿里资)究竟是谁?笔者手边有一份资料:“新世纪丛书”第 1 集(5),1889 年爱露斯著,1907 年真民节译《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家》(*L'Anarchisme*)(Auteur: Eltzbacher, Traducteur: Tsunmin)。以下两点可以说明爱露斯即是 Eltzbacher:一是,该书 Auteur(法语,“作者”之意)为 Eltzbacher;二是,真民(李石曾)在节译本《无政府主义》中说:“无政府历史书夥矣。其最精详者当推德法律博士爱乐斯巴氏[“露”字被写成“乐”字]Eltzbacher 之作,名曰《无政府主义》(*L'Anarchisme*)。今先译是书中七家略史,与其学说简明表。”也就是说,真民(李石曾)把 Eltzbacher 的“Eltz”译成爱露斯,以表示“Eltzbacher”。其次,笔者(站在一般可以用 Eltz 来代替 Eltzbacher 的前提下)曾把爱露斯与阿利兹(阿里资)放在一起做过推论,认为如按法语腔拼读“Eltz”,发音则是爱露斯(Ailussu),而按德语腔拼读“Eltz”,发音则是阿利兹(阿里资)(Alitzu),但这不过是猜测,故不详。

此外,笔者也曾考虑过阿利兹(阿里资)是否就是爱利赛·邵可侣(Élisée Reclus, 1830—1905)的“爱利赛”?但爱利赛·邵可侣一般以“邵可侣”闻名于世,不会用“爱利赛”来代替。另外,在 1921 年实社出版的《革命与进化》(除该

版本之外,另有麦斐沙[Mark Fisher]、邵可侣《革命与进化》,袁振英译,香港受匡出版部,1928年5月20日。至于该书是否与实社版为同一版本,不详。——译注)中,署名也是邵可侣;在载于《民钟》第1卷第7期(1924年3月10日)的《无政府主义大家传略》中亦名为邵可侣;后来,在《巴金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第182页《亚丽安娜·渥柏尔格》(1933年)中,巴金把Élisée Reclus译成爱利·邵可侣。因此,尽管阿利兹(阿里资)与爱利赛发音相似,他也显然不是爱利赛·邵可侣。

爱乐斯巴(Eltzbacher,生卒年不详)。(Paul Eltzbacher,生卒年为:1868—1928。——译注)

德国法学家。奈特劳(Max Nettlau)《奈特劳——安那其主义小史》(ネットラウ——アナキズム小史)(上杉聪彦译,三一书房,1970年10月31日)第288页有对爱乐斯巴《安那其主义》的解说: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就戈德温、蒲鲁东、麦克斯·施蒂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B·R·塔克、托尔斯泰的主要理念做了比较。尽管这里举出的著作家极为有限,对其他的安那其主义概念也没有进行探讨,但要向公众准确地展现出这七位自由意志主义者[在神学、哲学上主张自由意志]的主要命题的根本目的则已经达到了。……

此外,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安那其主义 I 思想篇》(アナキズム I 思想篇)(白井厚译,纪伊国屋书店,1968年6月29日)第315页写有:

……1900年,德国学者保罗·爱乐斯巴对安那其主义思想的各种倾向做了先驱性的概观,他把托尔斯泰的思想纳入在其中,论证托尔斯泰虽然拒绝暴力,但他的基本教义——尤其是对国家与财产的明确否定——明显符合安那其主义的普通模式;对此,托尔斯泰也没有格外感到不愉快。

日译本有:爱乐斯巴《无政府主义论》,若山健二译,聚英阁,1921年5月。

〔注2〕

昂利柯·马拉铁司达(Errico Malatesta,1853—1932。又译为马拉叠斯丹、马力司达、马拉铁达)。

意大利知名的安那其主义者。据说他最忠实地继承了巴枯宁主义。克鲁泡特金在《我底自传》(1899年)的《西欧亡命》一章中称他为充满热情与理智的行动者,从此他闻名于世。

在中国,他的文章很早就已经有人介绍:

马拉叠斯丹《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工人问答》,瞿译。《天义》第16、17、18、19四册合刊春季增刊,1908年3月15日。

这篇发表日期不详。文章采用了年长工人提问、年少工人作答的著述形式,作答部分即是马拉铁司达的见解。举几例如下:

……主人家就都是吃人血剥人皮把我们当畜生看待的。……我们的意思,是想把世界不公平的事情,以及一切压人的事情,都一切除去。……

……你所讲的那种上流人,都是强盗。他们用的东西,都是我们从手里抢来的。……况且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甚么东西,叫做政府,……就是那一班财奴集合出来的了。还有一种当政府奴隶的,只晓得杀几个同胞,讨政府的好,他那里知道我们所做的事……

……你说我想抢夺财主的钱财,这句话是讲错的,我并不是想抢他偷他的财产,是想把有钱人家的财产,一起拿出来当做公众的财产,教社会上的人,大家一同儿享用。……(《天义》第16、17、18、19四册合刊春季增刊,第3—6页。——译注)

马拉铁达《无政府党忘其根本主义矣》,耀荣译。《民声》第23号,1915年5月5日。

这篇是针对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爆发后开始支持这场战争的安那其主义者(例如支持协约国并认为迫使德国投降将会带来无产阶级解放的人)而作,马拉铁司达从以下观点予以反驳:

吾非和平家也。吾辈之运动,无一非为和平及人类友爱之凯旋而发者。但吾以为希望不战,惟有两方面皆不愿战而后。若有侵害他人之自由者,则被侵害者之自卫,实为正当。吾又以为抗争乃自卫惟一之良法也。尤有进者,吾以为被压制者常在正当自卫之地位中,且常有攻击压制者之权。以是之故,吾许战争为必要而且神圣,盖为自由而战者也。若是者为“文明战争”,即革命也。

然则今度之战争,与吾人所持之人类解放问题,究有何关系乎。(《民声》第23号,第4页。——译注)

该篇发表日期不详,但估计发表于各国知名的绝对自由主义者三十五名(包括马拉铁司达在内)于1915年2月15日发表反战宣言的前后。

此外,《民声》第18号(1914年7月11日)介绍了马拉铁司达的著作:《无政府》(Anarchy)、《工人之无政府共产主义谈》(A Talk about Anarchist Communism between Two Workers)(该篇与《天义》所载《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工人问答》是同一篇)。《民声》第29号(1916年11月28日)所载《风雨鸡声录 伦敦无政府党年会》简洁地介绍了马拉铁司达关于意大利职工同盟团之情况的报告。

马拉铁司达,1853年生于意大利南部圣马利亚卡普阿韦泰雷(Santa Maria Capua Vetere)。1868年,与父母迁居那不勒斯。在此前后,参加共和派的活动。1870年,就读那不勒斯大学医学院期间,因参加示威游行被捕,后被学校开除。1871年,为巴黎公社所吸引,与多数共和党党员一起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经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卡尔梅洛·帕拉迪诺(Carmelo Palladino)的引导,成为社会主义者。1872年,拜访意大利安那其主义三杰——马拉铁司达、卡洛·卡菲埃罗(Carlo Cafiero)、安得列阿·科斯塔(Andrea Costa)——之一的卡菲埃罗及巴枯宁,热衷于巴枯宁的学说,开始亲密来往。是年,出席瑞士的圣伊米耶(Saint-Imier)代表大会(汝拉联合会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1874年,为响应安得列阿·科斯塔等人在意大利北部掀起的暴动,与六名同志在意大利南部的小村卡斯泰尔德尔蒙泰(Castel del Monte)掀起暴动,抗击军队三日,后被捕。1876年,出席国际工人协会伯尔尼(Bern)代表大会,提倡以行动做宣传,

及废除国家。后与司特普尼亚克(本名:Sergey Kravchinsky)等人参加了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暴动,被驱逐到意大利。1877年,与科斯塔、卡菲埃罗、司特普尼亚克等二十六名同志参加了意大利南部贝内文托(Benevento)的武装起义,解放了一两个村庄,但叛乱失败,被捕。翌年,亡命埃及。后经由罗马尼亚、法国、意大利,于1885年前往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续刊《社会问题》(*La Questione Sociale*)(1883年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创刊),致力于推动当地安那其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的运动。1889年,归意大利,创办《团结》(*L'Associazione*)。1891年,出版《无政府论》(*L'Anarchia*)(该书估计是《民声》第18号[1914年7月11日]介绍的著作《无政府》)。此后,经由西班牙、英国(伦敦)、美国、古巴、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1913年,在意大利创办《意志》(*Volontà*)。1914年,亡命伦敦,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声》第23号[1915年5月5日]所载《无政府党忘其根本主义矣》估计写于这一时期;《民声》第29号[1916年11月28日]所载《风雨鸡声录 伦敦无政府党年会》文中介绍的报告估计也是他侨居伦敦期间所写的文章。)

1916年春天,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支持协约国的克鲁泡特金等十六名安那其主义者发出的声明,发表反对意见。1919年,归意大利,翌年,创办日刊《新人类》(*Umanità Nova*),因讲演被捕。1922年,墨索里尼进军罗马,《新人类》停刊。1924年,创办双月刊《思想与意志》(*Pensiero e Volontà*),1926年停刊。遭墨索里尼政权的软禁,在森严戒备下在罗马度过了残余的岁月。1932年7月22日,于罗马去世。年谱部分主要参考:秋山清《拒绝权力——安那其主义哲学》(权力の拒绝——アナキズムの哲学)之《解题》,风媒社,1971年6月25日,第275—276页。

巴金回忆他曾经游玩厦门西南海上胜地鼓浪屿时的情景,写了一篇散文《月夜》,文中写道:

……要在这废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宝塔,怀着这样大的志愿的人是有的。我们的“耶稣”就是一个;还有我们的“马拉铁斯达”。这两人将永为我一生最敬爱的朋友罢。最近在上海和这昂利柯的会面是给了我最大的感动的。他的质朴勇敢和坚

决在我的胸膛里点起了长明灯。我感激他。我祝福他。(1935年2月在横滨。《点滴》，开明书店，1935年4月，第68页。)

但该篇与同名小说《月夜》(1933年)内容不同。

这里讲的“我们的‘耶稣’”估计是指巴金长篇小说《火》第三部中的宗教家“田惠世”的原型林憾庐(“耶稣”应为巴金的朋友叶非英，并非林憾庐。见《怀念叶非英兄》，《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 1984.9—86.8〕，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12月香港，第150—168页。——译注)；至于“我们的‘马拉铁司达’”“昂利柯”，不知所指何人。总之，马拉铁司达已可当作绰号用来称人，说明作为质朴、勇敢的安那其主义者的代名词，马拉铁司达的名字在中国已被广为使用。

〔注3〕

J·格拉佛(Jean Grave, 1854—1939)。

法国安那其主义者。接替克鲁泡特金的工作，在日内瓦编辑杂志《反抗者》(*Le Révolté*)，后在巴黎创办杂志《新时代》(*Les Temps Nouveaux*)。他是《垂死的社会与安那其》(*La Société Mourante et L'Anarchie*)、《未来的社会》(*La Société Future*)、《安那其，它的目的与手段》(*L'Anarchie; son But — ses Moyens*)等著作闻名于世的安那其主义理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与克鲁泡特金等人一起支持协约国(见乔治·勒弗兰〔Georges Lefranc〕《法国工团主义运动史》〔フランス劳动组合运动史〕，谷川稔译，白水社，1974年5月10日，第45页)。也许是因为与克鲁泡特金亲密来往，在中国很早就有人知道他。如《民声》第10号(1914年5月16日)附照片介绍了格拉佛；《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民声》第20号(1914年7月25日)介绍了他的著作篇目；《民声》第29号(1916年11月28日)所载《风雨鸡声录 法文新世纪〔原名为《新时代》(*Les Temps Nouveaux*)〕报之复活》中，报道了格拉佛的来信。《民钟》也多次介绍他的著作。

喜欢给人写信的巴金或许也曾向格拉佛寄过书信，并收到了复信。

〔注 4〕

大杉荣(1885—1923)。

以下列出几篇关于他在早期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来往的资料。

1. 1908年,“自4月起,大杉荣为支那革命党党员开办讲习会(二十人)。原计划继续开办夏季讲习,大杉荣却被逮捕。应学员的恳求,自7月16日起,由千布[利雄]接手,担任讲习”(日本エスペラント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行事委员会《日本世界语运动史料》〔日本エスペラント运动史料〕1,日本エスペラント学会,1956年11月1日,第15页)。

相关资料见景梅九《留日回顾 一个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半生》(留日回顾一中国アナキストの半生)(大高岩、波多野太郎译,平凡社,1966年12月)第116页:

有一天,在某处二楼举行秘密会议,却被警察侦破,他们闯入二楼,很多人被赶到楼下。我没有理睬他们,继续向大杉荣先生求教世界语的读法,就地专心接受发音的纠正。……

2. 与《民声》相关的资料。由此将会发现,中日两国都在关注大杉荣与刘师复。

(1) 1915年1月15日,举办“工团主义”研究会时,大杉荣“阅读并讲解了无政府主义者某某在支那上海发行的杂志《民声》所载《克鲁泡特金的战争观》(中文)的部分内容,如下”(《大杉荣的经历及言行调查报告书》〔大杉荣的经历及言动调查报告书〕。社会文库编《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人物研究史料(1)》,柏书房,1964年10月15日,第290页)。

《克鲁泡特金的战争观》估计是指克氏答瑞典士梯芬教授(Prof. G. Steffen)《克鲁泡特金对于欧洲战争之意见》一文(耀荣译,《民声》第22号,1914年8月9日)。(见〔注2〕马拉铁司达。)

(2) 1915年4月16日,在平民演讲会上,山鹿泰治为刘师复之死(1915年

3月27日)表示哀悼,之后大杉荣也做了发言,讲述了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近况,并说师复同志之死极其可悲等(《大杉荣的经历及言行调查报告书》〔大杉荣的经历及言动调查报告书〕。社会文库编《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人物研究史料(1)》,柏书房,1964年10月15日,第291页)。

(3)《民声》第31号(1921年4月15日)第11页载有《强毅奋斗的大杉荣》,文中谈到他感染伤寒住院后情况良好,及已有人接替大杉荣编辑、发行杂志《劳动运动》第4期。

〔注5〕

古田大次郎(1900—1925)。

1923年9月中旬,为筹集远东虚无党的活动经费,与几个同伴一起在大阪市郊的小阪袭击银行职员,犯下杀人罪。1924年9月6日,把放入炸弹的包裹寄到福田雅太郎(当时,一般认为残杀大杉荣的凶手背后有军部指使,其负责人则是戒严司令官陆军大将福田雅太郎)官邸,引起爆炸。同年9月10日,被捕,被关押在市谷监狱。1925年10月15日,被处以死刑,罪名为抢劫杀人、违反爆炸物品取缔规章、破坏建筑物。

江口涣在《古田大次郎与〈死之忏悔〉》(古田大次郎と《死の忏悔》)中,通过与大杉荣相互对比,准确地指出了古田大次郎的思想,如下:

古田大次郎与大杉荣在思想上有明显的区别。大杉不是单纯的安那其主义者,而是一位杰出的安那其工团主义者。他的目标是通过调动全国富有革命性的工会之巨大战斗力来破坏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权力机构。相反,古田大次郎可以说是一位纯粹而单纯的安那其主义者。他要通过诉诸恐怖主义这一非常手段来消灭国家权力机构最上层的少数人,把国家这一权力机构引向毁灭。也就是说,他与帝俄时代的俄国社会革命党、虚无党这种战斗团体思想一致。(古田大次郎《死之忏悔》〔死の忏悔〕,春秋社,1968年12月20日,第4页。)

《死之忏悔》是古田大次郎从被捕到死刑确定前撰写的三十二本狱中记(单行本于1926年6月17日,由春秋社出版)。写于死刑确定后的一本,曾以《死刑囚的回忆》(死刑囚の思い出)为题秘密出版。

巴金后来谈到古田大次郎以及《死之忏悔》:

古田大次郎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同时他又自称为一个恐怖主义者。其实安那其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两样东西。(许多安那其主义者都不赞成恐怖主义。)而这书可以说是和安那其主义不相干。若把它当作一个恐怖主义者的心理分析的记录看倒很适当。或者把它看作一个纯洁的青年灵魂(或者说一个人)的最真挚的自白看也无不可。所以加藤一夫读了它,就“觉得我(加藤氏)的灵魂被净化了。我真的由于他的这记录而加深了我对于生活的态度”。这记录在深与真两方面是超过了无数的书册。和它同类的书本我连一册也没有见过。加藤一夫称古田为一个“真诚的,真实的而又充满温情的纯真的灵魂”,这个灵魂的最深而又最真的表白当然会引起无数年青的灵魂的共鸣,加藤一夫说《死之忏悔》是一本“非宗教的宗教书”也是有原因的。

.....

我爱《死之忏悔》,我甚至为了这书才发愿去学日文,但是我每次读它,在我的心灵被那么强烈地震撼了以后,我却有一种惋惜的感觉。像古田那样的人不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上面,却选取了恐怖主义的路,在恐怖主义的境地中去探求真理,终于身死在绞刑台上。这的确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巴金《关于〈死之忏悔〉》,1937年4月。《梦与醉》,南国出版社,1960年1月,第56—58页。)

在巴金的文字中,加藤一夫的表述共有三处。前两处均出自加藤一夫《序》(古田大次郎《死之忏悔》〔死の忏悔〕,春秋社,1926年6月17日,第2—3页),另一处“非宗教的宗教书”的出处不明。

在伯峰与陆少懿的帮助下,巴金翻译出版了该书(他也翻译了几处)。《文丛》第1卷第2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4月15日)广告栏写有“古田

大次郎著，伯峰译，文化生活丛刊《死之忏悔》，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另说“[1937年]5月初出版”。此外，在散文《死》（1937年3月在上海）与《醉》（1937年5月在上海）（均为《梦与醉》所收）中，巴金提及《死之忏悔》并谈到了古田大次郎。古田大次郎《死之忏悔》的其他汉译本有：《民钟》第1卷第14期（1926年1月）所载《狱中绝笔》（非子译）；相关著作有：江口涣《恋爱与牢狱》（钱歌川译，北新书局，1930年）。参考：江口涣《战斗作家同盟记》（たたかひの作家同盟记）（上），新日本出版社，1966年8月30日，第15页；桥川时雄编纂《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10月25日，第735页“钱歌川”。

〔注6〕

鲁多夫·若克尔(Rudolf Rocker, 1873—1958)。

德国安那其主义者、哲学家、历史学家。生于德国美因茨(Mainz)。父亲是工人，在他五岁时去世，不久，他开始从事装订工作维生。通过叔父，了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但马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失望。在换了几次工作后，开始对安那其主义产生兴趣。1893年，作为政治流亡者前往巴黎；1895年，到达伦敦，与犹太移民生活在一起。当时是伦敦犹太人安那其主义运动最活跃的时期，正在发行意第绪语(Yiddish)杂志《工人之友》(Arbeter Fraynd)。他在当地学习了意第绪语，1896年为杂志《工人之友》撰稿(1898年担任编辑)。两年后，前往利物浦(Liverpool)，协助编辑意第绪语杂志《自由世界》(Dos Fraye Vort)。此外，他又致力于组织犹太工人。1902年，犹太安那其主义者联盟(Jewish Anarchist Federation)于英国、巴黎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拘留，后于1919年前往柏林，成为安那其工团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纳粹兴起后逃往美国，在美国结束了一生。

……鲁多夫·若克尔氏在“一大工会”(One Big Union)美国评议会机关报 *One*

Big Union Bulletin 上发表《苏维埃制度之起源》时说：这种思想早在圣西门提倡“消除统治人之手段，应以事务管理技术代之”时就已经萌发了。他又说：“第一国际最初主张苏维埃思想，是在巴塞尔的第四次大会（1869年）上。法国人潘迪（Jean-Louis Pindy）与比利时人安斯（Eugène Hins）勇敢、明确地解释了苏维埃制度的思想。二人意见一致，认为必须以劳动政策取代政府及政党政治。而劳动政策之基础，则是劳动者的富有战斗性的经济团体。革命之际，这些团体承担着重新组织生产与分配的使命。必要消除政治家与议会政党，举行劳动代表大会”；在一开始，“第一国际各团体的大多部分成立了工会组织。第一个企图在政治、议会基础上成立劳动党的，仅有德国”；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结果“在拉丁语系诸国正在实施险恶的反动政治时，其他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初次发展了以改良议会政策为基础的近代劳动党之形体。正是这一政党，给这些国家的工会带来了极其可悲的影响。第一国际的丰富的思想，尤其是苏维埃制度，因此逐渐被人忘记。而再次给它带来新生命之气息的，则是189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此思想从法国传到了俄国”；“在此应注意的是，所谓政治劳动党，当初则无时不彻底对这种思想展开最为毒辣的攻击。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不例外。即使到了1905年，列宁还在声明：‘苏维埃思想是庸俗[Philistine]思想，我党所排斥之物’”；“因此，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工人与士兵等随即在各地主动建立了苏维埃，对抗各政党。至此，布尔什维克等则不得不迎合这种新势力。无论心甘情愿与否，他们终究承认了这劳兵评议会”。然而，他们却未能抛弃征服的欲望，而渐渐扰乱苏维埃思想，把它改变成布尔什维克国下的从属团体。因此，苏维埃失去了它的创造力，终归颓废。”

* R. Rocker, *The Origin of the Soviet-System* (*One Big Union Bulletin*, Winnipeg, Canada. Dec. 31st, 1925). (石川三四郎《改订增补 西洋社会运动史》，弘文社，1950年8月20日，第334—335页。)

余思牧《作家巴金》（南国出版社，1964年8月）第170页“四 巴金的翻译”介绍了巴金的译作，文中写有“西班牙的斗争（R. Rocker 著，1938年平明书店版）”，但笔者没有查阅该书。说到鲁多夫·若克尔与西班牙内战的关系，他是被称为西班牙内战知名斗士的杜鲁底（Buenaventura Durruti）、阿斯加索

(Francisco Ascaso)的挚友。丹尼尔·居林(Daniel Guérin)编《无神无主人 安那其主义·文选Ⅱ》(神もなく主人もなく アナキズム・アンソロジーⅡ)(江口干译,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7月25日)第247—248页《杜鲁底与绝对自由主义战争》(ドゥルーティと绝对自由主义战争)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28年秋天,他们[杜鲁底与阿斯加索]终于秘密地成功移转到德国,在这里接触了试图把他们二人的身份合法化为政治流亡者的鲁多夫·若克尔与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尽管若克尔他们求助于政治权势强大的几位人物,但失败了。……

两位朋友拿到伪造护照后,决定留在比利时。他们在比利时住到1931年4月13日。……

〔注7〕

亚历山大·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1870—1936)。

1870年11月,生于俄罗斯维尔纽斯(Vilnius)。年幼时,舅父马克西姆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柏克曼接触革命文学的机会增多,逐渐成长成革命家。1888年,移居美国。1892年,在爱玛·高德曼的帮助下狙击了当时压迫钢铁厂工人的卡内基钢铁公司(Carnegie Steel Company)总裁亨利·克雷·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致其受伤,因此被宣判二十二年徒刑。1906年秋天,释放(服满刑期之前获假释。——译注)。出狱后,协助爱玛·高德曼编辑她创办的杂志《大地》(Mother Earth)(1906年至1917年)。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爱玛·高德曼共同成立反征兵联盟(No Conscription League),但在1917年遭到镇压。从1916年至1917年间,他还一人编辑、发行杂志《冲击波》(The Blast)。1919年,与爱玛·高德曼一同前往俄国,对俄国革命感到失望,后发表《布尔什维克的神话》(The Bolshevik Myth)(1925年)。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后,离开俄国,辗转德国等欧洲各地。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后,1936年6月28日,因在法国尼斯(Nice)身患重病,加上两次手术失败,顾虑到今后的残疾生活,用手枪自杀身亡。

除《布尔什维克的神话》之外，另有《俄罗斯的悲剧》(*The Russian Tragedy*)、《狱中记》(*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安那其主义 ABC》(*Now and After: The ABC of Communist Anarchism*)等著作。(一并参考本章第2节关于爱玛·高德曼的注解。)

巴金赴法留学期间，1928年在巴黎见过柏克曼。关于当时的情景，他说：

……柏克曼还是一个勇敢的活人，六年前我到过巴黎郊外 St. Cloud 的他的寓所，访问他。他给我写信时用的那柏林办事处的信纸上就鲜明地印着“没有神，没有主人”的字样。这个人已经过了六十岁了，他还常常说着“我们到死都是青年”的话，那么他到死也会相信着神是不存在的罢。这是无疑的。……那个身材短小而结实的，秃头的柏克曼的坚定的风姿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十四年的监狱生活都不能够改变他的信仰……(《神》，1934年11月24日。《巴金短篇小说集》第3集，开明书店，1942年6月，第20页。)

此外，巴金在散文《死》(《文丛》第1卷第2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4月15日，第274页)中提到了柏克曼用手枪自杀身亡一事。《水星》第2卷第2期(1935年5月)广告栏写有“《地牢里生长的爱的花》(A·柏克曼作)，巴金译”；该书或许与《狱中记》有关，详情不明(广告栏为《译文》第2卷第2期[1935年4月16日]的要目介绍。《地牢里生长的爱的花》为柏克曼《狱中记》第2篇《惩役所》中的一章。除了该篇之外，《译文》另连载了《狱中记》第2篇《惩役所》所收《性的渴望》[第2卷第3期，1935年5月16日]、《独房》[第2卷第4期，1935年6月16日]、《记忆的客人》[第2卷第4期]、《绝望的思想》[第2卷第5期，1935年7月16日]，译者均为巴金。——译注)。《民声》第20号(1914年7月25日)第12页《答岸父(续18号)》的著作介绍所列《无政府党之狱中纪略》，即是该书。

二、巴金与爱玛·高德曼

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註1]在很早以前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天义》第六册(一九〇七年九月一日)所载《新刊介绍》介绍了她所编辑的著名杂志《大地》(*Mother Earth*)^①;《民声》第二十号(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二十一号(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第三十三号(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分别简洁地介绍了她的著作篇目、传记及著作内容^②。

巴金初次接触爱玛·高德曼的著作,还是他在成都的时候。他在五四运动时期读过的文章有:《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一九一七年七月)所收,高曼女士《爱国主义》(超海译)、高露曼女士《无政府主义》(霜译);同刊第二集(一九一八年五月)所收,高曼女士《组织论》(凌霜译)、《高曼女士致同志书》等^③。

巴金回忆他当时接触爱玛·高德曼的著作时说:

……《实社自由录》第一集,那里面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说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时候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④

巴金旅居南京时(一九二三年秋天至一九二五年春天)收到了爱玛·高德

① 1906年3月至1917年。杂志以言论自由、废除征兵制、计划生育、俄国革命等为主题,展开了安那其主义宣传运动。

② 《民声》第20号所载《答岸父(续18号)》所收著作篇目有:《无政府主义与各派之言论》(*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工团主义》(*Syndicalism*)、《结婚与恋爱》(*Marriage and Love*)、《祖国主义》(*Patriotism*)。《民声》第21号简洁地介绍了高德曼的生平事迹。《民声》第33号所载《近世无政府党传略(续)》为高德曼的传记。——译注

③ 《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介绍了爱玛·高德曼《结婚与恋爱》,同刊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介绍了《近代戏剧论》,译者均为震瀛(袁振英)。

④ 《我的幼年》。《中流》第1卷第1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5日,第8页。

曼的书信^①，他又回忆说：

E·G·[爱玛·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主义的美丽的人。^②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发行的杂志《民钟》第一卷第十期刊载了爱玛·高德曼《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芾甘译)^③。

在此，或多或少要对爱玛·高德曼当时的处境以及她的著作《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注2]的迫害事件》加以说明。

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爆发。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爱玛·高德曼与柏克曼等二百四十九名政治犯一同被驱逐出美国，一九二〇年一月，到达祖

① 书信中写道：

你的美丽的信和××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说出我是怎样深刻地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青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了活动的革命家来。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智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儿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信仰与活动》。《水星》第2卷第2期，文华书局，1935年5月，第114—115页。）

② 《信仰与活动》。《水星》第2卷第2期，文华书局，1935年5月，第115页。

③ 该篇估计是巴金根据爱玛·高德曼写于1922年7月的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日译本有：司法大臣官房调查课译《我在俄国的觉醒》〔露国に于ける我觉醒〕，1924年7月）中主要与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相关的文字汇集的一篇译作。〔注4〕引用了原著的部分内容。

国俄国，住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由于她把革命后的俄国描绘成一个非常理想的世界，最初还抱有一种良好的印象，但慢慢就开始无法压抑她对俄国的失望了^{〔注3〕}。于是，以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为契机，她决定离开俄国。她探访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注4〕}，是前一年的一九二〇年三月的事情。

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她在十月革命期间，与布尔什维克组织军事革命委员会，又参加了苏维埃政府的建立。然而，因反对苏维埃政府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及政府实施的农民政策，与布尔什维克走向决裂，另加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展开恐怖活动，刺杀布尔什维克一位领导人，列宁也因此负伤，至此，她被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被监禁在疗养院里。一九一九年四月，逃出疗养院。爱玛·高德曼探访她时，她正在展开非法地下活动。

由此可见，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爱玛·高德曼是安那其主义者，尽管二人立场不一，但当时在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意义上，则有相近之处。例如：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地下安那其主义者团体”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手，向位于列昂季耶夫大街的共产党莫斯科委员会的建筑物投进一颗爆炸力强大的炸弹。……^①

在爱玛·高德曼探访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翌年，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为对抗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而设立）、国际妇女会议这三个国际会议。被关押在塔干卡监狱（Taganka Prison）里的十三名安那其主义者借机宣布绝食斗争，向聚集在莫斯科的欧洲各代表团团员提出诉求。结果他们得以释放，但遭到驱逐处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也趁此形势要求政府释放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批准她出国。此

① 胜田吉太郎《安那其主义者——俄国革命的先驱》（《アナーキスト——ロシア革命の先驱》），社会思想社，1974年10月30日，第228—229页。

时,爱玛·高德曼也请求欧洲各代表团的妇女们能够探讨这个问题;她又会晤了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克拉拉·蔡特金,委托她来说服政府^①。

巴金翻译的《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讲的就是发生在这种历史洪流中的事件。他一定是在南京阴暗的屋子里孜孜不倦地翻译了该篇。至于对自己所翻译的文字内容以及相关的历史动向,巴金能够准确地掌握多少,尚不清楚。巴金或许把这种背景等同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民粹派被捕下狱的帝俄时代。此外,巴金也许把要点放在他所敬爱的爱玛·高德曼为了使狱中的俄国安那其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得以释放而四方奔走的行动上面,并出自一种赞同的态度翻译了该篇。无论巴金怎样理解这一事件,从客观角度来讲,他翻译并发表该篇至少可以说明: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时,关于布尔什维克给前安那其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的待遇,巴金是站在批判立场的。通过这种姿态,巴金呈现了安那其主义者的自我形象。

注解

〔注 1〕

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

1869年6月29日,生于俄罗斯科夫诺(Kovno),现立陶宛考那斯(Kaunas)。父母是犹太人,希望她能够成为一个善良、崇奉宗教的女子。她曾在身为官僚的父亲任地库尔兰(Kurland)度过了童年。从七岁到十三岁,被寄养在东普鲁士的伊曼努尔·康德市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祖母家里。直到这一时期,她才开始正式就学。按照当时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惯,除了在学校接受教育之外,她也照例学习了法语与音乐。1882年,与父母移居圣彼得堡。在前一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当时活跃的苏菲亚·佩罗夫斯卡娅

^① 斯坦柏格(L. Steinberg)《左派S·R战斗史》(左翼エス・エル战斗史),苍野和人、久坂翠译,鹿砦社,1970年11月20日,第269—270页。

(Sophia Perovskaya)、安德烈·热利亚博夫(Andrei Zhelyabov)等“人民意志”党人的名字已经脍炙人口,在这座城市里革命形势也在高涨。她在学校学习俄语,并接触到向往革命的学生与富有革命性的新思潮。看到学生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生走向民间,她也想做一个同他们一样的人。1886年,她被一家束身衣制造工厂雇用为女工,后调换工作,制造手套。是年,她得知姐姐希伦(Helena)已决定依靠已在美国成家的另一位姐姐移居美国,于是便随同姐姐希伦前往美国。他们经由纽约、罗彻斯特(Rochester),到达城堡花园(Castle Garden),住在这里,开始在嘉森公司(Carson Co.)成衣部做工。偶然遇到一位会讲俄语的青年,于是两人结了婚,但不久丈夫行踪不明。之后,她到了纽黑文(New Haven),在一家束身衣制造工厂做工。在这前一年的1886年,刚刚展开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在芝加哥,罢工工人与雇主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而著名的干草市场事件也发生在这一年。她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开始关注工人运动。1887年,她慢慢发现对权力机构不能指望任何慈悲,并开始认识到俄罗斯沙皇专制主义与美国巨大的资本体制几乎毫无差异。在工厂做工时,她渐渐开始渴望自己能够从事一种把人们从工钱奴隶状态解放出来的事业。在此前后,她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大量文献。此外,她还见到了当时正在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看了安那其主义者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发行的杂志《自由》(Freiheit)。就这样,她逐渐成长成一位觉醒的无政府主义者。因做工劳累过度生病,迁居罗彻斯特,住到1889年8月。不久赴纽约,师从约翰·莫斯特(后因意见不合而决裂)。与俄国人安那其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1870—1936)相识也是在这前后。柏克曼是她自由恋爱的对象,也是她后来住在俄国时的亲友及合作伙伴。从此,她开始以演说家的身份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1890年,任纽约无政府党大会评议员。1892年,在匹兹堡(Pittsburgh)发生总同盟罢工。亚历山大·柏克曼为了替在荷姆斯泰德钢铁厂(Homestead Steel Works)罢工中遭到残杀的工人复仇,狙击资本家亨利·克雷·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但行刺未遂。柏克曼被判处二十二年徒刑。警方想以柏克曼的事件株连爱玛·高德曼,但没有达到目的。柏克曼被关进宾夕法尼亚监狱。

1893年10月,爱玛·高德曼以煽动暴徒罪名在纽约的法庭受审,后被关进黑井岛狱(Blackwell's Island)一年。1894年,与纽约各种无政府主义报刊编辑结下友谊。1895年,前往欧洲,在英格兰、苏格兰举行巡回讲演,后到维也纳,领取助产士、护士执照。1896年,经由苏黎世、巴黎,回到纽约。1897年,举行了远至加利福尼亚的大型巡回讲演。1899年11月,再次到英格兰、苏格兰举行巡回讲演,后前往巴黎。在英国,与彼得·克鲁泡特金、昂利柯·马拉铁司达、柴可夫斯基(Nikolai Tchaikovsky)、柴尔克梭夫(W. Tcherkesoff)、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西波里特·哈维尔(Hippolyte Havel)等人相见。1900年11月,回到美国。她一边做护士的工作,一边继续从事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宣传活动。1901年9月,波兰青年里昂·乔戈什(Leon Frank Czolgosz)击毙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并在法庭上强调自己是安那其主义者(其实,他没有加入任何安那其主义者团体)。官方想把这起刺杀事件嫁祸于安那其主义者团体以及像爱玛·高德曼那样知名的安那其主义者,用以拘捕他们,却以失败告终。然而,由于1886年的干草市场事件以及这起美国总统麦金莱刺杀事件,美国国内由美国工人展开的安那其主义运动逐渐走向衰落。因此在美国,安那其主义主要残存于大城市里的犹太居民、意大利人以及为逃脱俄罗斯沙皇的迫害而来到美国的俄国流亡者之间。从1906年3月至1917年,她从事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名杂志《大地》(*Mother Earth*)的编辑、发行工作,展开了以言论自由、废除征兵制、计划生育、俄国革命等为主题的安那其主义宣传运动。1906年,被关在宾夕法尼亚监狱里的柏克曼得以释放。1907年,她作为美国代表,出席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次无政府党大会。1917年,高德曼与柏克曼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立的反征兵联盟(No Conscription League)遭到镇压,多名成员被捕下狱。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爆发。1919年12月,她与柏克曼等(二百四十九名政治犯)一同被驱逐出美国,乘坐美国轮船比福德号(USAT Buford)前往俄国。1920年1月,到达俄国,住到1921年12月。在此期间,她到俄国各地——彼得格勒、莫斯科、乌克兰、哈尔科夫(Kharkov)、波尔塔瓦(Poltava)、基辅(Kiev)——旅游,访问共

产党各机关,出席各种会议(莫斯科无政府党大会、被逐出美国的人们所组织的集会等),并探访彼得·克鲁泡特金、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等人。她希望自己能够作为俄国革命的一个成员献身工作而回到了祖国,但随着对现实的深入了解则发现,映入她眼帘的“俄国的真相,竟然与自己抱着远大期待所憧憬的理想世界迥然不同”(《我在俄国的觉醒》[*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1922)。于是在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后,她产生了离开俄国的想法。1920年3月与7月,拜访彼得·克鲁泡特金;7月,到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隐匿之处探访。1921年2月8日,彼得·克鲁泡特金去世,她参加了葬礼。3月,逗留彼得格勒时,获悉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喀琅施塔得军港一万六千名水兵提出第一、第二舰队支队船员全体大会决议,要求:因现苏维埃不反应工农意志,故应按照秘密投票制度进行改选;确保工农、安那其主义者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言论与出版自由;释放政治犯;废除政治处;解散军队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等等(关于大会决议,详见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1年1月13日,第53—54页。——译注)。爱玛·高德曼、亚历山大·柏克曼等人已经预料到苏维埃政府将进行镇压,于是诉求彼得格勒劳动委员、防卫苏维埃委员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不要诉诸武力,要以革命家的姿态通过协议解决问题。然而,她们的呼声影响甚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久,托洛茨基把海军士兵们的行为判定为反革命行为,连续十天发动攻击,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12月,她离开俄国,前往德国、法国。1924年,到达英国。在英国生活不久,又前往法国。随着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她开始在报道领域活跃。西班牙内战终结后,她作为反对佛朗哥将军所建立的西班牙体制的宣传活动家展开活动。1940年5月,在加拿大举行巡回讲演途中,病倒在多伦多,结束了她七十一岁的一生。她的遗骸被送往芝加哥,埋葬在瓦尔德海姆公墓(Waldheim Cemetery)——距离以干草市场事件闻名的干草市场广场的牺牲者坟墓不远。关于她的前半生(至1907年的部分),见西波里特·哈维尔《爱玛·高德曼传》(エマ・ゴオルドマン传)(1910年12月,纽约),伊藤野枝译,《大杉荣全集》第10卷《伊藤野枝全集》,世界文库,1963年9月20日翻印版。

〔注2〕

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Maria Spiridonova, 1884—1941)。

1884年,生于莫斯科东南方、顿涅茨克岭(Donetsk Highland)以北的坦波夫(Tambov)县坦波夫镇,中等阶层家庭出身。1905年,进入护士培训学校。是年1月,发生“血腥星期日”事件,其影响波及坦波夫县。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构成了革命运动两大派别。对于在乡村小镇长大的她来讲,与站在城市工厂工人立场的列宁等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相比,以社会三位一体说——认为农民可以向革命阶级发展,预想农民与城市工厂工人可以合作,给予知识分子在这一队伍中的地位——为纲领的社会革命党则更有魅力,于是在此前后加入社会革命党。1906年1月,她在鲍里索格列布斯克(Borisoglebsk)车站用手枪狙击卢热诺夫斯基(G. N. Luzhenovsky)将军,使其受致命伤。在一年前的“血腥星期日”事件发生后,俄国各地不断发生叛乱、罢工、示威游行,政府也格外加强了对这些组织的镇压。她的居住地坦波夫县也宣布戒严,坦波夫县长向各行政区任命特别军司令官,并在其所在地驻扎军队。被她狙击的卢热诺夫斯基,是被委以其行政区之一的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地区之全权的特别军司令官,他派遣的惩罚远征队在各村庄的威胁行为已成为村民的怨府。司披利多诺瓦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行动,正如之后她在法庭上的陈述那样,这是按照社会革命党坦波夫县委员会的决定执行的。1906年3月,她出庭军事法庭,被判处绞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当她在狱中写给亲友的书信刊登在圣彼得堡的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报刊《俄罗斯》(*Rus*)上时,在俄国国内引起了营救司披利多诺瓦的运动。而在国外,例如法国成立了抗议司披利多诺瓦死刑判决委员会,并向俄国政府递交了请愿书。1906年5月,她被移送到莫斯科布提拉尔监狱(Butyrka Prison)。1907年,她被关进西伯利亚涅尔琴斯克地区监狱之一的阿卡忒(Akatui)监狱。约六个月后,又被移送到位于马勒泽甫(Malzev)的妇女监狱,在这里呆到1911年。在此期间,1910年,社会革命党党员阿尔卡季·斯佩兰斯基(Arkady Speransky)为司披利多诺瓦策划越狱,但被发现,以失败告终。

1911年4月,她再次被关进阿卡忒监狱。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儒略历1917年2月(公历3月),二月革命爆发,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开幕,由社会革命党与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领导。布尔什维克派的势力当时还很微弱。各地建立了苏维埃,由农民代表组织的苏维埃也将要诞生。以宪政民主党为中心的临时政府成立后,沙皇逊位,罗曼诺夫王朝由此衰亡(临时政府,有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一人代表苏维埃入阁;后于5月,另有孟什维克领袖策烈铁里[Irakli Tsereteli]与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入阁)。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与苏维埃的妥协政权。4月,列宁从亡命之地归国,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得到了强化。7月,彼得格勒的军队与工人打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标语展开了武装示威运动,为此,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忙于平定武装示威运动。8月,在彼特格勒召开了社会革命党大会,党内左右两派作为敌对者相互对抗。司披利多诺瓦率领的左派提出纲领:“禁止展开与战争的各种目的有关的宣传活动,即时停止全战线作战,无条件废除死刑,即时向土地委员会转让土地,允许工人参加工业产品管理。”这明显是逼促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体制垮台的纲领。不久,司披利多诺瓦等人领导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与承认临时政府体制的右派走向决裂,便开始支持布尔什维克。儒略历10月(公历11月),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与司披利多诺瓦等人领导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组织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并在布尔什维克主导下发动起义,包围冬宫,推翻了临时政府。司披利多诺瓦等人又参加了新苏维埃政府的建立。1918年2月,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7月,因反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及政府实施的农民政策,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走向决裂。第五次苏维埃大会支持了政府的方针。为此,在苏维埃大会上归于失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展开了反政府运动。8月,因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展开恐怖活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乌里茨基(Moisei Uritsky)被刺杀,列宁也因此负伤。12月,司披利多诺瓦在莫斯科的家中被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缩写音译,成立于1917年12月,取缔反政府行为、对苏维埃政府的怠工、投机以及其他犯罪行为)成员逮捕,被监禁在疗养院里。1919年4月,逃出疗养院,展开非法地下活动。

1920年7月,美国安那其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到她的隐匿之处探访。10月,被契卡当局再次逮捕,被关押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除了身患结核性疾病之外,还并发神经系统的疾病,于是被移送到契卡的附属医院。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1921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为对抗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而设立,另称赤色职工国际)、国际妇女会议这三个国际会议,被关押在塔干卡监狱里的十三名安那其主义者借机宣布绝食斗争,向聚集在莫斯科的欧洲各代表团团员提出诉求。结果他们得以释放,但遭到驱逐处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也趁此形势要求政府批准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与亚历山德拉·伊兹麦洛维奇(Alexandra Ismailovich, 司披利多诺瓦的老同志)出国疗养,并声明准备提供必要资金。此时,爱玛·高德曼也请求欧洲各代表团的妇女们能够探讨这个问题;她又委托克拉拉·蔡特金来说服政府。然而,这一心愿未能实现。直到1921年9月,她才住进了莫斯科近郊马拉霍夫卡(Malakhovka)的一栋私人住宅,条件是到她病情痊愈为止。她在这里呆了两年多。1923年5月,她被移送到完全不能与同志们接触的地方。1925年年初,司披利多诺瓦与亚历山德拉·伊兹麦洛维奇遭到处分,被驱逐到中亚撒马尔罕。1928年年底,契卡接受司披利多诺瓦的要求,于是她开始在突厥斯坦(Turkestan)的首都塔什干(Tashkent)生活。1929年秋天,司披利多诺瓦患上严重的肠伤寒。1930年年初,前往莫斯科接受诊断。专家强调她病情严重,并说她尤其患有肺结核。为此,她被移送到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的国立结核疗养院。她在这里疗养了一段时间,感觉病情有所好转,另加疗养费用开始拮据,于是回到了塔什干。1930年8月,她被带回莫斯科,被关进监狱。后又关进位于乌拉尔山脉西南方乌法(Ufa)的监狱,处于一种完全与外界友人隔绝的状态。1941年,去世。主要参考:斯坦柏格《左派S·R战斗史》(I. Steinberg, *Spiridonova, Revolutionary Terrorist*, London, 1935)(左翼エス・エル战斗史),苍野和人、久坂翠译,鹿砦社,1970年11月20日。此外,《新世纪》第45号(1908年5月2日)所载《记俄国女侠玛丽亚事(俄国仰来稿)》介绍了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内容至1906年前后为止)。

〔注 3〕

1922 年 7 月,爱玛·高德曼在德国柏林创作了《我在俄国的觉醒》(*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以下文字讲述了她离开俄国的经过。笔者使用的版本为该书日译本:司法大臣官房调查课译《司法资料第 48 号 露西亚事情》,1924 年 7 月。

放弃我心中蕴藏已久的幻想,确实是很苦恼。对于拥有那些将自己毕生奉献给伟大但又艰难的、富有革命性的改造事业的俄国民众之新生国土,我怀着一种期待而来到了俄国。我热切地渴望自己将成为这一鼓舞人心的事业的一员。

然而,俄国的真相,竟然与自己抱着远大期待所憧憬的理想世界迥然不同,是一幅百鬼横行的画幅。直到我能够拥有如此想法,足足用了十五个月的时间。为了拉倒我蕴藏在心中的理想的高楼,致命的锁链每日、每周、每月都在增添其新链环。我曾与这一觉醒拼斗过,却毫无益处。不该放弃,也不能放弃!我心中的幻想在拒绝那将要打破这一幻想的周围的现实,这让我懊恼不已。

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后,我终于发现俄国革命如今已灭亡。

我看到了彻底破坏革命建设成果的,压迫、贬低、瓦解一切的,确实可怕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当我发现我无法又不甘心做如此凶恶机关的一员时,发现它对俄国、对她的民众都没有任何用处时,我决定离开俄国。……(《露西亚事情》,第 1—2 页。)

……

真正的俄国革命发生在 1917 年夏天的几个月里。其间,农夫们得到了土地,工人们得到了工厂,这实证了他们对社会革命的意义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十月革命,是对始于六个月前的事业的收尾工作。布尔什维克身披社会革命主义者的土地均分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产业政策的外衣,僭取民众的声音,发动起义。当革命热潮使它掌握了权力,布尔什维克便摘去了它的假面具。布尔什维克与俄国革命在精神上的分裂始于此时。从此,两者间的鸿沟则日益加深,利害冲突也日渐增多。如今,称布尔什维克为俄国革命之强敌,也不为过。(同书,第 4 页。)

.....

把破坏与恐怖视为革命之一部分的议论,我并不反对。我知道,过去一切政治的、社会的大变动都曾诉诸暴力。美国的独立,是勇敢的殖民者用武器反抗英国压迫的结果。黑人奴隶制度的废除,是约翰·布朗不惜一战的结果。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这我决不拒绝,决不否定。然而,它应该用在防御之时。而把凶暴政治视为主义、制度、社会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则又是另一回事。此种凶暴政治将导致反革命,最终同样会使凶暴政治本身变成反革命。

像俄国革命这样少有暴力的革命,是罕见的。假如民众与有修养的军队能够继续管制革命,赤祸也决不会发生。这已为十月革命后几个月之间盛行于俄国的协力、团结的精神所证明。由于少数人一心想成立独裁国家,所以自然需要压迫与凶暴政治。

.....

.....布尔什维克的压迫在搅动世界的标语下掩盖了其真相,欺瞒着群众。正因为我是革命家,我拒绝支持在俄国可谓主人阶级的共产党。

直到我生命结束那天,我要拥护被剥夺权力者与被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其他,我都无所谓。在俄国时,我未能为受苦中的俄国做些什么。如今,我认为通过该著作可以对俄国做些贡献。然而,该书并非我只为关怀俄国人民而创作的,而是为世界民众创作的。(同书,第10—11页。)

[注4]

我用了两天时间听玛丽亚向我讲述关于1917年10月以来的情况。玛丽亚详细地述说了民众的热忱与热情,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掌权、左倾化(该处日译本为“左倾”,而英文原文为“turn to the right”,即“右倾”。——译注)。她又继续讲了很久:《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可谓束缚俄国的锁链之第一链环;强行征兵制将毁灭俄国,使其丧失对革命的信心;布尔什维克任意对革命性批评施加暴力;共产党的新官僚政治及其无能;万事绝望的局面。她以这些话彻底攻击了布尔什维克及其理论与制度。……(《露西亚事情》,第108页。)

.....

玛丽亚继续说:“布尔什维克的问题在于它不信任民众。布尔什维克自称为无

产阶级党派,但它不信任工人。由于不信任工人,因此造成了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屈服。《布列斯特和约》也给革命带来了致命打击。除了芬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乌克兰(割让给德国)的背叛,农民还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同胞们遭到屠杀,他们的家当也被掠夺。即便单纯的农民难以理解布尔什维克为何背离以往公布的声明‘无赔款无并吞’,但再单纯的农民都知道,《布列斯特和约》所带来的赔款只有以榨取农民膏脂、以农民的千辛万苦才可支付。因此,他们怨恨、敌视苏维埃政府,沮丧、气馁使他们放弃了革命。而《布列斯特和约》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后果则是:既然布尔什维克与支配德国无产阶级的德国主人谈判并签订和约,德国工人也无法继续信任俄国革命了。《布列斯特和约》是俄国革命之灭亡的开始,这是历史事实。其他因素也将成为革命崩溃的原因,但其最大原因则是《布列斯特和约》。”(同书,第111页。)

.....

玛丽亚没有讲述自她反对布尔什维克以来所受到的极大痛苦。然而我从别处听说:玛丽亚曾两次被捕,遭到长期的监禁;释放后也与帝俄时代同样受人监视;夜间几次被拉到外面拷打,被宣告执行枪决(契卡的惯用手法)。于是我问她真相如何。玛丽亚不喜欢讲她自己的事情,但好像也没有否认这些事实。玛丽亚只在顾虑革命与她热爱的农民的命运,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事情,她非常希望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能够知道俄国的真相。

在我所接触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所有人士之中,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是最诚实、不偏不倚,又是最可信任的人物之一,令我深感钦佩。她英勇的经历,与她无论是在帝俄时代还是在布尔什维克时代都不肯对革命思想表示妥协的姿态,是她身为纯粹革命家的充足证据。(同书,第113页。)

斯坦柏格《左派 S·R 战斗史》(I. Steinberg, *Spiridonova, Revolutionary Terrorist*, London, 1935)(左翼エス・エル战斗史)(苍野和人、久坂翠译,鹿砦社,1970年11月20日)第250页至第253页的部分内容引自爱玛·高德曼《行过此生》(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London, 1935),该处描述了爱玛·高德曼探访正在莫斯科展开非法地下活动的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情景。

三、黄庞死后的第四年

首先来简单地介绍黄爱与庞人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安那其主义者黄爱与同事庞人铨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劳工会。他们信奉工团主义^①,提出了“政治和经济的平等”等十七条纲领,创办了杂志《劳工》《劳工周刊》(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时,会员激增到四五千人^②),同时又创办夜校,致力于工人教育。

一九二二年一月,第一纱厂工人为谋求旧历年假双薪举行罢工,立即遭到军警镇压。事后不久,黄爱与庞人铨因领导罢工而被第一纱厂的主要股东华实公司所贿赂的军阀赵恒惕逮捕,并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处决。情况大致如此。

黄爱与庞人铨被处决后,湖南劳工会被查封,干部们逃往上海、天津、汉口等地,企图在各地重建组织。

当时在中国劳动界中,成立全国性联络机构的形势正将诞生。其开端即是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③的领导下,于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与会者中也有前湖南劳工会干部、逃往上海后成立“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的谌小岑^[注1]等人。据铃江言一《中国解放斗争史》介绍,大会情形如下:

此次大会,不是在完备的领导力量下召开的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而是在劳动组

① 激进的产业工会主义,是否定权威、提倡个人自由结合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工会之结合体,要求以罢工等直接行动来实现产业管理。它重视工会般的经济组织,由此组成共同体来调整生产与消费。它不承认所有政治活动,尤其是议会主义,以自治为原理排除中央集权管理。

② 《湖南劳工会的刊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22页。

③ 负责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特立、邓中夏、罗章龙、李启汉等人。

合书记部的主持下召集的全国各派的工会大会。因此,仅仅五天的讨论也与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之后的情况相同,仍然杂乱无章,无法一致,反而相持的各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派与工团主义[Syndicalism]派——始终在激烈争论。代表工团主义的湖南方面人士,如有谌小岑出席大会,他坚决反对把统一工会的领导权交给马克思主义派。经过激烈争论,他们脱离了所谓工会大会。因此到了最后,此次全国大会实际上便从各派联合大会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派工会的全国大会。……^①

另外,此次大会决议案(六)中写有:“规定黄、庞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湖南劳工会代表提出)。”^②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运动继续发展,但是,反抗这一趋势的势力也的确存在。例如在上海劳动界中,至少湖南劳工会方面的谌小岑等人则属于该势力。然而,他们不久便开始把各种体系的因素引进组织,终于被编入国民党的劳动政策路线之中。关于这些形势的变迁,《中国解放斗争史》的解释如下:

马克思主义派的领导力量当初就很强大,但在这前后,企图与此对抗的其他工会运动者的努力也颇为激烈。这场运动的核心势力,主要是信奉工团主义的湖南劳工会的成员。华实纱厂[即主要股东华实公司所经营的第一纱厂]罢工后,在赵恒惕的追赶下,他们把组织迁到上海,在这里继续展开活动。然而,因领导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逐渐消失,在此前后,基于所谓经验现实主义的“工会主义”实际上则变成了这一派别的领导精神。于是,一批因情感或其他因素脱离了共产党派的分子,以及国民党内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便加入了这一派别。尤其是国民党右派领导人对此给予大力支持,如有冯自由、邵元冲、马超俊等人。

就这样,一九二三年十月,他们以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

^① 石崎书店,1953年9月15日,第294页。

^②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3页。

会、上海纺织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为基本工会，筹备成立地方联合，翌年[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上海工团联合会成立大会^①。工团联合会成立时，拥有二十四个工会，到了一九二五年五月，已增加到三十七个工会。中心人物为张志余、徐锡麟、王光辉、谌小岑等人。

然而，这一派别并没有建立全国性组织的基础。原因不只在他们上海一带仅仅拥有三十几个地方工会联合；由于他们的活动在整体上逃避政治斗争，仅以工会主义的经济斗争来改善工人的地位，因此，他们连领导那些遭受军阀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工人发动斗争，并牢固地掌握住这些群众的最基本的资格都丧失了。果然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初，上海所有的工人都抛弃了他们。……^②

巴金住在上海期间，上海劳动界正处于这种情况。湖南劳工会与国民党在上海共同举办“黄庞四周纪念大会”，出版了纪念特刊号《上海黄庞四周纪念大会特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巴金于该刊发表了《黄庞死后的第四年》。

笔者没有找到这篇论文，不知文章是什么内容。但有些资料介绍了收于特刊号的其他几篇论文。笔者将通过探讨这些资料，以及依据笔者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份刊物的性质的理解，来综合讨论巴金的处境。

如上所述，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把黄爱与庞人铨殉于国难之日定为纪念日的决议案已经通过。因此，为了纪念此日，中国共产党每年都会举行各种活动、发行各种纪念出版物。但无论怎样，最热心的主要还是湖南劳工会方面的人士们，他们似乎要以此掩盖自我势力的衰落。也许，他们想通过强调黄爱与庞人铨是中国劳动运动的先驱，亲自炫耀这一方面已真正由他们继承，来维持其势力。仅就上海的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的出版物而言，就有《劳工周刊》第十四期的《黄爱庞人铨被害纪念特刊号》（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血钟》（一九二二年五一增刊）、《黄庞四周纪念特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几

^① 上海工团联合会于1924年3月8日成立。见《工团联合会成立记》，《时报》1924年3月9日，第3张。——译注

^② 铃江言一《中国解放斗争史》，石崎书店，1953年9月15日，第307—308页。

种；即使不是特刊号，《劳工周刊》也常会提及黄爱与庞人铨。

发表巴金的文章的《上海黄庞四周纪念大会特刊》载有毛一波^①《黄庞与中国劳动运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介绍了文章的部分内容，如下：

……“不幸啊，黄庞是早死了，于是乎全中国的劳动运动，竟入于可怜的状态之中！”……“那般所谓共产党的工贼[Scab]，便喜出望外，乘机来利用工人了。他们的口中，自然说得天花乱坠，什么打倒军阀咧！打倒资本家咧！其实都是哄骗我们工人的话。他们的心目中，都很想自己做军阀、自己做资本家呢。他们以为黄庞两烈士是我们工人所最崇拜的首领，硬说黄庞是他们同志，真可恶之至。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那般所谓共产党的工贼们利用工人，工人是万分危险的。工人的事，应当由我们工人自己来干；驱逐所谓共产党的工贼，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②

介绍该篇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的编辑也在引文后（第一五五页）说“这些说法是比较露骨的”。此话的确不假，毕竟是黄庞四周纪念大会的特刊号，刊物论调与往常相比高出几度也万不得已，但实际上，这却成了对共产党的强辩无理之全面攻击。

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六七四页《上海黄庞四周纪念大会特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目录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国民党纪念黄庞通告》，值得关注。只从目录中的文章标题即可看出，这与湖南劳工会方面的人士们被编入国民党的劳动政策路线之中的上述情况相互符合。此外，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册^③第二〇六页的以下文字，与以上所引《中国解放斗争史》第三〇八页“国民党右派领导人对此给予大力支持，如有冯自由、

^① 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54—155页。（自“那般所谓共产党的工贼”至结尾的引文，出处为愚夫《黄庞四周纪念》【《上海黄庞四周纪念大会特刊》所收】，并非出自毛一波《黄庞与中国劳动运动》。——译注）

^② 中华大典编印会、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合作，1966年6月。——译注

邵元冲、马超俊等人”中的马超俊有关。引如下，以做旁证。

国民党员马超俊等呈中央抚恤委员会为黄爱庞人铨烈士请恤事略：

“黄爱庞人铨两烈士，以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努力工人运动致触军阀之忌，于民国十一年一月，在长沙惨遭伪湖南省长赵恒惕杀害，[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奉国民政府明令昭雪，通缉凶犯，并飭湖南省政府，拨给葬地在案。……”

以上讨论了巴金住在上海期间有可能会接触的上海劳动界(湖南方面)的情况，以及信奉工团主义的湖南劳工会方面的人士们的活动情况和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上海黄庞四周纪念大会特刊》的性质。若要通过这些因素特意做出判断的话，笔者认为巴金《黄庞死后的第四年》与毛一波《黄庞与中国劳动运动》尽管在文字表达上笔锋会有强弱之别，内容上也会有浓淡之差，但就本题而言，估计内容相似^①。

以上通过追溯巴金在成都、上海、南京、上海的行踪，以及讨论他写于这段时间的几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他已经成长成安那其主义的信奉者。从巴金对爱玛·高德曼《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的翻译，以及巴金撰写《黄庞死后的第四年》时的处境可以得出：第一，关于布尔什维克给前安那其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的待遇，巴金是站在批判立场的；第二，从客观角度来讲，巴金可能与湖南劳工会方面的人士们有过来往；等等。然而，第二点过于笼统，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本文的说明还不够充分。其实，在笔者查阅第二点的相关资料时，一直对其处女作小说《灭亡》(一九二八年八月写毕)的主人公杜大心的形象感到好奇。

^① 巴金通过介绍各国安那其主义者的临终遗言，主张废除压迫者所倚仗的制度。毛一波则通过分析黄庞的言论，再次强调了二人的主张：劳工的事情要由劳工自己做，实行劳工与资本家绝无妥协的阶级斗争。——译注

杜大心当然不是巴金本人。只是，杜大心在《灭亡》中的态度，与巴金后来撰写的《谈〈灭亡〉》中的部分内容^①有所一致。这一点下面还会讨论。

首先来介绍小说梗概，如下。

时间：一九二五、二六年。地点：上海。当时，上海正处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统治下。

主人公：杜大心，在纺织工人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一名同事因携带传单被戒严司令部逮捕，后被斩首。为了复仇，杜大心用手枪狙击戒严司令，又向自己头部开枪自尽。

杜大心与李静淑之间的恋爱问题又为小说增添了色彩。故事大致如此。

作者巴金这样描述杜大心的工作地点纺织工人总工会的内部情况：

在这纺织工人总工会底十几个办事员中分了两派：杜大心是一派，王秉钧也算一派。王秉钧底势力要大一点，他虽然只是一个交际委员，但他是某党[国民党]工人部底职员，又是派到这工会来的代表，他可以向党部按月去领津贴工会的款子。王秉钧本是一个工厂的学徒，但因为人很聪明，又常常跟着几个二等伟人东奔西跑，而且同别人办过几个工会，资格既老，经验又多。加入某党后，因为他曾从事劳动运动多年，所以得在工人部里当一个职员。……^②

杜大心与王秉钧的人物形象的对比文字如下：

……他们之同情于杜大心与其说是受了他底思想上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他底人格上的感化。他们不能明白地说出王秉钧所述的总理主义[三民主义]和杜大心底自由社会主义谁好谁坏……^③

① 《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4月5日，第61页。

② 《灭亡》，开明书店，1940年3月十三版，第124页。

③ 同上书，第125页。

此外，趋炎附势的王秉钧在讲话时常提起总理孙文，炫耀自己的权势。而杜大心则以拒绝的态度应付了他。巴金这样描写了这段情节：

“……他老人家还拍我的肩膀，说我是忠实的革命同志。……本来总理的主义是伟大的，然而他本人更伟大，凡是和他老人家见过一面的人也多少有点伟大了。……”他还得意地用左手摸摸他底右肩，极力模仿当时总理拍他底肩膀的神气。

杜大心不禁失声笑了。这一笑使得王秉钧觉得惶恐了。在他看来这时候发出不敬的笑声，不仅是侮辱了他，而且连总理也被侮辱了，真是罪该万死。他不相信世间竟有这样大胆的人！^①

关于王秉钧，巴金在《谈〈灭亡〉》第六十一页中写道：

……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却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写了这样的人。……

只要回顾一下以上以《黄庞死后的第四年》为题所讨论的湖南劳工会的人士们，我们便会看清王秉钧的真面目。巴金说他以极大的厌恶描写了王秉钧这样的人物，据此可以推断巴金与这种人物的立场是互不相容的。更具体地说来，对于上述那些被编入国民党的劳动政策路线之中的湖南劳工会方面的人士们，巴金表示了拒绝的态度。

在《灭亡》中，王秉钧是总理主义者，杜大心是自由社会主义者。虽然王秉钧崇拜总理孙文、遵奉三民主义，但他也许通过这一点展现了他以此为谋生之道的姿态。而杜大心的自由社会主义，只从术语本身来看则无法下严谨的定义，但我们还是可以由此领悟到它是否定权威、提倡个人自由结合的安那其主

^① 《灭亡》，开明书店，1940年3月十三版，第173页。

义——类似于社会主义。

在小说中，巴金再现了王秉钧会晤总理的情节，而在这一场面，杜大心不禁失笑。笔者大体上认为，杜大心不过是对王秉钧炫耀他与总理的关系时的举止感到好笑，然而，这是否还有其他解释？笔者认为，在王秉钧的总理主义与杜大心的自由社会主义的对比之下所呈现出来的双方的生存方式的差异，以及在面向未来建设新社会的构想上的差异，不正是杜大心失笑的根本原因吗？

这就说明，对于像湖南劳工会方面的部分人士那样与国民党建立关系的人，巴金始终从他的思想立场上表示拒绝。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巴金内心描绘的估计是一个对于所谓趋炎附势的总理主义者表示拒绝的人物。

笔者从沈仲九^[注3]身上看到了这种安那其主义者的例子。虽然本文所涉及的沈仲九的活跃时期是在巴金赴法留学（一九二七年一月）之后，但作为具体例子他则是最恰当的人物，所以决定讨论他。

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海近郊江湾创办了国立劳动大学^[注4]。国立劳动大学，是其前身上海大学^①被封锁后，国民党为了培养从事劳动运动的人才而创办的学校。沈仲九任劳工学院院长（按照大学机构的地位，他是副校长级别）。日本安那其主义者岩佐作太郎^[注5]、石川三四郎^[注6]、山鹿泰治^[注7]等人也曾被聘为大学讲师。三人分别就国立劳动大学写过文章，但本文主要讨论岩佐作太郎的文章，因为他的文章最为翔实地记述了沈仲九的为人立场。文章出处均为战后

① 当时上海大学情况如下：

……民国 13、4 年顷，上大取教员，大都为国共两党要人。人才济济，极盛一时，衔名姓氏如下：校长暨代理校长于右任，邵力子；教务长邓中夏；总务主任韩党民；社会学系教授瞿秋白（主任），彭述之，李季，恽代英，施存统，高语罕，蔡和森；俄国文学系教授蒋光赤，瞿世英；英国文学系教授何世植（主任），田汉，沈雁冰，傅东华，谢六逸；中国文学系教授陈望道（主任），叶楚伦，胡朴安，刘大白，俞平伯；自由讲座讲师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孙科，张继，谢持，陈独秀，张太雷，沈玄庐，郭沫若，柳亚子。（小杜《于右任与上海大学》。《现代史料》第 1 集下篇，海天出版社，1935 年 3 月再版，第 290—291 页。）

发行的《平民新闻》^①。岩佐作太郎见到沈仲九，了解了其对国立劳动大学的抱负，如下：

先生[沈仲九]详细地讲述了即将创办的国立劳动大学的性质、教育方针、它与政府的关系，极力主张作为对抗共产党的政策首先要击败唯物辩证法，并强调由于国民党把孙文崇为偶像、遵奉三民主义，因此要尽快培养出安那其主义者的斗士，以实现社会革命。^②

可是，岩佐作太郎来到这所大学后，却没有从师生身上感受到要热心献身于社会改革的干劲。

……没有任何可观的运动。我的心情不禁郁闷起来。我想，这是因为中国的同志多为中产阶级出身，生活宽裕，他们并非出自切实要求，而是陷入思想游戏之中。……^③

之后，岩佐作太郎日渐看出这所大学的矛盾。

① 以“平民新闻”为刊名的刊物有以下几种(世界语版除外)：

周刊《平民新闻》，1903年(明治36年)11月15日创刊，1905年(明治38年)1月29日停刊。

月刊《平民新闻》，1907年(明治40年)1月15日创刊，同年4月14日停刊。

月刊《平民新闻》，1914年(大正3年)10月15日创刊，1915年(大正4年)3月停刊。

此外另有半月刊《大阪平民新闻》，第10号停刊；后改题为《日本平民新闻》，第23号停刊。《大阪平民新闻》，1907年6月1日创刊，第10号[同年10月20日]停刊；《日本平民新闻》，同年11月5日以发行第11号创刊，第23号[1908年5月5日]停刊。——译注)

战后，1946年(昭和21年)6月15日，日本安那其主义者联盟创办了机关报周刊《平民新闻》，1949年(昭和24年)8月22日停刊。(以第129号停刊后，自第130号[1949年12月10日]起，先以旬刊，后以月刊，又改为半月刊发行，于总第154号[1951年5月25日]停刊。——译注)

文中所引用的刊物均为战后发行的《平民新闻》。

② 《受邀至中国》(中国に招かれて)(2)。《平民新闻》第38号，1947年8月22日。

③ 《朕即国家》(朕は国家なり)。《平民新闻》第40号，1947年9月6日。

尽管劳动大学受到了安那其主义者的影响,但对外毕竟是国立大学,是国民党支配下的学校。建校典礼与各种国家性礼仪均要按照国民政府的政令如实执行。例如祭拜孙中山、朗诵孙中山遗嘱、默哀等,都要务必执行。

如果沈仲九担任校长,他只能从中择一:(一)冒充国民党党员,按照国民政府的政令如实执行所有礼仪;(二)完全不考虑那些礼仪,而采用安那其式的新教育方式;(三)由别人代理执行那些礼仪。

其中(一)与(二),不是仲九氏的真纯之心所能允许的,也不是沈氏所能忍受的,(三)不仅危及学校的存亡,同时将关系到仲九氏的生命问题。……^①

不久,沈仲九辞去国立劳动大学的职位,前往欧洲。

沈仲九不甘心按照国民政府的政令如实执行那些礼仪。

笔者并不是要把沈仲九的形象与巴金的形象重叠在一起,只是想通过巴金对于上述小说《灭亡》中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人物表示拒绝的态度,以及具体体现了这一点的人物沈仲九,为巴金的立场提供一个或许与此相似的形象而已。

巴金在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译毕(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后不久,起身赴法。

注解

〔注 1〕

谌小岑(1896—?)。(生卒年为:1897—1992。——译注)

1. 字晓岑。湖北安化人。国立北洋大学毕业后,加入觉悟社(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的组织,与下面“2”的《觉悟》不同)。历任汉口扬子机器厂化学技师、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指导主任、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铁道部劳工科科长、浙赣铁路理事会秘书等。《劳动季报》编辑。译作有《马克思之真谛》《将来的妇

^① 《劳动大学的事情》(劳动大学的话)。《平民新闻》第42号,1947年9月19日。

女》等(见桥川时雄编纂《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10月25日，第745页“谌小岑”)。

2. 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674页《〈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分类目录》介绍，谌小岑为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创刊，1932年停刊)副刊《觉悟》所收《黄庞周年纪念号》(1923年1月17日)写了《发刊词》。《觉悟》另载有谌小岑《追悼会怎么才不白开?》(1922年4月2日)、《“一个紧急提议”的申论》(1922年4月7日)、《1923年底中国劳动运动》(1923年2月19日)等。至于《劳动季报》，详情不明。

3. 《劳工周刊》第14期《黄爱庞人铨被害纪念特刊号》(1922年1月17日)载有谌小岑的两篇杂感：《黄庞的牺牲给我们的教训》《无产阶级应该永远记得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669页《劳工周刊》目录)。

4. 《黄庞流血周年纪念特刊(长沙)》(1923年1月17日)的《论文》栏转载了上述“2”的《觉悟》所收《黄庞周年纪念号》的《发刊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673页《黄庞流血周年纪念特刊(长沙)》目录)。(转载《发刊词》的刊物为《黄庞周年纪念册》，并非《黄庞流血周年纪念特刊(长沙)》。见同书同页。——译注)

〔注2〕

毛一波(生卒年不详)。(生卒年为：1901—1996。——译注)

详情不明，但可以举出以下三种资料：

1. 据近藤宪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一无政府主义者の回想)(平凡社，1965年6月30日，第276页)介绍，1927年，中国安那其主义者沈仲九(见〔注3〕及关于国立劳动大学的〔注4〕)在前往欧洲的途中，顺路来到了日本，“与留日中的卫安仁、张易(张景之弟)、毛一波、索非等人，还有小池英三和我，大家

一同畅谈”。

2. 山鹿泰治在《平民新闻》第54号(1947年12月26日)所载《台湾的同志们》(台湾の同志たち)(5)中写道:

……曾在东京参加我们的运动的民锋剧团创立者张维贤以及台中的一波等人
都去了大陆,与中国同志密切合作取得成果,所以希望他们不久能够回到台湾奋
斗。……

文中“一波”估计是指毛一波。由于安那其主义者不注重出身,很多人都不报姓氏。刘师复组织的“心社”(1912年)有“十二戒律”,其中也有这一条。

3. 杂志《民钟》第1卷第16期(1926年12月15日)载有一波《土地与人口——批评马尔沙士的人口学说》;同刊第2卷第1期(1927年1月25日)载有一波《阶级斗争与阶级独裁》。

〔注3〕

沈仲九(生卒年不详)。(生卒年为:1887—1968。——译注)

1. 据《易培基与故宫盗宝案》(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3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1月15日,第220页)介绍,沈仲九原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任教,但详情不明。

2. 以下所列资料均选录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882—888页所载《教育潮》目录。《教育潮》,发行时间为1919年4月至1921年1月(月刊,或双月刊),浙江省教育会编,是教育方面的专门杂志。由此可知,沈仲九曾经从事教育工作。

仲九《德莫克拉西的教育》。《教育潮》第1卷第1期,1919年4月。

仲九《怎么样对付新旧思想?》。《教育潮》第1卷第1期,1919年4月。

仲九《告浙江省议会议员》。《教育潮》第1卷第1期,1919年4月。

仲九《做教师应该怎样?》。《教育潮》第1卷第3期,1919年8月。

仲九《青年的自觉》。《教育潮》第1卷第3期,1919年8月。

仲九《注音字母与改造》。《教育潮》第1卷第4期,1919年9月。

仲九《随感录》。《教育潮》第1卷第4期,1919年9月。

仲九《我的人生观》。《教育潮》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

仲九《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授的意见》。《教育潮》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

馥泉、潜进、仲九《随感录(1—9)》。《教育潮》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

〔注4〕

国立劳动大学从创办到解散的经过如下(见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1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年5月一版):

1927年

4月18日 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期,第117页,《日志》。)

4月27日 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李煜瀛、汪兆铭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公报》第3号,第10页,《命令》。)

5月2日 江湾上海大学被封,学生一律离校。(《教育杂志》第19卷第6期,第5页,《教息》。)

5月9日 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上海江湾之模范、游民两工厂,改设国立劳动大学,并派定蔡元培、李煜瀛、张人杰、褚民谊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委员会后于5月13日成立。(《劳大概况》,第2页,《本校二周年经过述略》。)

5月28日 国立劳动大学筹备委员会与工厂改组委员会开联席会议,议决定本年9月劳工学院开学,十八年春农农学院开学,两院每月经费各一万元,随后于6月聘沈仲九为劳工学院院长。(《劳大概况》,第2页,《述略》。)

8月14日 国立劳动大学劳工学院开始招本科生、中等科生各一百名,师范班训练班各一百名。(《劳大概况》,第2页,《大事记》。)

8月20日 国立劳动大学筹备委员会开五次会议,通过劳动大学条例、劳农学院组织大纲及劳工劳农两院各项预算。(《劳大概况》,第2页,《述略》。)

9月4日 国立劳动大学筹备委员会开六次会议,推定易培基为劳动大学校长。(《劳大概况》,第2页,《述略》。)

10月15日 国立劳动大学劳农学院开始招生。(《劳大概况》,第3页,《大事记》。)

1928年

6月13日 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四次会议,派易培基前往北京接收故宫博物院。(《中央周报》第3期,第13页。)

1929年

4月 中央前通过国立劳动大学新预算自本月起每月增至五万元。(《劳大概况》,第8页,《述略》。)

6月24日 教育部令国立劳动大学改劳工学院为工学院,劳农学院为农学院,并准增设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公报》第1卷第7期,第55页,《工牍》。)

1930年

4月26日 教育部咨财政部为中央大学北平各校劳动大学十八年度经费预算,请转咨财政委员会复核准各照现支额数(中大月十六万元,北平月三十五万元,劳大月六万四千余元)继续支給。(《教育部公报》第2卷第17期,第7页,《工牍》。)

6月6日 教育部奉令停止劳动大学招生。(《教育杂志》。)

9月24日 国立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免职。(《教育部公报》第2卷第39期,第4页,《府令》。)

12月9日 任命王景岐为国立劳动大学校长。(《教育部公报》第2卷第50期,第3页,《府令》。)

1931年

4月13日 国立劳动大学学生因校长王景岐提议征收膳费,大学部修业改为五年等案,殴辱校长围守终日。(《教育杂志》第23卷第5期,第126页,《教

息》。)

7月11日 教育部电令国立劳动大学及附属中学暂行解散,学生即日离校,定期举行登记。(《教育杂志》第23卷第8期,第256页,《教息》。)

7月 教育部派秘书周淦会同国立劳动大学校长王景岐办理劳动大学学生登记事宜。(《教育部公报》第3卷第29期,第41页,《报告》。)

1932年

1月28日 日军进犯我上海闸北各地。(《新亚》第4卷第1期,第153页,《陈迹》。)

6月9日 教育部向行政院提请国立劳动大学于本学期终了时,办理结束,原有学生转入其他国立各校,以竟学业。(《档案[各机关存备的文件]》。)

7月19日 教育部派员接收国立劳动大学。(《档案》。)

国立劳动大学的教师:

笔者根据桥川时雄编纂《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10月25日)、《平民新闻》(1947年4月2日、5月21日、6月11日、8月13日、8月22日、9月19日)、石川三四郎《自叙传·一自由人之旅》(自叙传·一自由人の旅)(理论社,1956年9月,第126、127页),以及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3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1月15日)等资料掌握的国立劳动大学的教师如下(专任讲师、外聘讲师,或仅讲过一次课的讲师等区别,尚不清楚):

易培基(校长)、王景岐(校长)、沈仲九、毕修勺、扎克·邵可倡、匡互生、黄凌霜、张景、祝振纲、陈声树、陶希圣、陈望道、黄敬思、冯达夫、熊子容、熊梦飞、翟俊千、郑若谷、黎国昌、钱亦石、魏岩寿、于藻、朱通九、吴树阁、李石岑、李权时、武培干、邵爽秋、徐仲年、徐金淙、夏康农、张农、陈光熙、章渊若、梁就明。

此外,日本教师有岩佐作太郎、山鹿泰治、石川三四郎。

鲁迅也在这所大学做过演讲。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拾遗》(1927年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451—458页。

该书第 822 页注解中写有：“本篇是 1927 年 10 月 25 日在上海劳动大学的演讲词，由黄河清记录，最初发表于《劳大论丛》（二周年纪念刊物之二），1929 年 9 月劳动大学编辑馆编辑出版。”黄河清是以《译文》杂志编辑闻名的黄源。

劳动大学的创办意图：

其时[1927 年 5 月]，国民革命军已克复上海，吴忠信任警察厅厅长，以所辖江湾之模范工厂及游民工厂形同倒闭，吴感于教育与革命关系之密切，乃与张人杰、李煜瀛等呈请中央，就厂设一大学取半工半读方式，以挽救传统上劳心劳力分立之弊，且为国民党培植工人运动人才。……（《易培基与故宫盗宝案》。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 3 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年 1 月 15 日，第 220 页。）

〔注 5〕

岩佐作太郎。（生卒年为：1879—1967。——译注）

1879 年，生于现千叶县长生郡长南町棚毛的有钱有势的富农家庭。1898 年，毕业于东京法学院（现中央大学的前身）。1901 年，赴美，成为安那其主义者。与美国安那其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爱玛·高德曼相识。在三藩市经营印刷公司，出版安那其主义的宣传杂志。在美国期间，结交了幸德秋水，1906 年，与仓持善三郎等人成立社会革命党。1914 年，归国，1919 年，参加大杉荣等人组织的劳动运动。立足于克鲁泡特金主义，在大杉荣等人的圈外另发行《小作人》。1920 年，成为组建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中心人物，担任机关报《社会主义》的名义发行人。1927 年 5 月前后，离开日本前往中国，在创办于上海近郊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担任讲师。1928 年秋天，到泉州民团训练所，住到 1930 年冬天前后，这已得到确认。归国后，成为“黑色青年同盟”“全国劳动组合自由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战后，担任日本安那其主义者联盟全国委员会委员长。

著作有：《无政府主义者如是回答》（无政府主义者は斯く答ふ）（地底社，1930 年）、《革命断想》（私人出版，1931 年）等；译作有：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

史》(フランス大革命史)(春阳堂,1929年)、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パンの获得)(安那其主义者俱乐部〔アナキスト・クラブ〕,1960年)等。

参考:岩佐作太郎《我的回忆——安那其主义者的生涯》(私の思い出——アナキストの生涯),塔那托斯社(タナトス社),1970年4月30日。

〔注6〕

石川三四郎(1876—1956)。

1876年(明治9年),生于埼玉县。1891年,在佐藤虎次郎、粕屋义三——均为与板垣门人复刊《自由新闻》的初归国者——等人的共宿之处做门丁。通过佐藤,初次接触社会主义与芝加哥工人罢工。1893年,进入东洋大学的前身哲学馆,翌年退学。1898年,进入中央大学的前身东京法学院,1901年(明治34年)毕业。1902年,担任《万朝报》记者,翌年辞职。随即加入堺枯川、幸德秋水等人成立的平民社(发行周刊《平民新闻》),参加社会主义、非战论的宣传活动。平民社解散后,与木下尚江等人创办《新纪元》。1907年,参与创办日刊《平民新闻》,后因遭遇该刊笔祸入狱。1909年,因遭遇《世界妇人》笔祸,再次入狱。在此前后,成为安那其主义者。大逆事件发生时(1910年),身在狱中,幸免于难。1913年(大正2年),脱逃日本,在欧洲各国流浪。1920年年底,归国。提倡农民自治与工团主义,援助农民自治会。1921年,再次赴欧,1922年,归国。1927年(昭和2年),前往中国,在上海近郊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担任讲师,以“欧洲社会运动史”为题授课有一个多月,后归国。同年11月,在东京郊外千岁村船桥开始了半农生活。1929年,成立共学社,创办《力学》(ディナミック *La Dynamique*)(因遭当局压迫,于1934年停刊)。1933年到中国旅行,后另从事东洋文化研究(1933年12月4日,在北平与巴金相见;1935年暮春,巴金到千岁村探访他)。战后,任日本安那其主义者联盟顾问。1956年,去世。

著作有:《圣人卡彭特》(哲人カアペンター)(东云堂书店,1912年)、《西洋社会运动史》(大鐙阁,1922年)、《日本社会主义史》(石川旭山编、幸德秋水补,收于《明治文化全集》第6卷“社会篇”,日本评论社,1929年2月)、《作为社会美

学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美学としての无政府主义)(共学社,1932年)、《东洋文化史百讲》(育生社弘道阁,1939—1944年)、《爱利赛·邵可侣——思想与生涯》(エリゼ・ルクリュ——思想と生涯)(国民科学社,1948年9月25日)、《自叙传·青春的遍历》(自叙传·青春の遍历)(理论社,1956年7月)、《自叙传·一自由人之旅》(自叙传·一自由人の旅)(理论社,1956年9月)。另有著作、译作多部。

简历部分主要参考:唐泽隆三编《石川三四郎书简集》(灵魂社〔ソオル社〕,1957年12月)第131页,石川三四郎本人于1950年写下的生平事迹。

〔注7〕

山鹿泰治(1892—1970)。

1892年(明治25年),生于京都三条乌丸的印刷商家庭。1905年,进入京都府立第一中学,后辍学。1907年,进京,在有乐社住宿,帮助处理杂务。有乐社内设有日本世界语协会事务所。他在这里学习了世界语,同时帮助协会事务所办理业务。1910年,与大杉荣、石川三四郎、渡边政太郎等人相识。1913年,前往大连,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发电所工作。1914年春天,接到大杉荣的通知,为协助刘师复发行的世界语、汉语双语的安那其主义运动杂志周刊《民声》而赴上海。与师复及师复之妹无为、郑佩刚相识。同年8月,为协助创办月刊《平民新闻》,归国。1922年,为了去俄国,前往上海,结果计划失败。由于黄凌霜赴美途中将路过日本,于是随黄回到日本。归国后不久,为了在中国给大杉荣办理护照,以便他出席国际无政府党大会,前往北京。与爱罗先珂、周作人、陈昆山、王鲁彦、景梅九、范一洗等人相见。因在北京未能达到目的,赴上海。承蒙华光医院院长邓梦仙的关照取得护照,归国。1927年8月下旬,前往中国,在上海近郊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担任世界语讲师。与致力于创办该校的沈仲九相识。1928年1月,归国。1939年,逃亡国外,移居台湾高雄。1941年至1944年,被当地征用,作为陆军军属前往菲律宾。1946年,返回日本,担任日本安那其主义者联盟国际部负责人。1953年至1960年,负责发行日本安那其主

义者联盟机关报世界语版月刊《平民新闻》(4页)。1960年,出席于印度马德拉斯州(现泰米尔纳德邦。——译注)甘迪格拉姆(Gandhigram)召开的“反战者国际”(War Resisters' International)第十次大会。1970年,去世。

参考:逸见吉三《山鹿泰治・其人与其生涯——世界语与安那其主义的活动家》(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エスペラントとアナキズムの生活者),《现代之眼》(现代の眼)1972年2月号、3月号、4月号,现代评论社;《平民新闻》(1947年5月7日、5月21日、5月28日、6月11日、12月26日,1948年1月2日、1月16日、2月13日、3月12日、3月19日);等等。

第四章 泉州民团训练所

徐懋庸^①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寄给鲁迅的书信(附于鲁迅^[注1]《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②的开头部分)中谈到巴金: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

① 文艺评论家，浙江上虞人。从1936年初开始，“国防文学论争”全面展开。同年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同月15日，鲁迅、巴金、黄源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徐懋庸为中国文艺家协会成员。他在寄给鲁迅的书信中讨论了中国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在复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予以反驳，而使他闻名于世。评论集有：《街头文谈》（光明书局，1936年5月）；文学理论著作有：《怎样从事文艺修养》（三江书店，1936年12月）；译作有：山川均《社会主义讲话》（生活书店，1933年）。

② 8月3—6日。《作家》第1卷第5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8月15日。

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①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从文章前后关系判断，该是“安那其主义者”之意]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②

在巴金看来，徐懋庸所说的“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却与事实相反，于是撰文《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③予以反驳。

首先，巴金针对“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予以反驳：

……其实徐懋庸是不会看见什么“中国安那其的卑劣行为”的，因为那种人从来不在文坛里混过，他们只在一些荒僻的地方沉默地埋头工作。……他们的势力固然不大，但他们能够怀着热烈的希望，坚强的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而徐懋庸却说他们卑劣，这“卑劣”两字出于徐懋庸之口大概不是“信口胡说，含血喷人”吧。……^④

引文中笔者较感兴趣的是巴金谈到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部分：“他们的势力固然不大”但“在一些荒僻的地方”怀着“希望”、“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着。巴金的表述之所以如此肯定，当然有某些事实根据。而对这些事实的了解，又是当我们去理解这一时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至中期）的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关系时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么，中国安那其主义者到底在哪里展开了哪些活动？

① 浙江人。作家，翻译家。留日学生。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译文》杂志编辑，尤其致力于介绍苏联文学。195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在上海展开文学活动，担任《文艺月报》（后改名为《上海文学》）编辑。

② 《作家》第1卷第5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8月15日，第1139页。——译注

③ 《作家》第1卷第6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15日，第1362—1368页。

④ 同上书，第1364页。

关于这一点,巴金本人并没有在某篇文章中明确交代过他们在何时、何地、以多大规模具体展开哪些运动,以及给社会带来哪些影响。但以下几种资料可供我们推测这一问题。

下面依据巴金关于这些方面的几篇文章,以及参考其他人所写的文章,来探索巴金笔下的当时中国安那其主义者之形象(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1. 巴金《忆范兄》,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夜重庆沙坪坝。《怀念》,开明书店,一九四七年八月,第九、十三页。

……你的和蔼的清瘦的面颊,通过了十二年的长岁月,在这雨夜闪亮了。在闽南一个古城的武庙中,我们第一次握手,这是我最初从你的亲切的话语里,得到温暖和鼓舞。没有经过第三个人的介绍,我们竟然深切地彼此了解了。是那个伟大的理想把我们拉拢的。为着我们的理想你劳苦了二十年,你把你的心血,精力,肌肉,都献了给它……

……

诚然十二年前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肺病患者,而且我们也想得到有一天你终会死在这个不治之症上。……

2. 巴金《纪念憾庐先生^①》,一九四三年三月桂林。《怀念》,开明书店,一九四七年八月,第三十一、三十四页。

我敬爱的亡友,十三年以前我们在泉州的武庙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只默默地注视你那温和的微笑。这微笑经历了长久的艰苦的岁月都没

① 1. 《中国文学月报》(以竹内好为中心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所发行的刊物)第50号(1939年5月1日)《文化消息》栏中的《作家群的工作》(作家群的工作)开头写有:“《满蒙》4月号刊载了朱雯《流浪的中国作家群》(流浪する中国作家群),是一位作家的经验谈,略述了战争爆发后作家们的消息,在这种意义上该篇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文中写有:“汉口、广东陷落后,桂林的形势也紧迫起来,文化工作者们也纷纷来到这里避难。……接着,巴金和林憾庐也来了。”

2. 林憾庐,基督教徒,据说是巴金长篇小说《火》第三部中的宗教家“田惠世”的原型。

有消去。……

……

……你是一个理想家，但你又是实际的人，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你又和非宗教者做了好友。……

把“1”与“2”中标有着重点的文字综合起来便会得知，巴金大概于一九二九年或一九三〇年前后，在福建南部古城（泉州）的关帝庙与他们相见。确切地讲，《幸福的船》的《序》^①的落款日期是“一九三〇年九月在泉州”^②，故大致不会有错。

如果从《忆范兄》《纪念憾庐先生》来掌握巴金的友人即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活动，那么浮现在我们眼前的画面便是：他们建立了自治组织，以匡正社会为目标献身工作。然而，如果从整个中国的视野来讲，他们的运动有多大规模，其运动具有哪些可以呼吁当时社会的因素，这方面的轮廓未必清楚。

笔者手边另有一份资料，是岩佐作太郎在上述《平民新闻》上发表的回忆录，文章记述了中国安那其主义者在泉州建立某组织展开运动的情形。这是：《平民新闻》第四十四号（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所载《民团训练所》；《平民新闻》第四十五号（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所载《准备革命》（革命への准备）；《平民新闻》第四十六号（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所载《撤离泉州》（泉州より退避）；《平民新闻》第四十八号（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所载《从中国归来》（中国より归る）。根据这四篇文章的介绍，其情形大致如下。

岩佐作太郎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前后前往中国，在创办于上海近郊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担任讲师。后于一九二八年晚秋，在梁龙光——在泉州经营商行兴隆号的梁氏家族的长子——的陪同下，从厦门到达泉州。他的目的地民团

① 巴金为爱罗先珂《幸福的船》（鲁迅等译、巴金编，开明书店，1931年3月）作《序》，落款日期为“1930年9月在泉州”。

② 落款日期出处为《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67页。《幸福的船》（开明书店，1931年3月）第7页《序》落款原为“1930年，9月，巴金”。——译注

训练所位于距离市区两公里的郊外。

民团训练所是培养一批能够建立自治组织——安那其主义者的活动地点——的成员之地。

关于民团训练所的机构、民团的活动范围、住民的评价以及周围的政治形势，他写道：

当时在福建省，李深济(?)[李济琛]的海军与国民政府十一路军于同一时期、在同一地点相互争夺势力。被夹在中间的民团训练所开创事业，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已将其势力以泉州区为中心伸展到其他五个县，甚至还将扩展。民团训练所顾名思义即培养建立民团、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人民的事情人民解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所需要的斗士的训练所。假如拿军队打比方，可以说是军官学校。在生活，训练所不足一百人，军队也不超过三百人。据说步枪数量却不能满足所有军官使用。学生们远征四方，宣传建立民团的必要性，已取得了卓越成果。泉州知县与法官遇到难题也不会求助于十一路军或海军来解决，而把它交给民团训练所。……

民团训练所的中心人物是泰望山氏，但遗憾的是我不了解泰氏的为人。我只知道他年龄不过四十，是个壮年的安那其主义者，与国民政府方面关系很好。

他十分繁忙，很少在训练所。参谋是我在上海时临时受访的李有观氏，兄海观氏也是有势力的合作者。[岩佐作太郎在《平民新闻》第三十八号(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所载《受邀至中国》(中国に招かれて)(二)中谈到了他们兄弟，说：他们是安那其主义者，“是活跃于南朝鲜的李乳乙奎兄弟^[註2]。海观君曾带上王子脱逃朝鲜，在国外策划朝鲜独立，王子被捕，他则死里逃生；弟有观君于我母校庆应毕业后赴上海，参加了兄海观所展开的运动”。文中“临时受访”的意思是说，兄弟二人突然来到他在上海的住处探访他。]军务由二十二岁的青年少将李君担任。李君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不愧是年纪轻轻就被擢升为少将的男子，总觉得他很出色。不惜寸阴读书求学，温厚诚实，都是别人所无法模仿的。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愿意做军人，想做科学研究。后来，他进了劳动大学。上海事变爆发之际，据说他作为劳动大学总司令与日军作战，至于后来的消息我就不清楚了。他在阴暗的

电灯下专心学习的样子，真是让我难以忘怀。^①

岩佐作太郎又说：“我的支那同胞选择了泉州，视为安那其主义者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之根据地，可是那里究竟是什么地方？”^②为此，他讲述了古城泉州的历史与风尚习俗，后又谈到了当地居民对于政治具备一种传统的自卫、自治意识，认为民团是得天时、占地利的组织。

居民们毕竟遭遇了革命动乱的殃祸与巨大冲击，他们必然会感到训练所青年们的呼声——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依靠政府则断无可救；必须建立民团，以民团的力量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即是空谷足音、暗夜灯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想法至今依旧根植于人心深处。为了维持自身的治安，各个部落入口都建有一座岗哨、防守兼用的坚固高塔，因此，在这里呼吁建立民团、以民团的力量行事，则恰恰符合他们的习俗。不得不说，民团训练所的运动的确是得天时、占地利的。

到达当地后，马上有总商行邀我做演讲，美国人创办的学校请我做报告，可以说，这是训练所享有声望的佐证。^③

然而，训练所愈享声望、民团愈加发展，驻扎在邻近地区的海军、十一路军则愈不顺心。但他们却没有马上进行镇压，这不仅因为民团毫无形成强大组织的征兆，同时也因为对于势均力敌的海军与十一路军来说，民团不过是被夹在双方空隙间的、实际上还是一个物理条件弱小的组织。关于这一点，岩佐作太郎这样解释：

民团训练所的这些运动当然不会为贪图名利、权势、爵位、俸禄的官方人士所

① 见《民团训练所》。《平民新闻》第44号，1947年10月10日。——译注

② 见《准备革命》（《革命への准备》）。《平民新闻》第45号，1947年10月17日。——译注

③ 同上。——译注

欢迎。无论对于海军还是对于十一路军,它必定是不共戴天的组织。训练所的运动的发展,的确将毁灭他们的生存依据。因此,他们总是锋芒毕露,一旦抓住机会便会镇压训练所的运动。他们不采取极端手段,不过是因为海军与十一路军都会趁对方不备之机相互攻击,在这种关系下,双方都不好对训练所下手而已。

如果愚钝得连这种形势都看不出来,哪里还称得上民团、训练所呀。民团与民团训练所都深刻感受到:为了对抗政府人士,要做好充分准备。

备步枪! 备步枪、机关枪! 有了四五支机关枪、两三千支步枪,两三万人的军队,不,十万军马也可以即刻组成。民团与民团训练所也暗地里想过,这决不是幻想。^①

然而,随着周围形势的变化,民团的这种期待也随即消失了。维持民团本身变得困难起来,于是决定暂时撤离泉州。关于这段时间的经过,岩佐作太郎说:在一九二九年暮春或初夏,共军打到福建边界,因势力勇猛,政府军连战连败,一直向后撤退;在这形势下,民团也无法维持下去了,于是撤退到厦门,但被拒绝入境,只好守在山岳地带,等候再起的时机^②。

一两个月后,他们再次回到泉州,重新展开活动,其势力已经超过撤离之前。但这对十一路军来说却是不容乐观的现象,不久便明令民团中心组织的民团训练所解散该组织。岩佐作太郎这样描述在此前后的情况:

……训练所回到泉州时,据说老巢已遭到全面的破坏与掠夺。由于总商会(具体名称我已记不清了)马上空出了他们的根据地,所以当我回去的时候那已经是个新地方了。当然,十一路军已经撤退了,海军好像也撤走了。

^① 见《准备革命》(革命への准备)。《平民新闻》第45号,1947年10月17日。——译注

^② 关于这一形势的演变以及共军向福建进军的情况,吴民、萧枫合编《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年表)》(新潮书店,1951年)第93页关于4月×日的记述中写有:“红四军入赣与红五军会合,再度入闽[福建],击溃国民党军三十团,克龙岩、永定。敌再来袭,我分军为二,一由朱德率领深入敌后,活动于闽中一带;一由林彪率领游击于龙岩、永定、上杭等地,将闽西之地方武装组织为红四军之第四纵队,开展闽西苏区。”情形大致符合岩佐作太郎的记述。(关于岩佐作太郎的记述,见《撤离泉州》[泉州より退避]。《平民新闻》第48号,1947年11月14日。——译注)

而且,与之前相比,训练所增强了势力。……可是,训练所势力增强对十一路军来说则是不利现象,是个障碍物。……

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民团训练所解散该组织,说是政令不宜出自二途。十一路军与民团训练所不能于同一时期、在同一地点驻扎在福建。……福建当然由国民政府军十一路军来统治。

也就是说,这是一道决不允许国家内部存在国家——民团训练所——的、西方式的集权命令。……

当然,力量薄弱的民团训练所也发动了反抗,但毕竟不足以敌过势力强大的十一路军。^①

就这样,民团训练所被迫解散,岩佐作太郎离开泉州,返回日本。岩佐作太郎何时离开泉州尚不清楚,但在他的记述中最晚的日期是“一九三〇年冬天”^②,可以说,直到此时他一直都在泉州。假如是这样,那么巴金《幸福的船》的《序》的落款日期“一九三〇年九月在泉州”则可以说明岩佐作太郎在泉州时巴金也在那里,二人或许还见过面,只是,双方都没有留下能够确认这方面的资料。

以上,笔者围绕岩佐作太郎所写的文章,概观了从一九二八年中期至一九三〇年冬天,中国安那其主义者在泉州附近的活动情况,这当然与巴金《忆范兄》《纪念憾庐先生》的内容有相互重叠之处。尤其是在《纪念憾庐先生》中巴金明确提到了泉州,时期也大致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另加《幸福的船》的《序》的落款日期为一九三〇年九月“在泉州”,经综合判断,这段事实大致不会有错。

由此,我们看到了巴金反驳徐懋庸时所强调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在一些荒僻的地方”怀着“希望”、“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着的一个例子。

巴金描述这一方面的文章如有以下几篇:一九三三年五月下旬至七月巴金旅居广州期间探访一位住在新宁铁路(从新会至斗山的铁路)沿线城镇的朋友

① 见《从中国归来》(中国より归来)。《平民新闻》第48号,1947年11月14日。——译注

② 见《非同胞》(同胞非なり)。《平民新闻》第47号,1947年11月7日。——译注

时所写的旅行记——《庶务室的生活》(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广州)、《农民的集会》(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广州)、《鸟的天堂》(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广州)、《谈心会》(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广州)、《别》(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广州)、《朋友》(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广州)等^①。文中的朋友们也成立了自治组织,为改善地区居民的生活默默地工作着。尤其是《农民的集会》,篇幅虽短,但以报告文学的手法,生动地描写了应该怎样处理土豪劣绅在本区县参议员选举中购买选票的现象,以及怎样组织“农会”等问题。

此外,巴金在旅行记《南国的梦》(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描写了在极其贫困的环境中经营两三所学校,并为了向贫家孩子伸出温暖的手,以满腔热情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朋友匡互生^②。

另外,还有巴金的几部小说:《雷》^③、《电》^④、《星》^⑤。巴金在《爱情的三部曲》的《新版题记》^⑥中对这三部小说的题材做过说明,如下(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① 以上几篇均为《旅途随笔》(生活书店,1934年8月)所收,落款日期出处均为《巴金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译注

② 该篇落款日期出处不明。《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359页)为“1939年春在上海”。此外,谈到匡互生的文章并非该篇,而是《旅途随笔》所收,写于1933年5月的《南国的梦》。——译注

③ 《雷》(《文学》第1卷第5号,生活书店,1933年11月1日)是短篇小说,原与《爱情的三部曲》无关,后被放在《电》的前面。1938年开明书店出版时,已收入《电》中。

故事结构主要由和睦地从事革命事业的两位青年敏、德以及两位女子慧、影构成。慧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对性的问题很开放。一开始,她与敏确立了恋爱关系,并约定了未来,但后来她又爱上了德。胸怀坦荡的德不接受她的爱,但慧却固执地追求他。而敏又误会了德,于是在敏与德之间蕴着一种尴尬的感情。

有一天晚上,敏与德在开完革命工作会议回家的路上,碰到军队警戒线,险些遭到搜身。德知道敏衣服下面藏有重要文件,于是挺身庇护敏,使他逃走,而德却被士兵击毙。影则暗恋着德。

④ 短篇小说《星》(1936年于上海。《巴金短篇小说集》第3集,开明书店,1942年6月)。

出场人物有家桢、志良和名叫秋星的女子。故事描写了青年们成立“民团”、在劳动运动及妇女运动中活跃的情形。

⑤ 1943年10月。开明书店,1949年3月七版。

1.

《雷》同《电》里面写的是在陈国辉统治^①下的一个闽南古城的生活。我到那地方去时,正是这个由土匪改编的旅长作威作福的时期,那里确实发生过行刺陈国辉的事,自然没有成功。但一两年后这个旅长就因了人民的告发,被正规军捕获正法了。……

2.

我另一本小说《星》里面曾写过土匪汪国刚,那是高为国,他曾占过那个古城,后来被民团赶了出去……

笔者曾想,“1”中的“闽南古城”和“2”中的“那个古城”也许与《忆范兄》《纪念憾庐先生》中的地点同样都是泉州,但巴金本人没有明确指出地名,故不好判断。

《纪念憾庐先生》中的林憾庐本人曾写过一篇回想录^②,估计该篇与《新版题记》中的地点有关,引如下,供作参考。

作者在该篇“引言”中说:一九三三年四月时,红军攻占漳州,他偶然回到漳州时经历了此事。在关于红军进攻漳州之前的记述中有这样一段: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的晚上,红军攻占龙岩。

龙岩距漳州二百四十里[漳州西北方,直线距离不到八十公里],以前曾给红军占过三回,……龙岩是个军事必争之地,关系很重要,虽然地方不大。第一回红军来攻,是陈国辉——省防军,由土匪收编的——在龙岩横征暴敛,而引起人民的痛恨……^③

① 福建南安县人,现住福州。经历:自任护法靖国军营长起,历任福建自治军泉州卫戍司令部第一统领、讨贼第五独立旅旅长、福建建国军第二师师长、福建陆军第八旅旅长等,现任革命军新编第一军独立第二团团团长。党派:国民党。外务省情报部编纂《改订 现代支那人名鉴》,1928年9月30日,第214页。

② 《逸经》第2期,人间书屋,1936年3月20日,第35—37页。《逸经》第4期[人间书屋,1936年4月20日,第26—29页]载有同一篇回想录的续篇。——译注

③ 同上书,第35页。——译注

憾庐的记述与《新版题记》引文“1”的部分内容相互符合,这说明林憾庐离开泉州民团训练所后,至少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呆在龙岩、漳州一带。《新版题记》引文“2”中有“民团”一词,估计中国安那其主义者曾在这一带展开过活动。

以上,笔者以巴金所写的与朋友相关的文章为线索,概括了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活动。

至少巴金考虑到了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处境,于是才断定徐懋庸的说法是诬蔑。

巴金继续对徐懋庸说:

……我想他们自己将来会用事实来答复徐懋庸的“诬枉”的,用不着我来代他们辩解,我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我的言行也和他们没有关系。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我到现在还相信着那主义,而且我对前面提过的那般人也很敬仰,但其实我已经失掉了这个资格,我这几年来离开了实际运动的阵营,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稿纸和书本上消磨生命。……^①

巴金喜欢被人称为安那其主义者,即使在一九三六年时,他还依旧信奉安那其主义。

尽管从事的工作不同,但他还是表明了以中国安那其主义者自居的意识。

注解

〔注1〕

以下列举的鲁迅与巴金的相关资料,并不是关于鲁迅对巴金的影响方面的材料,主要是关于出版与书信等业务方面的材料。“一、鲁迅方面”之“3”是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引如下,供作参考。

① 《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作家》第1卷第6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15日,第1364页。

一、鲁迅方面

1. 《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8月（仅列出与巴金相关的内容）。

1933年5月5日晴。……往良友公司买……《雨》……（注a）

1934年10月6日晴。……夜公钱巴金于南京路饭店……（注b）

1935年9月25日晴。……河清来，并交《狱中记》及《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话》

(1)各一本，巴金所赠。……（注c）

1936年2月4日云。……午后得巴金信……

1936年2月8日云。……得巴金信并校稿。……

1936年4月26日 星期。晴。风。……巴金赠《短篇小说集》二本。

（注a）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之二——雨》，1932年11月写毕，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原载《文艺月刊》第3卷第1期至第5、6期合刊）。

（注b）巴金侨居日本期间为1934年11月至1935年7月。（归国时间有误。见本书第3章第1节第49页注⑤。——译注）

（注c）河清为黄河清，黄源。《狱中记》《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话》均为巴金的译作。《狱中记》，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 1870—1936）著，文化生活出版社刊“文化生活丛刊”之一，1935年出版。《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话》，司特普尼亚克（本名：Sergey Kravchinsky；笔名：Stepniak, 1851—1895）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出版。（该书为巴金著，标题应为《俄国社会运动史话》〔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9月〕。作者提到的司特普尼亚克的著作应为《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译注）

2. 《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

巴金先生：

校样已看讫，今寄上；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下略。

巴金寄给鲁迅校样后，鲁迅在信中吩咐巴金重新校正。校样不知是指鲁迅的哪部

作品。](该信写于1936年2月4日。文中“校样”指《死魂灵百图》的校样,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1页。——译注)

3.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8月3—6日。《作家》第1卷第5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8月15日)。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第1146页。)

……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第1147—1148页。)

二、巴金方面

1. 巴金《幸福的船》的《序》之“附记”,1931年3月在上海。《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67页。

巴金编《幸福的船》(开明书店,1931年3月)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共十六篇),其中从鲁迅翻译出版的集子选录四篇,其余为巴金、胡愈之等人的译作。

2. 巴金、章靳以、郑振铎主编《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第282—283页载有鲁迅(署名唐俟)的杂文《选本》。

3. 作为“文学丛刊”(巴金主编)第1集之2,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故事新编》(1935年11月)。

4. 作为“文学丛刊”(巴金主编)第4集之10,汇集出版了鲁迅写于1934年

至1936年之间的杂文。杂文集标题为《夜记》，出版日期为1937年4月。后来，《夜记》所收杂文分别被收入《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5. 巴金所写的关于鲁迅的文章。

巴金《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1936年10月22日。《中流》第1卷第5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11月5日，第291—292页（见《巴金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394—398页）。（该篇于《中流》发表时原题为《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译注）

巴金《悼鲁迅先生》，1936年10月在上海。《文季月刊》第1卷第6期，文季月刊社，1936年11月1日，卷头语（见《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331—333页）。

巴金《感激的泪》，1937年10月在上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10月（见《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334—335页）。（巴金只是在《感激的泪》中提起《鲁迅先生纪念集》，谈到鲁迅而已。《鲁迅先生纪念集》仅收巴金《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一篇，见该书第117—120页。——译注）

〔注2〕

据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三民书局，1976年3月）第241页“四、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及其主张”介绍：“旅沪之韩国无政府主义者，柳絮、韩一元、李已奎、李丁奎等曾于1927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在中国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另外还有柳基石、尹浩然、安恭根等组成了‘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组织，进行民族革命工作。”（作者随后注明参考资料：潘公昭《今日的韩国》，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47年1月。）

这份资料中的人名“李已奎”估计是岩佐作太郎提到的“李乳乙奎兄弟”的某一方，因为“李已奎”与“李乙奎”文字的确很相似。而且，“在中国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立，是在岩佐作太郎到达上海大概两个月之前的事情。因此，

他在上海时，兄弟二人探访他也不是为奇，即使他们在泉州民团训练所工作，也算是自然的。

只是，“李乳乙奎兄弟”是否可以理解为“李乳”与“李乙奎”，笔者依然存有疑点。岩佐作太郎在《平民新闻》第38号（1947年8月22日）所载《受邀至中国》（中国に招かれて）（2）中谈到真正尽力于国立劳动大学创办的人物沈仲九时，曾误写成“波冲九先生”，正因为如此，笔者才敢这样猜测。

〔注3〕

《电》，1933年12月写毕，开明书店，1938年11月。

据该书1943年六版所收《新版题记》介绍，在由土匪改编的旅长陈国辉统治下的福建南部的一座古城发生的事件使巴金受到启发，创作了这部小说。巴金到达这座古城时，正是陈国辉作威作福的时期，正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陈国辉遇到刺客行凶也是事实。后来，因人民告发，陈国辉被正规军捕获击毙。

曾在《雾》《雨》《雷》中从事革命事业的所有人物都出现在小说《电》中。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是《爱情的三部曲》的总结。主要出场人物有：李佩珠、高志元、方亚丹、敏、慧、明等人，他们致力于劳动运动，以工会、妇女协会为据点，热烈地展开工作。这时，《雨》的主人公吴仁民带着重要的消息来到此地。

正好在那一天，码头工人与军人之间发生了纠纷。不久军队出动，恰好在场的明也被拘留，遭到拷打。后来举行的群众集会也遭军队包围与驱散。

从拘留所释放出来后，明生了病，生命垂危。这时，明向吴仁民问道：“我问你在我们中间——爱——我说那恋爱——我们也可以恋爱——和别的人一样的吗？”“我们有没有这——权利？他们说恋爱会——妨碍工作——和革命——冲突。……我始终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许久我就想问你。”其实，明在暗恋着名叫德华的女子。吴仁民答道：“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和群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一个罪过。”

面对同志们的陆续牺牲，以敏为首，多数同志都想采取激进行动。吴仁民努力劝导他们说：“一刹那的痛快固然使你自己满足了，然而社会要继续存在下

去的。它需要着那些勇敢的人。”而在另一方，资本家与军队、警察同谋，出面镇压他们这些工会的主要成员。

首先，报馆被封，高志元与雄当场被捕。

敏企图刺杀旅长。方亚丹得知后，为了阻止敏的计划便来到他的住处，不料其住处已被士兵包围。方亚丹抗击，击毙了两个士兵，但他自己也牺牲了。

敏向死敌的旅长行刺，但旅长只受了轻伤，敏却被当场炸死。周围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对他们不利。吴仁民劝告他们避难。这时，他们收到一封电报，说李佩珠的父亲李剑虹失踪了。吴仁民为了替李佩珠寻找父亲，冲进了充满危险的城市。

尾 声

在搁笔之前，笔者想引用战后发行的《平民新闻》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介绍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在当时的消息（其中分别提到巴金）^①，以作尾声。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发行的《平民新闻》第二十二号刊载的文章题为《已与中国同志取得联系》（中国同志との联络成る），内容如下：

战争时期，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音信隔绝，同志武良二君归国后，带回了彼地的消息。现又收到曾赴法留学、后归上海于劳动大学任教的同志毕修勺先生寄来的书信。先生现居上海，在中国知名安那其主义者李石曾先生任社长的上海自由

^① 以下所引毕修勺、卢剑波所撰二文原均为中文，但由于原文下落不明，现依据日文译出。——译注

出版社担任编辑，来信曰：

来信收到，已告知各位朋友。在中国作战期间，我们没有一天不曾挂念日本同志的命运。两军交战，并非吾人所望。我们没有国境的概念，我们所反对的是军阀。既然军阀已被打倒，两国人民要携手向辉煌的自由前进。“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我们只有名不副实的和平，战争留下的灾祸，则重重压在我们头上。今后，我们应当共同携手打倒一切强权。如今，中国正苦于共产党的叛乱之中。民生凋敝，则比日本严重、凄惨。（吴）稚晖、（李）石曾、巴金诸氏皆向石川、岩佐等同志致候。

祝平安

毕修勺

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发行的《平民新闻》第一〇六号刊载了卢剑波《中国安那其主义者之现状》（中国アナキストの现状），文中提到巴金：

对政府党派心怀不满之者，或被秘密监视，或不知何时被逮捕、遭到杀害。这种情况之下，安那其主义者再起复兴并非易事。很多同志饥饿、疲劳、苦恼。印刷费用每月倍增，邮税昂贵，不易通信。但因李蒂甘君的努力，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正以坚实的步伐依次出版。……

本书为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年）度国内研究题目的成果。

交稿多次拖延，给工作人员带来极大不便，在此深表歉意。

附录一 关于巴金的出生 年月日、本名、笔名

巴金出生年月日中的月日部分暂且不谈，就出生年份而言，例如霞山会编《现代中国人名辞典 一九七八年版》^①中的记载是一九〇六年，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九三三年）^②中为一九〇五年，林曼叔、程海、海枫编著《中国当代作家小传》（一九七六年）^③中则是一九〇四年。

巴金的本名，是李芾甘，还是李尧棠？

笔名“巴金”，也常被人说成是从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各取一字组合而成，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巴金自己的说法却未必如此（除了笔名“巴金”之外，笔者

① 1978年3月31日，第491页。——译注

② 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第353页。——译注

③ 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6年5月，第46页。——译注

还想探讨其他的笔名)。

笔者留意以上几点撰写了本篇,供作参考。

一、出生年月日

巴金的出生年月日是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下是笔者如此下结论的根据。

首先要查清他的出生月日。正如以下所述,因为这是判断出生年份时的前提条件。

巴金在《家庭的环境》^①第七十六页中说: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在第七十七页中巴金继续说: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的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以上两段引文中的“十月十八日兵变”的经过大致如下。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保路运动”由此爆发。

^① 《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

四川总督赵尔丰拘禁了保路运动的领袖人物——保路同志会会长邓孝可、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十九人。为此，立宪派联络哥老会发动武装起义，并动员保路同志军，开始进攻成都。关于此后的变迁，周开庆编著《四川与辛亥革命》^①第五章《成都独立与全川统一》的记述为：九月十六日，免赵尔丰职；十月初七日，成都宣布独立；十月十八日，赵尔丰军队内部哗变；十一月初三日，成都军政府围攻赵尔丰的旧督署，擒获赵尔丰，枭首示众^②。由此可见，“十月十八日兵变”是指赵尔丰军队内部哗变。

巴金在《家庭的环境》中说：“第二天十九日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这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这事情。”^③也就是说，十月十八日兵变翌日的十月十九日，是他与母亲陈淑芬的生日。

其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八日兵变日期的“十月十八日”，是农历日期。在周开庆编著《四川与辛亥革命》第一章《绪言》中，“武昌起义”爆发日期为“八月十九日”^④，即可说明这一点。如果按公历推算，“武昌起义”当然是“十月十日”。一般来讲，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部分用农历记载，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部分用公历记载。

为了说明与巴金出生(年)月日相关的“十月十八日兵变”即是农历日期，为慎重起见，笔者还要举出几种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⑤第一〇八页，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文中写有：

……十月初七日，赵尔丰将民政交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军权交新军统制朱庆澜，成都宣布独立。

① 四川文献研究社，1964年9月。

② 第303—306页。——译注

③ 《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81页。

④ 第1页。——译注

⑤ 中华书局，1962年9月。

……蒲殿俊欲消弭军队隔阂，决定于十月十八日在东较场点名发饷。事前曾有人告以军心不稳，隔离犹恐不及，如集中点名发饷，则一夫发难，即不可收拾，蒲终不听。是午，各军齐集东较场，蒲、朱戎装登台训话。未久，台下队伍中即发生索饷争饷叫嚣。枪声一作，全军哗变。……

引文中的“十月初七日”“十月十八日”均为农历日期。如果按公历推算，分别为“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八日”^①。

如果与反而均按公历记载日期的吴玉章《辛亥革命》^②加以对比，这一点将更为明显。该书第一三五页记载的成都宣布独立、赵尔丰的兵变，以及赵尔丰被捕枭首等内容如下：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立宪党人和赵尔丰的勾结下，成都扮演了一出“独立”的滑稽戏，成立了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由立宪派头子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心腹新军统制朱庆澜担任副都督。至于赵尔丰，仍被委以办理边防的重任，实际上操纵着军政大权。对于这样的“独立”，人民当然不会满意。各地民军都以“索赵”为号召，继续向成都进攻。这时，赵尔丰已确知清朝中央政府尚未垮台，于是又阴谋复辟。十二月八日，蒲殿俊到校场点兵，巡防军在赵尔丰的唆使下，发生哗变。……

如果把引文中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八日”反而按农历推算，分别为“十月初七日”“十月十八日”。

显然，巴金《家庭的环境》第八十一页记载的巴金出生月日是农历“十月十九日”。

其次是他的出生年份。据笔者所知，巴金自己没有在某篇文章中具体提到过他的出生年份是一九零几年，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可供推测其出生年份的资料以及现已查清的农历出生月日加以判断。那么，在可供推测其出生年份的资

^① 见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历表》，商务印书馆，1962年5月，第82页。

^② 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

料中,较接近其出生年份并适于判断的有以下几种。

《巴金文集》第十卷^①第七十一页,《忆》所收《觉醒与活动》中写有“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一般来讲,“十四岁半”的“半”是不会用来表示虚岁的,通常是以实岁为准来推算流逝的岁月时才会使用的数词。我们留意这一点,从“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起按月倒数“十四岁半”,大致可以数到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如果把时间稍微放宽些来推算,结果是年十一月,或是一九〇五年一月。

如上所述,巴金的出生月日是农历十月十九日,这一点现已查清。如果分别按公历来推算农历一九〇四年与一九〇五年的十月十九日,结果即是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五日^②。如上所述,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起按月倒数“十四岁半”即可数到一九〇四年十二月,那么最接近它的是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于另一方的一九〇五年,按公历推算即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如此算来,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巴金还不满十四岁,“十四岁半”的“半”也无法解释。通过以上的推论,巴金的出生年月日该是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把巴金的出生年份说成一九〇六年,当然是错误的。

此外,在巴金的文章中可供推测其出生年份的资料还有以下几种:

(1)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③

(2)

……我的二十八年的岁月里,已经堆积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阴影了。……^④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

② 见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历表》,商务印书馆,1962年5月,第75、76页。

③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海行杂记》,开明书店,1935年11月,第6页。这是巴金离开上海赴法留学时的文字。

④ 《春天里的秋天》的《序》,1932年5月。《巴金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第4页。

(3)

……我为这个旅行准备了将近一年，可是等到我办好手续上船的时候，正在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已经逐渐逼近上海，全国革命浪潮一天天在高涨，孙传芳血腥统治的白色恐怖也越来越猖狂。我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却在这个时候，到外国去过寂寞的书斋生活！……^①

二、本名

如下所述，笔者根据余思牧《作家巴金》^②的《后记》断定他的本名为李尧棠。首先要说明笔者将他的本名断定为李尧棠的经过，供作参考。

巴金的本名到底是“李芾甘”还是“李尧棠”，或许会有争论。巴金在现已出版的《巴金文集》^③中把大哥与三哥分别写成“大哥(李尧枚)”与“三哥(李尧林)”，因此，把他的本名推测为李尧棠也不无道理。只是，李尧枚、李尧林是否为本名，笔者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好断定。

其次是“李芾甘”。例如：李芾甘《致〈文学旬刊〉编者信(节录)》^④，及创造社出版部《洪水周年增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第二〇二页附录《[〈洪水〉]第二卷人名索引》所录李芾甘《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洗一洗不白之冤》^⑤等，均采用

① 《谈〈灭亡〉》，1958年3月。《巴金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第303页。“这个旅行”是指赴法留学。除了“准备了将近一年”的部分之外，这里提到的时间大概是从1926年10月前后至1927年1月前后。

② 南国出版社，1964年8月。

③ 第1卷(1958年3月)至第14卷(196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④ 原载《文学旬刊》第49期，1922年9月11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0月，第43页。大安(影印)，1966年10月。

⑤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0集《史料索引》(香港文学研究社)第484页《洪水》目录仅署“芾甘”。

了该署名^①。

署名李芾甘的第一个例子《致〈文学旬刊〉编者信(节录)》，是他不满十八岁那年所写的书信。假如他考虑到或许会有人寄来复信，那么李芾甘自然就是他的本名了。果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他的本名。可是，笔者没有办法确认，不好断定。

有一份资料精彩地解除了他的本名到底是“李芾甘”还是“李尧棠”的疑点，如下：

巴金(笔名)，原名李芾甘，又名李尧棠……^②

据此解释，巴金原名芾甘，但时而或逐渐开始自称尧棠。如果是原有本名，后来开始使用与本名地位相等的名字，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常见的署名方式则有：“初名○○、后名○○”，“名○○、假名○○”，“原名○○、名○○”或颠倒成“名○○、原名○○”，或如上述巴金的例子“原名○○、又名○○”等。其中最吸引笔者的是最后的例子，但还没有确认。

不言而喻，“乳名”、“小名”、“字”、“号”或“自称○○”应另当别论。

通过以上的考察，笔者最终将他的本名断定为“李尧棠”。如上所述，这是根据余思牧《作家巴金》的《后记》做出的判断。该书第一页写有“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名字是取义自《诗经·小雅——甘棠》”；《后记》第三三二页写有“这本书……曾请巴金先生订正了一些日期及细节上的错误，并蒙他提了些意见帮助我修改初稿”。

由此可知，巴金曾校订过余思牧的书稿。既然巴金亲自校稿，错处肯定会修改，那么在现在能够查到的资料中该书应是最为可靠的一部。也正因为如

① 仅署“芾甘”的例子有：巴金分别在离开成都旅居上海与南京期间、赴法留学航海途中、到达法国不久的一段时间，向安那其主义杂志《民钟》投寄了二十三篇文章，据日录记载均署名“芾甘”；巴金赴法一个月之前(1926年12月)所译《克氏全集》第2卷《面包略取》也署名“芾甘”。

② 中共人名录编辑委员会《中共人名录》，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67年8月，第70页。

此，笔者将他的本名断定为李尧棠。

三、笔名

关于笔名“巴金”，最常见的说法是：从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 1814—1876）、克鲁泡特金（Peter Alekseevich Kropotkin, 1842—1921）各取“巴”“金”两字组合而成^①。从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关系等角度来看，这是可以令人信服甚至恰当的说法。

然而，巴金本人对于笔名“巴金”的解释则是：

不久我因为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起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②

如果我们另再穿插一些他当时的经历，对以上的记述重新加以解说，其情形大致如下。

巴金在他赴法留学的一九二七年夏天，因身体欠佳，遵守医生的嘱咐，转地疗养。幸好有朋友介绍，便在马恩（Marne）河畔小城蒂埃里堡（Château-

^① 《天义》第15册（1908年1月15日）刊载了《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续）》，作者克鲁泡特金的署名则是“苦鲁巴金”。（该篇原无署名。作者也许是根据同一期所载苦鲁巴金《未来社会之生产方法及手段》〔申叔译〕举出了此例。——译注）

^② 《谈〈灭亡〉》，1958年3月。《巴金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第307—308页。

Thierry)租下蒂埃里堡中学食堂二楼的房间住了下来。在这里,他一边疗养身体,一边从事写作、翻译,同时又在蒂埃里堡中学学习法语。在他在这里相识的朋友中,有一位来自北方的朋友,名叫“巴恩波”。这位朋友与巴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回到了巴黎,后来听说于翌年(一九二八年)在昂热(Angers)投水自尽。巴金与巴恩波的交往并不特别亲密,但巴恩波自尽的消息使他非常悲痛。后来,巴金取笔名时,由于巴恩波一直留在他脑海深处,于是用了“巴恩波”开头的“巴”字^①。

至于“金”字,可以依照以往的定论。

当时,巴金刚刚译完克鲁泡特金《伦理学》(*Ethics*)的前半部,桌上正好放着用来翻译的英译本,赴法研究哲学的安徽朋友看到后,听说巴金正想取一个容易记住的笔名,于是半开玩笑地问他克鲁泡特金的“金”字如何。

由此可见,“金”字可以依照以往的解释来说明,但将“巴”字与“巴枯宁”直接联系在一起则不为妥当。

他的笔名除了“巴金”之外还有以下几种。括弧中的内容为署同一笔名的作品及其发表日期。

“一切”(《骷髅的跳舞》,开明书店,一九三〇年三月。译自秋田雨雀《骸骨の舞跳》世界语译本〔Ujaku Akita, *Fonto de Sudroj ; Danco de Skeletoj ; Nokto ĉe Landolimoj*, Tr; Haĵime Ŝuzui, Kaname Suzuki, Japana Esperanto-Instituto, 1927〕。)

“比金”(《新年试笔》。《文学》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

“余一”(《将军》。《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

“余七”(《无题》。《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

“王文慧”(《罗伯斯比尔的秘密》。《文学》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① 由于巴金在蒂埃里堡住到1928年9月前后,8月初完成处女作《灭亡》初稿便从蒂埃里堡邮局寄给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

“余三”(《再说批评家》。《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余五”(《“点戏”》。《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竟容”(《倘使龙眼花再开放时》。《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欧阳镜蓉”(《龙眼花开的时候(下篇)》。《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①

“黄树辉”(《知识阶级》^②。《文学》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

“黎××”(《神》,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日本横滨。《巴金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六月,第三二二页。)

虽然不是笔名,巴金侨居日本期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③)自称“黎德瑞”,而在归国后也经常使用这个名字。^④

据袁涌进编《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⑤介绍,他的笔名有:王文慧、比金、巴比、巴金、余一、余七、余三、余五、欧阳镜蓉。其中,笔者未能查到“巴比”的出处,但估计袁涌进是根据原著列出了这些笔名。记如上,供作参考。

至于他写于成都时期的文章(《致〈文学旬刊〉编者信(节录)》除外)都用了哪些署名,尚不清楚。据笔者所知,巴金在离开成都旅居上海与南京期间、赴法留学航海途中、到达法国不久的一段时间撰写的文章均署名“芾甘”或“李芾甘”。署笔名“巴金”,是从一九二八年八月初完成的小说《灭亡》开始。

① 《文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4年4月1日)载有《龙眼花开的时候》,署名“欧阳镜蓉”。——译注

② 发表时题为《电话》。——译注

③ 归国时间有误。见本书第3章第1节第49页注⑤。——译注

④ 《谈〈憩园〉》,1961年11月12日。《巴金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第412页。

⑤ 北平中华图书馆,1936年,第32页。

附录二 巴黎的

邵可侣家族

——从芹泽光治良《爱、知、悲》谈起

笔者在附录三《巴金略年谱》的一九二八年“侨居法国时的其他事项”中写道：“[巴金]常到巴黎的邵可侣家拜访，这里据说是安那其主义者常来探访之处。”其实，这句话的出处不是巴金的著作，而是笔者根据芹泽光治良《爱、知、悲》(爱と知と悲しみと)^①第四页序言写的。原文如下：

……仁兄[巴金]不仅认识邵可侣[札克·邵可侣, Jacques Reclus]，据说一九二七年赴法留学时还常去邵可侣家，所以我想，往时我们也许在他家里见过面，所以越来越对仁兄感到亲近。

^① 新潮社，1961年11月20日。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亚非作家会议”于东京召开，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日，芹泽光治良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会议^①。

会议结束后，巴金到芹泽光治良的住处探访，当话题涉及芹泽光治良侨居法国时期^②时，芹泽谈到了当时他在巴黎的邵可侣家中初次与中国人相识，以及在邵可侣家中见到的中国人。以上引文即是芹泽回顾此次对话的记录。

巴金侨居法国的时期是：经由马赛，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到达巴黎；一九二八年十月下旬或十一月初离开马赛^③。可见，巴金与芹泽光治良的侨居法国时期有所重叠。

同时谈起芹泽光治良与安那其主义者世家邵可侣家族，或许会令人感到奇异，其实是有这样一段内情：芹泽光治良与夫人晴子的婚姻媒人是《万朝报》社长，芹泽赴欧时，拜托《万朝报》社长向他介绍朋友，社长便把曾任《万朝报》记者、现已从法国归来的石川三四郎^④介绍给他，石川三四郎又向芹泽介绍了巴黎的邵可侣家族^⑤。

芹泽光治良赴法时，当然不知道邵可侣家族是知名的安那其主义者世家。

当时，邵可侣家的主人是扎克·邵可侣（鲍尔·邵可侣的次子）。祖父爱利赛·邵可侣^{〔注1〕}是国际知名的地理学家、安那其主义者，以克鲁泡特金（Peter Alekseevich Kropotkin, 1842—1921）的挚友闻名于世。父亲鲍尔·邵可侣也是地理学家，在布鲁塞尔、波尔多任大学教授，当时（一九二五年初夏）由于夫人生病等原因，隐居于法国南部多姆（Dome）。

① 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协议会、东京大会议事录委员会编《亚非作家会议东京大会》（アジア・アフリカ作家会议东京大会），1961年9月15日，第241页。

② 1925年初夏，前往巴黎；1929年冬天，归日。

③ 李存光编《巴金著译年表》关于1928年的记述中写有“10月18日 自巴黎至马赛，拟乘轮回国”。见《巴金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526页。——译注

④ 见本书第3章第3节第100—101页关于石川三四郎的〔注6〕。

⑤ 石川三四郎初次到巴黎的邵可侣（鲍尔·邵可侣）家拜访是1913年初夏的事情（《平民新闻》第73号，1948年5月24日）。1921年赴欧时，石川再次拜访了邵可侣，1922年年末归国。

邵可侣家族闻名欧洲，是因为祖父与父亲曾伸手援助、庇护世界各国的政治流亡者；到了扎克·邵可侣的年代，尽管不能比拟以往，但世界各地的同志依旧常来探访。

下面主要依据芹泽光治良《爱、知、悲》，并以石川三四郎的文字为旁证加以补充，来概括介绍扎克·邵可侣与中国安那其主义者^①。

扎克·邵可侣，就读巴黎的音乐学院，于一九一二年首席毕业。一九一四年，在巴黎准备举办首演音乐会，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音乐会将被取消，一九一五年五月，作为一名军人奔赴前线。经过一年零数月的苦战，因右手负伤，被送往兵站。右手的负伤断送了他作为钢琴家的前途。终战后，在索邦大学学习社会学。芹泽光治良探访扎克·邵可侣时（一九二五年初夏），他正靠钢琴指导等来赚取生活费。扎克·邵可侣的夫人曾是科尔奈里孙（Cornelissen）博士的太太，她不仅对终战后陷于绝望之中的扎克·邵可侣给予鼓励，而且还援助他继续在索邦大学学习社会学。夫人的奉献与扎克·邵可侣的感激相应相随，两人跨越了母子般的年龄差距，结下了姻缘。

扎克·邵可侣还收养了克鲁泡特金的孙女做养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她死于德军的伦敦空袭之中）。

一九二七年秋天，有人邀请扎克·邵可侣到中国的大学^②授课，科目为劳动问题与社会问题。于是，于一九二八年春天，扎克·邵可侣把科尔奈里孙夫人与克鲁泡特金的孙女留在巴黎，独自前往中国^③。

另一方面，芹泽光治良于一九二九年冬天归日之际，中途路过上海。他在上海见到了扎克·邵可侣以及以前在巴黎相见的几个中国人（陈君、王君，后见到季君）。扎克·邵可侣在国立劳动大学讲授社会学、劳动政策，另教法语。他听说，

① 引号结尾注明页码的引文，均引自芹泽光治良《爱、知、悲》。

② 国立劳动大学。见本书第3章第3节。

③ 石川三四郎《自叙传·一自由人之旅》（自叙传·一自由人の旅）（理论社，1956年9月）第127页谈到扎克·邵可侣曾在国立劳动大学担任教授。

在三位中国挚友中,王君经营牙刷工厂,向民众提供牙刷,教他们要讲卫生,使她们过上讲体面的生活,或多或少想要改善民众的生活;王君正通过这些初步行动,志于社会改革的道路。王君尽管是经营者,但“他不仅多次讲述过精英安那其主义者的理论,还曾作为互助组织的一员从事体力劳动”(第七十二页),为此,芹泽光治良对他感到了好奇。

芹泽光治良侨居上海时,与扎克、陈君、王君、季君一同探望了卧病中的鲁迅。当时,鲁迅这样说:“你们的事情,我从朋友那里听说了。本国朋友也期待着你的作品,要把作品写好,就要常以世界为对手,并且还要记住把根扎在祖国。这对你来说并不是难事,你的这些朋友让我这么想。”(第七十五页)

一九三〇年七月中旬,扎克·邵可偈与科尔奈里孙夫人一同访问日本,寄居在石川三四郎的家里^①。

芹泽光治良邀请扎克·邵可偈夫妇到日本信州。当提到扎克·邵可偈回国回法时,科尔奈里孙夫人说出了她对此事的看法:

他不愿意回国。他爱上了中国……不,倒不如说他起了念头,要解放中国的民众。当然,从性格上来讲,他是当不了革命家的,但他希望把解放人的思想灌注给中国青年,甚至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人的解放,是邵可偈一家的传统、理想。既然它活在扎克的精神里,我也没有办法。他相信这是他的使命,我估计在他完成这使命之前,他不会离开中国吧……(第九十四页。)

一九三二年春天,扎克·邵可偈来到了东京芹泽光治良的家里。特别高等警察^②前来查问扎克的身份、扎克与芹泽以及与石川三四郎的关系等。不久,扎克缩短旅程,返回北平。

① 石川三四郎编辑、发行的《力学》(ディナミック *La Dynamique*)第13号(共学社,1930年11月1日)所载《千岁村信》介绍了相关消息。《力学》的大小为普通报纸的四分之一(21cm×30cm。——译注),月刊,每号各4页,1929年11月1日第1号至1934年10月1日第59号。

② 1911年至1945年,由日本内务省直辖,压制思想、取缔社会活动的秘密警察组织。——译注

在此前后,石川三四郎决心做东洋史研究,首先为了解中国的情况——风土、居民的生活状况、社会习俗、汉族、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文化等,自一九三三年十月起,在华北地区旅行了三个多月。石川三四郎在天津塘沽受到扎克·邵可侣的迎接,侨居北平期间也多次承蒙他的关照。另外,在侨居北平期间,石川三四郎遇见了巴金。石川三四郎在十二月四日从北京寄给《力学》(ディナミック *La Dynamique*)发行处共学社的书信中写道:

……去了国立图书馆,有人拍我肩膀叫我先生[Monsieur]。原来是李巴金。他生于四川,但可以说是福建的同志。他现在是小说家,书很畅销,是位文坛新秀。从他那里了解了福建的种种情况。^①

从石川三四郎的文字首先可以体会到,巴金对石川三四郎的举动是充满亲近感的。这是巴金与石川三四郎初次相见,估计是因某一方的同行者向彼此介绍而结识。

石川三四郎的著作常被介绍到中国,也许巴金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至少,刊载巴金的论文《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与其译作马拉铁司达《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的《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同时载有石川三四郎《我们的自由与连带责任》(如囚译),因此巴金也一定读过该篇。而且巴金留法归国后,也一定听说了石川三四郎当时在国立劳动大学担任讲师一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巴金赴日,翌年一九三五年暮春,到东京郊外千岁村拜访石川三四郎。

巴金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写于广州的散文《给一个敬爱的友人》^②,即是献给石川三四郎的一篇。

言归正传。一九三八年春天,芹泽光治良到正于北京大学任教的扎克·邵

① 《力学》(ディナミック *La Dynamique*)第52号,1934年2月1日。“福建的同志”是指曾在泉州民团训练所(见本书第4章)工作的安那其主义者。

② 《感想》,烽火社,1939年7月,第36—45页。——译注

可侣的住处探访，但扎克·邵可侣去了云南，不在家。后来才知道，扎克·邵可侣已经与中国女子结了婚。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终战。

一九五一年，芹泽光治良前往瑞士洛桑(Lausanne)，参加国际笔会。归途，在巴黎见到科尔奈里孙夫人。夫人对她说：终战后，扎克·邵可侣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九四七年夏天，于假期返回巴黎时，是和中国太太在一起的，六岁零数月的女儿也在一起；一九四九年年末或一九五〇年，新中国决定把所有外国人逐出境外时，扎克·邵可侣打算带上全家回国，但中国当局说女儿完全是中国孩子，必须把她留在中国，所以他回国时把女儿留在了中国；等等。

一九五三年，科尔奈里孙夫人去世。

一九五九年夏天，芹泽光治良在巴黎见到扎克·邵可侣及其中国太太，据说女儿住在北京。当时太太说：大概在两年半之前，他去北京见过女儿，和她一起生活了一年半左右；中国当局说如果女儿愿意离开中国他们将准许出国，于是他劝说女儿回到法国，而女儿却说她不愿意回到法国那样腐败的资本主义国家。芹泽光治良把扎克·邵可侣当时的神情与其女儿联系起来，这样写道：

在扎克下陷消瘦的脸颊上，眼泪已经流成了河。父亲特有的静静恸哭，给我心中带来了永生难忘的悲痛の波动。所以在东京见到仁兄[巴金]时，见到杨朔同志[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时，无意之中便说出了扎克女儿的事情……(第二四二页。)

不久，芹泽光治良告别扎克·邵可侣，离开了巴黎。

仁兄[巴金]啊，当时我真想到北京去看看扎克的女儿，而在这一刻，我才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人生。(第二四三页。)

《爱、知、悲》至此结束。

本文开头已经提到了巴金到芹泽光治良的住处探访一事，而与他畅谈时，巴金说要邀请他到北京，顺便看看扎克的女儿。归国后，巴金马上通过日中文

化交流协会促请他访华,但因芹泽光治良卧病,未能实现。

归国后,巴金写了一篇与芹泽光治良相关的文章:《致芹泽光治良先生(代序)》(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①。

注解

〔注 1〕

爱利赛·邵可侣(Élisée Reclus, 1830—1905)。

1830年,生于波尔多(Bordeaux)附近大圣富瓦(Sainte-Foy-la-Grande)的伯爵家庭,次子。1840年至1842年,在摩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学习德语。1842年至1848年,在家乡的基督新教学校读书。1848年至1849年,就读蒙托邦(Montauban)大学神学系。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之际,企图与哥哥爱理·邵可侣(Élie Reclus)一同援助地方革命运动,故受到停学处分。1850年,父母把兄弟二人送往柏林。在柏林大学本该攻读神学,但他没有这样做,却专心聆听同校人文地理学权威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 1779—1859)的讲课。父母希望兄弟二人当神父,但他们没有这种意愿。同年,他们回到父母的居住地奥尔泰(Orthez)(法国西端比利牛斯山麓)。1851年,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时,邵可侣兄弟企图与几位朋友一起建立叛乱组织,但被发现。当获悉他们的名字已被登在流放者名单上,1852年,亡命英国。1853年至1854年,去北美旅游;1855年至1857年,去南美各地旅行。1857年,回到法国,结婚,住在巴黎。从美国归来后的几年间,比较平静地从事写作。1857年,作《欧洲土地与历史》,为世人瞩目。1860年,作《合众国的奴隶制》。为奖赏他所做出的努力,美国总统林肯想对该篇论文授予奖金,但被他拒绝。1861年,撰著《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之旅》(*Voyage à la Sierra-Nevada de Sainte-Marthe*)。1864年,加入于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1868年,巴枯宁派安那其主义者对抗马克思派中央

^① 《倾吐不尽的感情》,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6月,第1—13页。

集权主义者，成立“国际社会民主同盟”，于是他脱离了第一国际。虽然他很欣赏巴枯宁派，但最终没有加入同盟。当时，另有一国际团体，叫做“和平与自由同盟”，维克多·雨果担任会长。邵可倡与巴枯宁是该同盟委员，但因在1868年召开的布鲁塞尔大会上属于少数派，他们最终脱离了该同盟。爱利赛·邵可倡当时发表演讲，据说是他初次在公众面前讲解无政府主义。此外，是年（1868年）出版第一部大作《大地》（*La Terre*）第1卷。全篇为陆地研究，仅此一卷便闻名欧洲诸国。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得知德军将迫近巴黎，加入了朋友那达（Nadar）组织的气球队。另参加了1871年3月成立的巴黎公社（自治政府），因遭到受德国后援的政府军的镇压，被捕下狱。1871年11月5日，在军事法庭上被判处终身流放。然而，欧洲诸国的学者们向法国政府申诉他非凡的学识与才能，并提交了抗议书。以达尔文为首，世界各国的知名学者为此联署。法国政府万般无奈地决定将他逐出境外十年。1873年2月，前往瑞士，住在卢加诺（Lugano）。是年，于日内瓦举行关于地中海历史的公开演讲。1875年，出版巨著《新世界地理》（*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第1卷（每年出版一册，1894年出完第19卷）。1879年，迁居克莱伦斯（Clarens, Switzerland）。1880年，撰著《进化与革命》（*Évolution et Révolution*），强调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要重视道德改革。1885年，为克鲁泡特金第一部无政府主义著作《一个反抗者的话》作序。1892年，受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邀请，任地理学讲座负责人。是年，为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作序。1893年，在巴黎发生了由安那其主义者引起的爆炸事件，地理学讲座也受此牵连而被迫停课。在巴黎发生的爆炸事件，是因一位名叫瓦扬（Auguste Vaillant）的青年对议会的反动性深感愤怒，在开会时间向会议厅投入炸弹而引起。当时，政府断定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鲍尔·邵可倡（指其外甥；他有个儿子也叫鲍尔，并非同一人物）与此事件有关，因此他受到牵连。1894年，布鲁塞尔的慈善会馆创办了一所新大学，直到1900年，他在这里担任比较地理学讲座。哥哥爱理也在同校主持宗教史学讲座。1897年，出版《进化、革命和无政府理想》（*L'Évolution, la Révolution et L'Idéal Anarchique*）。1903年，完成《人与地》

(*L'Homme et la Terre*)六卷。1904年,哥哥爱理去世。1905年,出版《人与地》第1卷。7月4日,爱利赛·邵可侣去世。参考:爱利赛·邵可侣《人与地》(地人论)第1卷所收《爱利赛·邵可侣小传》(エリゼ・ルクリュ小传),石川三四郎译,春秋社,1930年6月10日;石川三四郎《爱利赛·邵可侣——思想与生涯》(エリゼ・ルクリュ——思想と生涯),国民科学社,1948年9月25日。



第二辑 论 文 篇



巴金的信念^{*}

回顾巴金的作品时会发现，巴金连续创作《静寂的园子》《爱尔克的灯光》等多篇散文的一九四〇年，即他三十六岁那年，是他创作风格出现显著变化的起点。

在如此设定这一时间区分点的前提下，今天我们通过他的“信念”来讨论前期巴金，描述所谓前期“巴金文学”的一般性质以及他的文学观，下次将讨论《憩园》，描述后期巴金以及其他后期作品的形象。

巴金在他的处女作《灭亡》（一九二九年）的《序》的开头说“我是一个有了信

* 该篇原载《中国文艺座谈会记录》（中国文艺座谈会ノ一卜）第4号，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1955年5月，第1—17页。

仰的人”，因此，我们会经常看到巴金通过以下几种创作手法表现他对人生的这种姿态：把这种姿态与选取题材的方式直接联系在一起，呈现出“愿望小说”的面貌；或者仅以作品发泄不满反而使他感到不安，于是写下长篇序言；抑或把自己的伦理、道德强加于主人公身上。

我之所以讨论“巴金的信念”，是因为我认为阐明这一点可以初步理解巴金文学。因此，今天这场讨论的目的则是：通过讨论他的信念来描述他的文学的一般性质以及他的文学观。

按顺序来讲，首先应该讨论他建立信念的经过，由此讲述他的“信念”究为何物，但在此之前，先来论述以下两点，以揭示“信念”一词的性质。

第一，界定巴金赋予“信念”一词的内容之范围。

第二，“信仰”被日译成“信念”及其他相关问题。

关于前者，可以借用约翰·杜威的说法来解释。杜威在《思维术》^①中这样概括信念一词：

信念，涵盖了我们的确不清楚的、却又足以使我们安心置信的所有事项。

因此，信念性思维，迟早要由探究它何以为据的我们去研究。

我认为，巴金对信念的构思也是从此出发的。

也就是说，理解某种事情的轮廓之后，在其触动之下，能够笼统地预料到大致将取得什么结果，并大致可以瞻望为此自己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我认为，这就是巴金赋予“信念”一词的内容之范围。

其次是后者。我所讲的“信念”这一复合词，在原文中是“信仰”，我日译成“信念”。日本《国语辞典》对该词的解释是“信服、敬慕”，《辞海》的解释是“佛家语，深信三宝而钦彻之也”。如果按照巴金自己的说法来判断的话，“信仰”显然不是宗教方面的用法，重要的是，拒绝宗教领域的他的姿态本身就已经明确地

^① *How We Think*,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33.

体现了他的信念的性质。

巴金在《〈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中说：

……基督教的处女在罗马[古罗马,暴君尼禄时代]斗兽场中跪在猛兽的面前,仰起头望着天空祈祷,那时候她们对于即来的灭亡,并没有一点恐怖,因为她们看见天堂的门为她们而开了。她们是幸福的,因为她们的信仰是天堂——一个人的幸福。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却是众人的,甚至要除掉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信念]在黎明的将来,而这将来我们自己却未必能够看见。革命者和教徒是完全相异的两种典型。……^①

我认为,他的幸福,似乎是把感受性、经验性因素以及在人的生存之全体过程中即一生当中所有事情都能够按照他所希望、所向往的那样顺利完成的一种优越条件通通排除在外,通过充分发挥良好意志的能力、坚持自我“信念”而获取的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这种幸福观,当然与宗教中的净福有相关的一面,但他割断了这种关联性,只把宗教限定在教徒根据自身的主观经验来处理自己的层面,从本质上与他的信念区别开来。

虽然在展开自我信念的过程中,为完善自身的生存,不免会出现些不连贯的跳跃的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则是:他认为实践信念的目的之选择,乃应优先于信念,这是他从他所身处的现实社会中汲取而来的。

此外,正如短篇集《神·鬼·人》的《序》所描述的年幼时他与神的接触那样,神与他所身处的封建社会的基础结为一体,对他来说不外是压抑他的一种压力。既然如此,他所意识到的神的存在本身也是问题所在^②。

其次,通过“我们的信仰[信念]在黎明的将来,而这将来我们自己却未必能

^① 1935年11月22日。《〈爱情的三部曲〉,开明书店,1938年11月,第510—511页。着重点为作者所加,下同。——译注)

^② 《神·鬼·人》,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1月,第1—5页。在《序》中,巴金只说他希望神能够给人带来和平与幸福,主持公道。——译注

够看见”即可看出,尽管信念尚未实现,但巴金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认为它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努力得以实现,为此,巴金突出了理性的人的观点,认为人是不断努力、实践的主体。也就是说,把人的具体存在从理智的角度斩断,只有呈现在其切面的人之形象,才会成为常浮现在他脑海中的首要问题;而单从他把追求某一课题的意志之强化视为自我“信念”的这种姿态来讲,它也要与宗教划清界限。

这样看来,尽管巴金与宗教有过接触,但他不会有任何收获。巴金在二十三岁那年赴法留学,他在航海途中回顾往事,给朋友写信,其中一段文字写道:

……然而我在过去的某一个短时期里也曾几乎要去皈依佛教。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但是结果我并没有得着什么,那只是一个妄想,那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这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①

这种表述出自巴金的一种姿态:具体来讲,社会上所有的问题都应该从实现目的——去完成他所认定的有意义的行为——的方法之价值层面来处理。

下面引用一段现仍健在的安那其主义研究权威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1893—^②)的文字,以归纳巴金的信念与所谓信仰的关系。

……安那其主义,由于其神秘性倾向,它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去想象一种从安那其主义发展下来的新宗教。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许多观察家对安那其主义者带有宗教色彩的热忱感到惊讶。在赋有潜在的重生力量的西班牙社会中,安那其主义孕育了英雄,以至于圣者。这一群新人,为了通过感性的想

^① 《两封信》。《海行杂记》,开明书店,1935年11月,第56页。——译注

^② 赫伯特·里德歿于1968年。——译注

象力与实践来创造新型人类社会,奉献了他们的生命。^①

如果要找出巴金与宗教信仰的关联性,那么这只能是他狂信宗教般地彻底沉醉在自我信念中的这一层面。

《火》第三部的主人公田惠世的表述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徒不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相信爱,相信真理,只要你愿意散播生命种子,鼓励人求生,他同我又有什么分别?”……^②

以上通过讨论巴金赋予“信念”一词的内容、“信仰”之非宗教方面的用法、从信念与信仰的关系总结出来的观点,论及了“信念”的性质。

由此,我们可以在心里描绘出巴金文学作品中无所畏惧、坚信人的潜力、勇往直前的主人公形象。

接下来,通过巴金的文字来说明他建立“信念”的经过以及他“信念”了什么。

……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从十五岁起直到现在我就让那信仰指引我。^③

……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也曾有过那“立誓献身的一瞬间”。……^④

① 《安那其主义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narchism*)(*アナキズムの哲学*),1940年。(该篇收于赫伯特·里德《安那其主义哲学》[*アナキズムの哲学*],大泽正道译,法政大学出版社,1968年10月15日。引文重译于该书第51页。——译注)

② 《火》第三部,开明书店,1945年7月,第286页。——译注

③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爱情的三部曲》,第54页。——译注)

④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我也曾”的“也”字,估计是用来呼应克鲁泡特金的经历。(《爱情的三部曲》,第511页。——译注)

此时为一九三五年，巴金三十一岁，那是他完成《家》《爱情的三部曲》与其他多部中、短篇小说，开始执笔创作《春》的时期，当时巴金已确立了作家的地位。

巴金十五岁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在我看来，阐明这一点则是了解他建立“信念”的经过的关键。据巴金的回忆录《我的幼年》（一九三六年）介绍，正在他开始发现家族是一个专制王国、亲自意识到社会制度之不合理的时候，他阅读了克鲁泡特金《告少年》（*Appeal to the Young*）。巴金这样讲述他读完《告少年》时感到的震撼：

……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用一颗颤抖的心读完它。……^①

这段话写于前一段引文的翌年，即巴金三十二岁那年，同样是回顾往事的内容。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段话也可以说是巴金撰写该篇时的自我形象，这一点暂且不谈；由此不难想象的是，巴金十五岁那年阅读了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从此对互助论——提倡结合由相互间的爱与理解所蕴育出的具温度的有机体——感到内心澎湃。

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在经历此事的前后巴金经历的另一件事，即朋友“吴”对他的感化。巴金在《我的几个先生》（一九三六年）中说“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随后写道：

……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②

① 《我的幼年》。《中流》第1卷第1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5日，第7页。——译注

② 《中流》第1卷第2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20日，第100页。——译注

那么，“吴”又是怎样一个青年？他是巴金就读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时的学长，因此，他又是巴金与几位朋友成立的秘密结社“均社”的成员之一；他信奉安那其主义，提倡“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工神圣”；为了不只讲漂亮话，而把主义付诸实际行动，他放弃了学业，白天在一家裁缝店里做学徒，晚上来到“均社”专心工作；刊物经费短缺时，竟然会典当衣服来弥补。关于这位青年对巴金的影响，巴金写道：

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那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涯里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信仰这树木所开放的花朵。……^①

巴金通过这位朋友的英姿清楚地看到了把行动建立在信念上的人是怎样顽强地活下去的，不难想象，巴金也一定想过自己要做这样的人。

巴金说他通过阅读克鲁泡特金《告少年》、目睹朋友的行动，获得了足以支配自己一生的信念。巴金如此表明的姿态本身会令人感到含糊不清。我想把巴金曾经翻译过的克鲁泡特金《我底自传》中的一段话套用在巴金身上。

……然而人的性格之确定时期通常总要比一般人所料想的早得多。虽然我当时[十五岁时，为进入侍从学校赴圣彼得堡的时期]在外表上还是小孩，但那时的我和后来的我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②

巴金并没有自然而然地经历这些。十五岁时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封建大家族以及社会之不合理感到苦恼，所以这些经历同时也来自巴金本人的意识。

通过这些经历，巴金建立了他的“信念”——实现空想的、理想的无政府社会。尽管巴金如上讲述他的一些经历，然而在我看来，夸大评价他十五岁时的

^① 《我的几个先生》。（《中流》第1卷第2期，第100页。——译注）

^② 《我底童年》第5节。克鲁泡特金《我底自传》，巴金译，开明书店，1939年5月，第75页。——译注

这些经历并不妥当；此外，从之后他与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以及他的生活态度来讲，当时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接触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第一，对于由相互间的爱与理解所建构的共同体(Gemeinschaft)社会充满憧憬；第二，内在于安那其主义的否定精神，正如林健太郎氏所界定的安那其主义的本质——“对资本主义社会出自本能的反抗”^①。其中，巴金尤为向往前者。

为了说明我做出如此判断的理由，以下参看巴金有关爱的表述。这段文字可以说明巴金与互助论的紧密关系：

因为[从母亲那里]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拿来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点事情，把我和这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②

我认为，这段回想与互助论紧密相连。

互助、正义、道德，这些都是根植于人心深处的天生的本能力量，巴金的这种伦理在不停地挖掘爱，直至他创作《憩园》时，终于把所有人都描写成了善人。

关于巴金与内在于安那其主义的否定精神的交接点，巴金说，通过面对他所身处的现实社会，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应该改变的对象^③。因此，否定儒教的权威性，否定身份、地位，不容忍社会之不合理，该是双方的交接点。这与众多中国青年随着接触现代精神所选择的道路有所关联。在他的内部，这与他对于革命的要求共处，茁壮地成长起来。

小说《雨》已经反映了其之一端。主人公吴仁民对不顺利的革命工作感到焦虑，激情冲动之下说：“像火山那样地爆发罢。毁灭世界，毁灭自己，毁灭这矛盾的生活！”^④正如巴金所言，这已经关涉到巴枯宁的说法——“破坏的激情就是

① 林健太郎《安那其主义》(アナーキズム)。《新伦理讲座》第5卷《世界与国家》[世界と国家]，创元社，1952年9月15日，第154页。——译注)

② 《我的几个先生》。《中流》第1卷第2期，第98页。——译注)

③ 《我的幼年》。《中流》第1卷第1期，第5—9页。——译注)

④ 《雨》第5章。《爱情的三部曲》，第179页。——译注)

建设的激情”^①。而在《灭亡》与《电》中，巴金毫不犹豫地描写了个人恐怖主义等，例子繁多。巴金对现存秩序的强烈的否定精神已多次出现在我们眼前。

巴金这种二元化姿态，反映在巴金的尤其是前期的作品之中。爱憎共处所带来的矛盾也可以由此来解释。

巴金在他三十一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时候，依然在讲“这一信仰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假如我们直接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巴金的说法，那就说明巴金依旧坚信他在十五岁时建立的信念——实现空想的、理想的无政府社会。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直接通过字面意思来这样理解巴金的说法？当时他所身处的社会背景令我对此有所不解。

一九三五年这一年几度发生大事件。二月，蒋介石严令“剿匪”，愈对红军施加压迫。在对外问题方面，自五月起，签订《何梅协定》、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军的压力变得逐渐显著。在这种形势下，八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表了《八一宣言》。终于在十二月，反对日本分裂华北的声明引发了学潮，作为抗日民族运动的开端，逐渐扩展到全国。

文学界也响应了这种社会动向，迫使作家们表明立场与文学观。是年六月，瞿秋白在长沙被枪决。

如果说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背景再来理解上面引用的巴金的说法，那么我对于巴金坚持信念本身的不解之处则应该得到赞同。这是因为，在现实社会动向面前，巴金的“信念”越发脱离现实。既然如此，“这一信仰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到底意味着什么？巴金将怎样展开他的信念？巴金在这两年（一九三三年）于杂志《现代》第二卷第五期发表的言论涉及问题的一端，值得留意。对于左翼评论家谷非所言“接近新兴阶级底主观”^②，巴金反驳道：

①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爱情的三部曲》，第 512 页。——译注》

② 《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文学月报》第 1 卷第 5、6 期合刊，光华书局，1932 年 12 月 15 日，第 116 页。——译注

这所谓新兴阶级是单指苏联的工农阶级呢，还是指在 C. N. T.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指导下的西班牙的无产阶级呢？后者和前者所要求的政治纲领是两样的。如果谷非先生是单指前者而摈弃后者，那么对于他的好意的劝告，我就只得恭敬地璧谢了。因为我的政治纲领是和后者一致的。^①

三年前的一九三〇年，是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终于得到普及、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开始形成的时期，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巴金的这种表述是不容忽略的。

从巴金的表述来看，他与中国共产党也划清了界限。而从他的信念来讲，他当然也不会支持蒋介石政府的路线。如此推论下来，必然要考虑到第三种立场。他的无政府主义的信念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展开。而且，这种表述却又偏偏出现在作家的文学理念与立场不容分割的时期。

这让我想到了在这前一年（一九三二年）开始与左翼作家联盟激烈展开“文艺自由论辩”的杜衡等“第三种人”的立场与巴金的关系。蔡仪一口断定苏汶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②，纵然苏汶的立场未必如此单纯，但这毕竟说明了他的某一层面。与此相比，巴金的文学观则是“拿起笔用它做武器，来攻击我的敌人”^③，从这一层面来讲，他也应该与苏汶区分开来。如果围绕左翼作家联盟的位置来思考的话，即使在文艺理论方面，巴金也还站在他们的对岸，未能摆脱革命浪漫主义。但巴金以他自己的方式，把他的立场、文学理念寄托于自我信念之中。下面，我想从他的安那其主义者的立场来讨论这一点。

巴金在《我的自辩》中说过：他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在 C. N. T. 指导下的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是一致的。巴金又在《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一九三六年）中

① 《在日本的中国文人》（来朝中の中国文人）所收冈崎俊夫《巴金》。《中国文学》第2号，中国文学研究会，1935年4月5日，第16页。（作者引用的冈崎译稿为巴金《我的自辩》中的一段文字的摘译。全文见《现代》第2卷第5期，现代书局，1933年3月1日，第708页。——译注）

② 《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第95页。——译注）

③ 《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该栏所收巴金《关于两个〈三部曲〉》，《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合刊，1941年3月20日，第152页。——译注）

写道：

……我写文章“答徐懋庸”^①不过是出来为那些在西班牙人民解放战场上牺牲的英勇斗士辩诬，替那少数沉默地工作着的“中国安那其”伸冤……^②

由此可见，巴金已信奉了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为适应新时代的条件由无政府主义演变而成。那么，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巴金内心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依我的想象来讲，讨论这一点，首先应该留意巴金在他的短篇集《复仇》^③——这应该说是巴金回忆法国生活而创作的纪念品——中描写的意大利流亡者、波兰女革命工作者、南俄囚犯等安那其主义者坚持奋战的情形；其次应该考虑到无政府工团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发展，尤其在法国，其余烬尚未熄灭。我认为，这些因素使巴金对他赴法留学以来所信奉的安那其主义在现实社会中所能占据的地位及其活动的局限有了重新认识；而通过反思、探讨实际活动应该如何展开的问题，已在中国彻底被击垮的巴金找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

然而，安那其主义者的形象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视之为可望的理想而充满憧憬的人；另一种是，不但憧憬，还要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当时（一九三五年）巴金由于文笔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上的转变，已经开始由后者逐渐转向到前者。我这种想象主要来自巴金写于翌年（一九三六年）的小说《星》^④。

正如《电》的《新版题记》（一九四三年）所介绍，这部小说取材于发生在南方一座地方城市的一起真实事件。小说梗概如下：某作家的朋友建立了一个自治组织，由他们自己来治理，试图逃脱地方军阀的压迫。为了与朋友和相识已久的女子重逢，这位作家来到了这里，却偏偏赶上土匪高为国（实有此人）为占领

① 《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作家》第1卷第6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15日。

② 《中流》第1卷第3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10月5日，第171页。——译注

③ 新中国书局，1932年8月。——译注

④ 原载夏丏尊编《十年》，开明书店，1936年7月，第119—183页。——译注

这座城市发动运动的时期。这位作家忧心忡忡，便听从劝告，告别了战斗中的朋友，离开了这座城市……小说中的作家不就是巴金其人吗？从《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的内容也可以明显看出，巴金与一些默默工作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保持着联系，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活动，但他随时都在关注他们，给予精神上的援助。《电》描写了在陈国辉统治下的闽南古城致力于工会运动的青年们的形象；《忆范兄》《纪念憾庐先生》《写给彦兄》等一系列怀念文字则赞扬了在福建、广东一带活跃于地方自治组织、劳动运动的朋友们。

那么，安那其主义者巴金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又是如何？关于这一点，首先要讲的是，尽管巴金在《我的自辩》中反驳谷非时表明过自我立场，但他毕竟没有用更清楚的方式来表达。最大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运动事实上已经衰落，同时还有身处于他们的运动不久被中国共产党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淹没了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安身立命的问题——从运动的角度来讲，至少在工会运动方面他们站在协助立场。那一年（一九三五年），朋友的活跃之地福建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十一月），翌月，建立了红军福建人民军与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只是，在此应该留意的是：巴金作为安那其主义者的姿态，以及他直接用它来处理他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关于这一点，赫伯特·里德的说法极为巧妙：

……即便我曾向异于安那其主义的政治运动妥协，那也是因为我相信这是多少能够使我接近终极目的唯一的实际方法。……^①

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与巴金的立场有关。巴金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也是通过信奉安那其主义——作为覆盖一切的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鲁迅の印象）^②中提到了鲁迅对巴金的评价：

① 《诗与安那其主义》（*Poetry and Anarchism*）（诗とアナキズム），1938年。该篇收于赫伯特·里德《安那其主义哲学》，引文重译于日译本第63页。——译注

② 角川书店，1970年12月。——译注

……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①

《火》第二部《后记》中写有：

……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还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②

巴金一定亲身意识到了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的自我。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讲，作为现实问题继续发展安那其主义，此乃无可期望，它已失去了活动的基础，已被历史所遗弃。可是，在巴金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时^③，他仍在强调信念。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此时的巴金？巴金本人当然很清楚，坚持这种信念并不说明他将提倡蒲鲁东或克鲁泡特金的学说，这也是办不到的。

对此，我的看法是：尽管巴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者逐步建设社会的过程，但他依然向安那其主义探索现代社会的最后一条活路。巴金在文学上找到了这条道路。

我听说战后巴金在上海开始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④，这让我看到了重新反思与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的巴金。

以上，我以巴金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为焦点展开了论述。第一，通过讨论巴金的信念与信仰的关系，回想起了他的作品中的那些深信人的潜力、为自我

①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8月15日，第1147页。——译注

② 《火》第二部，开明书店，1941年1月，第291页。——译注

③ 《火》第二部《后记》。

④ 《译者序》。《灭亡》，饭冢朗译，云井书店，1951年8月15日，第3—4页。

信念盲目冒进、勇于献身的人物形象；第二，通过思考安那其主义与巴金的紧密关系，看到了他爱憎共处的一种姿态；第三，则是对巴金安那其主义者立场的说明，关于这一点，另有必要举出巴金在中国受到的基本评价。例如王瑶评论巴金的作品意义与局限时说：

……虽然他并不明确地指示青年应走的道路，他的政治思想也不就是中国现实所需要的，作品中又有很浓重的虚无色彩，但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里，一个学校的青年常常受了巴金小说的启发而走上革命。因为他既为作者的热情所吸引，也具有了为大众谋福利的正义感，则当他决定为社会献身的时候，在具体环境里他就不能不走向那巴金所未曾指点过的，真正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和主流。从这种意义讲，他的作品在读者中所发生的效果是积极的，虽然作品本身的思想并不十分正确。……^①

这种说法可以理解。

丁玲下面这句话也常被人引用：

巴金的作品，叫我们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过去的作品去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②

这种评论也可以理解。

下次，我将通过探索巴金怎样展开他的信念，来讨论他的文学观的建立以及他的信念在作品中的反映。

①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9月，第233页。

② 《在前进的道路上》，冈崎俊夫译。（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7月，第175页。——译注）

作品的秩序与

现实社会的秩序*

——以巴金短篇小说

《白鸟之歌》为例

巴金有一部短篇小说，叫做《白鸟之歌》（一九三二年）。在小说中，曾经备受多数青年的敬佩与期待的社会事业家某某，在两次失去亲爱的妻子之后，为了消除悲伤，抛下他唯一的女儿，去欧洲留学。侨居欧洲时，与同是来自中国的富家姑娘亲密来往，归国后依然与她保持着恋爱关系，于是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不再像之前那样热衷于社会事业了。归国后，他的女儿则变得精力充沛，对社会事业更加投入，但父亲与往日截然不同的样子给她带来了悲哀与烦恼。加上富家姑娘与父亲的关系，父女二人之间开始疏远起来。女儿觉得父亲渐渐失去了对她的关怀，深感孤寂。由于这些原因，不久后她开始悲观厌世，在

* 该篇原载《中国文艺座谈会记录》（中国文艺座谈会ノ一ト）第6号，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1955年10月，第1—9页。

一个大雪飞舞的夜晚，跑出家门，企图寻死。通过她这极端的行爲，父亲终于看清了自己的面目，开始反省自己的言行。从此以后，他开始像往常那样献身于社会事业，恢复了女儿所熟悉的父亲的形象。

从作品的统一性来讲，读完这部作品，笔者认为巴金放在故事结尾的女儿陷入绝望深渊、以死明志的情节，带有破坏作品协调的斧凿痕迹；而“将爱情奉为至上，有了爱情，反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父亲得知女儿决心寻死后马上懊悔自己当下的言行，这种行为非但离奇，同时消解了父亲在这部作品中被赋予的必然性。

那么，这部作品的主题是什么？父亲有了情人，把倾注于女儿的爱情全部献给了情人，因此女儿内心深处感到寂寞与苦闷；由于父亲沉湎在恋爱中，不顾工作，因此尽管父女二人住在一起，女儿本身的生存方式——把自己的生存意义建立在社会事业上——也会与父亲的行为互相发生冲突，从而父女间的鸿沟日益加深，使女儿身陷孤独，这反而引起了她对父亲的憎恨。这部作品的主题即在追索这两种因素相互交叉的女儿的心理。如果只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的话，我们应该承认巴金在形象化上所取得的成就；但问题是，巴金为何要在故事结尾，让父亲突然改悔，并为了创造这一转折点而使女儿不自然地抉择一死，故意把起到瓦解作品结构作用的这些情节加了进去？

笔者想从巴金关于他为何创作《白鸟之歌》的表述来讨论这一问题。巴金说：

……譬如说《白鸟之歌》，许多人都知道我是拿某一个上了年纪的友人做模特儿来写的；但我的本意却不是如此简单。我爱护那个朋友，我不愿意他辜负了大家对他的期望，我不愿意他牺牲了过去的一切，去走个人的路[沉湎在恋爱中]。所以我写了这小说来劝他。……^①

^①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爱情的三部曲》，开明书店，1938年11月，第4页。——译注

可见,对于作品的作用巴金事先已有考虑。越出作品的秩序来直接影响现实的秩序,则是巴金赋予作品的作用。如果我们把《白鸟之歌》只理解成一部追索女儿对父亲的行为所感到的苦恼、气愤的作品,那么可以说这部作品始终贯穿着同样的节奏,令人感到协调、统一。这也是笔者所感动、心怀同感之处,但这在故事结尾却突然被打破。这一点应该这样理解:正因为巴金对于作品设定了某种意图,把直接影响现实世界的这种作用作为一种任务赋予作品,因此,这反而变成了巴金不得不背负的债务。探讨《白鸟之歌》自然会明白,尽管巴金已经意识到了这对作品统一性的破坏,可他还是特意选择了这一手法。巴金并没有以毫不瓦解作品结构并与作品渗透为一体的手法表现出他所意图的终极主张,这种缺点我们当然要承认,但不容忽略的是,正因为巴金过度意识到文学作品的评价价值的相对性,所以才把故事引到了这一方向。《白鸟之歌》是极度体现了这一点的例子,笔者从中看到了巴金的文学观的一端。

关于巴金的文学作品的评价价值的相对性,下面以更适于讨论的材料为例,展开详细的论述。巴金发表于一九三四年的散文《几段不恭敬的话》中关于岛崎藤村《新生》的评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巴金首先说,在日本文学家之间很流行把自己与女人的关系直接写在小说里(巴金并没有对作家的现实生活与小说的虚构世界展开严密讨论),接着涉及了《新生》,集中发泄他对小说作者岛崎藤村的气愤:

和自己的侄女暗地发生了关系,又为这关系,感到了良心的责备,而痛悔,于是为避免这苦痛而远游法国。结果为求自己良心的慰安终于不顾自己的哥哥(即侄女的父亲)的劝阻,不顾念到侄女的将来,而将这关系毅然地向世人公布了。岛崎氏固然因《新生》增高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但那位节子姑娘一生的幸福却从此断送了。……^①

^① 署名余一。《太白》第1卷第8期,生活书店,1935年1月5日,第341页。——译注

从巴金的语气即可体会到,《几段不恭敬的话》其实是一篇从芥川龙之介《长江游记》中的一段话——“现代的中国有什么东西呢?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都堕落了吗?尤其是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果真有一件可以自豪的作品吗?”^①——谈起,以气愤不平的语气评述了日本文学与艺术的文章。文中极不成熟的观点、随处可见的不慎、离题的表述令人无法赞同,评论《新生》的角度也令人感到离奇。笔者预想的是《新生》发表后节子这个人物也许会因此受到打击,而巴金却指责藤村如此轻举妄动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巴金根据他评价作品时的价值标准——作品世界的秩序与现实人生的秩序是不容分割的——写下如此评论。这与巴金在《白鸟之歌》结尾不顾作品结构的瓦解而设置不自然的情节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虽说作品是相对性的产物,总要给其他存在带来某种影响,可是只有在把作品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上升为做文学的人的使命,苛求作品须有某些作用的巴金笔下,对《新生》的这种评论才能成立。笔者是这样理解的。

在巴金的作品中,这方面的表述无处不有,我们也常会看到,例如:

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过。大学里有关于文学的种种课程,书店里有种种关于文学的书籍,然而这一切在轿夫仆人中间是不存在的。他们梦想不到会有许多人靠着文学吃饭。……

我写过一些小说,这是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②

这种说法带有一种故作谦虚的傲慢。巴金这样讲,也许是对于一部分人——把所谓现实人生与艺术分开理解——的讥讽与强烈批判所使然。巴金所讲的“这一切在轿夫仆人中间是不存在的”是关键之处,但在字面上则无法理解,下面来附加说明。《家》《奴隶的心》中的轿夫为了替少爷顶罪被关进监狱;

^① 《太白》第1卷第8期,第339页。——译注

^② 《将军》的《序二》。《《将军》,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6月,第6页。——译注)

《杨嫂》中的女仆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我的幼年》中的女仆受人谗害，不好在公馆里生活便上吊自尽，此外还有轿夫们的悲惨生活……由此看来，与那些在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压迫下面挣扎的人们毫不相干的文学作品，至少对巴金来讲，没有存在价值。巴金希望自己的作品最终或多或少能够引导那些人进取向上。巴金的不成熟与急躁或许会受人讥笑，但对于他的意图本身却不能一笑置之。

笔者从巴金的文学观——作品世界应该着重反映、直接影响现实社会——入手，以巴金初期作品中这一倾向最为显著的《白鸟之歌》为例，讨论了主人公被赋予的必然性的消失最终导致作品统一性的瓦解这一逻辑。此外，笔者还要讨论与此相呼应并起到作用的另一个内因，它隐藏在巴金的思想中。

这与巴金怎样理解“恋爱与工作”的比重有关。这里所讲的工作，或指从事革命，或指开展社会事业，总而言之，是以改善社会为目标而展开的活动。还有这里所讲的恋爱，巴金提出的恋爱问题往往是怎样面对恋爱的能量，因此他不会关注恋爱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对于摆脱所有规矩、反抗一切的真诚热情——这也许是瞬间燃起的火焰——巴金是毫不关心的。同时，对于产生于这种能量燃烧过程中的一种不能算是意志的热情——令人超越美、善、恶，最终采取背叛个人意志的行动——巴金也不肯接受。因此，巴金以恋爱为小说题材探索问题时，并没有以热情燃烧之中将会出现的上述可能性为基础，这是次要的；对巴金来说，在把一个人正要散发这种能量时的形象与其尚未进入这种状态前的形象加以比较的过程当中，专注于此人在日常生活中活在某种意义上有所不同的世界，思考其所带给此人外部行动上的变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当巴金以恋爱为小说题材并将其意图形象化时，故事则不得不围绕不连贯的事件展开；也正因为如此，故事的进展需要一种已被固定下来的坚固性格。

巴金以这种方式来关注恋爱。《〈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中关于巴金为何以恋爱为小说题材的解释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我所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写。我并不是单纯地描写着爱情事件的本身；

我不过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①

只有像巴金——由于从这一角度关注恋爱，结果作品往往倾向于所谓目的小说、教训小说——那样主观性较强的作家，才会允许恋爱为伦理服务。同序中的另一句话更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也很知道每日的工作比爱情更为重要……^②

我们不妨以“恋爱与工作”的比重划分得更加清楚的作品《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为例，粗略、简洁地指出各自的模式。《雾》（第一部）的主人公周如水因无法投入革命工作，另加恋爱受到挫折，最终自尽。

《雨》（第二部）的主人公吴仁民在他开始对革命工作产生怀疑时，从这缝隙中萌生了恋爱，他的激情便立刻燃起。这里指的是他与熊智君、张太太之间偶然发生的一场恋爱。吴仁民高呼“到底是恋爱的胜利”，但结局却非如此，而以张太太自尽、他与熊智君悲惨离别告终。当他认识到因质疑革命工作而萌生的恋爱不过是一场游戏时，他选择离开那里。后来，经过悔悟，他转变成一位热诚的革命工作者。

《电》（第三部）汇集了《雾》《雨》中的所有革命工作者，是《爱情的三部曲》的集大成之作。至此，巴金才通过吴仁民表明了他对“恋爱与工作”的看法，但居然是这样一句话：

……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和群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一个罪过。在这一点我们和别的人不能够有什么大的差别。……^③

① 《爱情的三部曲》，第17页。——译注

② 同上书，第17—18页。——译注

③ 同上书，第396页。——译注

个人的幸福来自正常的(?)恋爱,而这种正常的恋爱只有通过从事正常的(?)革命工作才能够得到。由于它不会对工作加以反击,所以也不会成为罪过。笔者通过《爱情的三部曲》,这样理解了巴金的这句话。最后一句“在这一点我们和别的人不能够有什么大的差别”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但这与以一九二七年前后为顶点的所谓“恋爱加革命”的文学主题——恋爱或革命抉择其一——有关。如果某人身为革命工作者但对革命工作没有热情,那么恋爱对他来说当然只能是一种享乐,它必定成为罪过,因此,只有洗心革面从事革命的人才可以谈恋爱。意思是说,只有像后者这样,才能与普通的人(?)一样。笔者如此认真地讨论了毫不出奇甚至会令人觉得可笑的这句话,但这种讨论本身或许应该得到更多的注意。按上述模式来看,巴金通过《电》中吴仁民与李佩珠的关系表现了上述后者的应有形象。二人分别站在领导人的立场,都是献身地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物。条件俱已齐备。我们不妨从吴仁民低声对李佩珠所讲的话来看一看后者最为模范的形象。

……你从黑暗里出现了。……我请求你允许我,暂时在你温暖的怀抱中睡一些时候,休养我的疲倦的身体,来预备新的斗争吧。^①

工作一定要优先于恋爱。这个现象可以追溯到巴金处女作《灭亡》中的一个情节:杜大心虽然迷恋李静淑,但为了工作最终不得不放弃她。这一奇妙的逻辑以及将其形象化而反映于作品的手法,实际上应该说是巴金前期作品的一个普遍特性。

在《白鸟之歌》中,父亲与资产阶级的姑娘沉湎在恋爱中。巴金大体上承认人有这一弱点,但他最终还是恢复了父亲的形象:改悔后像往常那样献身于社会事业。

① 刘西渭《〈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第504页。刘西渭在该处前后谈到《电》及其女主人公李佩珠,因此作者或许为此所迷惑,把该处误解为《电》中的一段,其实这是《雨》第7章中吴仁民对熊智君所讲的话。见《爱情的三部曲》,第211页。——译注

巴金论^{*}

——有关一九三五、三六年前后的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问题

本篇小论，是以一九六三年（昭和三十八年）五月笔者在九州中国学会（于福冈学艺大学）会上以“巴金与安那其主义”为题发表口头报告时的原稿与提交的资料，以及一九六四年（昭和三十九年）十二月在日本中国学会（于庆应义塾大学）会上与秋吉久纪夫共同发表口头报告时提交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论争资料——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试论》（解放後の文学论争资料——中国近

* 该篇原载筑紫女学园短期大学《纪要》第3号，1968年2月，第1—19页。

代文学を理解するための试论)中关于巴金的部分^①为基础,另汇集了后来收集到的资料,以介绍资料为目的写成。

为在论述方面易于阐明巴金的立场,笔者在副题中把时间限定在一九三五、三六年前后(准确地讲是指巴金从日本归来后的一九三五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这是因为,本篇小论将要讨论的巴金关于安那其主义的表态集中在这一时期;此外还有时代背景的问题:左翼作家联盟与第三种人、自由人之间展开“文艺自由论辩”——迫使作家们表明立场——之后,“国防文学论争”接踵而起,涉及支持“中国文艺家协会”还是支持《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问题。

在本篇小论中,笔者主要讨论前者即“巴金关于安那其主义的表态”,并按以下顺序展开论述。

1. 简要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巴金批判是怎样一种运动。因为,这是笔者选定本篇小论主题的主要动机。

2. 主要根据下列几种资料来思考巴金谈到安那其主义的哪些方面(未署名者均为巴金所作)。

a.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写完。

b.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六日。

c. 《我的幼年》,一九三六年八月深夜。

d. 《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作家》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

e. 《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一九三六年九月。

f. 《我的几个先生》,一九三六年九月。

3. 在论述“2”的过程中将涉及小说《电》的取材对象、旅行记《农民的集会》、随笔《纪念憾庐先生》等,简要讨论这些文章与“2”的相关性。

① 中国文学评论社,1964年12月5日,第34—37页。该处由笔者执笔。

二

自一九四〇年十月前后起,巴金连续创作了《静寂的园子》《爱尔克的灯光》等多篇散文。大概从这前后开始,直到小说《还魂草》(一九四二年)、小说《憩园》(一九四四年),巴金的创作风格出现显著变化。后来遭到批判的作品大多创作于这转折期之前。

至今已有很多人指出巴金的作品受到了安那其主义的影响。其实,只要通读小说《灭亡》(一九二九年)、短篇集《复仇》(一九三二年)、小说《爱情的三部曲》尤其是《雨》(一九三三年)等作品便会理解这一点。

例如:巴金在《灭亡》的结尾以赞同的姿态描写了个人恐怖主义;巴金唤起法国生活的记忆,在《复仇》中描写了意大利流亡者、波兰女革命工作者、南俄囚犯等安那其主义者的奋战情形;《雨》的主人公吴仁民因社会运动进展得极不顺利感到焦虑,激情冲动之下说:“像火山那样地爆发罢。毁灭世界,毁灭自己,毁灭这矛盾的生活!”^①正如巴金在《〈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所言,这已经关涉到巴枯宁的说法——“破坏的激情就是建设的激情”^②,等等。

因此,尽管把巴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的报告文学《黄文元同志》(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写完)、《魏连长和他的连队》(一九五三年十月在朝鲜大德山追记)、随笔《越南人》(一九六四年,七月六日,上海)等作品包括在内的“巴金文学”之整体不会成为批判对象,然而,到了五十年代下半期,随着国家建设的推动,社会上逐渐呈现出一种社会主义教育将渗透到工农兵当中、文学运动也将由他们来推展的氛围,至此,在党的政策下,巴金与安那其主

① 《雨》第5章。《爱情的三部曲》,开明书店,1938年11月,第179页。——译注

② 同上书,第512页。——译注

义的关系受到了质问。如今看来,这也许是必然的趋势。

那么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文学的这一层面受到了怎样的理解与评价?一九五八年的巴金批判又是从哪个角度展开的?为了解它的倾向,以下列出几篇论文,并试以“1”“3”“9”为例加以简论。

1. 丁玲《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一九五〇年。《跨到新的时代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七月,第一七一—一七二页。

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二篇《左联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第八章《多样的小说》,开明书店,一九五一年九月,第二三三—二三五页。

3.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第三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三七二—三七五页。

4. 王瑶《论巴金的小说》。《文学研究》一九五七年第四期,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二四—一五四页。

5. 扬风《巴金论》。《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七月号,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第一六四—一八四页。

6.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集体写作《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三期,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十四—五十一页。

7. 李希凡《谈〈雾、雨、电〉的思想和人物》。《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第四期,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四十四—四十九页。

8. 刘国盈、廖仲安《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巴金过去的创作》。《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第四期,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五十一—六十四页。

9.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十二月,(a)第二十一页、(b)第二十七页、(c)第九十七页。

丁玲认为,“巴金的小说正好告诉你革命”^①,所以产生了良好影响。因

① 丁玲《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跨到新的时代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7月,第172页。——译注

此,她承认小说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拥有一定意义。但她又说:

……那种革命[巴金的幻想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中间只有几个又像朋友、又像爱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个名堂来。他们要找领导,不满足于乌托邦、无政府的道路,于是就去找实际的道路,走到革命的队伍里,前进了。^①

可见,丁玲巧妙地抓住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青年们怎样接触巴金文学的一个层面。

刘绶松的评价则更深入,直接指出了巴金信奉安那其主义的问题。

然而《家》(其实是巴金在解放前的所有小说)并没有指给读者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觉慧[《家》的主人公]走出了家庭,这是好的,然而走出家庭又怎样去干呢?我们从书中看不出“答案”来。作者的不正确的非科学的思想信仰(安那其主义)限制住了他。他书中的人物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抗击,实际上都是“个人主义式”的,他们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也缺乏一种作为行动的目的的革命理想。这种情形,构成了巴金内心中的苦闷和悲哀(《雨》中的吴仁民说:“我永远是孤独的,热情的。”这实际上是作者苦闷的自白),也给他的作品涂上了一层感伤忧悒的颜色,而这种感伤和忧悒也就不能不给读者带来一些坏的影响。这应当是巴金作品的一个严重的缺点。……^②

刘绶松的这部文学史,是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③重新确认、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界从而大体上获取方向之后撰写的。这与丁玲对之前关于巴金文学的一般性评价所做的概括又不相同,尽管作者在表面上带有好感,但还是敏锐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到

① 丁玲《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跨到新的时代来》,第172页。——译注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作家出版社,1956年4月,第372—373页。——译注

③ 本次大会于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译注

了这一阶段,我们大致可以预测到一九五八年展开的巴金批判是怎样一种运动。

“9”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对巴金的批判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评价。

(a)

巴金的民主主义思想之所以不彻底,其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所建立的“坚强的信仰”是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的“安那其主义”,也就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①

(b)

……巴金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宣传普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反动思想,把他们说成是“革命的导师”……巴金在《现代》(一九三二年[应为“一九三三年”。——译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我的自辩》中,明确地说:他的一些政治主张是与“在一党独裁(或者如他们所说一阶级独裁制)下面卓越地完成了五年计划的苏联的工农阶级”不一致的。……^②

(c)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火》^③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巴金先生把超阶级的爱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作品中通过人物形象具体化了。从作品中我们看出巴金先生对现实是有些不满的,但因为阶级出身的局限,世界观的局限,看不见社会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同时,也不敢正视它。只是设法尽量回避阶级矛盾,企图用

① 《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第21页。

② 《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同上书,第27页。

③ 《火》第一部,1938—1940年;《火》第二部,1941年;《火》第三部,1943年。小说描写了前线慰问演出团成立后遍历前线的情形及无情的战争,第三部涉及了宗教问题。

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人生哲学去改造这个社会。^①

(b)的后半部是关键部分,下面还会讨论;而该处批判的是:在新兴阶级问题上,巴金举出苏联的工农阶级与西班牙的无产阶级,强调他的政治纲领与后者一致。

“4”王瑶论文与“5”扬风论文均遭到“6”的批判。这种批判也可以从丁玲的说法联想得到,这是因为:对于凡是学生至少都读过的巴金《家》等小说表示认可的态度——尽管小说含有妥协的一面,但也具备了号召青年走向革命的积极意义——或多或少也体现在王瑶与扬风身上。也就是说,该篇所批判的评价方式则是:当我们回顾巴金的立场与创作姿态时,尽管可以从中找出一些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互不相容的因素,但其中同时也含有或多或少要接近终极目的(社会革命)的一面。

三

为了思考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以下围绕“a”《〈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写完)与“b”《〈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展开论述。这是最容易说明问题的方法。

a

……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从十五岁起直到现在我就让那信仰指引我。^②

① 《谈〈火〉》。《巴金创作评论》,第97页。

② 《爱情的三部曲》,开明书店,1938年11月,第54页。

b

……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也曾有过那“立誓献身的一瞬间”。……^①

在这前后时期,巴金完成了代表作《家》、小说《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与其他多部短篇小说,开始执笔创作《春》。然而,在这一年以及开始展开“国防文学论争”的翌年一九三六年,尤其是在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②之后,巴金疯狂地多次以“作家自白”或“短筒”的方式开始表明自己的姿态与立场。在笔者看来,其直接原因则是:徐懋庸在寄给鲁迅的书信——附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开头部分——中谈到巴金,使巴金产生了强烈的反驳心态。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可以说是受社会、文艺界的动向所迫的结果。

巴金过去到底经历了些什么?这使他建立了怎样的信念?他的信念又是什么?^③

据巴金《我的幼年》介绍,正在他开始发现家族是一个专制王国、亲自意识到社会制度之不合理的时候,他阅读了克鲁泡特金《告少年》(*Appeal to the Young*)。巴金这样讲述他读完《告少年》时感到的震撼:

……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用一颗颤抖的心读完它。……^④

① 《爱情的三部曲》,第511页。

② 8月3—6日。《作家》第1卷第5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8月15日,第1138—1150页。——译注

③ 关于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接触以及巴金的信念与信仰的关系,笔者已在拙文《巴金的信念 I》(《中国文艺座谈会记录》[中国文艺座谈会ノ一卜]第4号,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1955年5月)中讨论过,在此仅就与本篇小论相关部分加以说明。

④ 《中流》第1卷第1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5日,第7页。

可见,巴金已对互助论——提倡结合由相互间的爱与理解所蕴育出的具温度的有机体——感到内心澎湃。而在这前后时期,巴金经历了另一件事,即朋友“吴”对他的感化。巴金在《我的几个先生》中说“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随后写道:

……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①

这位姓“吴”的青年,是巴金就读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时的学长,因此,当时他又是秘密结社“均社”的成员之一;他信奉安那其主义,提倡“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工神圣”;为了不只讲漂亮话,而把主义付诸实际行动,他放弃了学业,白天在一家裁缝店里做学徒,晚上来到“均社”专心工作;刊物经费短缺时,竟然会典当衣服来弥补。这样,巴金清楚地看到了把行动建立在信念上的人,他也一定想过自己要做这样的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时,巴金如此回顾往事,讲述了他与安那其主义的接触,说他从此建立了信念^②。这一信念,尽管以安那其主义为中心,但应该说是巴金对

① 《短篇》,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3月,1945年5月再版,第32页。

② 关于从巴金幼年时代(十五岁左右)到1935年(三十一岁)这段时间他与安那其主义的接触,本文将略去不谈。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种角度来思考:

1. 巴金侨居法国期间(1927年2月19日至1928年年底)的经历。这可以通过参照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短篇集《复仇》等作品,并对照随笔与书信来追溯。
2. 一是,芹泽光治良在小说《爱、知、悲》(愛と知と悲しみと)(新潮社,1961年11月)序言中说,巴金常到法国知名安那其主义者世家后代札克·邵可侣(Jacques Reclus)家拜访。书中还说,大逆事件发生后日本安那其主义者石川三四郎脱逃日本,其求助庇护之处也在这里。因此,二是,巴金与石川三四郎的关系,这可以《春月之死》《忆春月》(均为《梦与醉》所收,南国出版社,1960年1月)为线索来讨论。
3. 巴金与曾经赴法的一些中国安那其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1920年前后的“勤工俭学运动”的角度来讨论。
4. 巴金自1934年11月至翌年7月(归国时间有误。见本书所收《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第3章第1节第49页注^⑤)。——译注)侨居日本期间的事情,以及在此期间巴金与日本安那其主义者的来往。例如从古田大次郎的文字谈起。

一种协同社会——大量吸纳了表现在母亲的“爱”、轿夫的“忠实”等说法中的相互间的爱与信赖等因素——的憧憬。因此，哪怕我们把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他的信念也不会被用来组织以生产物资与消费物资归为共有为前提的产业、农业共同体或能够推动它的工人团体，更不会为此向具体行动发展。不能说巴金对他所憧憬的安那其社会完全没有加以构图，但从本质上来讲，面对他所身处的现实社会——内含着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巴金的信念仍然保留着一种几乎出自本能的反抗与批判精神。巴金并没有把“安那其主义”的愿景直接套在一九三五年的中国，这一点单从概观这一年的社会动向即可看出。二月，蒋介石严令“剿匪”，对红军施加压迫。自五月起，签订《何梅协定》，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八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表了《八一宣言》。十一月，红军到达陕西北部。十二月，在北京爆发学生爱国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由此可见，假如我们仅以巴金在这一时期有关安那其主义的表述来思考它与现实的关系，并直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它，那么应该说，在这些社会背景面前巴金的“信念”不得不越发脱离现实。

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解释一九三五年十月巴金说他至今仍在坚持这一信念的含义，以及在随后将讨论的《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巴金说他“到现在还相信着那[安那其]主义”^①的意义？下面集中讨论这一点。

事情的起因是徐懋庸寄给鲁迅的书信^②。徐懋庸在书信中谈到巴金：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③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

① 《作家》第1卷第6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15日，第1364页。——译注

② 徐懋庸的书信附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开头部分，写于1936年8月1日。

③ 浙江人。作家，翻译家。留日学生。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译文》杂志编辑，尤其致力于介绍苏联文学。195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在上海展开文学活动，担任《文艺月报》（后改名为《上海文学》）编辑。生卒年不详，比巴金年少。（黄源生卒年为：1906—2003。——译注）

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①

当时，巴金被指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是不无理由的。例如在几年前的一九三三年，巴金在载于杂志《现代》第二卷第五期的《我的自辩》中如下反驳谷非(胡风)所言“接近新兴阶级底主观”^②，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所谓新兴阶级是单指苏联的工农阶级呢，还是指在 C. N. T.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全国劳工联盟。受安那其主义影响的革命工团主义者组织] 指导下的西班牙的无产阶级呢？后者和前者所要求的政治纲领是两样的。如果谷非先生是单指前者而摈弃后者，那么对于他的好意的劝告，我就只得恭敬地璧谢了。因为我的政治纲领是和后者一致的。^③

言归正传，对于徐懋庸将巴金断定为安那其主义者，巴金本人或多或少也许会抱有反感，但他并没有否定；而巴金在《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中反驳徐懋庸，主要是针对“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以及“中

①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9月，第71页。

② 《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光华书局，1932年12月15日，第116页。——译注

③ 该处未见原文，引自《在日本的中国文人》(来朝中の中国文人)所收冈崎俊夫《巴金》。《中国文学》第2号(目加田诚所藏，合订本)，中国文学研究会，1935年4月5日，第16页。(作者引用的冈崎译稿为巴金《我的自辩》中的一段文字的摘译。全文见《现代》第2卷第5期，现代书局，1933年3月1日，第708页。——译注)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第27页写有：

……巴金在《现代》(1932年〔应为“1933年”。——译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我的自辩》中，明确地说：他的一些政治主张是与“在一党独裁(或者如他们所说一阶级独裁制)下面卓越地完成了五年计划的苏联的工农阶级”不一致的。……

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相反。笔者重视该篇论文不只在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文章表明了巴金对当时他所身处的中国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看法。下面先来关注巴金的反驳内容。

……其实徐懋庸是不会看见什么“中国安那其的卑劣行为”的，因为那种人从来不曾文坛里混过，他们只在一些荒僻的地方沉默地埋头工作。他们不写文章，不办杂志。他们的言行不见于小报。他们的势力固然不大，但他们能够怀着热烈的希望，坚强的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①

巴金又说，徐懋庸所说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卑劣，则是一种诬枉，并谈到他与这些安那其主义者的关系：

……而徐懋庸却说他们卑劣，这“卑劣”两字出于徐懋庸之口大概不是“信口胡说，含血喷人”吧。我想他们自己将来会用事实来答复徐懋庸的“诬枉”的，用不着我来代他们辩解，我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我的言行也和他们没有关系。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我到现在还相信着那主义，而且我对前面提过的那般人也很敬仰……^②

以下资料有助于探索巴金与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来往：

1. 《怀念》所收《忆范兄》^③《纪念憾庐先生》^④《写给彦兄》^⑤《怀圣泉》^⑥等。

① 《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4页。

② 同上。

③ 1941年6月17日夜重庆沙坪坝。《怀念》，开明书店，1947年8月，第9页。

④ 1943年3月桂林。同上书，第31页。

⑤ 1944年8月重庆。同上书，第40页。

⑥ 1946年11月上海。同上书，第88页。

文中谈到的朋友们与作品的背景均在福建泉州,内容时间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前后。

2. 旅行记《农民的集会》^①。一九三三年六月,巴金在朋友的陪同下,用了五天的行程从广州来到人口约有五六千人的村庄(估计在泉州附近),恰好赶上了“农会”。他的朋友活跃于此地。“农会”上讨论的是本区县参议员选举的经过,怎样处理土豪劣绅为入选贿买选票的现象,以及怎样组织“农会”等问题。

3. 小说《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原与《爱情的三部曲》无关,后被放在《爱情的三部曲之三——电》的前面。据《爱情的三部曲》的《新版题记》(一九四三年十月)介绍,在由土匪改编的旅长陈国辉^②统治下的闽南的一座古城(漳州)发生的事件使巴金受到启发,创作了这篇小说。故事本身当然是虚构的^③,但故事中的活跃人物却与巴金的朋友们相似。小说《星》(一九三六年)^④也可以列为同一类。

陈国辉相关资料可参考林憾庐的一篇回想录^⑤,作者是《纪念憾庐先生》中的林憾庐。

此外,关于徐懋庸所说的“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巴金说,法国方面他手边有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的机关报^⑥,所以单从这一点来讲,徐懋庸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随后,

① 1933年6月在广州。《巴金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30—134页。

② 福建南安县人。自任护法靖国军营长起,历任福建自治军泉州卫戍司令部第一统领、讨贼第五独立旅旅长、福建建国军第二师师长、福建陆军第八旅旅长等。党派:国民党。外务省情报部编纂《改订 现代支那人名鉴》,1928年9月30日,第214页。

③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爱情的三部曲》,第45页。

④ 原载夏丏尊编《十年》,开明书店,1936年7月,第119—183页。——译注

⑤ 《逸经》第2期,人间书屋,1936年3月20日,第35—37页。此外,《逸经》第4期(人间书屋,1936年4月20日,第26—29页)载有同一篇回想录的续篇。

⑥ 具体来讲,巴金在文中提到的是 C. G. T. S. R.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Syndicaliste Révolutionnaire,法国革命工团主义总工会)的机关报,见《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4页。——译注

巴金涉及了西班牙的联合战线问题。

徐懋庸倘使不知道在西班牙的革命阵营中什么势力最大,最强,那么他最好不要来谈西班牙的事情。徐懋庸倘使不知道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革命中破坏联合战线的是 C. N. T. 还是 U. G. T.^①,那么他最好不要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事实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九三三年的失败以后第二年 C. N. T. 也还发过一个宣言说明联合战线的必要。C. N. T. 的一个领袖甚至在玛得里的《土地》日报上正式发表了一个对于联合战线的具体的提议。但没有得到预期的答复,不过 C. N. T. 也并不曾因此“反动”过。……^②

对于要扩张抵抗佛朗哥将军的势力以完成西班牙社会革命的 C. N. T. 来说,无论如何都要与 U. G. T. 建立联合战线。但正如巴金所言,C. N. T. 与 U. G. T. 的统一问题却也有它复杂的一面。一九一九年,在第二次 C. N. T. 大会上,有关与 U. G. T. 统一的提议被否决,反而出现了应该吸收对方的提议。而在一九二〇年,C. N. T. 则强调反对统一。不言而喻,这背后当然隐藏着双方在政策上的差异以及在势力扩张上的问题。假如从 U. G. T. 的立场来讲,可以举出土地改革问题。然而,由于革命战线紧迫,一九三四年三月,C. N. T. 与 U. G. T. 还是签订了协议。

那么在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怎样评价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引用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F. A. I., Federación

①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劳工总会。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工会。除此之外,另有以下组织:
1. F. A. I.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 2. P. S. O. E.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3. P. C. E.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西班牙共产党; 4. P. S. U. C.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5. P. O. U. M.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不同立场的革命共产党。见弗农·理查兹(Vernon Richards)《西班牙革命的启示》(スペイン革命の教えるもの), 远藤斌译, 自由思想研究会, 1960年8月1日, 第6页。

② 《作家》第1卷第6号, 第1365页。

Anarquista Ibérica)领导人山提颜(Diego Abad de Santillán)的一段话来了解这一点:

作为安那其主义者,我们要对抗一切独裁,无论它是民族的还是政党的。我们要对抗政府的极权主义形态,我相信我国人民将来所指向的,应该是把地域社会——对于建设阶级特权不存在的社会是意见一致的——各个层面的共同活动结合起来的社会。……^①

这是山提颜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内部人士的讲话,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建立西班牙的联合战线的姿态。巴金的姿态也与此相近。

之后,巴金再次触及了联合战线问题,并强调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蒙受了“诬枉”。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或者在徐懋庸写那封“私信”[徐懋庸寄给鲁迅的书信]的时候,C. N. T. 领导的一百二三十万的劳动者和在 F. A. I. 的旗帜下团结的五万革命分子正在西班牙南北两路的各前线上为人民阵线流血战斗。靠了他们,西班牙的自由才能够保持到今天。他们是佛朗科将军所最憎恨的死敌。倘使他们一旦改变心意,真的听从了徐懋庸的吩咐,去“破坏联合战线”,那么佛朗科将军的铁骑早已踏遍伊比利亚半岛了。……^②

为了反驳西班牙“‘安那其’之反动”这种说法,巴金还谈到了 C. N. T. 领导人之一阿斯加索(Francisco Ascaso)的阵亡^③。其实,一九二七年巴金在巴黎留学期间就已经知道这个人物,当时,阿斯加索、杜鲁底(Buenaventura Durruti)、

① 这是1937年7月,山提颜在召开于巴伦西亚的地方委员会总会上的发言。弗农·理查兹《西班牙革命的启示》,第168页。

② 《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5—1366页。

③ 此事发生在1936年7月19日清晨,他们成功地防御了以巴塞罗纳守备部队为首的军队叛乱之际。

何威尔(Juan García Oliver)三位西班牙流亡者被捕,消息见报后知识分子与工人们集体表示抗议。一九三一年,西班牙革命爆发后,三位流亡者与其他同志一同回到西班牙参加革命。由于是巴金所熟悉的人物,所以他极力称赞“他是为西班牙的自由的第一批殉道者中最光荣的一个”^①,说徐懋庸的说法实是误判。

大概在发表《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一个多月后,巴金在《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中再次谈到该篇,结束了他对徐懋庸的反驳:

……我和徐懋庸并无私人的恩怨,……我写文章“答徐懋庸”不过是出来为那些在西班牙人民解放战场上牺牲的英勇斗士辩诬,替那少数沉默地工作着的“中国安那其”伸冤……^②

四

读完巴金反驳徐懋庸的这些文字,笔者发现巴金通过讲述西班牙与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者的活动,直接表明了他对当时的中国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看法。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在巴金对西班牙的联合战线问题的深入探讨之中。在笔者看来,巴金是从上面所讲的我立场来思考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出的问题。这与鲁迅在信中对萧军说现在不必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③的言外之意有雷同之处,而巴金也一定自信自己站在这一方。鲁迅这

① 《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6页。

② 《中流》第1卷第3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10月5日,第170—171页。

③ 《致国内人士书信 摘录》(中国人宛书简抄)(1935年)(《鲁迅选集》第12卷所收,松枝茂夫译,岩波书店,1956年10月7日)第191页的译注为“文艺家协会”,但该处应为“左联”,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1页。下同。——译注

样对萧军说(该信是关于是否应该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事,萧军通过胡风向鲁迅征求意见后,鲁迅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寄给胡风的复信):

……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面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

……我确信我是对的。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划成绩好。……^①

通过该信,鲁迅具体地表明了他对左翼作家联盟宗派主义的态度。尽管巴金的观点与鲁迅不同,但估计这也正是巴金的姿态。

从中国的社会动向来看,巴金所建立的信念无论怎样都无可期望。尽管如此,巴金仍旧站在安那其主义的立场上发言,是因为面对徐懋庸等人的封闭性倾向,巴金要求建立一条更有效的统一战线。正是安那其主义的本质性因素决定了巴金的这一姿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① 《致国内人士书信 摘录》(中国人宛书简抄)(1935年)。《鲁迅选集》第12卷所收,松枝茂夫译,岩波书店,1956年10月7日,第191—192页。见许广平编《鲁迅书简(下册)》,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0年12月,第946—948页。

巴金与西班牙内战(上)

——关于巴金写于一九三六年

九月的《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

联合战线》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 1890—1939)作为外科医生参加西班牙人民阵线,六个多月后归国;接着,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前往中国。这时,他向前妻弗朗西丝(Frances Penny)写信道别:

……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的一部分。我觉得他们才是最需要我的,所以我要去中国。……^①

* 该篇仅有上篇,原载《野草》第8号,中国文艺研究会,1972年8月,第26—35页。

① 泰德·阿兰(Ted Allan)、赛德奈·戈登(Sydney Gordon)《伟大的一生》(伟大なる生涯),浅野雄三译,东邦出版社,1965年12月5日,第153页。(该处重译于日译本。汉译本可参考:《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巫宁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0月,第201页。——译注)

可见，白求恩把与当时即将崛起于世界的法西斯统治势力相互对峙的西班牙与中国同等以视。

本篇小论将涉及的时间范围是：从大概一年半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成立，至鲁迅去世之前的十月初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①。

王任叔、艾思奇、立波、茅盾、郭沫若、洪深、徐懋庸、唐弢、许杰、陈子展、张庚、傅东华、梅雨、郑伯奇、郑振铎、赵景深、叶圣陶、叶紫、臧克家、欧阳予倩、谢冰心、丰子恺、魏金枝、关露等一百一十一人联名在上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②。数日后，鲁迅、巴金、曹禺、张天翼、靳以、曹靖华、田间、鲁彦、陆蠡、东平、叶籁士、黎烈文、以群、胡风、草明、萧军、孟十还、萧红、周而复、欧阳山、黄源、周文、葛琴等六十三人联名成立另一个组织，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③。（为双方署名者有：马宗融、方光寿、赵家璧、丽尼、荒煤、芦焚、辛人、马子华八人。）

前者《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中写有“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④；后者《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中写有“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⑤。可见，双方都带着迫在眉睫的紧张气氛来面对日本的侵略与压迫，分别呼吁中国文艺界要集结力量，以获取“民族解放”（前者）与“民族自由”（后者）。

事实证明，此时两个组织已经成立。自是年年初起，国防文学论争正式展开，正在讨论“统一”问题，而在两个组织成立后，这场论争变得更加激烈。

本篇小论将要讨论的是：身处于中国文艺界的这一趋势当中，作家巴金怎样认识、如何面对“统一”问题。笔者在副题中举出了巴金《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

① 《文学》第7卷第4号，生活书店，1936年10月1日，第744页。——译注

② 《光明》第1卷第1号，生活书店，1936年6月10日，第68—69页。——译注

③ 《现实文学》第1期，中国图书杂志公司，1936年7月1日，第160页。——译注

④ 《光明》第1卷第1号，第68页。——译注

⑤ 《现实文学》第1期，第160页。——译注

牙的联合战线》^①，意思是说就这一主题展开论述时该篇是主要资料；而把文章标题定为《巴金与西班牙内战》，也是因为巴金讲述西班牙内战中安那其主义者的动向及联合战线问题——即该篇的焦点——的姿态，可供我们探索巴金怎样认识、如何面对中国文艺界的“统一”问题。为此，笔者将讨论以下四个层面，并附结语。

1. 副题所举巴金《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一文，原是巴金针对徐懋庸在寄给鲁迅的书信中涉及“统一”问题同时攻击巴金的文字加以反驳的文章。这既是本篇小论的出发点，又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因此，先来介绍文章内容并加以简要解说。

2. 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组织与巴金的连带感，以及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接触。

3. 巴金《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一文与西班牙内战中联合战线的实际问题之间的相异点。

4. 巴金与《光明》——该刊一般被称为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机关杂志——分别如何评价西班牙内战，就此加以对比。

—

事情的起因如下。

徐懋庸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寄给鲁迅的书信^②中谈到巴金：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

① 《作家》第1卷第6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15日，第1362—1368页。

② 附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8月3—6日)的开头部分。《作家》第1卷第5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8月15日，第1138—1140页。

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译文》编辑]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①

在巴金看来，徐懋庸所说的“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与事实相反，于是在《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中予以反驳。

首先，关于“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巴金的辩白如下：

……其实徐懋庸是不会看见什么“中国安那其的卑劣行为”的，因为那种人从来不在文坛里混过，他们只在一些荒僻的地方沉默地埋头工作。……他们的势力固然不大，但他们能够怀着热烈的希望，坚强的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而徐懋庸却说他们卑劣，这“卑劣”两字出于徐懋庸之口大概不是“信口胡说，含血喷人”吧。……^②

关于巴金所说的怀着“希望”、“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着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我们可以通过巴金的以下几篇文章来讨论：回忆录《忆范兄》（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夜重庆沙坪坝）、《纪念憾庐先生》（一九四三年三月桂林），旅行记《农民的集会》（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广州），小说《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等。

在一九二九年前后，中国安那其主义者曾以匡正社会为目标，在福建泉州附近的农村展开过一种实验性的活动。“范兄”是当时的活动家之一，他身患肺结核但仍旧献身工作。他曾经翻译过进化论方面的著作，同时又是学者。“憾

^① 《作家》第1卷第5号，第1139页。——译注

^② 《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4页。——译注

庐先生”也是与“范兄”在同一时期一起工作过的朋友，他还是巴金长篇小说《火》第三部中的宗教家“田惠世”的原型。《农民的集会》记录了巴金的朋友们活跃在福建南部农村的情形，描写了应该怎样处理土豪劣绅在本区县参议员选举中贿买选票的现象，以及怎样组织“农会”等问题。关于小说《雷》，据《爱情的三部曲》的《新版题记》（一九四三年十月）介绍，在由土匪改编的旅长陈国辉^①统治下的福建南部的一座古城发生的事件使巴金受到启发，创作了这篇小说。故事本身当然是虚构的，但可以看出，故事中的活跃人物却与巴金的这些朋友们性格相同。也许巴金一边回想这些中国安那其主义者，一边强调徐懋庸的说法是诬枉。

……我想他们自己将来会用事实来答复徐懋庸的“诬枉”的，用不着我来代他们辩解，我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我的言行也和他们没有关系。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我到现在还相信着那主义，而且我对前面提过的那般人也很敬仰，但其实我已经失掉了这个资格，我这几年来离开了实际运动的阵营，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稿纸和书本上消磨生命。……^②

随后，巴金开始讨论“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首先是关于法国安那其主义者。巴金说，单从他手边的 C. G. T. S. R.^③ 机关报所载 C. G. T. S. R. 书记伯拿与 C. G. T.^④ 书记石屋（Léon Jouhaux）的书信来往即可看出徐懋庸的说法是对无辜之者的一种诬陷。如此简要指出后，巴金随即进入本题，即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的联合战线问题。

① 福建南安县人。自任护法靖国军营长起，历任福建自治军泉州卫戍司令部第一统领、讨贼第五独立旅旅长、福建建国军第二师师长等。（外务省情报部编纂《改订 现代支那人名鉴》，1928年9月30日，第214页。——译注）

② 《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4页。——译注

③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Syndicaliste Révolutionnaire，法国革命工团主义总工会。

④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法国总工会。

徐懋庸倘使不知道在西班牙的革命阵营中什么势力最大,最强,那么他最好不要来谈西班牙的事情。徐懋庸倘使不知道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革命中破坏联合战线的是 C. N. T.^① 还是 U. G. T.^②, 那么他最好不要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事实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九三三年的失败以后第二年 C. N. T. 也还发过一个宣言说明联合战线的必要。C. N. T. 的一个领袖甚至在玛得里的《土地》日报上正式发表了一个对于联合战线的具体的提议。但没有得到预期的答复,不过 C. N. T. 也并不曾因此“反动”过。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的革命中 C. N. T. 和 U. G. T. 的联合战线成立了,产生出很大的效果,但革命终于失败,两个团体的斗士大批地死在战场上,殉道者中有着 C. N. T. 的领导者马地涅斯(一个著名的安那其工团主义者)。^③

接着,巴金又从“但有一事实却是任何的‘诬枉’所不能够推翻的”讲起,指责徐懋庸的言论使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蒙受“诬枉”。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或者在徐懋庸写那封“私信”^④的时候,C. N. T. 领导的一百二三十万的劳动者和在 F. A. I.^⑤ 的旗帜下团结的五万革命分子正在西班牙南北两路的各前线上为人民阵线流血战斗。靠了他们,西班牙的自由才能够保持到今天。他们是佛朗科将军所最憎恨的死敌。倘使他们一旦改变心意,真的听从了徐懋庸的吩咐,去“破坏联合战线”,那么佛朗科将军的铁骑早已踏遍伊比利亚半岛了。……^⑥

①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全国劳工联盟。安那其主义者的工会。

②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劳工总会。社会民主主义式工会,深受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影响。西班牙工人阶级大致可分为社会党、安那其主义者、共产党的三方阵营,但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共产党的相关组织与前两者相比,还未能充分扩展势力。

③ 《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5页。——译注

④ 徐懋庸于8月1日寄给鲁迅的书信。

⑤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

⑥ 《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5—1366页。——译注

此外,巴金还举出了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阿斯加索(Francisco Ascaso)、杜鲁底(Buenaventura Durruti)、山提颜(Diego Abad de Santillán)的名字,以反驳徐懋庸所说的西班牙“‘安那其’之反动”。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成立,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 Díaz)^①组成新内阁。然而,莫拉(Emilio Mola Vidal)将军^②、佛朗哥将军等人领导武装起义,为打倒人民阵线政府于七月十七日发动军事政变,西班牙内战爆发。阿斯加索在两天后的七月十九日清晨,为防御巴塞罗那守备部队等正规军的叛乱而阵亡。在文章中,巴金从阿斯加索的阵亡谈起,回顾了一九二七年他在巴黎留学时,阿斯加索、杜鲁底、何威尔(Juan García Oliver)三位西班牙流亡者被捕,之后在人权协会、流亡者权利防护委员会的援助以及各国工人的抗议之下获释的情形,并称赞“他是为西班牙的自由的第一批殉道者中最光荣的一个”^③。巴金早在巴黎留学时就熟悉阿斯加索这个名字,正因为如此,阿斯加索的死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④。巴金还谈到了杜鲁底(C. N. T. 领导人)与山提颜^⑤分别代表各自的组织,与 U. G. T. 以及 P. O. U. M. ^⑥的代表等共同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军中央委员会^⑦,试图证明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并非“反动”,相反还积极支持联合战线的建立。

最后,巴金把话题转移到中国文艺界的“统一”问题上,以作结语:

① 原为法学家。组织共和党,领导左派共和主义者,同时联合社会党。

② 在佛朗哥将军得势之前,他是军事方面的中心人物。

③ 《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6页。——译注

④ 阿斯加索与杜鲁底二人当时在巴黎经营了一家安那其主义方面的书店。

⑤ F. A. I. 领导人。巴金说他在1928年收到过山提颜的一封信。

⑥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该处原文为“P. M. U. (马克思主义统一党)”,估计是 P. O. U. M. 的笔误。该组织被西班牙共产党称为托派。

⑦ 1932年9月,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通过,建立了单独的议会。1936年7月17日正规军叛变后,该委员会立即成立。(Comitè Central de Milícies Antifeixistes de Catalunya。巴金在文中译为“加泰隆尼亚自治省革命防卫委员会”,见《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7页。——译注)

……我是很赞成联合战线的；不过“文艺家协会”有着徐懋庸那样的人做理事，纵然加我以任何可怕的罪名，我也不会加入。因为破坏统一战线的并不是我，倒是他了。他写给鲁迅先生的“私信”和西班牙斗争的进展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吗？^①

二

巴金试图通过 C. N. T. 与 U. G. T. 两大西班牙工人(包括农工)组织间的关系来说明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并没有破坏统一战线。当然，巴金是站在安那其主义者组织 C. N. T. 的立场上做出了这种评价。由于论述的关系，下面需要对 C. N. T. 加以简要解说。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C. N. T. 成立于一九一〇年十月。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时，据说联盟已经拥有大概一百万成员^②。C. N. T. 中还有许多工人不是安那其主义者，但他们无时不受到安那其主义者的领导人的全面统制。另外，安那其主义者活动家于一九二七年建立的秘密组织 F. A. I. 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加入了 C. N. T.，为把 C. N. T. 变成社会革命组织，他们已经展开了活动。C. N. T. 拥有最强大势力的地区是工厂工人较多的东北部加泰罗尼亚，以及南部农村地带的安达卢西亚；除此之外，其拥有局部势力的地区有中部马德里，萨拉戈萨地区(加泰罗尼亚西部)，北部钢铁地带的阿斯图里亚斯等地。

如果我们试图把该组织定位在真正要实现安那其主义的“运动”之历史当中会发现，它一般被视为 Anarcho-syndicalist 所组织的工会。法语“syndicat”即“工会”之意，“anarcho”即“无政府的”之意，意思是说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① 《作家》第1卷第6号，第1368页。——译注

② 关于联盟成员人数，详见弗农·理查兹(Vernon Richards)《西班牙革命的启示》(スペイン革命の教えるもの)，远藤斌译，自由思想研究会，1960年8月1日，第49页。巴金认为联盟成员有一百二三十万人(见上述引文)，统计各有出入。

所组织的工会。如果按照词典的方式来解释,意思则是:否定权威、提倡个人自由结合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工会之结合体,要求以罢工等直接行动来实现无政府、无阶级社会;它重视工会般的经济组织,由此组成共同体来调整生产与消费,以自治为原理排除中央集权管理。当然,这不过是目标而已,直接用来理解 C. N. T. 的实际情况则不为妥当。对于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巴塞罗那工人自己管理工厂、各地区农民组成共同体的这些短暂的经验,也是可以这样评价的。从整体上来讲,应该说 C. N. T. 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存在意义具体表现在:在安那其主义者的领导下毫不妥协地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展开斗争的这种充满热情、勇于献身的姿态上面。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组织的工会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的工人运动受到上述法国 C. G. T. 等组织的极大影响,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却只剩下西班牙的 C. N. T. 。

关于巴金与 C. N. T. 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巴金谈到 C. N. T. 就推断他与 C. N. T. 之间有某些特殊的关系,这是不对的。这在下面(引言所言之“3”)还会讨论,但如果预先下结论的话,可以把巴金与 C. N. T. 的关系理解为信奉安那其主义的一个中国的同路人从 C. N. T. 感觉到的精神上的连带感,这样讲会妥当些。这里面也包含了以下因素:例如巴金对当时仍有强大影响的唯一存在即安那其主义者组织 C. N. T. 的某种期待,以及巴金本人的个别理由——如巴金在《一篇真实的小说》^①中的述怀,说他时时挂念着他所敬爱的加泰罗尼亚的朋友。巴金认为,西班牙内战时,C. N. T. 由于反对佛朗哥才提倡建立联合战线。以信奉安那其主义自居的巴金,直接把 C. N. T. 的动向投射在他自己的姿态上面,表明了他在中国文艺界中的立场。

借此机会,笔者想对巴金站在 C. N. T. 一方发表言论的基本姿态的背景,即巴金接触安那其主义的经过加以简要介绍。

一九一九年,十五岁。在此前后,阅读了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以及北京大

① 《大公报》副刊《文艺》第 220 期,1936 年 9 月 23 日。

学安那其主义者组织“实社”创办的《实社自由录》第一集所收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 1869—?)^①的《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结婚与恋爱》等;此外还订购成都安那其主义者组织“适社”的宣传性刊物。

一九二〇年,十六岁。与四位朋友成立“均社”,参与杂志《半月》的出版工作,通过该刊介绍 IWW^②。后因杂志被查禁,新创办周刊《平民之声》,共发行九期,最后一期为《师复纪念号》。

一九二三年,十九岁。春天,与三哥(李尧林)离开成都赴上海。秋天^③,二人一同考入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

一九二四年,二十岁。收到爱玛·高德曼鼓励他的书信;编写大杉荣(一八八五—一九二三)年谱。

一九二五年,二十一岁。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患轻度肺结核,为治疗,迁居上海。在此前后,学习世界语,翻译蒲鲁东《财产是什么?》(巴金在这一时期的译作多为摘译)。

一九二六年,二十二岁。翻译爱利赛·邵可侣(Élisée Reclus, 1830—1905)《近代劳动运动中的议会活动观》^④、马拉铁司达(Erriico Malatesta, 1853—1932)《科学与无政府主义》,撰写关于古田大次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被处以死刑)的文章。古田大次郎的相关文章有《关于〈死之忏悔〉》(一九三七年四月)。

一九二七年,二十三岁。一月十五日,起身赴法。航海途中整理苏菲亚·佩罗夫斯卡娅(Sophia Perovskaya, 1853—1881)的传记。二月十九日,到达巴黎,在拉丁区租下一间屋子住了下来。常到巴黎的邵可侣家^⑤拜访,这里据说是

① 高德曼毁于1940年。——译注

②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③ 入学时间有误。见本书所收《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第3章第1节第49页注①。——译注

④ 该篇作者为若克尔(Rudolf Rocker, 1873—1958)。——译注

⑤ 当时,邵可侣家的主人是扎克·邵可侣,上述祖父爱利赛·邵可侣是国际知名的地理学家、安那其主义者。

安那其主义者常来探访之处。又与奈特劳^①的组织通信,得到安慰与鼓励。另又给凡宰特——因萨柯(Nicola Sacco, 1891—1927)凡宰特(Bartolomeo Vanzetti, 1888—1927)事件而闻名——写信,并收到复信。初夏,因身体欠佳,遵守医生的嘱咐,迁居马恩(Marne)河畔小城蒂埃里堡(Château-Thierry)。开始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踏上归途^②。

一九二九年,二十五岁。如上所述,来到泉州附近的农村,与安那其主义者来往。

此后,巴金就没有再与展开实际活动的安那其主义者一起行动。从此以后,他站在同路人的立场上,继续从事写作。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迫使所有作家对中国社会、文艺界的动向表明他们的立场,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就巴金而言,以下资料与本篇小论主题有关。

一九三三年,巴金在载于杂志《现代》第二卷第五期的《我的自辩》中如下反驳谷非(胡风)所言“接近新兴阶级底主观”^③:

这所谓新兴阶级是单指苏联的工农阶级呢,还是指在 C. N. T. 指导下的西班牙的无产阶级呢?后者和前者所要求的政治纲领是两样的。如果谷非先生是单指前者而摈弃后者,那么对于他的好意的劝告,我就只得恭敬地璧谢了。因为我的政治纲领是和后者一致的。^④

① Max Nettlau, 1865—1944, 安那其主义文献学学者,以《安那其主义的历史》闻名于世。

② 归国时间有误。见本书所收《巴金与安那其主义》附录二第 132 页注③。——译注

③ 《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文学月报》第 1 卷第 5、6 期合刊,光华书局,1932 年 12 月 15 日,第 116 页。——译注

④ 该处未见原文,引自《在日本的中国文人》(来朝中の中国文人)所收冈崎俊夫《巴金》。《中国文学》第 2 号,中国文学研究会,1935 年 4 月 5 日,第 16 页。(作者引用的冈崎译稿为巴金《我的自辩》中的一段文字的摘译。全文见《现代》第 2 卷第 5 期,现代书局,1933 年 3 月 1 日,第 708 页。——译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 12 月)中的一段话证实了这一点。(见该书第 27 页。——译注)

南京时期的巴金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三年秋天^①，巴金与三哥（李尧林）^{〔注1〕}一同考入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住在南京北门桥附近^②，约有一年半时间是从这里去学校。毕业^③

* 这篇原载《九州中国学会报》第23卷，九州中国学会，1981年5月，第64—74页。

① 入学时间有误。见本书所收《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第3章第1节第49页注①。——译注

② 巴金《纪念我的哥哥》（1946年5月上海。《怀念》，开明书店，1947年8月）第68页写有：“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春雷》第3期（真社，1924年5月1日）第107页载有《芾甘启事》，通信地址为“南京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但不知该地址是搬家前的还是搬家后的。

③ 《巴金自传》（自力出版社，1955年9月。1934年，第一出版社擅自将巴金《片段的回忆》改题为《巴金自传》出版）第102页写有：“我离开成都后便在南京读了一年半的中学，在东南大学附属高中里毕业了。我在中学正式读书，就只有这一点时间。”

后,巴金与三哥告别,赴北京^①。《南京时期的巴金(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这一标题,是根据巴金在这一时期表明志向的文字,他的诗歌、译作,以及他所投稿的杂志、他的生活环境、他所关注的日本报刊(《劳动运动》)等因素定下的,只希望在勾勒巴金当时的形象时多少能够有所突破。

笔者撰写本篇小论时主要使用的资料如下(A—D):

A. 在巴金写于这一时期的文章中笔者已经找到的有:

a. 杂志《春雷》:

1. 《芾甘启事》。《春雷》第三期,真社,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第一〇七页。
2. 芾甘《悼橘宗一》。同刊第三期,第一〇〇—一〇二页。
3. 芾甘《伟大的殉者》。同刊第三期,第一〇二—一〇三页。

4. 东京安那其主义者《东京安那其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芾甘译。同刊第三期,第一〇五—一〇七页。

5. 芾甘《大杉荣著作年表》。同刊第三期,第一〇八—一一二页。

b. 杂志《惊蛰》:

日本东京劳动运动社《一九二三年日本大震灾中日本政府军阀及反动党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攻击》,芾甘译。《惊蛰》第一期,真社,一九二四年(月日不详),第九—十二页。

B. 在巴金写于这一时期的文章中笔者已通过目录等掌握清楚但实际上还没有找到的有:

① 巴金《忆鲁迅先生》(《人民文学》第1卷第1期,1949年10月25日)第60页写有:“1925年8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因了病我没有进过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

杂志《民钟》^①：

以下所列篇目均选录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七〇四—七〇六页所载杂志《民钟》目录。

1. 芾甘《大杉荣年谱》。《民钟》第一卷第九期，民钟社，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

2. 芾甘《“欠夹”——布尔雪维克的利刀》。同刊第一卷第十期《援俄在狱革命党人专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3. Goldman《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Maria Spiridonova, 1884—1941]的迫害事件》，芾甘译。同刊第一卷第十期《援俄在狱革命党人专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4. 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 1870—1936]《俄罗斯的悲剧》，芾甘节译。同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七月。

C. 关于巴金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状况的文章有：

巴金《纪念我的哥哥》，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海。《怀念》，开明书店，一九四七年八月，第六十八—六十九页。或见《巴金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月，第五三一—五三二页。

^① 在安那其主义刊物中，《民钟》是发行时间较长的一种。该刊于1922年7月1日创刊，1927年7月25日停刊，先后出版两卷，共二十三期。第2卷第1期（1927年1月25日）之前在广东新会出版，之后改迁上海出版。该刊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格拉佛（Jean Grave, 1854—1939, 法国安那其主义者）、大杉荣、爱玛·高德曼等人的文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第242页关于《民钟》发行地点的说明为：“2卷4期以前在广东出版，以后改迁上海出版。”——译注）

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12月）介绍，上海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较为完整地收藏了杂志《民钟》，但经确认则发现现仅藏有1927年之后出版的部分，因此笔者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本篇小论所需要的部分。至于1927年之后出版的部分，其中与巴金相关的资料，笔者已经保存了复印件。

D. 巴金谈到他在这一时期收到爱玛·高德曼的书信的文章有：

巴金《信仰与活动》。《水星》第二卷第二期，文华书局，一九三五年五月，第一一五页。或见《忆》，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八月，第一一四——一五页。

笔者曾将五百页左右的原稿^①以《巴金与安那其主义》为题汇集成西南学院大学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十四号，已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出版。该书第三章《从成都到上海》第一节《上海、南京、上海》与第二节《巴金与爱玛·高德曼》的部分文字谈到了南京时期的巴金，因此，本篇小论尽量避开了内容上的重复，以新资料为中心汇集而成。

二

首先以巴金在南京时期明确表明志向的《芾甘启事》为例展开论述。

“芾甘”为巴金的字，“启事”是登在报刊上的广告、联络事项、通知、问候。《芾甘启事》的内容如下：

芾甘启事

我欲考究安那其主义者在中国运动的成绩，故拟搜集历年所出版之关于此主义的书报，同志们如有此类书报（不论新的旧的）望赠我一份，如要代价者，可先函商。来函请寄南京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②

这些文字不必特加解释，但如要附带说明的话，意思大概是：通过大量阅读

^① 指日本的稿纸，每张二十字×二十行。——译注

^② 《春雷》第3期，第107页。

以前出版的著作与报刊,巴金想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总结、有系统地去掌握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由此还可以发现,通过客观观察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巴金已经具备了建立自我主体性的意识。

自五四运动时期至一九二三年春天这段时间,巴金参与了三种杂志(《半月》《警群》《平民之声》)的出版工作,并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注2]。除此之外,巴金还成立了倾向于安那其主义的组织“均社”,同时加入带有同一倾向的组织重庆“适社”。巴金在《我的幼年》^①第八页回顾往事说“我被人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是从这时候起的”,这也是因为当时他正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

有一份资料涉及了巴金等人在当时成都学潮中所展开的活动,引如下,以作旁证。

张秀熟在《五四运动在四川》^②第一七三页中写道:

在青年学生向各种主义摸索的当中,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无政府主义信仰者了。其骨干是巴金、张拾遗、吴先忱等人。他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出版了《半月报》,在这个报查封后,又出版了《平民之声》,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此外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只在一些节日张贴点小标语传单,因此影响不大。……

由于笔者没有把握说自己已经充分地掌握了当时成都学潮的情况,因此反而不能完全置信这份资料。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认为该文大致没有逸出要点。

不管怎样,离开成都赴上海、南京,向杂志投寄《带甘启事》以表明志向,这些举动可以说明:与前一阶段即成都时期相比,此时巴金对自己的重生与新发展已经有了志向。

还有一件事情与《带甘启事》同样对于这一时期的巴金极为重要:巴金来到

① 《中流》第1卷第1期,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9月5日。

② 《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59年4月。

南京后与爱玛·高德曼通信,并初次收到她的书信。

巴金曾在五四运动时期读过《实社自由录》^①第一集所收高曼女士《爱国主义》(超海译)及高露曼女士《无政府主义》(霜译)。后来,巴金在《我的幼年》^②第八页中写道:“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说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时候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

对巴金来说,爱玛·高德曼是先驱之一。巴金就是从这位先驱那里初次收到了书信。

《信仰与活动》^③第一一三——一四页介绍了该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爱玛·高德曼]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出了活动的革命家来。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智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

巴金收到这封书信,一定感到“正合我意”,可以说,该信替当时的巴金说出了他的心情,同时给予他鼓励与勇气。

关于当时他收到爱玛·高德曼的书信一事,巴金回忆说:“高德曼曾经被我

① 1917年5月,以太侔、震瀛(袁振英)、竟成、超海等人为发起人,在北京大学内成立了实社。7月,创办《实社自由录》。编辑组有黄凌霜、区声白、震瀛(袁振英)、华林等人。系安那其主义不定期刊物。1917年7月发行第1集,1918年5月发行第2集。

② 《中流》第1卷第1期。

③ 《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原载《水星》第2卷第2期,文华书局,1935年5月,第114—115页。

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①，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②

巴金与三哥兄弟二人在南京的生活并不悠闲自在。生活费当然要依靠大哥(李尧枚)来接济，而生活本身应该说是苦读寒窗。巴金在《纪念我的哥哥》第六十八页谈到当时的生活状况：

……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
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

巴金又在《纪念我的哥哥》第六十九页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

尽管巴金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但他还是心怀《芾甘启事》所体现的决心及爱玛·高德曼的书信对他的鼓励；通过写作行为，他表现了其之成果。

三

本篇小论第一章节介绍了巴金写于这一时期的文章中笔者已经找到的几篇，即杂志《春雷》^{〔注3〕}所载五篇、杂志《惊蛰》所载一篇、杂志《民钟》所载四篇。由于笔者实际上还没有找到杂志《民钟》所载文章，在此将这一部分略去不谈。

下面重新列出杂志《春雷》、杂志《惊蛰》所载文章的篇目：

1. 《芾甘启事》。
2. 芾甘《悼橘宗一》。

① 《将军集序一》，1933年9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2集，开明书店，1936年4月，第39页。

② 《信仰与活动》。《忆》，第114页。

3. 蒂甘《伟大的殉者》。
4. 东京安那其主义者《东京安那其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蒂甘译。
5. 蒂甘《大杉荣著作年表》。
6. 日本东京劳动运动社《一九二三年日本大震灾中日本政府军阀及反动党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攻击》，蒂甘译。

除了“1”之外，假如我们知道“3”《伟大的殉者》是指大杉荣，即可通过这些篇目推测出这些文章的取材对象大致是什么。

不言而喻，这些文章全部取材于发生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关东大地震之后的屠杀事件。其实，《春雷》编辑部决定为此做宣传活动，于是也通知了巴金，巴金便答应了邀稿。

在刊载了“1”至“5”的杂志《春雷》第三期(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上，除了巴金的文章之外，其他文章也涉及了该事件。《诗》栏载有凌霜[黄凌霜]《悼大杉荣》、剑波[卢剑波]《悼伊藤野枝并示女同胞》；《通讯》栏载有中国安那其主义者团体一同《致东京对虐杀事件演讲会书》。

笔者读完“2”至“6”，感觉“2”确实体现出了巴金的风格。也就是说，笔者觉得“2”与后来巴金发表的作品有共通的底流。

为此，关于“2”之外的文章，以下仅加简要说明。其中，笔者认为有必要提供原文的资料，一律放在文章结尾的注解中。

“2”的全文如下：

悼橘宗一

蒂甘

(一)

我们且闭目想想罢：/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孩，/被残酷的恶魔捉着，/光亮的刀锋刺进肥白的身体，/随着刀喷出的鲜血，/和从痛苦中迸出来的叫号。/这是何等的残酷呵！/这样的惨剧又现于资本主义的国家了。

(二)

可羞呵，卖友的叛徒；/可恨呵，资本主义的恶魔。/难道这无抵抗的七岁的小孩，/便会破坏你们资本主义的根基，/捣碎你们天皇的宝座么？/你这残酷的行动，/只不过在世界上留下极大的污点，/使资本主义的罪恶更加明显，/你何尝能使他七年的生命永离人间？

(三)

可怜呵，我小小的橘宗一！/可爱呵，我小小的橘宗一！/可敬呵，我小小的橘宗一！/我们的小兄弟；/光明的先驱者，/你等着罢！/你的仇我们是报复的。/我们要使饮你的血的毒剑转去喝一切恶魔的血呵！（于南京）

（注）橘宗一君大杉荣之甥，其妹之独子。一九一七年生于美国。一九二三年六月同母来日本，九月一日日本震灾发生，君与大杉荣夫妇同为宪兵大尉甘粕正彦所杀。实是近年来一大惨剧！昨于《劳动运动》上见君的遗照，悲愤不已，便和泪写了这首诗。^①

诗中“可羞呵，卖友的叛徒”是误报所致。事发当初，中国似乎流传着大杉荣遭到同志告密的消息。而橘宗一因窒息而死，当时还不为人知。安那其主义杂志《民声》^[注4]创刊以来，“资本主义”“天皇”（在中国，二词往往与“政府”连在一起使用）等词汇在中国已经成为强权者压迫弱者的定型用法。估计巴金也是照例使用了这些词汇。

当笔者思考巴金时，总会把以下三点放在心上。

第一，巴金亲人的死。（母亲与二姐，歿于一九一四年；父亲，歿于一九一七年；祖父，歿于一九二〇年；三姐，歿于一九二四年；大哥，歿于一九三一年；三哥，歿于一九四五年。）

第二，巴金的病情（结核）。（在成都时，因身体虚弱，祖父没有允许他上中学。一九二五年八月，赴北京投考大学，但又因生病未能应试。一九二七年

^① 《春雷》第3期，第100—102页。

一月,赴法,初夏,因身体欠佳,迁居蒂埃里堡疗养。一九四四年,在贵阳入院,等等。)

第三,巴金尤其在幼年、青年时代的积极通信。(巴金在成都时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写过信。从此算起,单是能够掌握到的通信就已经有很多次。这是他的求知欲与诚实所致。)

笔者读完这首诗,突然想到第一点与第二点,特别是第一点。

巴金尤其尊重生命个体。换一个角度来讲,笔者有时会觉得巴金随时都在感受着生命个体的尊严,并对它产生恐惧。

因此,生命个体无端遭到压迫时,巴金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反应。这甚至让笔者觉得巴金的文学尤其是他的初期文学,其实都是在反复表现这种反应。巴金的文学作品结构单纯的原因或许也在于此。无端施加压迫的因素如“家族制度”,还有其他各种形态。对此,巴金敏锐地表现了他的反应与反抗,并直接把它反映在作品中。

到了这一时期,巴金已经失去了母亲、父亲、祖父,还有两位胞姊。

另要提到的是,幼年时代,巴金与出任广元县知县的父亲一起住在县衙内,有一天,他最喜欢的大母鸡在厨房被人宰割,得知后他便放声大哭^①。可见巴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

笔者读到《悼橘宗一》中的“光亮的刀锋刺进肥白的身体”,便想到了这些。

以下是关于其他几篇文章的说明。“3”^[注5]可以说是当时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对大杉荣做出的公式化评价及其表述。而巴金在文中举出了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在美国芝加哥发生的干草市场(Haymarket)事件中遭受牵连的斐失儿(Adolph Fischer)的例子,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大杉荣,这正是巴金与其他论者不同之处。诗中“数千年”估计是误植,应为“数十年”。

“4”涉及了屠杀事件中朝鲜人与中国人的境遇。文章仅署“东京安那其主

① 《最初的回忆》。《忆》,第24页。

义者”，详情不明。在劳动运动社中，能够用世界语与海外尤其与中国联络的人是山鹿泰治（一八九二—一九七〇），所以该篇或许出自山鹿手笔，但笔者尚未掌握到确凿的证据。

“5”的后记中，巴金写道：“这篇短文是根据日本《劳动运动大杉荣、伊藤野枝追悼号》后面的 Bibliografio de Osugi[大杉荣著作年表]一篇而作的。后来又依前面一篇《大杉荣著作年表》改了一两处。”该《追悼号》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由劳动运动社发行。笔者已核对过该刊原文与巴金这部年表，除了对大杉荣《自叙传》中的各个时期的划分方式不同、《物质非不灭论》作者署名有误、另有几处误植之外，大致没有问题。

“6”^[注6]译自“Kontraŭatako de Reakciuloj”, *Laborista Movado*, Monata Organo de Anarĥistoj en Japanujo, vol. iv, Decembro 1923(《反动分子的反攻》，《劳动运动》，日本安那其主义者月刊机关报，第四次，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见《劳动运动》第四次第一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一、四面。巴金在后记中说译文略有删改。

四

林曼叔在《巴金访法散记》^①第十八页提到一位法国记者询问巴金如今是否依旧坚持着安那其主义的信仰，巴金笑了笑说：“那是年青时候的事了！那是年青时候的事了！”

法国作家皮埃尔-让·雷米(Pierre-Jean Remy)在《巴金访问记》中提到他采访巴金时询问巴金无政府主义对他来说是否还具有意义，巴金回答说：“我已

① 《观察家》第20期，观察家出版社，1979年6月。

经完全抛弃。”^①

笔者完全赞同巴金这两句话。因为巴金消化了安那其主义,已经将其作为一份营养吸收到了体内。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

注解

〔注 1〕

李尧林(1903—1945)。

笔名李林。以翻译家闻名。李家是个大家族,巴金父亲(李道河)的兄弟之同辈子弟要按出生年月排辈称呼。排行第一的男子是大哥(李尧枚,1897—1931);第二是二叔(排在巴金父亲后面的第一个弟弟)的儿子,二哥;其次是排在巴金前面的三哥李尧林。按此排辈称呼,巴金为四哥。

1925年三哥与巴金告别后,一边继续过着苦读寒窗的生活,一边就读苏州的东吴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毕业后,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住在校内宿舍。他热心地与学生交流,受到学生的敬爱。1931年春天,大哥李尧枚突然服毒自尽,之后,他挑起了家族的担子,每月向家里寄钱。

除了1938年与巴金一起生活了大概十个月之外,他基本上过着教师生活。

在此期间,三哥一点一滴做起翻译工作,并爱好上了音乐。就此,巴金在《纪念我的哥哥》(《怀念》所收)第72页中说“音乐和翻译工作做了你排遣寂寞的工具”。此外,三哥一生没有结婚。

^① 东方晓译,《文汇报》1979年6月17日。见《巴金杰作选》附录,百灵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3页。《巴金杰作选》附录仅收沙布隆〔Jean Leclerc du Sablon〕访问巴金的记录稿《访问巴金》〔东方晓译〕,此句表述引自该篇第3页。至于皮埃尔·让·雷米《巴金访问记》及其原载刊物、发表日期,书中没有提供任何信息,估计是作者的笔误。此外,《文汇报》所载《巴金访问记》的译者署名乔子。——译注)

1945年,巴金得知三哥在上海因结核卧病,匆忙赶路,终于于11月从重庆返回上海,与三哥重逢,但不过一周时间,三哥病故。

巴金在《纪念我的哥哥》第77页表达了他的悲痛之情:“你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

三哥的骨灰由巴金亲手埋葬在虹桥公墓。巴金在《随想录》(第1集·1979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12月)第166—167页《靳以逝世二十周年》中提到三哥墓碑,说在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注2〕

从1920年至1922年年底或1923年春天,巴金写了以下几篇文章。实际上笔者一篇都没有找到,但通过回忆录《小小的经验》(《忆》所收)、《觉醒与活动》(《巴金文集》第10卷所收)大致可以了解文章内容。经整理,列如下:

(1)“对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予以否定”的文章(《半月》第24号)。

(2)对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介绍(《半月》,期数不详)。(《IWW与中国劳动者》。《半月》第21号,成都半月社,1921年6月1日,第8—10页。——译注)

(3)《中国人的到幸福的路》(《警群》,期数不详)。

(4)《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平民之声》第4期)。

(5)论述托尔斯泰社会思想的文章(《平民之声》第5期)。

(6)《支加哥殉道者》(《平民之声》第6期)。

(7)“心社”社约解说(《平民之声》最后一期,《师复纪念号》)。

(1)、(3)、(5)内容根本无法推测。至于其他几篇文章的内容,大致可以依靠上述资料提供的巴金与杂志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材料加以推断。笔者已在本书所收《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第2章第2节第30—42页讨论过这一点。

〔注 3〕

杂志《春雷》。发行所：真社（广州）。发行期间：现可确认的是第 1 期（1923 年 10 月 10 日）至第 3 期（1924 年 5 月 1 日）以及《春雷劳动增刊》（1924 年 4 月 1 日）。关于该刊的意图，见第 1 期第 4 页所载《广州真社宣言》中的部分文字：

在远东的支那方面，广东一部，要算是思想发达最先之区。中经几度的起伏改革，因而环境险恶，运动的效果，不免微薄些，这是我们所应该向世界同志道歉的。近来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同盟 Anarchists Federation of Kwantang〔1914 年 7 月成立〕感受种种的关系，至于停滞不进；而我们多数又是 A. F. 的分子，都一致要想把精神奋发起来。但是服膺主义，只有牺牲一切，永远为主义尽力。

杂志《惊蛰》。第 1 期（1924 年，月日不详）第 1 页所载楚沈《我对于〈惊蛰〉的希望》中写有：“《春雷》的出版，系有许多阻滞，便成了不定期的刊物，……所以决定发刊这个定期月刊。……顾名思义，遂叫做《惊蛰》。”发行工作实际上由真社承担。杂志的性质可以说与《春雷》相同。

〔注 4〕

《民声》，安那其主义杂志。1913 年 8 月 20 日，刘师复（1884—1915）在广州创办机关杂志《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12 月 20 日，在澳门发行第 3 号，并改名为《民声》。后将代理处设于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发行。1915 年 3 月 27 日，师复去世。1916 年 11 月 28 日，发行第 29 号，停刊。1921 年 3 月 15 日，复刊，在广州发行第 30 号。7 月 15 日，发行第 33 号，停刊。（同年 8 月 15 日，发行第 34 号，《民声》以此停刊。——译注）

下面举出两个例子：

《民声》第 4 号（1913 年 12 月 27 日）第 9 页所载《风雨鸡声录 日本无政府党之近况》中写有：“日本之皇族每至一处，凡受嫌疑之同志，皆不许出门，日本

之专制，至于此极。”

《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第11页所载《风雨鸡声录〈劳动者〉之创刊》中写有：“惟日本政府禁压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书报异常严酷，此报一出，必遭禁止，且必科以酷刑。”

〔注5〕

芾甘《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春雷》第3期，真社，1924年5月1日，第102—103页。

(一)

伟大的殉道者，/闭了目罢！/你的呼声是永久在我们心上的；/你的血染透的旗帜是永久在我们手中的。/我们是要举起而向自由的路上前进呵！

(二)

资本主义的淫威居然压到你头上；/帝国主义的毒剑居然染满了你的赤血；/三十余年贫困、流亡、监禁的生活从此完结；/但你的心却永不死去，/只永在东亚劳动者的心中活跃，/你的生命却永远不朽，/永指挥着东亚的劳动者向光明自由的路上走。

(三)

“为安那其欢呼，/这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1)/你全身的血光，/将永照耀全球，/使一切的恶魔战抖。

民众的呼声又在喧响；/“日本天皇”的根基已在动摇；/导火线已被你的血光点燃，/劳动者的部队将直往资本主义的阵上走。/且看数千年后的9月1日，(2)/最后的胜利究竟属谁手？(于南京)

注(1)支加谷劳动运动殉难者 Adolph Fischer 临刑时高叫“Hurrah for Anarchy! This is the happiest moment of my life.”

(2) 大杉君 1923年9月1日殉难。

〔注 6〕

日本东京劳动运动社《一九二三年日本大震灾中日本政府军阀及反动党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攻击》，蒂甘译。《惊蛰》第 1 期，真社，1924 年（月日不详），第 9—12 页。

在东京前次大地震及火灾的时候，发生了对于高丽人和革命党极残暴的屠杀举动，我们知道这是中产阶级的市民底意志，这件事很足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宣传尚未十分满足，和革命运动的准备，尚未完满的。

日本资本阶级的经济组织虽然尚在发展，但是他的崩坏的先兆已现了。经济界将为绝大恐慌所攻击，同时劳动阶级亦将起对于资本阶级的不平和叛逆之声，恐怖和骚乱亦将继之而起，这些使强权者和资本家胆寒。

在前次大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强权者和资本家——遂利用这时机大造谣言，使劳动阶级改变他的倾向转而憎恨高丽人和革命党。他们鼓吹市民自卫成功之后，便乘着人心混乱之际来攻击急进的革命团体，甚至敢于实行虐杀。

“高丽人和革命党放火暴动”的流言很早，在 9 月 2 日便喧传各处了，自警团屯所的各分所都贴有这样的谣言，民众早已极端的恐怖，又加以这憎恨和狂怒的煽动，自警团员便带着武器——竹枪、刀、短銃——开始向革命党的住宅攻击。

接着我们的住宅遂被蹂躏，一部分的同志遂遭惨杀。

大杉荣君等三人 9 月 16 日被杀于在天皇宫殿旁的宪兵司令部中，这事到 20 日才暴露于社会。别一方面，自 9 月半至 20 日几天内，我们许多同志都被监禁于警察署，他们受着同样的不可思议的侮辱，在巢鸭署许多警察用棍棒殴打他们，平岩岩君曾气绝四次，石黑、米山君也曾气绝过一次。其他各署于 15、6 日也是这样做，在 20 日以后才停止了。在各监狱里也全与这一样。我们听得在狱中的同志受着极残酷的刑罚，在中野监狱内，我们同志武良二君被反剪着手高吊起，并有人用污水淋他的身体；这样的事也是起于 9 月 15 日，20 日左右便突然停止了。

强权者说大杉荣之被害是由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个人的意志，但这不过是愚拙的诌语，因为在几年前军阀已经利用好机会杀戮革命党了。并且就在那年保守党检阅的时候，那些司令官训令说：“在最近的将来国家将要与社会主义者战争，所

以……”

照上面所述的事实看来，我们便可断定这事是由日本政府的强权者命令的，和市民的需要催迫的。

我们很可惜在那个机会中没有得着什么，但是当我们在混乱中我们又被攻击了，我们留心这次的袭击，我们发现一件活动的有趣味的事。在10月以后一个极端爱国主义者的团体——黑龙会——秘密出版了一种小册子，叫做《震灾中高丽人及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在这书里面，他们证明当时的谣言，是真的事实。

这次骚乱渐次镇静后，自警团团员中的“暴动者”便被拘禁，因为强权者要借着这件事来掩过世人的耳目。不久自警团员便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自警团同盟”，随后经纶学盟，及其他国家主义者的团体也大活动来拥护这个同盟（即这次攻击革命党住宅的人）。

这次的攻击并不是单纯的，现在我们在这国家里的安那其主义者仍然反抗政府军阀和极高的反动派；我们将劳动者的，农人的，和社会的团体联合组织起来：我们更要具坚强的决心来尽力于宣传运动。

我们亲爱的男女同志们在线上牺牲了，我们应当踏过他们的尸体向前进，不到我们得着胜利不止。

日本东京劳动运动社

关于巴金小说《灭亡》的 若干事^{*}

一、关于巴金的小说《灭亡》

这部小说是巴金侨居法国^①期间,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在法国东北部马恩(Marne)河畔小城蒂埃里堡(Château-Thierry)完成的,写后寄给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周索非。原计划自费出版,因受到《小说月报》的关注,自一九二九年一月号至四月号,小说共分四期连载,皆署名巴金。

* 该篇原载《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论集》第1卷第1号,1986年7月,第65—82页。

① 1927年2月18日,到达马赛;1928年10月30日,乘船离开马赛。

小说梗概如下。

时间：这个问题第二章节还将继续讨论，但大致是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左右。地点：上海。当时，上海正处于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的统治下。

主人公：杜大心，在纺织工人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一名同事（张为群）因携带传单被戒严司令部逮捕，后被斩首。为了复仇，杜大心用手枪狙击戒严司令，却谋事不遂，便向自己头部开枪自尽。

此外，小说又触及了革命工作者杜大心与女子李静淑之间的爱情问题。

关于小说《灭亡》的书名，巴金在《谈〈灭亡〉》中说，这个书名有双重意义，一个是控诉、攻击、诅咒，另一个是歌颂^①。也就是说，《灭亡》控诉、攻击、诅咒了那些把革命家逼向灭亡的因素，同时又歌颂了革命家为实现理想英勇牺牲自我走向灭亡的献身精神。

巴金还说，“灭亡”一词取自俄国诗人十二月党^②领袖雷列叶夫（Konraty Fyodorovich Ryleyev, 1795—1826）的叙事诗《纳里瓦依科》（*Наливайко*）的第八篇《纳里瓦依科的自白》。

……“我知道：灭亡（погибель）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③

这是在巴金创作小说《灭亡》整整三十年后的一九五八年三月写下的，巴金倾注于作品的热情至今基本上仍无改变。

① 《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4月5日，第61页。《巴金选集（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第599页。

② 以1825年12月发生的十二月党人起义闻名。

③ 《巴金选集（上下卷）》，第600页。

本篇小论的目的并非写出一篇周详的所谓《〈灭亡〉论》，而是要确认笔者每读《灭亡》都会感到好奇的几个方面。

即以下三点：

第一，小说《灭亡》故事的发生时间究竟起止于何时。这需要确认。

第二，关于杜大心的思想（自由社会主义）。为慎重起见，这也需要确认。

第三，杜大心与巴金的距离。

本篇小论所使用的小说《灭亡》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下列“1”的开明书店版。

1. 巴金《灭亡》。开明书店，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版，单行本，三十二开，第一章至第二十二章，共二二六页。

初版本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一九三六年七版出版时修订，《序》之外新附《七版题记》（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之夜巴金）。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巴金文集》第一卷出版之前，这是流行量最多的版本。（下简称为“开明书店版”。）

2. 巴金《灭亡》。《小说月报》（最初连载发表《灭亡》的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

第一章至第六章，第二十卷第一号，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

第七章至第十章，第二十卷第二号，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

第十一章至第十六章，第二十卷第三号，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

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

（下简称为“《小说月报》版”。）

3. 巴金《灭亡》。《巴金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三月。（下简称为“《巴金文集》版”。）

此外，巴金直接谈到《灭亡》的文章有以下三篇：

1. 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原载《开明》第二十二期，开明书店，一九三〇年六月，第六一九页；后收于《生之忏悔》，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三月，第五一九页。

2. 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开明书店，一九三六年二月，一九四九年五月七版，第一一十五页。

3. 巴金《谈〈灭亡〉》。《文艺月报》一九五八年四月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第五十七—六十一页。

二、《灭亡》故事的发生时间

本章将讨论《灭亡》主要叙述了哪一时期的事情，即故事的发生时间。这一考察是为了对证《灭亡》所描写的现象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掌握清楚时间关系，小说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也自将一目了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作品。

《灭亡》中关于孙传芳、总商会及戒严司令的文字是判断故事的发生时间的依据。下面依次举出相关文字。

1. 关于孙传芳。

小说第十五章《革命党被捕》中有一段文字以略带嘲讽的语气描述了上海。

不过在这“赤祸蔓延”的中国，S市究竟算是一个世外桃源，虽然近年曾因齐卢之战受过一点兵祸，但究竟是短时间的，也没有多大的损失，况且现在又有那管辖五省，坐镇金陵〔南京〕的孙联帅在……^①

通过小说所描写的各种现象，我们足以推断文中“S市”即是上海。为慎重起见，笔者查阅了其他版本，结果发现该处在《小说月报》版中为S市，但在《巴金文集》版中均被改写为“上海”。

^① 开明书店版，第158页。“管辖五省”在《小说月报》版第20卷第3号第604页中原为“管辖九省”，估计巴金根据事实做了修改。

其次是“近年曾因齐卢之战受过一点兵祸”。众所周知，“齐卢之战”是指一九二四年九月，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展开的激战。因此，“况且现在”的“现在”是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以后，如果再加上“近年”的不确定时间，估计此时至少已经进入了一九二五年。

此外，关于“况且现在又有那管辖五省，坐镇金陵的孙联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一卷^①第二一一页，张振鹤《孙传芳》中写有：

……同月[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他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

可见，“现在”的时间还要往后推。

章回、包村等编写《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②第一三七页，第十一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③“北伐战争开始了”中写有：

……北伐军就沿长江东下，进攻军阀孙传芳控制的江西，并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上旬攻占了九江、南昌。

当时，孙传芳号称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联军总司令”。上海也在他的统治之下。……

如果以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上任时期为起点来推算，“现在”的范围还可以扩展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在《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一三八页中，有一段文字提到了一九二六年

① 中华书局，1978年8月一版。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

③ 标题中的“三次”分别为：第一次，1926年11月23日；第二次，1927年2月19日；第三次，1927年3月21日。（第一次武装起义应为1926年10月23日，下同。——译注）

十月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所展开的反对孙传芳的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在北伐军胜利的新形势下,党[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总工会在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中展开了反对孙传芳的运动,揭露他残酷压迫人民的种种罪状,号召大家打倒这个罪恶大恶极的军阀。同时,工人纠察队也纷纷组织起来,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上海,响应北伐的大进军。

通过以上围绕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考证可以得出,《灭亡》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2. 下面来讨论《灭亡》中谈到的“总商会”以及“戒严司令”。

小说第二十二章《灭亡》中写有:

这天晚上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S市。在总商会欢宴戒严司令的席上一个冒充新闻记者的不知名的青年向着戒严司令放了四枪。戒严司令底肩上受了微伤,但他底一个马弁被打死了。凶手也用剩下的一颗子弹打进自己底脑里自杀了。^①

首先是“总商会”。京大东洋史辞典编纂会《新编东洋史词典》^②第四七五页,“浙江财阀”中写有:

是为乡党团体,在金融业、商业、产业上团结人与资本,在各财阀的联合机关上海总商会的全体会员中,浙江系会员的比例在一九二六年占百分之八十七,一九三四年占百分之九十五。……代表人物有虞洽卿,是浙江财阀领袖,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支持蒋介石。

^① 开明书店版,第224—225页。

^② 东京创元社,1980年3月31日。

此外,《新编东洋史词典》第二二九页,“虞洽卿”中写有“自一九二五年起,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五年”。

此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一三四页,第十章《“五卅”运动》“资产阶级的妥协出卖”中提到了总商会:

上海总商会也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屁股后面,破坏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关于总商会在一九二七年二月第二次武装起义时的动向,《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一四一页,第十一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写有: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开始进攻浙江。二月十七日占领杭州,第二天先锋部队到达嘉兴,离开上海已经不很远。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越来越不稳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并决定先发动总同盟罢工,充分发动群众,准备等北伐军进入上海附近的松江一带,就开始行动,响应北伐军。

上海总工会在发动总罢工的时候,曾经建议总商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中小企业联盟]发动罢市,一起行动。可是他们都不肯参加。于是,上海工人就单独挑起了起义斗争的重担。

其次是“戒严司令”。《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一四〇页中写有:

第一次武装起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使敌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敌人的“上海防守司令”、刽子手李宝章,马上宣布紧急戒严。……

关于第二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之后的情况,《上海近百年

革命史话》第一四二页中写有：

面对着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军阀吓得发抖了，也更加疯狂了。李宝章急忙勾结帝国主义在租界里的军队，共同迫害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发动后，孙传芳的军队终被驱逐。

通过以上对“总商会”及“戒严司令”的考证，笔者如此推测：《灭亡》故事的发生时间大致是到第二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前后。

最后对这一章节稍作总结。

《灭亡》主人公杜大心十九岁离开家乡，到了上海，考进一所有名的大学，“第二年就接着他底母亲病故的消息”^①。又过了“一年”^②，经同学介绍，信奉自由社会主义，加入革命团体。在这“两年”之后，即杜大心离开家乡“四年以后”^③，大概是《灭亡》中的“现在”。此时杜大心二十三岁。

“现在”，是以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上任时期的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为起点。在北伐军沿长江东下的一九二六年十月前后，孙传芳的地位也还没有改变。如果考虑到“总商会”及“戒严司令”，“现在”的时间范围最大限度还可以扩展到第二次武装起义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但笔者敢确切指出的“现在”的范围是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如此看来，另加杜大心的经历综合判断，《灭亡》故事的发生时间大致如下。

杜大心离开家乡，是从“现在”数起四年前的事情，所以应该是一九二一年或一九二二年。

① 开明书店版，第36页。

② 同上书，第37页。

③ 同上书，第38页。

也就是说,《灭亡》故事的发生时间是从一九二一年或一九二二年开始,到一九二七年年年初为止。而“现在”的部分——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小说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之前的部分是回忆,之后的部分是为扩展时间范围所加。

三、杜大心的思想(自由社会主义)

首先来介绍小说《灭亡》怎样描述了杜大心的思想(1—3),其次通过几份资料(a—d)对此加以阐释。

1. 杜大心十九岁离开家乡成都^①,到了上海,考进一所有名的大学。两年之后的情况如下:

……他因一个同学底介绍,相信了为人类谋幸福的自由社会主义。加入革命团体。后来他竟完全抛弃学业,离开学校,把他底全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面。家里依旧寄了很多的钱来,但是他除了留下一点来维持自己底最低限度的生活外,其余的就一概拿出充作团体底费用,或帮助个人。^②

2. 有一段文字描述了杜大心的工作地点“纺织工人总工会”^③组织内部的情况,以及杜大心的自由社会主义:

在这纺织工人总工会底十几个办事员中分了两派:杜大心是一派,王秉钧也算一派。王秉钧底势力要大一点,他虽然只是一个交际委员,但他是某党[国民党]工人工部底职员,又是派到这工会来的代表,他可以向党部按月去领津贴工会的款子。

① “成都”出自《巴金文集》版,《小说月报》版为“T城”,开明书店版为“C城”。

② 开明书店版,第37页。

③ 只有在《巴金文集》版中“总”字脱落,为“纺织工人工会”。(见该书第95页。——译注)

王秉钧本是一个工厂的学徒，但因为人很聪明，又常常跟着几个二等伟人东奔西跑，而且同别人办过几个工会，资格既老，经验又多。加入某党后，因为他曾从事劳动运动多年，所以得在工人部里当一个职员。……

……………

……他们[杜大心一派]之同情于杜大心与其说是受了他底思想上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他底人格上的感化。他们不能明白地说出王秉钧所述的总理主义[总理即孙文]和杜大心底自由社会主义谁好谁坏……^①

3. 第十三章《张为群》中写有：“工会里办事员中真正算得是杜大心底同志的，只有张为群一个人。”^②在关于张为群的描述当中，如有以下文字：

……在不到一年以前他便信仰了杜大心底自由社会主义，要用革命的方法来打破这不平的一切，创造出一个美满的世界来。^③

出现在引文 1—3 中的杜大心的思想立场“自由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笔者在开明书店版《灭亡》中第一次看到了该词，曾做过多种推测，但都未能掌握其具体含义。但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使用该词。下面举出与该词相关的几份资料(a—d)。

a. 《民声》第三号(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六页，《风雨鸡声录 荷兰无政府党之活动》(*La Movado de Anarhismo en Holanda*)之“— A. Kloek 君通信”中写有：

无政府主义在荷文中亦名“自由社会主义”。……^④

① 开明书店版，第 12 章《杜大心底悲剧》，第 124—125 页。

② 同上书，第 133 页。

③ 同上书，第 133—134 页。

④ 该处出自该篇所收“二 G. P. de Brunin 君通信”。——译注

b. 在海隅孤客《解放别录》^①第三十六页，第十一章《思想的白刃战》中，海隅孤客（梁冰弦）触及了一九二〇年会见共产国际派远东局长维金斯基等人一事，写道：

……中国自由社会主义者，既与苏俄革命工作者表面合作，骨子里却百分之百为安那其，故思想、言论和行动无往而不相抵触。……

c. 张益弘主编《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研究集》^②第二页，黄尊生《记黄文山先生》中写有：

他[黄文山]早年即服膺人道主义与自由的社会主义。……

黄文山为本名，字凌霜，以黄凌霜闻名。

d. 巴金本人的解说。

克鲁泡特金《告青年》（巴金译）^③第六页，《告知识分子》中的“告医生”结尾写有：

那时候你就会懂得社会主义了。^①

引文中的注解^①关于社会主义的解释是：

^①作者指的是自由社会主义，即安那其主义，下同。——译者。

①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该书所收诸篇原载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香港《自由人》报。

② 台湾中华书局，1976年10月。

③ 平明书店，1938年9月六版。

以上几份资料(a—d)显然说明了杜大心站在安那其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还要补充一点。

至此,笔者一直依据开明书店版讨论了“自由社会主义”,但实际上,“自由社会主义”一词在《小说月报》版中均为“平等主义”,而在《巴金文集》版中均为“社会主义”。

关于《巴金文集》版中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通过以上几份资料中的“d”巴金本人的解说,得出“社会主义”无非就是“自由社会主义”的解释,但是“平等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的关系又该怎样理解?

关于这一点,最可靠的依据即是《小说月报》版《灭亡》中对“平等主义”的解释。

这又同时关系到小说中关于杜大心唯一信赖的同志张为群的描述,如下。

以下第一段文字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由于该处正是“自由社会主义”被改写为“平等主义”的部分,另外需要考虑到文章的前后关系,因此再次引用同处。

……在不到一年以前他便信仰了杜大心底“平等主义”,要用革命的方法来打破这不平的一切,创造出一个美满的世界来。

张为群底理想是很单纯的,是出于感情的。关于现在的不平的一切是他自己从生活中看到感到的;至于那美满的将来世界,却是杜大心给他的书里面告诉他的。……在将来是不再有不平的事,没有人压迫人的事,也没有厂主和工人这一类的分别了。人人都是平等的,都享着和平的幸福。他不但相信那日子是会来的,而且还相信在最近的将来,甚至一两年内就会到来的。……^①

张为群已在生活中看到并经历了无数次不平等的事情。通过杜大心送他的书,张为群开始相信没有人压迫人的、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能够享受和平

^① 《小说月报》版,第20卷第3号,第596页。

幸福的社会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到来。

那么，杜大心到底送给了他哪一方面的书？

笔者想通过巴金《〈伦理学〉中译本前记》来回答这一问题：

……他[克鲁泡特金，一八四二—一九二一]把社会主义视作伦理学说的一部分。在他的伦理学体系中正义之概念是与平等之概念连结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他的伦理学是和他的自由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连结在一起的。……^①

一九一八年六月，克鲁泡特金迁居莫斯科近郊的小村庄德米特罗夫(Dmitrov)，之后开始撰写《伦理学》，但因一九二一年二月去世，未能完成该书。之前，他撰写了《安那其主义的道德》(一八九〇年)，其中有一处详细解释了安那其主义与平等的关系，如下：

此外待人如己，和望他人待我，好比如待自己一样，是与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原理——平等——无异。要是那个人不能实行这个原理，那配称是一个无政府党！

……

……无论什么都要平等，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本色的主张。我们因为反对那抽象三位一体的法律宗教和强权，所以要同他宣战。我们所以要做无政府党，就是和那虚伪、奸谋、私利、凶淫、罪恶——一言以蔽之的不平等——这种种都灌注在我们的心中——宣战。……^②

不必多说，“平等主义”指的就是“安那其主义”，所以杜大心送给张为群的

① 《中国与世界》第6期，中国与世界社，1941年2月，第346页。

② 《无政府党的道德》(无政府主义の道德)，八太舟三译。《克鲁泡特金全集》(クロボトキン全集)第8卷，春阳堂，1928年8月31日，第555—557页。(该处引自《无政府党的道德》，《克氏全集》第1卷《国家论及其他》，上海自由书店，1927年11月，第78—79页。就中文版《无政府党的道德》而言，在引文中的“我们因为反对”之前还有一句：“那些‘白骨’的鬼魅，看见人家诚朴，就来骗人，我们不要他。我们在必要时，决意压止他。”但在作者引用的日文版中却没有这句。——译注)

书即是安那其主义方面的书。再补充一句，这本书很有可能是克鲁泡特金的著作。

如此看来，杜大心所信奉的思想，尽管用词上有所出入——如《小说月报》版的“平等主义”、开明书店版的“自由社会主义”、《巴金文集》版的“社会主义”，但总之都是指安那其主义。

四、杜大心与巴金的距离

一九二八年八月，巴金为《灭亡》写《序》，文中写道：

自然杜大心不是我自己，我写其余的人也并没有影射谁的心思。……^①

事情的确如此。尽管在某些方面二人有所相似，例如：第十二章《杜大心底悲剧》中的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记^②直接抄自巴金本人的日记；第十章《爱与憎》中的一个插曲——父亲任S省知县时，杜大心在县衙养鸡，他很喜欢它们，有一天一只鸡被宰割，出现在饭桌上，这使他万分痛心^③——与巴金在《最初的回忆》^④中谈到的经历一模一样；在第十二章《杜大心底悲剧》中杜大心担任《工人旬刊》编辑^⑤，而巴金也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担任《民众》半月刊发起人^⑥；杜大心离开成都^⑦来到上海；等等。但这都是一些片段的记录。因此，正如巴金所言，从杜

① 开明书店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128—129页。

③ 同上书，第114页。

④ 该篇写于1933年。《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8—28页。

⑤ 开明书店版，第123页。

⑥ 《民钟》第13期《特载》栏，1925年9月。

⑦ 《巴金文集》版，第31页。

大心的经历以及表面上的行动来讲,笔者也认为杜大心并非巴金。

然而,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进而深入推敲?

笔者则认为这必然要考虑到杜大心的政治立场与巴金的政治立场的共同点。

第三章《杜大心的思想(自由社会主义)》中也曾提到过,杜大心的工作地点纺织工人总工会中有一个从国民党工人部派来的人,名叫王秉钧。趋炎附势的王秉钧讲话时常提起总理孙文,炫耀自己的权势。而杜大心则以拒绝的态度应付了他^①。

巴金在《谈〈灭亡〉》中说:

……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却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写了这样的人。……^②

关于王秉钧这样的人物,笔者曾在《巴金与安那其主义》^③第三章第三节《黄庞死后的第四年》中指出过:黄爱与庞人铨被处决后,湖南劳工会被查封,干部们逃往上海、天津、汉口等地,企图在各地重建组织,但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编入国民党的劳动政策路线之中。

巴金之所以以极大的厌恶描写王秉钧这样的人物,是因为巴金与他们立场互不相融。

笔者手边还有一份资料,是巴金署名佩竿发表的《无政府党并不同情于国民党的护党运动》。文章简短,全文如下:

① 开明书店版,第173页的摘要。

② 《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第61页。

③ 西南学院大学学术研究所纪要第14号,1978年10月1日。

李石曾在《现今革命之意义的附注》上说“护党运动……倡始于吴稚晖先生。……国民党无政府党均同情于吴”。我看了大呼冤枉，据我知道的许多无政府党大半并不同情于吴稚晖，本来国民党的护党运动，与无政府党有甚么关系。无政府党以为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是他们两党自己的事，我们只站在民众方面说话，从不拥护任何政党的。^①

通过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杜大心不仅要与被称为国民党右派的人物划清界限，既然他信奉安那其主义，尽管小说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同时也要与中国共产党划清界限。笔者则认为这必然要考虑到杜大心的政治立场与当时巴金的政治立场的共同点。

李石曾《现今革命之意义（一）》附注现收于《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②第二四二页。引如下，供作参考。

附注一 护党运动，于民国十六年三月，倡始于吴稚晖先生。即卫护国民党抵制伪共产党夺取党权政权之阴谋。因此共产党对吴攻击甚烈，国民党无政府党均同情于吴。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① 《平等》第2期《短评》栏，美洲三藩市平社，1927年8月1日，第11页。

^② 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5月29日。

巴金的演讲《我和文学》^{*}

引言

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至十七日，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与谢冰心女士、草明女士、林林先生等一同访问了东京、广岛、京都、奈良、德岛、长崎。在此期间，四月十一日下午，巴金于京都会馆以《我和文学》为题做了演讲。

此次演讲的内容与标题相同，讲述了五十几年以来巴金怎样通过从事文学

* 该篇原载《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论集》第1卷第2号，1986年12月，第151—170页。

工作来理解文学。演讲时间为一个多小时，菱沼透先生担任翻译。

笔者也作为一名听众参加了演讲，聆听后深有感触，尤其对此次演讲的焦点——具体展现了巴金文学性质的以下三点——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我不是文学家。

第二，我一向留意写作同生活的一致。

第三，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

其实，类似的想法巴金也曾讲过几次，并不是在此次演讲中第一次谈起。

例如，在此次演讲的五十几年前，巴金在《灵魂的呼号》中写道：“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想把小说当作名山盛业，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底生活底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径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径是相同的。”^①关于“敌人”，巴金在《写作生活底回顾》中写道：“我底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底最大的敌人。”^②

当然，笔者不是把这两个例子挂在心上去听演讲的。但笔者的确是一边回忆着包括这些因素在内的巴金以往的类似的发言，一边听了演讲。

那么，笔者为何会对以上三点重新留下深刻印象？回想起来才发现，是因为笔者感受到了巴金的决心与气魄：借此机会巴金总结了他至今从事文学的经历以及有关文学的发言，对他如何理解文学下了结论。

笔者撰写本篇小论，是想通过参照巴金以往关于以上三点的发言以及在此次演讲之前完成的《随想录》中的相关发言，深入理解以上三点的内容。

此次演讲一周前的四月四日，巴金于东京朝日讲堂以《我的文学五十年》

① 后改题为《电椅集序》，1932年10月。原载《大陆杂志》第1卷第5期，1932年11月1日，第141页。见《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开明书店，1936年2月，第310页。

② 1935年10月改作。《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第15页。

(わたしの文学五十年)^①为题做了演讲。查看后发现,该篇与《我和文学》部分内容有所重复。因此,笔者在论述时仅参考了与本篇小论相关的该篇部分文字。

此外,《文学生活五十年》演讲两天后的四月六日,巴金与木下顺二进行了《相隔三年的对话》(三年ぶりの对话)^②。该篇与《我和文学》演讲内容有直接关系,故将适当引用。

关于《我和文学》及其相关资料,整理下来有以下几种。为方便起见,每篇均附资料序号①—⑦。

1. 《我和文学》相关资料:

① 《我和文学》(わたしと文学)。《圣教新闻》,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此次演讲由圣教新闻社主办,京都新闻社后援)。

② 《我和文学——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探索集》(随想录第二集·一九八〇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一年四月香港,第一三六一—一四一页。

③ 《我和文学——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原载《钟山》一九八〇年第四期,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二一九—二二一页。见《巴金专集(I)》,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第六六五—六六九页。

该篇另收于《探索集》(《随想录》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① 中文标题为《文学生活五十年》。(以下,为统一标题,将《わたしの文学五十年》均译为《文学生活五十年》。——译注)

a. 《文学生活五十年》(わたしの文学五十年)(摘要)。《朝日新闻(夕刊)》,1980年4月7日,《文化》栏。

b. 《文学生活五十年》(わたしの文学五十年),东京朝日讲堂,4月4日。中国作家代表团欢迎委员会、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文学交流的旅途——1980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记录》(文学交流的旅途——'80中国作家代表团来日的记录),1980年6月,第4—22页。

c. 《文学生活五十年——1980年4月4日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讲演会上的讲话》。《花城》第6集,1980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6页。

② 《图书》1980年第8号,岩波书店,第2—15页。

七月,第一二五——二九页)、《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月,第七二四——七二八页)等书中。

2. 与木下顺二对话的相关资料:

④ 巴金、木下顺二《相隔三年的对话》。《图书》一九八〇年第八号,岩波书店,第二一十五页。

⑤ 木下顺二《同巴金先生交谈》(文学を谈ず)。原载《读卖新闻(夕刊)》,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二日,《文化》栏。见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九月,第三十一—三十三页。

(④《相隔三年的对话》详细记录了对话内容;⑤则简要总结了主要话题。)

3. 触及了巴金撰写《我和文学》讲稿时的心情的资料:

⑥ 《二十年的心愿》,一九八〇年六月五日。《收获》一九八〇年第四期,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六四——一六七页。

⑦ 《访问广岛》,六月五日。《探索集》(随想录第二集·一九八〇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一年四月香港,第七十一—七十六页(标题与⑥不同,但内容相同。收入《探索集》时改题)。

一、我不是文学家

在此次演讲中,“我不是文学家”这句发言的前后文关系如下:

前两天有一位日本作家问我你怎么能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
(注)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问:“你明明写了那许多作品,你怎么说不是文学家呢?”我说,唯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别人把我赶出文学界。”……^①

^① 本书第 227 页资料^②《我和文学》,第 137 页。

(注)日本作家指著名剧作家木下顺二先生,四月六日他和我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三十九层楼上“对谈”了一个上午,因为我四日在东京朝日讲堂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演说中讲到“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①,他才提出“怎么能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这样的问话。^②

如原注所述,“一位日本作家”即是木下顺二。在《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演讲中,巴金举出了夏目漱石等五位日本老师的名字,为此,对话时木下对巴金说,从日本文学家的常识来讲,同时喜欢不同流派的作家是很难理解的,便向巴金询问了理由(这一点下面还会讨论),而巴金却说他自己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不受限制,所以才能同时喜欢不同流派的作家;到了后半部,巴金又补充说:唯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③,我也不怕别人把我赶出文学界。

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仅靠巴金这几句说辞是有点令人理解不透的。因为,巴金说“我不是文学家”所以“不会怎样怎样”,而“我不是文学家”往往是他的一个前提,并且认为这是不需加以任何解释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我不是文学家”的含义没有说明清楚的条件下进行着对话。

为了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木下在对谈中也试图进而追问,可却不见成果。最后,木下终于不得不采取先设定假说再向巴金确认的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巴金与木下的对话记录来梳理这前后的经过。先来引用木

① 本书第 227 页注①c《文学生活五十年》,第 3 页。

② 本书第 227 页资料②《我和文学》,第 137 页。该注是《我和文学》被收入《探索集》(《随想录第 2 集》)附录时增补的。《钟山》1980 年第 4 期发表该篇时就已附该注,见该刊第 221 页。——译注)

③ 在巴金与木下《相隔三年的对话》的第 7—8 页中,以下文字与“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有关。

我的儿子现在在大学攻读中国文学[李小棠(1950—),当时就读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理论等,学习范围很广。回家后他就会谈起这些,从文学的角度来讲理论是怎样怎样,父亲的作品某些方面应该怎样等,最近再三评论我。……

下询问巴金为何能够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与作品的文字。(木下语附记号“K”,巴金语附记号“B”,数字为发言顺序。)

[木下“K1”:]……在朝日讲堂演讲时,您提到了几位日本作家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您是说喜欢他们还是说受了他们的影响,他们是漱石、田山花袋、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好像还有一位吧?还有藤村吧^①。如果说这些作家全都对你有影响,或者说每一位作家您都尊敬,那么这从日本的文学观来讲,有点难以理解。

这是有种种原因的。藤村写了一部与巴金先生的《家》同名的作品,但这是在巴金先生四五岁时^②写的。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一边描写旧的“家”在新兴资本主义的浪潮之中渐渐解体、没落的过程,一边把“家”的问题调换成个人与个人针锋相对的问题,描绘了逐渐陷于泥沼中的人物形象。这种无可救药之处,与同样带有自传色彩的巴金先生的《家》恰恰相反。漱石呢,他的《道草》和志贺直哉的作品例如《暗夜行路》是同一类的,也是在讨论日本的旧的“家”的问题。漱石和志贺直哉虽然以“家”为题材,但两位作家是把他们的立场放在走出他那无法忍受的“家”之后怎样维护、如何确立自我的问题上。这与巴金先生那部从正面对抗“家”的《家》恰恰相反,这一点先不说,总之,漱石是这样的作家。接着是田山花袋,他写的是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告白小说,要把自己完全袒露在人们面前。有岛武郎是人道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是非常有理智的作家;武者小路是无思想的善意作家……这种概括虽然过于笼统,但大概可以这样划分。这样一来,如果说这些作家全都对你有影响,或者说每一位作家您都尊敬,那么这对日本人来讲是难以想象的。对日本的文学家来讲,这有点难以理解。这已经不是提问了,是我个人的意见。

① 在《文学生活五十年》所提到的日本老师中,没有藤村的名字。下举一份资料,供作参考。

1984年,国际笔会在日本召开。巴金访日之际,与井上靖进行了对话。在对话中井上靖说:“我认为[藤村]作为文学家的诚实是可贵的。巴金先生来了,真的让我想起了岛崎藤村。”对此,巴金回答说:“我也非常尊敬岛崎藤村先生。”巴金、井上靖《友情探索》,《昴》(すばる)7月号,集英社,1984年7月,第36页。

② 岛崎藤村《家》写于明治43年(1910年)。巴金的出生日期为1904年11月25日。

[巴金“B1”:]这一点,我在朝日讲堂演讲时已经重复过多次了,我不是文学家……

[木下“K2”:]是的,可是我还想再请教一下您说自己不是文学家的含义……^①

不得不说,木下在“K1”中通过与巴金《家》互做对比,对“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所做的分析与评述非常精彩。他想通过这种评述,问出巴金“能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的理由,但正如“B1”所述,巴金的口吻则是:我已经在朝日讲堂重复过多次了,相信您大概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对话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怎样理解“我不是文学家”的含义上了,如果不能理解其含义,这次“对话”则将无法进行下去。

为慎重起见,下面来确认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说“我不是文学家”的前后文关系: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②

……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③

文中只有这两处。前者仅此一句内容就中断了,而后者的接续内容也只是与本篇小论第二章节将要讨论的内容相关而已,因此,文中没有任何文字可以令人直接理解“我不是文学家”的含义。

当然,木下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K2”中说了一声“是的”,先来附和巴金的意思,再追问已经成为“对话”重点的“我不是文学家”的含义,但却不见成果。

于是,木下抓住了巴金在“对话”中的一个说法,采取了先设定假说再向巴

^① 本书第 228 页资料④《相隔三年的对话》,第 5—6 页。

^② 本书第 227 页注①c《文学生活五十年》,第 1 页。

^③ 同上书,第 5 页。

金确认的方法。巴金的说法如下：

[巴金“B2”:]文学怎样分类、自己属于哪一类,与我的看法无关。

直到如今我一直都在想,要与旧社会斗争。这是需要武器的。只要是武器^①,不管它是什么武器,凡是经得起战斗的,我都拿在手里,与旧社会斗争到现在。^②

木下抓住巴金的这句话说：

[木下“K3”:]关于这方面,已经过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冈崎俊夫先生曾在河出书房版《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的《巴金篇》中做过解说。他说：“当时的确有很多青年看了他(巴金)的小说,挣脱了封建枷锁——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与在日本漱石或直哉的小说没有培养出革命家是明显相反的。”^③能够这样理解漱石和志贺直哉,让我觉得这确实是中国文学研究者的风格,所以我还记得。那么您是不是说您在这种意义上不是文学家?……^④

巴金并没有否定木下所讲的“这种意义”,可以说巴金大体上赞成他的意思。也许巴金希望木下能够深入理解“这种意义”,于是出此心意,等木下讲完,随后补充了一句说：“在刚刚送您的《随想录》(第一集,香港,三联书店,七九年)

① 《家》,1937年,1月。《文丛》第1卷第1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3月15日,第147页。

……我对于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积愤到现在才有机会被吐露出来。我写了《家》,我若把这本小说作为武器,我是有权力的。

该篇散文《家》后改题为《家》的《十版改订本代序》(1937年2月)。

② 本书第228页资料④《相隔三年的对话》,第6页。

③ 冈崎俊夫《后记》(あとがき),1954年9月15日。《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7卷《巴金篇》,河出书房,1954年9月30日,第367页。

④ 本书第228页资料④《相隔三年的对话》,第6—7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中,我也多处提到我不是文学家。”^①

以上是从巴金与木下的对话得出的“我不是文学家”的含义。

一般来讲,“我不是文学家”这种说法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虽是文学家,但本来想当革命家^②,只是偶然写了些作品,之后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作为革命家发展事业的心愿至今也没有改变,自己不过是以文学的方式来展现而已。

另一个层面是:虽是文学家,但从以往的经历来判断,自己并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文学家;从这种意识出发,强调自己不是文学家。

木下顺二的表述重点在于前者,巴金也没有理由否定它,便表示赞成;然而,巴金的意思也许是说:您同时还有必要考虑到后者,在这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巴金”。

下面通过巴金刚刚提到的《随想录》(第一集)与巴金写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的《灵魂的呼号》,重新讨论、总结“我不是文学家”的含义。

首先是《随想录》(第一集)。笔者仔细阅读了文本,发现文中从未出现过与“我不是文学家”中的“文学家”意思相同的用词。凡是相当于日本的“文学家”的用词均为“艺术家”。

例如:

我不是艺术家,我只能说是文艺的爱好者。其实严格地说,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说我是作家倒更恰当些。“作家”这两个字是老舍同志[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在重庆时[一九四三年前后]经常使用的字眼,……老舍同志不用“小说家”的称呼

① 本书第 228 页资料④《相隔三年的对话》,第 7 页。

② 冯华征《巴金谈作家的生活》。原载《解放日报》1957 年 2 月 26 日。见《巴金专集(I)》,第 17 页。如下:

……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下过决心要做作家,倒是想做个革命家。……

而自称“作家”，只能说是他很谦虚。我称自己为作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话，我只是写写罢了。……^①

《毒草病》^②《遵命文学》^③中也有意思大致相同的说法。

一般来讲，凡是创作作品的人，都会希望以富有艺术性的作品来深刻感动读者，以期丰富读者的人生。巴金亦不例外。这一点巴金也非常清楚，但至今巴金一直在自问、诉说：作为文学家，是不是还有一些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

巴金在《灵魂的呼号》中写道：

……我不是个艺术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我却以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一点光明，假若它不能够对黑暗给一个打击。……^④

引文中的“那个东西”“它”指的是或多或少能够为多数人带来光明、攻击黑暗的东西，这对巴金来说，具体来讲即是与本篇小论第三章的“敌人”相反的东西：保障人的尊严的“自由”，促进社会进步与人性发展的“平等”，以及作为人

① 《长官意志》，1月25日。《随想录》（第1集·1979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12月香港，第40页。

② 1月22日。同上书，第35页。

我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专门学过文学。即使因病搁笔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③ 1月24日。同上书，第36页。

我说我不是艺术家，并非谦虚，而且关于艺术我知道的实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认的：我写了五十年的小说……

④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第312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的生存过程中的基本伦理的“相互的爱”，这些都是巴金渴望得以实现的。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比艺术之长久更加久远地继承下来的重要课题吗？在巴金看来，通过写作为此课题做出贡献，把自己投进这一“长久”课题之中去寻求自己生存的依据，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巴金来讲，既然要求自己通过写作接近“那个东西”的境界，那么意识到自己是文学家或是艺术家则毫无意义；对更要坚定、一贯自我立场的巴金来说，人们一般所说的“文学家”“艺术家”的意识是无用之物，乃至不该具备的意识。

在《我和文学》的演讲中，巴金说“我不是文学家”，重新确认了他的这种立场。

二、我一向留意写作同生活的一致

在此次演讲中，巴金谈到了写作同生活的一致：

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

我最近还在另一个地方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①。我几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辩论时就说过：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丑八怪，不打扮，看起来倒还顺眼些。他说：“流传久远的作品是靠文学技巧流传，谁会关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这仍然是在反对那些无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语。我最恨那些盗名欺世、欺骗读者的谎言。^②

① 《探索之三》，2月28日。《探索集》（《随想录第2集·1980年》），第47页。

② 本书第227页资料②《我和文学》，第138页。

在此前后，巴金多次在《随想录》中谈到这一话题，其中有些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巴金在此次演讲中的发言。下面举出的两段文字，均写于此次演讲之前。

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作品便是一份一份的“思想汇报”^①。它们都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我不能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它们是严肃的。我看到什么，我理解什么，我如实的写了出来。……^②

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学家的探索不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的问题。我想来想去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怎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③

反复自问“怎样生活得更好”，将其生活方式直接反映在作品当中，乃是巴金所探索的小说。这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但至今，巴金一直都没有迷失他心目中属于最高境界的这个目标。

还记得在此次演讲中听到“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这句话时，笔者一时没有弄清楚巴金到底要说什么，但仔细考虑后才明白，说谎则意味着割断双方的关系（写作同生活的一致），笔者这才想通。

三、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

关于这一点，巴金说：

① “文革”中遭到拘禁期间，巴金常要写检讨、接受检查。巴金如此遣词，旨在把语义直接联系在那些叙述了每时每刻的看法与心情的汇报上。

② 《再谈探索》，2月15日。《探索集》（《随想录》第2集·1980年），第40页。

③ 《探索之三》，2月28日。同上书，第44—45页。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

……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①

关于这“敌人”，笔者已在本文《引言》中引用了巴金写于一九三五年的文章。其实在这之前，巴金已在写于一九二一年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中用过“敌人”一词，表现了他与此相互对峙的姿势。

上面所列几种[政府、私产、宗教]，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到幸福路的第一步，就要推倒这些。这些东西消灭后，再分配财产，自由组织，互相扶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图众人之利益，众图个人之安宁。这岂不是幸福吗？……^②

这是一九二一年巴金大概十六岁那年写的文章。此时，巴金已经接触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并发表了几篇论文，这是其中的一篇。可见，从此巴金开始意识到“敌人”这一对象。到了上述一九三五年前后，它的具体形象已经定型，至今一直都没有改变。

如果按照巴金的说法来讲，他的文学作品大致可以这样划分：以一九四二年

① 本书第 227 页资料②《我和文学》，第 137—138 页。

② 署名芾廿(李尧棠[巴金]之字及笔名)。《警群》第 1 号，成都警群月报社，1921 年 9 月 1 日，第 14 页。(该处转引自：《巴金全集》第 1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7 页。——译注)

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①为分界线,之前的作品直接倾吐了他奔放的感情,而之后的作品却压抑、埋没、时而暗示了感情^②。通过这种方法,巴金与“敌人”一直斗争到今天。

结语

听了巴金《我和文学》的演讲,笔者对“我不是文学家”这种说法深有感触。巴金在一篇题为《把心交给读者》的随想中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随想录》]当作我的遗嘱写。……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③记得笔者在听演讲时突然想起了“遗嘱”一词,感到他所强调的“我不是文学家”颇有分量,便产生了一种肃穆的心情。

在演讲当天上午,笔者与世界语者德田六郎先生、朝日新闻福地山分局的池本盛雄先生、巴金研究者岛田恭子女士一同来到巴金下榻的宾馆。与巴金畅谈时,觉得他好像对下午的演讲怀有某种期待。

后来才知道,据《二十年的心愿》^④所述,巴金是在演讲的四天之前,在广岛的宾馆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完成了《我和文学》的讲稿。关于当时的心情,文中写道:

于是我想起昨夜留下来的未完的讲话稿,已经夜深了,可是有什么力量在推动

①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4月。——译注

② 《谈我的短篇小说》,1958年5月—6月。原载《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1958年6月8日,第16—20页。见《巴金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第454页。

③ 2月3日。香港《大公报》1979年3月6、7日。《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44页。——译注

④ 巴金分别于1961、62、63年访日,每次都想去访问广岛,但都未能实现,此次终于如愿以偿了。《二十年的心愿》的标题正表达了巴金的这种心情。

我,也许就是我常说的那种火在烧我自己吧,我移坐到小书桌前,一口气写完了它。一共不到三千字,我又立下了一个心愿:给自己的十年苦难做一个总结。……^①

一九七七年,受拘禁的生活得到了解放。从此,巴金撰写了多篇随想,重新确认了自我立场。通过此次演讲可以看出,巴金已下定决心要总结他的经历,就此告一段落。

“那种火在烧我自己”也许是说,当一定要讲出真话的强烈感情为某种因素所触动时,种种往事将变成一团烘热的火焰,在他心头高高燃起。

巴金在一九二二年创作的第一首诗《被虐待者底哭声》中写道:

火一般的悲愤在我底心里燃烧着,/……

……

风能吹熄的,/水能淹没的/不过是寻常的火罢了;/但这是我底心里底火呢!^②

十七岁的青年巴金听到被虐待者的哭声,燃起了悲愤之火焰。巴金心中的火焰至今一直都没有熄灭,相信今后也将继续燃烧下去。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① 本书第 228 页资料⑩《二十年的心愿》,第 167 页。

② 署名佩竿(李尧棠[巴金]之笔名)。《文学旬刊》第 44 期,时事新报社,1922 年 7 月 21 日,第 4 面。

巴金小说《灭亡》中的 爱与憎*

对笔者来说,谈论“爱与憎”这一主题,感觉负担颇重。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笔者会设想某种伦理观念,随意制造出其假象,另加生活方式单调,所以一旦涉及赤裸裸的爱与憎或男女关系,总觉得这绝不是笔者力所能及的事情。

“爱”是个关键词。讨论巴金文学便无法避之不谈,这一点笔者十分清楚。

* 该篇原载《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论集》第2卷第2号,1987年12月,第167—184页。

笔者曾根据散文《我的几个先生》^①讨论过巴金的家庭环境,以及巴金通过母亲陈淑芬的养育逐渐认识了爱^②。然而,这是为了理清巴金思想的发展过程而设置的一个环节,其中只触及了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爱”而已。因此,这自然与本篇小论关于《灭亡》中曲折又鲜明的爱与憎的论述旨趣相异。

另外,笔者一直在回避讨论《灭亡》中“爱与憎”的问题,这是别有原因的。因为:杜大心强调“憎”,李静淑强调“爱”,两者在《灭亡》中逐渐增强,构成了小说的结构,但实际上,小说并没有明确地表现出“爱”“憎”同源(渊源相同);不过,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能够令人联想到这一点的文字共有两处^③,本来是应该通过这些文字来体会的,但毕竟不易被人发现,即便有人注意到它们,并发现“爱与憎”同源,可是一旦涉及用什么来证明“爱与憎”同源时,问题则会变得更为复杂。

笔者偶然发现,巴金在《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④中提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的道德》(一八九〇年)。笔者也曾读过该篇,文中一处如下:

我们对于别人的行为,随便他自己以为怎样最好,就怎样做,无论他犯了反对社会的行为,也绝对不承认社会有责罚他的权利,然而我们对于好坏,究不能无爱憎,我们保存这种能力——这是动物社会维持及发展道德、情操的力量——人类有此,也就够了。^⑤

① 《中流》第1卷第2期,中流社,1936年9月20日,第96—100页。

② 见本书所收《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第1章第11—13页。

③ 见本书第247—248页划线处。

④ 1929年6月14日写成,1940年6月15日改作。《克鲁泡特金全集》第10卷《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平明书店,1941年6月,第503、504、508页。

⑤ 《无政府党的道德》(无政府主义的道德),八太舟三译。《克鲁泡特金全集》(クロボトキン全集)第8卷,春阳堂,1928年8月31日,第564—565页。(该处引自《无政府党的道德》,《克氏全集》第1卷《国家论及其他》,上海自由书店,1927年11月,第86页。就作者引用的日文版《无政府主义的道德》而言,在引文中的“我们保存这种能力”之前还有一句,可译为:“爱吧,但也要憎。因为只有知道怎样憎的人,才知道怎样爱。”但在中文版中却没有这句。——译注)

不难想象，巴金也一定读过这段文字，但我们却不能以此断言巴金根据这段文字做出了“爱与憎”同源的判断。至少笔者通过这段文字大致理解了“爱与憎”同源，于是才产生了讨论《灭亡》中的“爱与憎”问题的想法。

笔者使用的版本是：巴金《灭亡》，开明书店，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版，第一章至第二十二章，三十二开，共二二六页。文中用括弧标示页码的文字，均依据该版。

一

首先介绍《灭亡》的梗概，其次讨论巴金所理解的“爱”与“憎”是什么，之后思考小说怎样展开“爱与憎”。

时间：一九二五、二六年。

地点：上海。

当时，上海正处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统治下。

主人公：杜大心，在纺织工人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他离开成都，来到上海，考进一所大学。后来，“因一个同学底介绍，相信了为人类谋幸福的自由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加入革命团体。后来他竟完全抛弃学业，离开学校，把他底全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面”（第三章《四年以前》，第三十七页）。

就这样，杜大心为了宣传主义、煽动革命，在纺织工人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在这前后，因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杜大心与李冷、李静淑兄妹相识。李冷读大学二年级，李静淑是大学预科生。他们的家乡在江西，父亲是清朝的一个大官僚。不久，杜大心与李静淑开始相爱，而面对工人与贫民遭受孙传芳压迫的惨状，杜大心逐渐增强了他的“憎”。李静淑对杜大心基本上表示理解，但在原则上她还是主张用“爱”来拯救他们。李冷虽然没有李静淑那样彻底，但他也想着重表达“爱”。

另一方面，杜大心的工作地点宣传部的内部情况又是如何，文中写有：“在这纺织工人总工会底十几个办事员中分了两派：杜大心是一派，王秉钧也算一派。王秉钧底势力要大一点，他虽然只是一个交际委员，但他是某党〔国民党〕工人部底职员，又是派到这工会来的代表。”（第十二章《杜大心底悲剧》，第一二四页）由于与王秉钧关系不和，杜大心无法顺利完成工作，每天都充满苦恼。

就在此时，宣传部中杜大心所完全信赖的同事张为群携带传单走在街上，被两个巡警发现，被带到警厅，后被送进戒严司令部，关押了八天后被斩首处刑。为了复仇，杜大心用手枪狙击戒严司令，开了四枪，而戒严司令只受了轻伤，一个马弁却中弹身亡。看到如此局面，杜大心便向自己头部开枪自尽。

杜大心就这样灭亡了，但“五年以后在 S 市纺织工人大罢工里，工人占据了工厂，使各厂主不得不屈服。而这次大罢工运动的主动人物乃是一个深得工人们底敬爱的青年女郎。据说她就是李静淑”（第二十二章《灭亡》，第二二五—二二六页）。

以上是《灭亡》的梗概。小说中集中谈到“爱与憎”问题的部分几乎都与杜大心有关，分别为：第九章《杜大心与李静淑》、第十章《爱与憎》、第十一章《立誓献身的一瞬间》、第十二章《杜大心底悲剧》。

“爱与憎”这种说法简单，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爱”与“憎”。下面围绕巴金的理解来讨论这一问题。

笔者在第一章节中已经说过，为了理清巴金思想的发展过程，笔者曾讨论过巴金的“爱”。其方法则是：首先对“爱”这一概念下定义，之后以此来理解巴金的“爱”，但结果彻底失败。其原因之一则是笔者实力不足，概念定义未必明确；但相对来讲，更关键的是：我们理解巴金的“爱”时，与其依靠概念定义，不如直接去了解“爱”这一行为具体表现在哪些现象里面。至少就巴金而言，这种方法更为妥当。

巴金在散文《我的几个先生》中说：

……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母亲陈淑芬〕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

了“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极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叫我去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①

引文中应该注意的是后半部，“爱”被理解成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具体表现其实是一种互助行为——包括出自对人的关怀去帮助别人或受人帮助的表现。

所以巴金继续写道：“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拿来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点事情，把我和这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②巴金在该篇结尾又写道：“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③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还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④

也就是说，巴金的“爱”并非只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燃起或熄灭，它要超越这种局限，不断地意识到非特定的多数；它要作为面对社会的问题、作为具体行为表现出来——具体而言即是帮助别人、与人互助的行为。假如我们不能预想到这一点，那么就不能算是对巴金的“爱”做过讨论。

那么“憎”又是如何？笔者在第一章节中提到了克鲁泡特金《安那其主义的道德》，文中一处写有：“我们对于好坏，究不能无爱憎，爱吧，但也要憎。因为只有知道怎样憎的人，才知道怎样爱。”^⑤笔者想援用这句话。坏（恶）才是“憎”的对象、它的一切。可以说，巴金的“憎”也具备了这种性质。

假如从坏（恶）才是“憎”的对象的观点出发，重新阅读《灭亡》会发现，原来小说从第一章到第二十二章全篇都在描写“憎”的对象。

其中以下几处尤为明显：

① 《中流》第1卷第2期，第97页。

② 同上书，第98页。

③ 指朋友吴先忧，巴金的“先生”之一。巴金说朋友吴教他“自己牺牲”，给他“勇气”。见《中流》第1卷第2期，第100页。——译注

④ 《中流》第1卷第2期，第100页。

⑤ 见本书第241页注⑤。——译注

第一章《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戒严司令部秘书长乘坐的汽车轧死一个人，却把他当作蝼蚁。

第五章《一个平淡的早晨》：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因饥饿偷了萝卜，被带去找巡捕。

第九章《杜大心与李静淑》：卖小孩的叫喊声；灰白胡须的老人和他孙女的褴褛打扮^①。

第十章《爱与憎》：杜大心年幼时看到的饿死的人，与待人冷淡的一些人。

第十五章《革命党被捕》：张为群的身世与军阀孙传芳的压迫。

第十八章《两个世界》：一个是光明、温暖的世界，而另一个却只有饿死、冻死。

由此可见，《灭亡》全篇充满了“憎”。

此外还要补充一点：《灭亡》直接转载了巴金写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全文如下：

我不能爱，我只有憎。我憎恨一切的人，我憎恨我自己。

迦尔洵说过：“狼不吃狼，人却欣然地吃人呢！”不错，我每日只见着人吃人的悲剧。人能爱人吗？为什么在一个同样的人的世界中，一边是光明的，热的；而一边却是黑暗的，冷的呢？一些人在热的世界中狂欢，一些人却在冷的世界中冻死。我们坐视着。我们为将来的人许下了美丽的东西，而对于现在那些快要冻死饿死的人又怎样呢？什么是将来！所有的将来的希望都在这不死不活的现在中消失了。什么是“梦”？难道“梦”能使饿着冻着的人满足吗？我们尽管以美丽的梦来安慰人们，然而人们依然是不断地饿死冻死，被同类摧残而死。对于那些人我们底话还有什么力量！他们是会带着憎恨的记忆而死的。我要做一个替他们复仇的人。

我恐怖死，然而憎底力量却胜过了死底恐怖。我既然不能为爱之故而活着，我

① 老人与他孙女出现在第5章《一个平淡的早晨》中。——译注

却愿意为憎之故而死。到了死,我底憎恨才会消灭的。——五月二十八日。^①

读完这篇日记会发现,这与《灭亡》中的“憎”的性质极其相似,甚至会令人觉得就是这篇日记创造了《灭亡》。

至于落款日期的五月二十八日,笔者还无法断定这是不是真正日期,但假如真正是五月二十八日,那么此时应该是巴金于是年(一九二七年)初夏前往蒂埃里堡(Château-Thierry)之前侨居巴黎的那段时间。

以上是笔者所理解的巴金的“爱”与“憎”。那么,巴金在《灭亡》中怎样通过杜大心、李静淑还有李冷表现了“爱与憎”?巴金又描写了他们的哪些具体表现?关于这些方面,下面通过作者对出场人物各自立场所做的说明,以及出场人物根据各自立场提出的观点,重新讨论这一问题。「」内的文字是作者的说明,『』内的文字是人物提出的观点,页码下面的括弧中的内容是笔者的补充说明。

第九章《杜大心与李静淑》

杜大心

「他自己底命运是断定了:监禁和死亡,而且愈快愈好,愈惨愈好。他决定要做一个为同胞复仇的人,如果他不能够达到目的,那么,他当以自己底极悲惨的牺牲去感动后一代,要他们来继续他底工作。所以在他愈是悲惨的命运愈好。然而要

① 开明书店版,第12章《杜大心底悲剧》,第128—129页。另外,巴金在《灭亡》的《序》第3页提到了人物原型:

自然杜大心不是我自己,(1)我写其余的人也并没有影射谁的心思。但我确实在中国见过这一类的人。……

(1) 只有第12章内5月28日的日记是从我自己底日记中摘录下来的。

是她[李静淑]爱上了他,这一切她也不得不分享了。她底青春,她底美丽,她底才华都如此断送了。……多么可怕,……多么残酷。……他实在不能爱她,至少也不能使她知道他是在爱她。……但他现在是没有力量了!

矛盾的思想反复地来到他底脑中。……」(第一〇三—一〇四页。)

李静淑

「……她相信人应该彼此相爱,互助地,和平地生活着,那么她就不能再过那种靠别人底血汗,别人底眼泪来建筑自己底幸福的生活。她不能再过寄生生活,也不能再过吃人生活,杜大心底话多么刺人!但她知道杜大心底话是很公平的,因为她确实还是一个“千金小姐”。

……

她以为她现在更了解他,她相信他底出发点是和她底相同的,这就是她所奉为上帝的一个字“爱”。然而这“爱”何以会变成“憎”,在她还是不能明白的。……」(第一〇七—一〇八页。)

(李静淑相信杜大心的出发点是爱,又相信她在这里找到了她与杜大心的共同点。可是她没有理解爱憎同源,所以才以为爱会变成憎。这是她无法理解的。)

第十章《爱与憎》

李冷

……「我想你[杜大心]底毛病就在抛弃了爱,只从憎那方面去着想,所以觉得世间的一切是可憎,可悲的。……其实你应该像我一样,多在爱一方面努力。只要达到爱的境地,你底心自然也就宽大了,也不会再感到悲哀了。就拿我来说,我觉

得自己并无大的希望,我只望能够过着安静和平的爱之生活。我希望自己得着和平,也希望别人得着和平,我愿意自己幸福,也愿意别人幸福,我爱自己,我爱生物,我爱人类。我觉得世界是十分可爱的。如果你说我们底世界坏成了这样子,正因为人们抛弃了爱,彼此相恨。正是爱太少了,憎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用爱来消灭憎。……】(第一一一——一二页。)

(李冷认为爱与憎是相对立的。)

李静淑

『其实,我看杜先生也并不是不知道爱的,』李静淑插口向她底哥哥说。『我读他[杜大心]底《一个英雄底死》那几首歌,我总觉得那里面燃烧着一颗火一般的为爱而牺牲之心。……』她又转过头对杜大心说:『杜先生,你不是说过这是从一个共通点出发的吗?那么,你一定也承认爱字。……我想我很能了解你。你大概一生尝到憎底味道多而爱底味道少,不知不觉地留下很大的印象,只觉得人间可憎,可怕。人们本来就很难互相了解的,自己既然怀着憎恨之心,好像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镜,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他底仇敌,都在憎恨他。……你难道觉得我也是你底仇敌?你觉得我是可憎的吗?你会憎恨我吗?』……(第一一二页。)

……『其实世间并无绝对的事,爱与憎也是相对的。爱多一分,憎便少一分,你虽然在过去只尝到憎,但将来还有不少的机会来尝爱的。没有爱的人尚可以学习而发展爱,何况你本有一颗热烈的爱之心呢。……』(第一一三页。)

(李静淑还是不能理解爱憎同源,她在引文后半部说爱与憎是相对立的。在此应该注意的是,李静淑与杜大心不同,她摆脱了爱憎是否同源、她能否理解爱憎同源的问题,从而表现了今后她仅以爱去创造世界的姿态。)

杜大心

『至少在这人掠夺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凡是曾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苦痛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的。我发誓，我拿全个心灵来发誓说，那般人是应该灭亡的。至少应该在他们灭亡之后，人们才能相爱，才配谈起爱来。在现在是不能够的。』（第一一七——一八页。）

（除了憎以外，杜大心任何情感都不存在了。除了通过憎曲折地表现爱之外，他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了。听了杜大心的话，李冷与李静淑重新立下誓言。）

第十一章《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李冷

『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底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第一二〇页。）

（李冷摆脱了“爱与憎”的问题。）

李静淑

『我还是相信这世界只有用爱来救，我决不相信憎。不过以后我们要用行为来表现爱，而不单是言语了。』（第一二一页。）

（尽管李静淑仍旧停留在“爱与憎”的问题上，可是她主动地抛弃了“憎”，只

选择了“爱”。)

第十二章《杜大心底悲剧》至第二十二章《灭亡》(第一二三—二二六页。)

杜大心

(正如“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记所述,杜大心下定决心要复仇,但却对死感到恐惧,然而,憎的力量战胜了他对死的恐惧。他没有选择为爱而生的方法,反而选择了为憎而死的方法。他已经预料到,直到死他的憎才会消灭,而爱也将因此消灭。“爱与憎”同源的结构由此告终。显然,做出这种选择后,杜大心如同落入十八层地狱般地迅速走向灭亡。张为群被捕,斩首处刑,杜大心复仇,谋事不遂,自断生命,走向灭亡。)

三

最后,以《灭亡》第十章《爱与憎》中的李静淑提到的《一个英雄底死》为例,来阐释《灭亡》为何不得不以“爱与憎”同源之构图作为终结。

在笔者使用的版本《灭亡》开明书店版第七十七页,第七章《[李冷的]生日之庆祝》中,李静淑说:

……这是我新近学来的,歌名《一个英雄底死》,说的是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军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进底故事。……

诗如下:

“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我自己本也知

道这样的事情，/然而我底命运却是早已注定！

告诉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没有牺牲，而自由居然会得胜在战场？/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也愿意做到这样……”^①

关于这首诗，巴金在《谈〈灭亡〉》中的解释如下：

……这八句关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的诗决非表现“革命也灭亡不革命也灭亡”的虚无悲观的思想。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Погибель）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我这几句改译的诗不仅歌颂了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辛，也歌颂了为俄国民主革命英勇战斗的十二月党人，也歌颂了一切“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②

《小说月报》的连载（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二月十日、三月十日、四月十日共四次）结束后，开明书店出版《灭亡》单行本时（一九二九年十月），巴金把这首诗放在扉页，以作献词。

《一个英雄底死》是覆盖小说《灭亡》全篇的一首诗，也是作者巴金献给走向灭亡的杜大心的安魂曲。

① 开明书店版，第7章《生日之庆祝》，第80—81页。——译注

② 《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4月5日，第61页。

四

假如“爱与憎”同源,那么可以说一贯坚持“憎”而灭亡的杜大心鲜明地向我们展现了“爱”的具体表现。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蒂甘(巴金)致袁诗尧的
书信》(一九二二年)
解说*

一、引言

笔者曾以《五四时期巴金的诸篇论文及致袁诗尧的书信》为标题,在《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论集》第二卷第一号(一九八七年七月)翻译、介绍了几篇史料的全文。此次将从中选出《蒂甘(巴金)致袁诗尧的书信》(下简称为《书信》),试图加以解说。

* 该篇原载《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论集》第4卷第1号,1989年6月,第31—56页。

可是一旦真正查起资料来便发现，问题涉及面较广，篇幅也会增大。因此，本文仅对袁诗尧本人以及未能出版的刊物《革命》《利群》加以解说。

正因为如此，关于在《书信》中提到的其他人名、杂志、单行本、组织、团体、事件等，分别在本文结尾逐一加以简要解说。

《书信》大小为竖十六厘米×横十二厘米，横书，共信笺三枚，如下^①：

诗尧兄：

来信收到。

《革命》印刷交涉失败。洪先生说要检查后才能印。我们这样东西怎么能送去检查呢？版已排好，结果由我们付了六元半钱的版费（此是先忧去交涉的详情，可问他）现在大约油印出版。

《利群》停□事，先忧要告诉你。

《社会运动》只出了两期，第一号我这里没有。（成都也没有见过这书。）第二期重庆某君寄了几份来（他说，全的只是这几份，其余的不是没有第一号，就是没有第二号，总清不齐全五张）。故现只寄上一份，请查收。《兵的话》现寄上几份，其余稍缓再寄。

得人道学社（汉口）通告，谓北京同志陈德荣等二君在京被捕，不知何故，俟探得时再报。

在远东运动会场散传单被捕的同志自公堂判坐西牢十年（持平一人），半年（革生、唯奇等三人），（华清语多乞怜，故未得坐西牢。其余的四人皆不肯低首于民贼之前，故都判坐西牢。）后，经天研、危舟、介眉等筹款六百五十元（半为适社印刷费，半由同志筹集）请律师辩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于前日复□，结果，还是无效！而律师费已去。奈何，奈何！

天研著了一部问答书，解释吾党学说非常详细，现归泰东书局出版，版权作送，两月内出书。

上海近来成立了个安那其同志社，有宣言发表，俟到时再寄与你。

^① 根据手稿整理，原件手迹见本书插图。——译注

武汉明社已成立,为武昌、汉口、汉阳三处同志所组织,宣言尚未印好。请了。
祝你努力!

芾甘

二十二,九,一九二一

二、关于袁诗尧

《书信》开头的收信人诗尧,即是袁诗尧。

笔者第一次看到袁诗尧的名字,是在巴金《谈〈春〉》中。

① 巴金《谈〈春〉》。《收获》一九五八年第二期,收获社,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二二一页。

……方继舜的真名是袁诗尧^①。他编辑《学生潮》^②,为了梨园榜痛骂某名流的时候,还是高师的学生。他同我们在一起工作过一个时期,我们都喜欢他。他后来加入共产党,在某中学当教员。在一九二八年的白色恐怖中他在成都被某军阀枪毙了。

笔者根据以上内容,从巴金的文章中选出了与此相关的几篇,如下(为方便起见,每篇均附资料序号②—⑪):

② 巴金《小小的经验》。《文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文学季刊社,

① 关于袁诗尧(Yuán Shiráo)被写成袁诗尧(Yuán Shiyáo)的问题。在资料①巴金《谈〈春〉》的《巴金文集》版(《巴金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第367页)以及资料⑩中,名字均为袁诗尧,但在《芾甘(巴金)致袁诗尧的书信》中收信人为“诗尧兄”;另外,在资料⑨以及近年发表的关于卢剑波的资料⑪中,名字均为袁诗尧。经综合判断,笔者认为袁诗尧是正确的名字。

②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12月)第389页写有“四川学生潮 成都四川全国学生联合会 1—10,1920”。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一〇七八页。

……我们秘密地出了一期停刊号^①，详细的记载着这件事情的经过。那里面的两篇长文的确写得慷慨激昂，是出于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的手笔。我读着它们，血就会沸腾起来。这朋友不久在高等师范毕了业，便因了生活问题到别处去了。以后我也再没机会和他见面。听说他四五年前在一个悲惨的情形下面断送了性命。

③ 巴金在《我的幼年》中写道：“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团体均社。我被人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是从这时候起的。”^②

后来，巴金在“安那其主义者”之处标注解释他与安那其主义的关系，如下：

……从前我在成都办刊物的时候，有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可是后来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终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军阀逮捕枪决了。……^③

④ 《巴金选集》的《后记》，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巴金选集(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三月，第七三九页。

……从前我们在成都办刊物《半月》的时候，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有时还把他当作导师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巴金小说《家》《春》《秋》]里面的方继舜。在我离开成都[一九二三年五月^④，前往上海]以后，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终于找到了正确

① 杂志《半月》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下半期发行第24号后，因提倡女子剪发而被查禁。停刊号是在这之后发行的。

② 《中流》第1卷第1期，中流社，1936年9月5日，第8页。

③ 1959年5月注。《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20—121页。

④ 李存光编《巴金著译年表》关于1923年的记述中写有“4月月初偕三哥尧林乘船赴上海”。见《巴金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518页。——译注

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军阀逮捕枪毙了。……

如果根据巴金在①《谈〈春〉》与④《巴金选集》的《后记》中的说法——袁诗尧即是《激流三部曲》的方继舜的原型——来查阅小说文本,可以找出许多相关场面,但在此仅就可供了解袁诗尧的文字,从小说《家》《春》《秋》中举出几处。

⑤ 巴金《家》第二十六章,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二十一版(附《十版改订本代序》,即所谓“十版改订本”),第三〇六页。

觉慧得知冯乐山将娶鸣凤为姨太之后,感到惊讶,有一些问话,二哥觉民回答他的询问,其对话如下:

[觉慧:]冯乐山? 我不相信! 他不是孔教会里的重要分子吗? 他快要到六十岁了,还讨小老婆? 一定是你听错了话了。

[觉民:]你忘记了去年他们几个人不是因为发表了梨园榜,点薛月秋做状元,被高师底方继舜在《学生潮》上面痛骂了一顿吗? 他那种人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横竖他有钱。明天就是他接人的日子。我真替鸣凤可惜。她今年才十七岁咧!

关于引文中“冯乐山”与“方继舜”的名字,在巴金《激流》第二十七章《生与死》(《时报》^①,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第一张,第一三九回)中,“冯乐山”名为“王乐山”,“方继舜”名为“黄存仁”;而在巴金《家》第二十六章《生与死》(开明书店,一九三三年五月初版,第四〇六页)中,“王乐山”名被改为“冯乐山”,而方继舜依旧为“黄存仁”。因此,笔者认为这段对话中的“黄存仁”大概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十版改订本之际名被改为“方继舜”。为明确起见,顺便补述一点:“黄存仁”是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注1]的学生,比觉慧高一年级,他从最初的《激流》(《时报》所载)起就一直出现在小说中。因此,从《时报》版到初版

① 最初连载发表巴金小说的报刊,发行所为上海时报馆。连载时小说标题为《激流》(初版本出版时改题为《家》)。自民国20年(1931年)4月18日至民国21年(1932年)5月22日,共连载二百四十六回。

本,“黄存仁”同时扮演着“方继舜”的角色。

⑥ 巴金《春(六续)》。《文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文季月刊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第一二四页。

众人 and 琴打了招呼,连觉民一共是十一个人,除了一个二十六七岁光景面容苍老而带着沉毅的表情的男子外,其余的人她都见过。觉民把那个陌生的人介绍给她认识了。方继舜,这个名字是她熟悉的。她知道他是停刊了的《学生潮》周刊底编辑,他在那上面发表过一篇题作《道德革命》的长文,接连刊登了三期,中间因为攻击到几个孔教会底重要分子,这省城的大名流,老绅士之类,曾经引起过一般保守派底责难,要不是靠着当时的学生联合会底抗议(《学生潮》是学生联合会底会刊),他就会被高等师范开除了。……

⑦ 巴金《春》。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月再版(开明书店,一九三八年三月初版),第三八八页。

……他们也要组织一个这样的秘密团体^①,而且渴望做一点秘密工作。方继舜是他们中间最热心的一个,他被推举来起草宣言。……

同书第三九一页写有:

团体底名称也议定了,是“均社”[与巴金等人成立的组织名称相同]二字,方继舜提出的。……

⑧ 巴金《秋》。《巴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十月。

① 指“适社”(在重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在引文的前一行,巴金提到了《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的小册子。

在《利群周报》即将迎来办刊两周年之际(同书,第一三二页),他们决定召开纪念大会。此前举行筹备会时,因方继舜还未到场,黄存仁便向各位说“继舜近来学生会[成都学生联合会]的事情多”(同书,第一二七页)。同书同页另有对方继舜的人物介绍:

……方继舜今年二十八岁,是高等师范学校四年级的学生,面容显得比他的年纪老,不过那种常在的沉毅的表情却使人相信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

此外,同书第一三一页又提到了方继舜在这次筹备会中所谈到的如何关注劳动运动的问题。

……他认为应当把参加劳动运动、接近工人、援助工人的日常斗争等等问题列入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

之后召开《利群周报》办刊两周年纪念大会时,“方继舜被推举做主席”(同书,第四六六页)。

以上列举了巴金有关袁诗尧的文字。以下介绍其他人所写的关于袁诗尧的文章。

⑨ 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一七三页。

在青年学生向各种主义摸索的当中,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无政府主义信仰者了。其骨干是巴金、张拾遗、吴先忧^①等人。他们成立了无政府

① 指《书信》中的“先忧”,也是《我的几个先生》(《中流》第1卷第2期,中流社,1936年9月20日,第96—100页)中的“朋友吴”,又是《激流三部曲》中的“张惠如”的原型。

主义者联盟,出版了《半月报》,在这个报查封后,又出版了《平民之声》,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此外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只在一些节日张贴点小标语传单,因此影响不大。部分成员亦逐渐受了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发生分化,如袁诗尧同志在不久就转为马克思主义的战士了。

《五四运动在四川》结尾(同书,第一七五页)的附记如下:

谨以此文献给当时四川学生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在一九二八年为革命而牺牲的袁诗尧同志。

一九五九年二月,于成都

⑩ 孟默《新文化运动在四川》。《新文学史料》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三十七页。

文中介绍了袁诗尧与《学生潮》的关系,如下:

……它[《学生潮》]是整个成都学生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代表了全个成都市四、五十个学校的集体,数千学生的言论行动,都由此一刊物作为发踪指示的目标,所以对于当时的抵制仇货运动,成为一极有力的武器,具有无穷威力。同时被推为主编人之高等师范学生会,即由张秀熟、袁诗尧[本名“尧”字在文中均写做“尧”,下同]等负责,对于成都的封建教育,封建人物,更加以剧烈的猛攻,使得五老七贤们坐不安席,后来张秀熟之入狱,袁诗尧之被戕害,虽由反动军阀的狠毒手段,但其种因,此亦其一端。因为袁诗尧词锋犀利,更为反动派所十分恐惧之故。

⑪ 蒋俊《卢剑波先生早年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纪实》。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〇一四页。

卢剑波^①在重庆的时候,曾由陈小我[本名陈慕勤,重庆“适社”创立者]介绍,和成都的袁诗尧、李芾甘[巴金]、吴先忧等人建立了通讯联系。他[卢剑波]离川时,还收到袁诗尧的信,信中鼓励他认真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袁诗尧同志是五四运动时四川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最初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四川军阀向传义^②所杀害。……

虽然我们现在可以阅览据说是由袁诗尧起草的《均社宣言》^③,但他的其他论文笔者还没有找到,因此关于他的思想还有许多不明之处。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认为^①至^③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他的一个大致轮廓。

下面仅就这些资料与第三章《关于〈革命〉〈利群〉》的相关内容加以总结。正如^②所记载,《半月》以第二十四号(一九二一年七月下半期)停刊,袁诗尧在后来发行的停刊号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不久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二一年

① 笔名有黑囚、吴运、矛突、大吉等,四川合江县人,1904年生。五四时期即接受无政府主义,在合江成立“觉社”。1923年,在南京创办《民锋》《黑澜》等刊物。1926年至1928年,在上海组织“民锋社联盟”“中国少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联盟”“工团主义研究会”,并复刊《民锋》。1931年回四川,先后编辑出版《憧憬》《破晓》《惊蛰》等刊物和《疑信行》等小册子。解放战争期间,担任《长江月刊》主编。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见黑囚[卢剑波]《时代中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其二)》“编者注”栏。《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804页)。

1983年12月2日,笔者曾在成都采访过卢剑波先生。

② 外务省情报部编纂《改订 现代支那人名鉴》(1928年9月30日,第674—675页)中写有:

向傅义(Hsiang Fu-yi),字育仁,四十五岁。学历:日本留学出身。经历:任第五师所属团长后任四川三师长。民国16年7月,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曾为政学会派所属。党派:国民党。

向传义被写成向傅义。

此外,田尻撰《四川动乱概观》(杨凡译,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4期,中华书局,1963年5月,第63页)附表二“第二十四军刘文辉八师十旅兵力十六万五千四百人”中写有:师及区分,第五师;师长,向传义。

③ 本书所收《五四时期巴金的诸篇论文及致袁诗尧的书信》第326—328页介绍了《均社宣言》全文。该篇原载《半月》第21号,成都半月社,1921年6月1日。

八月),离开成都。从此,巴金再也没有见过他。《书信》大概写于这一前后。

巴金在③、④中写道:“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那么就袁诗尧“放弃”的时期而言,在巴金寄给他《书信》时,还不能算是完全“放弃”。可是正如⑧中所写,他提倡“援助工人的日常斗争”,会令人感到他与巴金等青年们有不同的一面^①。

三、关于《革命》《利群》

首先是关于“来信收到”。由于笔者不知袁诗尧致芾甘(巴金)的书信是什么内容,故无从推测。但假如反过来从芾甘(巴金)致袁诗尧的《书信》来推测,袁诗尧也许是对巴金等人将要发行或预定发行的《革命》《利群》产生了兴趣,于是致信咨询详情。其他内容,可能是拜托巴金若有存货请寄来《社会革命》等杂志,或向他咨询种种相关信息。

然而,就笔者刚刚提到的《革命》与《利群》而言,从载于这一时期巴金所参与的刊物上的文章——之前巴金撰写的文章或内容涉及巴金的文章——中却找不到任何线索。《利群》这一刊名在《春》《秋》中占有重要位置,常作为《利群周报》出现在小说中;然而,这是巴金以《半月》为前提,在这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刊物,并不是《书信》中的《利群》。这一点下面还会讨论。

也许是因为《革命》与《利群》实际上没有出版,至今巴金也就没有提起它们,这一点暂且不谈;笔者之所以要讨论这两份刊物,是希望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考察,进一步理清巴金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以及这一时期巴金与其他杂志的关联。

首先,以《书信》的落款日期——即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为坐标

① “工人”前后的文字是《秋》被编入《巴金文集》第6卷时才加进去的,之前,从未出现在《秋》的其他版本之中。

点,讨论其与在此前后巴金所参与的杂志的发行日期之关系。巴金在这一时期所参与的杂志,即从事编辑工作或尽力于办刊的杂志有《半月》《警群》《平民之声》。

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第二八四页介绍:“半月 成都半月社 一一二十四[第一号至第二十四号]一九二〇、八——一九二一、七。”《半月》为每半月发行一次。

该刊发行到第十号时,因内部改组,之后逐渐开始刊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①。巴金参与这份杂志是从第十四号开始,不久加入了杂志的组织。

下面按杂志发行日期的顺序排列出这份杂志与巴金的关联。

一九二〇年八月上半期,第一号。

创刊。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下半期,第十号。

发行后改组,逐渐开始刊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一九二一年二月下半期,第十四号。

转载重庆“适社”《适社的意趣和大纲》。看到该文后,巴金开始参与《半月》的组织。

一九二一年四月上半期,第十七号。

刊载巴金的论文《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一九二一年五月下半期,第二十号。

① 艾晓明《论五四时期巴金的思想与活动》(《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2期,《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1981年3月15日,第76页;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1年第11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第69页)中写有:

《半月》出至第10期内部改组,吴先忧、袁诗尧(应为“袁诗尧”。——译注)、刘砚僧等五人经选举组成编辑部。此后,这个刊物陆续载了一些宣传“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刊载巴金的论文《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

一九二一年六月上半期,第二十一号。

刊载《均社宣言》。巴金也参与了《均社宣言》起草。此时,巴金撰写论文《IWW与中国劳动者》,载于该号。

一九二一年七月下半期,第二十四号。

据巴金《小小的经验》介绍:“《半月》刊出到二十四期,我们正准备着大规模的举行周年纪念的时候,这刊物就突然被封禁了。被封禁的理由,说起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是提倡女子剪发。”^①

就这样,《半月》以一九二一年七月下半期第二十四号停刊。

巴金在《小小的经验》中写道:“我们秘密地出了一期停刊号,详细的记载着这事情的经过。”^②按照巴金的说法来讲,后来他们又发行了一期。

笔者曾想过,停刊号的刊名是否就是《革命》或《利群》?可是实际上,停刊号已经发行了;《书信》虽然提到《革命》“油印”出版一事,但相关资料至今也还未被找到,因此,把停刊号的刊名与《革命》或《利群》联系在一起有点勉强。

其次,巴金参与的杂志是《警群》。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第一号。

刊载巴金的论文《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

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第一二四九页介绍:“警群 成都警群月刊社 一一九二一。”

《警群》只发行了一期就停刊了。据巴金《小小的经验》介绍,《半月》停刊后,巴金等八人(芾甘、先忧、拾遗、叔勛、戩初等人)受到该刊主编的邀请,加入

^① 《文学季刊》第2卷第4期,第1077—1078页。

^② 同上书,第1078页。

了《警群》，但因意见不合，不久巴金等人离开了该刊，刊物主编也随即停止了杂志的发行^①。单从时间上讲，《警群》假如是《利群》便符合逻辑，但这却没有任何证据。

最后是第三个杂志，周刊《平民之声》。笔者认为该刊创办日期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前后，发行期数最多不超过十期。

至今笔者也还没有找到杂志《平民之声》，所以在很多方面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下面通过巴金或其他人所写的文章来探讨该刊与《书信》落款日期的关系。

据《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一〇七八页附录《四 无政府主义书刊名录》介绍：“《平民之声》一九二二年成都出版，蒂甘编，至少出了六期。”

引文中的“一九二二年”暂且不谈；关于“至少出了六期”，巴金的说法则是发行到第八期^②。

而在《信仰与活动》^③中，巴金却说该刊发行了十期。如此看来，巴金本人的说法也略有出入，所以在此将不再追究《平民之声》发行到第几期，现将话题转换到《平民之声》究竟何时创刊的问题上。

关于《平民之声》的创刊日期，巴金说：

半年以后我们又办了一种周刊，名称是《平民之声》。这一次是我主持编辑事务，通信处就设在我家里。……^④

“半年以后”意思是说从杂志《警群》停刊算起已经半年了。如上所述，《警群》第一号的发行日期为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经过简单的推算，把《平民之声》

① 《文学季刊》第2卷第4期，第1078—1079页。

② 《小小的经验》。同上书，第1080页。

③ 《水星》第2卷第2期，文华书局，1935年5月，第117页。

④ 《小小的经验》。《文学季刊》第2卷第4期，第1079页。

的创刊日期视为半年(六个月)后的一九二二年三月左右较为合理。

巴金在《小小的经验》^①中提到了他写于这一时期的论文内容。

1. 《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第四期。
2. 论述托尔斯泰社会思想的文章，第五期。
3. 《芝加哥殉道者》，第六期。
4. “心社”^②社约解说，最后一期，《师复纪念号》。

以上各期的发行日期不详。

此外，巴金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发行的适社杂志《人声杂志》第二号第一页至第三页发表论文，题为《五一纪念感言》。

以上围绕《蒂甘(巴金)致袁诗堯的书信》的落款日期，集中讨论了在此前后巴金所参与的杂志的发行日期，由此可以明确指出：巴金在《书信》中提到《革命》与《利群》，是在《警群》第一号(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发行)停刊之后，又是在《平民之声》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前后创刊之前。也就是说，《半月》停刊后，巴金等人便开始摸索能够代替它的刊物，这也许就是《革命》与《利群》。巴金又说，《革命》印刷交涉失败，大约油印出版，但至今还没有资料能够证明刊物是否已经实际出版。

其次是《利群》。笔者如今也还难以忘记第一次看到该刊刊名时感到的惊讶，因为它与巴金小说《春》《秋》中的《利群周报》是同一个刊名。然而，《书信》中的《利群》却与此并非同一种刊物，因为本篇小论第二章节中的资料^③已经明确指出，《秋》中的《利群周报》是即将迎来办刊两周年的刊物。因此，经综合判断，应该说《春》《秋》中的《利群周报》依然是在《半月》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① 《文学季刊》第2卷第4期，第1079—1080页。

^② 刘思复或名刘师复(1884—1915)组织的团体。

刊物。

那么,在小说《家》中又是如何?笔者查阅文本后发现,《家》中的《黎明周报》也依然是在《半月》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刊物。

《家》中有一处可以说明这一点,如下。

在巴金《家》第二十九章《青年底心》中,许倩如谈起警察厅发出布告禁止女子剪发时,与黄存仁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最好把它登在第八期[黎明]周报底《什么话》栏里,”黄存仁笑着提议说。

“好,”许倩如第一个叫起来。^①

其实,《半月》第二十四号(一九二一年七月下半期)《什么话》栏载有一篇报道,内容如下:

《国民公报》一九二一年七月八日载,“省会警察厅出示略云:昨据汪顷波报称,近日妇女每多剪发齐眉,并梳拿破仑华盛顿等头式,实属有伤风化。应予以禁止,以挽颓风。嗣后妇女已剪者,概即蓄留;未剪者不得再剪!如敢故违,定以妇女坐法处罚家长!”云^②

小说《家》中的《黎明周报》第八期与《半月》第二十四号,除了期数不同,其他状况基本相同。

也就是说,无论《家》中的《黎明周报》还是《春》《秋》中的《利群周报》,它们都是巴金以《半月》为前提,在这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刊物。

那么,《书信》中的《利群》应该怎样定位?其实在《家》中,《黎明周报》以

① 开明书店,1933年5月初版,第458—459页。

② 该处译自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谭兴国先生所藏原件的抄写稿。(该处转引自: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32页。——译注)

第八期停刊后，同人开会探讨今后的计划，决定筹备创办新的刊物。同时还决定把之前的“黎明日报社”改为阅报处，陈列各种报刊。接着巴金写道：

……到了第二天利群阅报处就成立起来，很有秩序，而且《利群周报》发刊的事，也筹备妥当了。^①

巴金又在同书《家》第四七八页（第三十章《一件大事》）中写道：

暑假很快地就来了，……觉慧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和他底那般青年朋友聚谈，工作。新的刊物在新的努力之下出版了，又有了新的读者，事情进行得还顺利。

《利群周报》只是简单地出现过两次，之后从《家》中完全消失，再也没有出现。

到了《春》《秋》，《利群周报》才重新出现。

通过这些层面，笔者对《书信》中的《利群》做出了以下判断。

实名刊物《利群》，与《革命》同样，准备在《半月》停刊后出版，但由于某些原因，取消出版。

巴金创作《家》时，在《半月》的基础上使用了一个虚构的刊名《黎明周报》。然而，在《黎明周报》停刊后，巴金需要另取一个新的刊名，这时他想到了《革命》或《利群》，便选择了《利群》。不过，如上所述，《家》只提到《利群周报》的出版、刊物拥有读者、工作顺利地进行着的情形。由此可见，《黎明周报》呈现了《半月》内容的基础，但这在《利群周报》却不具体。到了《春》《秋》，《利群周报》重新出现，与《家》中的《黎明周报》同样占有重要位置。读了小说就会知道，无论哪一方，都来自《半月》。

在《家》《春》《秋》中，杂志刊名未必采用《利群》，以《革命》为刊名亦无不可。

^① 巴金《家》第29章《青年底心》。开明书店，1933年5月初版，第466页。

就此而言,以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杂志为首,当时以《革命》为刊名发行的杂志种类繁多^①,而刊名《利群》则独一无二;另外,与刊名《革命》相比,《利群》比较稳妥。从当时中国出版界的审查情况来看,这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利群》,巴金在《谈〈秋〉》中触及了事实与虚构的问题:“利群周报社的工作也只是前一年工作(见《春》)的继续和发展。”^②这里所强调的事实当然不是说杂志《利群周报》事实上已经发行,而是指一些年轻人围绕《利群周报》展开的工作确系事实。笔者还要复述,这当然是指《半月》的情况而言。

四、结束语

读完《书信》笔者感到,巴金与中国的其他各种组织广泛地建立了关系,这远远超出了笔者的预料。

此外,在第二章节资料^①中提到的卢剑波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在上海、南京活跃于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的人物。下面提到的郑佩刚(一八九〇—一九七〇)是刘思复的妹婿,很早就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巴金早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开始与这些人物来往了。

郑佩刚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中写道:

……[巴金]在成都中学读书[巴金没有读中学,估计是指成都外国语专门学

①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1075页附录《四 无政府主义书刊名录》中写有“《革命》1920年上海出版,克水编。据《互助月刊》”。

克劳《吾人二十年来之传播品》(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328页)中写有“革命 克水 上海 1920”。

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第841—842页介绍,1925年至1926年之间,以《革命》为刊名发行的杂志共有四种;1925年至1938年之间,以《革命〇〇》《〇〇革命》为刊名发行的杂志共有二十六种。

② 《巴金文集》第14卷,第378页。

校]时,我俩就已通讯往来,交流思想。……^①

笔者曾经以为,巴金正式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是他在南京的时期(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但通过了解《书信》相关事项发现,至少就宣传活动而言,巴金在成都时期的活动也可以纳入到其范围之内。

注解

〔注 1〕

据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 1 册》(商务印书馆,1935 年 5 月,第 51 页)介绍,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创办于 1913 年。该校于所谓“壬子癸丑学制”(壬子为 1912 年,癸丑为 1913 年,该学制于中华民国成立后修订而成)颁布后成立,教育内容与校名相同,以外语课程为主展开社会学方面的教育。按“壬子癸丑学制图”(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 10 月,第 231 页)的说明,进入专门学校需要初等小学校四年毕业、高等小学校三年毕业、中学校四年毕业。专门学校的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三或四年。

关于入学及后来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巴金说:

祖父[李鏞,号皖云,1920 年 2 月 19 日病故(李存光编《巴金著译年表》关于 1920 年的记述中写有“2 月 17 日〔夏历己未年 12 月 28〕祖父病故”。见《巴金全集》第 26 卷,第 516 页。——译注)]死后半年光景在暑假[9 月(李存光编《巴金著译年表》关于 1920 年的记述中写有“8 月 偕三哥尧林同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见《巴金全集》第 26 卷,第 516 页。——译注)]我和三哥[李尧林,1903—1945。李氏家族的同辈子弟要按出生年月排辈称呼,但在巴金家里,李尧林属于排在大哥(李

^①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 968 页。

尧枚,1897—1931)后面的二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接连读了两年半的书。[在《巴金文集》第10卷所收巴金《家庭的环境》第69页中,该处则是“在1920年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读到预科、本科,在那里接连念了两年半的书”]在那学校里因为我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后来就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去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谁知道这事情竟帮助我打动了继母[邓景莲]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那里的学业到上海去。(巴金《家庭的环境》。《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11页。)

巴金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外语应该是英语。笔者如此判断,是因为巴金经常提到他与“香表哥”(濮季云)的来往。巴金曾在一篇文章中较为完整地讲述过此事:

……这位表哥就是我1932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我学英语,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1920年秋季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补习班以前,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巴金《关于〈寒夜〉》,1980年12月27日。《创作回忆录》,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9月,第101页。)

补记:关于《书信》中的人名、杂志、单行本、组织、团体、事件等

1. 洪先生

他是准备印刷《革命》的印刷所负责人,此外不详。也许是因为《半月》刚刚被查禁,洪先生才如此谨慎。

2. 先忧

除了在第2章节资料⑨与⑩中的说明之外还要补充的是:他是成都外国语

专门学校的学生，是巴金的学长（后辍学，转学到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又是巴金的挚友。负责“半月社”的会计、交涉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度过了贫困的教师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在成都担任中学校长及省政协委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病去世^①。现能阅览的文章有：《建设与破坏》（《警群》第一号，第二十八页）。（参考：巴金《我的几个先生》《小小的经验》《谈〈秋〉》；《四川日报》记者王潮清、何伦武《会见巴金》，《巴金专集（I）》，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第十四页；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第三十二页。）

3. 《社会运动》

一九二〇年于北京创刊，陈德荣、陈空三主编，“把怀疑无政府主义的群情解释，又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充分说明”。曾反复停刊，后于一九二三年一月第五号复刊，联系人为北京大学第一院鲁德。不知在《书信》落款日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时，该刊已发行到何期何号。（参考：《支那同志之举动》，《民声》第三十二号，广州邮局信箱七十四号，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第十四页；《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报刊一览表》，《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三三二页等。）

4. 重庆某君

不详。如果是重庆适社方面的人士，有陈小我、李峙青、陈刚、陶侃士、龚春台、柴和甫等人，如果是适社之外的重庆无政府主义者，则有江疑九、陈晓钟、朱昌文（女）等人。（见蒋俊《卢剑波先生早年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纪实》，《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一〇一〇—一〇一一页。）

5. 《兵的说话》

一九二〇年前后出版的小册子，另有《一个兵的谈话》《目兵须知》等，但估

^① 吴先忧生卒年为：1901—1962。——译注

计均与现已能阅览的李得胜述《兵士须知》内容相同。(《杨善德检送〈兵士须知〉致参陆办公处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第十九一二十八页。)

6. 人道学社(汉口)

一九二一年成立于汉口，发行杂志《救世音》，另售无政府主义相关书籍。(见《交通部等查禁〈救世音〉印刷品有关文件》，《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一五六—一五九页。)

7. 陈德荣

如上所述，担任创刊于一九二〇年的《社会运动》杂志主编。一九二一年二月时，与“北京无政府党互助团”建立关系，展开活动。曾与黄凌霜、朱谦之等人来往。四月，赴汉口。与益之二人在当地成立无政府主义运动机关，起草《大会筹备宣言书》(此事也许后来直接影响到“人道学社”的成立与《救世音》的发行，但至于陈德荣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被捕时期该是在四月赴汉口之后。(《关谦关于北京无政府党互助团集会活动及筹资赴俄调查等情致王怀庆呈》《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党互助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呈》，《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七十八、八十九页。)

8. 在远东运动会场散[安那其主义]传单被捕的同志

在这方面的相关资料中，《远东运动会场上之党人运动》(《民声》第三十三号，广州邮局信箱七十四号，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日，第十一十三页)的介绍最为详细，同时触及了公审之事。被捕同志共六人。持平：许持平，自称张正国，别号爱真理。唯奇：陈唯奇。华清：萧华清，自称罗卜德。此外另有李光宇(自称李光学)、曾友、张仁本三人。服刑半年者有陈唯奇、李光宇、曾友三人，所以《书信》中的“革生”该是李光宇或曾友的某一方。不知巴金与他们之间是否有何来往，但许

持平、萧华清、李光宇都是四川人。

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在上海举行(笹岛恒辅《中国的体育·运动史》〔中国の体育・スポーツ史〕,棒球杂志社〔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第一五八页)。散发传单是最后一天六月四日的事情。

9. 西牢

指上海共同租界内的华德路监狱,一般被称为“西牢”。(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一二八页;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九五四页。)

10. 天研、危舟、介眉

不详。仅就天研而言,《捐助本报印费者》(《民声》第三十二号,第十四页)中记载了《民声》印刷费捐助者的名字“天研五元(邮票)”。

11. 泰东书局

《汉口警察厅报告孙中山革命活动及防范无政府主义刊物传播函》(《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二十八—二十九页)中写有“〔上海〕四码头(应为“四马路”。——译注)泰东书局,印刷各种大逆不道书类出售,毫无顾忌”;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九五三页)举出了“泰东书局老板赵南公”的名字。

12. 安那其同志社

据《三 无政府主义社团名录》(《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附录,第一〇六二页)介绍,“一九二〇年成立于上海,目的在于‘联络各方同志,实行无政府共产社会’”。

13. 武汉明社

笔者通过《书信》才知道该组织。据《三 无政府主义社团名录》(《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附录,第一〇六二页)介绍,在成立于一九二一年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中,有一个叫做“明社”的组织,但它成立于四川泸州。另外,巴金《秋》(《巴金文集》第六卷,第一三〇页)中提到了(四川)县内的组织“明社”,社名虽然相同,但不是同一组织。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巴金《灭亡》论

一、引言——我对《灭亡》的理解的变迁

在反复阅读或过些时间重新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有时会发现，即便是同一部小说，自己对它的理解与当初相比还是会有很大变化。

笔者与巴金小说《灭亡》的关系也是这样。

虽然《灭亡》描写了革命，可是笔者最初接触它时，以为这是一部恋爱小说。

* 该篇原载《樋口进先生古稀纪念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国书店，1990年4月10日，第49—77页。

于是,笔者开始关注杜大心与李静淑的爱情的加深,对此已有了相应的理解。但还是有些不满之处:小说接近结尾时两人热烈地拥抱、接吻,而文中却说这是“纯洁的快乐”。还有一点,后来一直都没有忘记:读完《灭亡》后却无法理解巴金为何要让杜大心用手枪狙击戒严司令,并在谋事不遂后使他向自己头部开枪自尽,这一点一直留在笔者脑海深处。

正因为如此,后来每当阅读《灭亡》,笔者便会摸索应该怎样解释杜大心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每当收集到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资料,便会从不同角度反复思考、揣摩。因此,笔者对《灭亡》的理解已几经周折。

例如,巴金在《关于〈死之忏悔〉》(一九三七年四月)中谈到:

古田大次郎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同时他又自称为一个恐怖主义者。其实安那其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两样东西。(许多安那其主义者都不赞成恐怖主义。)……

……

……我每次读它[《死之忏悔》],在我的心灵被那么强烈地震撼了以后,我却有一种惋惜的感觉。像古田那样的人不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上面,却选取了恐怖主义的路,在恐怖主义的境地中去探求真理,终于身死在绞刑台上。这的确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①

这段文字写于一九三七年,大致是对恐怖主义的否定。笔者曾想:假如在一九三七年,巴金抛开其他各种条件,以与《灭亡》完全相同的素材创作小说的话,杜大心也许不会走向灭亡。可是随后发现,这样思考问题则完全否定了作者的意图、作品的主题,以及作者根据这些因素建构起来的作品结构——即《灭亡》原有的作品的秩序。因此,笔者没有继续发展这种观点。

其次,笔者查阅了与恐怖主义相关的资料,《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覆

^① 《梦与醉》,南国出版社,1960年1月,第56—58页。

太一同志的一封信》^①第三一四页结论部分如下：

这恐怖主义既是现社会的罪恶造成的，则只要现社会——多数人受苦少数人享乐的社会存在一日，它[恐怖主义]便不能避免。我们鼓吹也好，反对也好，这毫不会有影响的。

我不反对恐怖主义，并且对于“恐怖主义者”也极佩服。但我却反对鼓吹和宣传恐怖主义的举动，而且我也反对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连在一起，说恐怖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方法。无政府主义的实行只有靠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暗杀的行动对于无政府主义没有多大好处；因此对于恐怖主义者，我希望他们把精力用在革命的工作上，大家都来一致的干那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确切的必胜的工作。（下略）

关于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或许会有各种理解、争论。笔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引文开头的文字“这恐怖主义既是现社会的罪恶造成的”。这种观点说明：只要现实社会中存在罪恶，巴金便会支持恐怖主义这种选择。可是，怀有这种姿态的巴金在引文的后半部却说“无政府主义的实行只有靠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从原则上讲，巴金认为后者更加理想，但是作为一种选择，他也不会否定前者，这即是巴金的立场。

笔者从巴金的这种立场出发，重新思考了杜大心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于是才明白这是“作为一种选择，他也不会否定前者”这一立场的产物。但奇妙的是，笔者的这种理解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什么，只留下一一种空虚感而已。

原来，问题出在笔者的姿态上：笔者完全不去考虑小说的情节、故事的进展过程，只挑选出杜大心与恐怖主义的问题，与《灭亡》的作者巴金有关这一问题的发言加以对比，以为这就算是下了结论。

^① 芾甘(巴金)《断头台上》附录，上海自由书店，1929年1月增订再版，第301—314页。

这样下来，笔者才发现需要从各种角度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便注意到了杜大心的病情（肺病）。在一开始，笔者对此抱有成见，猜想这不过是作者为了把杜大心逼向恐怖主义而编造的一个借口。

其实，《灭亡》的作者巴金也曾患病（肺病）：在成都时，因身体虚弱，祖父没有允许他上中学；一九二五年八月，赴北京投考大学，但又因生病中途取消了应试；一九二七年一月赴法，但因身体欠佳，迁居蒂埃里堡疗养。了解了这些事情后，笔者才开始认真看待杜大心的疾病，便想起了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①。文章涉及了杜大心的病情（肺病）与杜大心在小说中展开行动的过程的关系，同时表明了巴金对杜大心的病情（肺病）的看法。

在文章中，巴金就刚果伦在《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②中关于杜大心的死发表的意见——“仅止因着一个朋友的被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仇，那更是一种不正确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态度”^③——作了如下回答：

……不过刚君如果再去深思一下，他一定会明白杜大心底面前只有死的一条路。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在我看来他并没第三条路可走，何况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复仇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第二期底肺病使“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奋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实上在他，也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着安静的幸福”。……^④

巴金早在《灭亡》第九章《杜大心与李静淑》中就对杜大心的结局埋下了

① 原载《开明》第22期，开明书店，1930年6月，第6—9页。按《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41页的记述，该篇落款日期为“1929年在上海”。

② 原载《现代小说》第3卷第3期，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12月15日，第181—182页。见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第469页。

③ 引文中的“那更是一种不正确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在《〈灭亡〉作者底自白》中已被省略。（见《开明》第22期，第7页。——译注）

④ 《〈灭亡〉作者底自白》。《生之忏悔》，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第7页。

伏笔。

他[杜大心]自己底命运是断定了：监禁和死亡，而且愈快愈好，愈惨愈好。因为他决定要做一个为人民复仇的人，如果他不能够达到目的，那么，他当以自己底极悲惨的牺牲来感动后人，要他们来继续他底工作。所以在他愈是悲惨的命运愈好。……^①

迄今，笔者通过杜大心与恐怖主义的问题以及他的病情(肺病)思考了他走向死亡的过程，但还是有些不解之处，却又不知所措。

经反复推敲、反复阅读《灭亡》，笔者忽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这是一个破坏作品结构的构思。青年杜大心从成都来到上海，在现有的工会宣传部工作，尽管工会的工作艰难辛苦，假如他能够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或希望，那么杜大心的结局将会大有改变。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也许就没有必要把杜大心的病情(肺病)与恐怖主义给他带来的死亡联系在一起。

笔者也知道这是一种离奇的构思，并不值得特意讨论。可是，通过阅读第十二章《杜大心的悲剧》与第十六章《八日》——内容分别涉及工会，以及查阅与这两章内容相关的资料，笔者慢慢发现工会在《灭亡》中占有如何重要的位置，甚至觉得至少由此可以找到杜大心走向死亡的过程的根本原因。

就这样，笔者对巴金小说《灭亡》的理解几经变迁后，最终找到的课题是：梳理作品中的工会“纺织工人总工会”的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它与杜大心在小说中展开行动的过程的关系。

为便于论述，首先来介绍小说梗概以及本篇小论所使用的《灭亡》的版本。

时间：一九二五、二六年。地点：上海。当时，上海正处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统治下。

^① 《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2月10日，第459—460页。

主人公：杜大心，在纺织工人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他离开成都，来到上海，考进一所有名的大学。后来，“他因了一个同学底介绍，相信了为人类谋幸福的‘平等主义’^{〔注1〕}，加入了革命团体。后来竟完全抛弃了学业，离开了学校，把他底全精力用在宣传主义与煽动革命上面去了”^①。

就这样，他为了宣传主义、煽动革命，在纺织工人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因一个偶然的机，杜大心与李冷、李静淑兄妹相识。李冷读大学二年级，李静淑是大学预科生。他们的家乡在江西，父亲是清朝的一个大官僚。不久，杜大心与李静淑开始相爱，而面对工人与贫民遭受孙传芳压迫的惨状，杜大心逐渐增强了他的“憎”。李静淑对杜大心基本上表示理解，但在原则上她还是主张用“爱”来拯救他们。

另一方面，杜大心的工作地点纺织工人总工会的内部情况又是如何，文中写有：“在这纺织工人总工会的十几个办事员中分了两派：杜大心算一派，王秉钧也算一派。王秉钧底势力要大许多，他虽然只是一个交际委员，但他是某党工人部^{〔注2〕}的职员又是某党派到这工会来的代表。”^②

由于与王秉钧关系不和，杜大心无法顺利完成工作，每天都充满苦恼。

就在此时，宣传部中杜大心所完全信赖的同事张为群携带传单走在街上，被两个巡警发现，被带到警厅，后被送进戒严司令部，关押了八天后被斩首处刑。为了复仇，杜大心用手枪狙击戒严司令，开了四枪，而戒严司令只是肩上中了一枪，两个马弁却中弹身亡。看到如此局面，杜大心便向自己头部开枪自尽。

杜大心就这样灭亡了，但“五年以后在 S 市纺织工人大罢工里，工人占据了工厂，使得各厂主不得不屈服了。而这次大罢工运动的主动人物乃是一个深得工人们底敬爱的青年女儿。据说她就是李静淑”^③。

① 《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1 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年 1 月 10 日，第 4 章《女人》，第 309 页。

② 《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3 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年 3 月 10 日，第 12 章《杜大心底悲剧》，第 593 页。

③ 《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4 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年 4 月 10 日，第 22 章《灭亡》，第 754 页。

本篇小论所使用的小说《灭亡》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下列“1”的《小说月报》版。

1. 巴金《灭亡》。《小说月报》(最初连载发表《灭亡》的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

第一章至第六章,第二十卷第一号,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

第七章至第十章,第二十卷第二号,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

第十一章至第十六章,第二十卷第三号,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

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

(下简称为“《小说月报》版”。)

2. 巴金《灭亡》。开明书店,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版,单行本,三十二开,共二二六页。初版本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一九三六年七版出版时修订,《序》之外新附《七版题记》(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之夜巴金)。(下简称为“开明书店版”。)

3. 巴金《灭亡》。《巴金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三一—一六六页。(下简称为“《巴金文集》版”。)

二、纺织工人总工会(一)

巴金在《谈〈灭亡〉》中说:

……杜大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灭他的矛盾,所以他选择了死亡。
……倘使杜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说找到了共产党,他就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最孤独的人”,他是在单独地进行绝望的斗争;……^①

^① 《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4月5日,第60页。

引文中笔者深感兴趣的部份,除了他的肺病之外,就是杜大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的说法。巴金的这种说法,指出了他创作《灭亡》时所设定并将决定杜大心的言行与结局的重要前提。然而,这种说法除了可以作为杜大心走向死亡的过程的一个前提来理解之外,笔者还想换一个角度加以阐释。也就是说,我们在小说的哪个部分才可以看到尽管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但却能够专心从事革命事业的杜大心呢?如此想来,笔者认为,只有小说中关于杜大心的工作地点纺织工人总工会组织内部的情况的说明,以及对他在其内部的形象的描写,才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如下:

在这纺织工人总工会的十几个办事员中分了两派:杜大心算一派,王秉钧也算一派。王秉钧底势力要大许多,他虽然只是一个交际委员,但他是某党工人部的职员又是某党派到这工会来的代表,可以向党部按月去领津贴工会的款。王秉钧本是由一个工厂的学徒出身,但因为人很聪明,又常常跟着几个二等伟人东跑西跑,而且同别人办过几个工会,资格既老,经验又多。加入某党后,因为他曾从事劳动运动多年,所以得在工人部里当一个职员。而且他自从做了这纺织工人总工会底交际委员以来,自己底经济状况一天天地好起来,他底妻子也穿起绸缎来了,这可见他确实有干才。并且他又曾见过伟大的总理,自己也沾了一点荣光。因此他在工会里很能得人心,大部分的办事员都是附和他的。……^①

“纺织工人总工会”一词的意思是:“纺织”即“纺绩”之意,“工人”即“劳动者”之意,“工会”即“劳动组合”之意,其前面另加了“总”字^②。因此,这应该是几家纺绩工厂的劳动组合的联合组织,也许应该日译成“纺绩劳动者组合总联合会”。这里有十几个办事员,应该说是相当正规的组织。

引文中的某党即是国民党,这可以通过“工人部”一词与文中提及“总理”

① 《小说月报》版第20卷第3号,第12章《杜大心底悲剧》,第593页。

② 在《巴金文集》版第95页,“总”字脱落,为“纺织工人工会”。

(孙中山)来判断。因此,“党部”该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关于“工人部”,见本书第三〇一一三〇二页〔注2〕中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人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之“五、本党工人部之工作”:

(一)……于工人运动工作重要之地方,遇有必要时,可由党部选派负责工作党员,在党的工人部指导之下,组织工人运动委员会,以为研究工人运动方法之机关。

(二)关于工人之各种问题,中央工人部须制定进行计划,指定各级工人部执行。各级工人部须于接到中央工人部指令后,转令各负责工作之党员执行。^①

王秉钧是不是一个能够忠实履行《工人运动决议案》中的“工人部之工作”的人物,我们暂且不谈。王秉钧身为工人部职员,从国民党派到工会来,有资格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取津贴,如此看来,他在纺织工人总工会中自有地位,难怪王秉钧一派的势力比杜大心一派还要强大。

而且,王秉钧“人很聪明”,“他曾从事劳动运动多年”,“资格既老”,自从当上交际委员,他就变成了会赚钱的能人,另加上“曾见过伟大的总理”这种可以炫耀自己的权势的经历,又沾了些“荣光”,所以“大部分的办事员都是附和他的”。这样看来,杜大心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了。

与此相比,杜大心一派又是如何?虽然有些人同情于杜大心,但除了因携带传单被带到戒严司令部、后被斩首的张为群以外,其他些人都不大可靠。关于这些方面,巴金的描述如下:

同情于杜大心的只有四个人:总书记周百顺,交际委员高洪发,还有张为群和

^① 见铃江言—《中国解放斗争史》,石崎书店,1953年9月15日,第486—487页。(该处转引自: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29页。——译注)

蔡维盛,这两人都是宣传委员。

周百顺、蔡维盛、高洪发三个究竟是有了年纪懂得世故的人,做事时常带敷衍的色彩,顾虑很多。他们虽然比较其他的办事员好一点,但至多也只能做到把工会的事看得和家事差不多有同等的重要。若说为工会而作多大的牺牲,在他们是做不到的。而且他们之同情于杜大心,与其说是受了他底主义上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他底人格上的感化。他们不能明白地说出王秉钧所述的总理主义和杜大心底“平等主义”谁好谁坏。但他们却相信杜大心,因为他们以为杜大心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底对人以及说话的态度都是诚恳的。他们也很讨厌王秉钧底骄傲的样子。并且王秉钧永远只是那几句话,开口说总理,闭口说总理,差不多三句话内就要夹一个总理。……然而总理究竟是伟大的,而王秉钧也就伟大了,一般人底意见是如此。所以王秉钧就常常这样地得胜了。^①

张为群之外的三个人是“有了年纪懂得世故的人”,“至多也只能做到把工会的事看得和家事差不多有同等的重要”。因此,这三个人之所以同情于杜大心,与其说是将杜大心与王秉钧的各自的主义互作对比,对杜大心表示支持,不如说是他们欣赏杜大心的人品。尽管“他们也很讨厌王秉钧底骄傲的样子”,但他们也难以反抗王秉钧与总理的关系所带来的权势,结果还是王秉钧得胜了。

准确地指出上述“王秉钧所述的总理主义”为何,乃是件难事。王秉钧“曾从事劳动运动多年”,因此,无论他能否真正实行这一主义,对于这一观念,他必有自己的看法。如果进一步推敲他的观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宣言》之“二 国民党之主义”中的“(三)民生主义”:

……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制定工人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

^① 《小说月报》版第 20 卷第 3 号,第 12 章《杜大心底悲剧》,第 593 页。

……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①

既然王秉钧常提起“总理主义”，那么他至少不会忘记这些内容。既然他炫耀自己的权势，常说总理拍过他肩膀，那么《总理遗嘱》^②他也一定牢记在心。遗嘱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③

笔者举出以上两个例子，只是想打个比方，而王秉钧不就是经常讲这种话，假装自己对此已有领会才展开日常工作的吗？笔者认为，“王秉钧所述的总理主义”并不是本义上的“总理主义”，而是含有欺骗自己、提起“总理”炫耀自己的权势这种意思的“总理主义”。

如在第三〇一页〔注1〕中所述，杜大心的“平等主义”即是安那其主义。在杜大心一派当中，只有张为群将此奉为信仰。杜大心真正意义上的支持者、同志，也只有他一人。

如此看来，在纺织工人总工会这一组织中，只有张为群才真正是杜大心的同志。在几乎孤立无援的条件下，杜大心专心从事宣传部的工作。可是：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7月本馆一版，1970年5月二版，第384—385页。

②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去世。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

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册》，第425页。——译注

……虽然在宣传部办事的人除他而外,还有两个委员[张为群与蔡维盛],但大部分的事都是要靠他来做的。而且如果他不去负责的时候,和他相反的另一派的人就更占势力,那一派人底意见就得胜而采行了。……^①

杜大心拼命地工作,但他的处境非常窘迫,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只要遇到某种机会,他就会走向灭亡。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作者巴金在《灭亡》中设定的这种局面?

当年,上海的工会绝对不会都像“纺织工人总工会”那样。那么,巴金为何没有取材于更加充满希望的工会?

其实,巴金曾经谈到过这一点:

……杜大心是单独地在进行革命的斗争,我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牺牲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写出杜大心这个人物来。要是我走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我就不会写小说,至少我不会写出像《灭亡》这样的作品。……^②

引文中笔者关注的部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以及在此前提之下巴金说“所以我会写出杜大心这个人物来”。

从广义上讲,笔者认为巴金是一位深刻、准确地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人物,这一点暂且不谈;笔者所强调的是:与其说杜大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不如说“杜大心只好在纺织工人总工会那种地方工作”,因此,杜大心沦落到如此结局也是事非得已。尽管我们不能仅以杜大心与“纺织工人总工会”的关系来解释有关杜大心的结局的所有原因,但无可置疑的是,杜大心的结局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此。

① 《小说月报》版第20卷第3号,第12章《杜大心底悲剧》,第592页。

② 《谈〈灭亡〉》。《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第60页。

不言而喻,在如上论述中,笔者围绕小说的内容讨论了作品所描写的范围,即从“作品的秩序”的角度讨论了“纺织工人总工会”。下面将深入问题,从“现实的秩序”的角度,即通过参考当时上海劳动界的情况来掌握“纺织工人总工会”这一组织的大致情况,并从这一角度再次回到“作品的秩序”,重新思考杜大心的结局。

三、纺织工人总工会(二)

在《谈〈灭亡〉》中,巴金亲自走进“现实的秩序”谈到王秉钧:

……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却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写了这样的人。……^①

先来讨论开头的“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其实在上面,笔者只围绕作品的内部——“作品的秩序”展开了论述;下面,笔者将离开《灭亡》的世界,通过关注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现实的秩序”来确认小说《灭亡》故事的发生时间,梳理作品中的时间与现实的时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把判断作品中的时间的起点放在《灭亡》的何处才好?这是有很多途径的,笔者决定以第十六章《八日》为起点。王秉钧谈起张为群因携带传单被捕一事时,讲过这样一段话:

……为群简直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又不懂得总理主义,他现在居然这般勇敢为总理主义牺牲,一定是先总理在天的英灵保佑他了。将来我们的武装同志打

^① 《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第61页。

到 S 市[上海]时,我一定在总司令[蒋介石]面前保举他……^①

由此可知,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发起的北伐已在进行,但当时尚未波及上海。

其次是第二十一章《淑我去了》,文中写有“路旁的桐叶受着风,知道快到深秋”^②。

随后,杜大心狙击戒严司令。由此可见,《灭亡》结尾的时间已经是接近晚秋的季节了。现已了解了《灭亡》结尾的时间,下面我们向前追溯。

在第十五章《革命党被捕》中,张为群携带的传单上印着“上海工人武装起来”^③几个字。

据章回、包村等编写《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④第一三七页,第十一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北伐战争开始了”介绍,“北伐军就沿长江东下,进攻军阀孙传芳控制的江西,并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上旬攻占了九江、南昌”,“当时,孙传芳号称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联军总司令’。上海也在他的统治之下”。据同书第一三九—一四〇页介绍,所谓第一次武装起义发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由于第二次武装起义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所以传单中的“武装起来”自然是指第一次武装起义,这说明张为群因携带传单被捕应该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之前的事情。

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在第十四章《杜大心与李静淑》^⑤中,杜大心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医生说这是因为他身体虚弱、忧郁过度,又“中了暑”^⑥。这说明当时是夏天。

① 《小说月报》版第 20 卷第 3 号,第 609 页。

② 《小说月报》版第 20 卷第 4 号,第 751 页。

③ 《小说月报》版第 20 卷第 3 号,第 606 页。

④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 10 月。

⑤ 开明书店版发行时,改题为《危机》。

⑥ 《小说月报》版第 20 卷第 3 号,第 601 页。

在此之前，第十二章《杜大心底悲剧》中有“七月九日”^①、“六月六日”^②、“五月二十八日”^③的日记。

其次是第九章《杜大心与李静淑》。杜大心离开李冷家回去时，“经着温和的春天晚风一吹，杜大心底精神比较是舒展了”^④。

以上的梳理可以说明，第九章到终章第二十二章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六年春天至晚秋。如果以一九二六年为起点来推算，杜大心回忆往事的第三章《四年前》应该是指一九二二年。

那么，杜大心是从何时开始在“纺织工人总工会”工作的呢？第十三章《张为群》中写有：“在不到一年以前他[张为群]便信仰了杜大心底‘平等主义’，要用革命的方法来打破这不平的一切，创造出个美满的世界来。”^⑤假如引文中的时间是晚秋的话，杜大心开始工作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二五年冬天，但究竟是几月份，笔者也说不准。只是，如果再斟酌从张为群接触杜大心的“平等主义”直到他将此奉为信仰的那段时间，那么上述问题就要考虑到一九二五年全年的时间了。

换个角度的话，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杜大心本人来思考。杜大心十九岁离开家乡，到了上海，考进一所有名的大学，翌年接到母亲病故的消息，又过了一年，即过了两年后的第三年，经同学介绍，信奉“平等主义”，加入革命团体^⑥。杜大心现二十三岁，他死亡那年是一九二六年，这就等于杜大心在第三章《四年前》的一九二二年离开了家乡，后于第三年的一九二五年加入革命团体^⑦，符合上述第十三章《张为群》所描写的情况。

① 《小说月报》版第 20 卷第 3 号，第 595 页。（该处另有 7 月 15 日的日记，见第 595—596 页。——译注）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594 页。

④ 《小说月报》版第 20 卷第 2 号，第 458 页。

⑤ 《小说月报》版第 20 卷第 3 号，第 596 页。

⑥ “加入革命团体”这种说法同时说明他开始在“纺织工人总工会”工作。

⑦ 作者在《关于巴金小说〈灭亡〉的若干事》（本书第 216—217 页）中对杜大心何时加入革命团体的解释为 1923 年或 1924 年。——译注

那么,巴金在这一时期的行踪又是如何,以下简单地举出一些相关事项。一九二三年五月,离开成都到达上海;是年年终,赴南京,就读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补习班。一九二五年八月,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随后赴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但发现患有肺病,便取消应试,同月下旬归上海,疗养身体;九月,安那其主义刊物《民众》发刊之际,担任发起人^①。一九二六年,住在上海;十一月,译完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仅此一年撰写论文二十余篇。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离开上海,乘船赴法。

言归正传。巴金说“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读了这句话笔者首先想到:巴金通过何种路径与这些人物相识?他又是怎样知道的“纺织工人总工会”这样的组织?这让笔者想起了毛一波《前尘琐忆》^②,该书第二十八页说,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当时在上海曾有许多同志来访邓梦仙^③开办的华光医院,同页还列出了他们的姓名:

……景梅九、王亚樵、许持平、江疑九、胡抱一、冯紫岗、陈廷璠、叶正叔、陈春培、董寄虚、胡博苏(苏哥)、王鲁彦、邓必夏、张连文、刘坤水、朱梅子、陶毕观、陶慧观、梁龙光、林成材、唐颂安、郑今日、郑佩刚、梁冰弦、李于观、李又观、高自性、周尧、吴朗西、姜种因、李少陵、卫惠林、周鉴之、李尧棠、马宗融、张禅林、柳絮。……

① 见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314页:

发起人:[刘]真恒 [黎]健民 [沈]仲九 三木[李少陵] [黄]培心 [卫]惠林 蒂甘[巴金]
[张]禅林 吕千[张履谦] [周]索非 [毛]一波 [沈]茹秋 [姜]种因 [卢]剑波 [秦]抱朴
[陆]不如

② 笔者手边的资料为手稿复印件,即未刊印版。页码均按原稿标注。

③ 四川忠州石堡寨人。民国元年留日,于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归国,在上海开办医院(华光医院)。日本的大杉荣、石川三四郎、岩佐作太郎、山鹿泰治等人曾承蒙关照,在日本也是知名人物。

其中有些人同样也是上述《民众》的发起人^①。

该书第二十六页另有以下说明，同在讲述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前后的事情。

上海当时有个工团联合会[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成立^②]，是从湖南劳工会出来的谌小岑、王光辉、谢作舟(征孚)、萧异(同兹)等组织起来的，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与安那其关系亦深。……这个联合会，我也参加。在五卅惨案中，共党李立三等把持上海总工会，我们便以联合会对抗。……

以上是毛一波《前尘琐忆》中的两段，前者文中列出了巴金本名李尧棠，说明他也去过那里。巴金与邓梦仙的关系如下：

这篇仓卒而成，遗漏定多，容后补入。和田[和田久太郎]演说辞和古田[古田大次郎]遗书都是同志梦仙替我译的，我不过改了些罢了。……

一九二五，十二月四日 蒂甘[巴金]著^③

如此看来，二人的关系极为亲密。

在来访华光医院的人士当中，例如王亚樵是加入工团联合会的“安徽旅沪劳工会”的干部^④，谢作舟是“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的干部^⑤。笔者这样写，并非要把这些人物与王秉钧直接联系在一起，只是想指出一种可能性：巴金也许通过他们才见到了王秉钧那样的人物。

① 见本书第 291 页注①。

② 上海工团联合会于 1924 年 3 月 8 日成立。见《工团联合会成立记》，《时报》1924 年 3 月 9 日，第 3 张。下同。——译注

③ 《革命的先驱》第 1 篇《无政府主义者殉道者的壮剧》第 5 章《东京的殉道者》之补记，上海自由书店，1928 年 5 月，第 192—193 页。

④ 《安徽劳工总会大会记》(载于《时报》1924 年 12 月 22 日)中有委员王亚樵的名字。

⑤ 《工团联合会成立记》(载于《时报》1924 年 3 月 9 日)中有宣传委员会正主任谢作舟的名字。

关于后者工团联合会，毛一波的说明过于干脆、明确。在笔者看来，其实这可以说是拥有不同思想、主义、立场的人士聚集在一起的混合团体，但从整体上来讲，毛一波指出的倾向也的确存在。

下面通过内容较为完整的铃江言——《中国解放斗争史》来讨论工团联合会。

在中国劳动界中，成立全国性联络机构的形势正将诞生之际，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①的领导下，于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情形如下：

此次大会，不是在完备的领导力量下召开的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而是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持下召集的全国各派的工会大会。因此，仅仅五天的讨论也与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之后的情况相同，仍然杂乱无章，无法一致，反而相持的各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派与工团主义^②派——始终在激烈争论。代表工团主义的湖南方面人士，如有谏小岑出席大会，他坚决反对把统一工会的领导权交给马克思主义派。经过激烈争论，他们脱离了所谓工会大会。因此到了最后，此次全国大会实际上便从各派联合大会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派工会的全国大会。……^③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运动继续发展，但是，反抗这一趋势的势力也的确存在。例如在上海劳动界中，至少湖南劳工会方面的谏小岑等人则属于该势力。然而，他们不久便开始把各种体系的因素引进组织，终于被编入国民党的劳动政策路线之中。关于这些形势的变迁，《中国解放斗争史》的解释如下：

马克思主义派的领导力量当初就很强大，但在这前后，企图与此对抗的其他工

① 负责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特立、邓中夏、罗章龙、李启汉等人。

② Syndicalism，激进的产业工会主义，是否定权威、提倡个人自由结合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工会之结合体，要求以罢工等直接行动来实现产业管理。它重视经济组织，由此组成共同体来调整生产与消费。它不承认所有政治活动，尤其是议会主义，以自治为原理排除中央集权管理。

③ 《中国解放斗争史》，第294页。

会运动者的努力也颇为激烈。这场运动的核心势力,主要是信奉工团主义的湖南劳工会的成员。华实纱厂[位于长沙]罢工[一九二二年一月]后,在赵恒惕[长沙一带的军阀]的追赶下,他们把组织迁到上海,在这里继续展开活动。然而,因领导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逐渐消失,在此前后,基于所谓经验现实主义的“工会主义”实际上则变成了这一派别的领导精神。于是,一批因情感或其他因素脱离了共产党派的分子,以及国民党内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便加入了这一派别。尤其是国民党右派领导人对此给予大力支持,如有冯自由、邵元冲、马超俊等人。

就这样,一九二三年十月,他们以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纺织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为基本工会,筹备成立地方联合,翌年[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上海工团联合会成立大会。工团联合会成立时,拥有二十四个工会,到了一九二五年五月,已增加到三十七个工会^①。中心人物为张志余、徐锡麟、王光辉、谌小岑等人。

然而,这一派别并没有建立全国性组织的基础。原因不只在他们于上海一带仅仅拥有三十几个地方工会联合;由于他们的活动在整体上逃避政治斗争,仅以工会主义的经济斗争来改善工人的地位,因此,他们连领导那些遭受军阀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工人发动斗争,并牢固地掌握住这些群众的最基本的资格都丧失了。果然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初,上海所有的工人都抛弃了他们。……^②

① 以下资料引自小杉修二《上海工团联合会与上海的劳工运动》(上海工团联合会与上海的劳动运动)(《历史学研究》第393号,1973年2月15日,第18—19页):

上海纺织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中国机器工会、粤侨工界联合会、丝纱女工协会、上海船务栈房工会、电车工会、中华电气工业(工界)联合会、淞沪机械职工同志会、浙江旅沪劳工会、印刷工会、馆业工会、缝纫工会、车磨工会、理发工会、上海履业工会、制墨工会、西式木器工会、上海工商友谊会、浦东码头工人联合会、湖北旅沪(工人)泥工会、安徽旅沪劳工会、宴业工会、职工青年会、江苏劳工总会、参战华工会、中国工会、中华工会、江北驻沪工会、中华劳动会、全国工界救亡大会、全国工团自救会、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湖北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会驻沪办事处。

② 《中国解放斗争史》,第307—308页。

以下文字是《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中关于工团联合会的性质以及它在五卅运动后的动向的说明。

……至十四年春，加入之工会约有四十，会员五万人。该会[工团联合会]之执行委员会，有讨论及解决该会之对外问题，(如劳资争议等)并各工会间纠纷之权。但各工会对于本身问题，仍由各工会之职员办理。故该会之主要目的仅在巩固各工会的团结力，借以雄厚阶级战争之阵线。至各工会本身之行政，仍由各工会自己解决，执行委员会并不干涉。故其[工团联合会]所含之工会，性质极为复杂，既不尽属同一或相关之职业，亦不尽属同一或相关之产业，不过仅为同区域内具有实力之工会，感联络之必要而组织者。会内分子既不统一，同情心当然不厚，此其势力所以不敌急进派之总工会也。该会主要人物，多与国民党右派相接近，主张以议会手续改进工界之生活，促进工界之运动……

至十五年，该会一方组织全国工团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他方又计划各省区工团联合会之设立，盖欲造成一巨大工会之系统置诸该派势力之下。然此等计划终未能实现，其曾经成立者，仅有北京工团联合会。……

五卅惨案发生，……在此混乱之中，工团联合会大失其控制之力，工界之急进派遂乘机组织上海总工会。^①

我们通过铃江言一《中国解放斗争史》与《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确认了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其在劳动运动史上的定位及其性质、结局。笔者无法判断王秉钧与杜大心的工作地点“纺织工人总工会”是哪一工会，但估计为工团联合会所属的某一工会。

巴金《灭亡》是在这种“现实的秩序”中完成的。因此，从工团联合会的结局以及“纺织工人总工会”为工团联合会所属并受国民党工人部支配的情况来看，杜大心自然知道，无论他怎样努力都必有局限。

^①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篇《劳动运动》第1章《劳动组织》第1节《劳动组织之发展》“(3)统一时代”，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12月，第8页。

也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特意讨论了“纺织工人总工会”，来思考杜大心走向死亡的过程的根本原因。

补记：王秉钧、施洋及其他

关于以真名实姓出现在《灭亡》中的人物施洋，《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已有介绍。对于王秉钧与施洋这两个人的组合，笔者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但在了解施洋的生平事迹的过程中，笔者也掌握了很多信息。

1. 怎样理解王秉钧与施洋的关系？2. 王秉钧说施洋没有见过总理，但实际上他们曾经见过面。3. 王秉钧说，在二七惨案发生后他遭到吴佩孚的追捕，这与历史事实的关系又是如何？下面依次确认这几个问题。

1. 在《灭亡》中，施洋的名字是在张为群因携带传单被捕后，由王秉钧提到的：

“他[张为群]底命还算不错，就是死了，也不要紧。……不但不要紧，反而是很荣耀的。他不就成了一个烈士么？何等荣耀！施洋，施百高[字“百高”一般写作“伯高”]，你们总知道吧！……二七之役[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他为了总理主义被萧耀南[湖北督军]枪毙，谁人不知，死得何等荣耀。我是百高的好朋友^①，百高在时极器重我。他常说：“秉钧真不错，他才是一个忠实同志，他才是一个真正运动家……”百高真知道我。^②本来二七之役我也逃不脱的，吴佩孚早就知道我是一个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听说他要指名捉拿我。不料正是风潮激烈的那几天，我女人病了，她一定要回乡下娘家去。我没有办法，只得送她回去。

^① 在《巴金文集》版中，“好朋友”被改写为“同乡”（施洋的家乡在湖北西北部竹山县，是长江沿岸区域）。见《巴金文集》第1卷，第127页。

^② 在《巴金文集》版中，从“百高在时极器重我。”至“百高真知道我。”的文字被改写为“我那时也在武汉，”。见《巴金文集》第1卷，第127页。

这一来就把好机会错过了！……真可惜。你看，百高死了多好。现在一提起百高的名字，武汉工人谁不流泪！”

“然而百高生平有件恨事”，他一面说，口沫四处飞溅，黄澄澄的牙齿从时开时阖的嘴里露了出来。“他没有见过总理，他常和我谈起。当时我也不曾见过总理，但百高死后我却见了总理了。……”^①

一九二〇年秋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施洋也参加了，据说，从此他认识到自己以往的错误思想。廖鑫初《施洋》如下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领导下，在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等的帮助下，施洋根据切身的体会，批判了自己的“实业救国”[以农、工、商等经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错误观点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想，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曾深有体会地说：“无政府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在理想上是很高明的，然而在事实上没有着手的办法，若要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苏俄的成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②。……^③

从引文来看，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前一阶段，施洋倾向于安那其主义，这是否可以说明：由于思想上的共同点，施洋与王秉钧曾在某一时期有过来往？在《巴金文集》版中，“好朋友”被改写为“同乡”，二七惨案发生时王秉钧又在武汉，估计他们有机会相识。

2. 王秉钧说施洋没有见过总理，但实际上他们曾经见过面。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施洋为了出席全国司法会议，离开汉口，赴上

① 《小说月报》版第20卷第3号，第16章《八日》，第609页。（着重点为作者所加。——译注）

② 该处原注写有“转引自[林育南]《施伯高传》”。该篇原载《施洋先生纪念录》，1924年2月。

③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91页。

海。旅居上海期间，他会晤了“总理”，如下：

施洋在上海期间，还参加了上海各界纪念双十节的庆祝活动。他与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以及其他一些国民党要人，多次进行会晤，对于如何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施洋的许多政治见解，赢得了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赞许和好评。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七日，施洋回到了武汉。……^①

《孙中山年谱》^②第二九八页关于一九二二年的记述中写有“八月十四日 抵达上海”；第三一〇页关于一九二三年的记述中写有“二月十五日 偕陈友仁等离沪赴粤”。

当时正是陈炯明发动叛乱的时期，孙中山旅居上海的期间是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可见，施洋在上海期间，孙中山也在上海。

那么王秉钧的行踪又是如何？

在《灭亡》中，王秉钧说他会晤总理是在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之后，小说中写有“先总理到 P 城去，路过 S 市的时候，我曾经亲自去见过他老人家”^③。

如此看来，我们需要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施洋枪决日）到孙中山去世的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这段时间中找出孙中山路过上海赴北京的日期。

《孙中山年谱》第三六三页关于一九二四年的记述中写有“十一月十七日 抵上海，受到群众万余人的热烈欢迎。中午在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寓所接见各界人士”；第三六四页写有“十一月十九日 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并发表谈话”。

十一月二十一日，孙中山乘“上海丸”轮船离开上海，经由日本前往天津。

① 廖鑫初《施洋》。《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 卷，第 111—112 页。

②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80 年 7 月。

③ 《小说月报》版第 20 卷第 3 号，第 16 章《八日》，第 609 页。

这就说明，王秉钧会晤总理，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之间。

在《灭亡》第十六章《八日》结尾，听了王秉钧的话——我见过总理，可施洋却没有见过——“杜大心不禁失声笑了”，“杜大心大笑地[从房间]走出去了”^①。

杜大心“失笑”“大笑”，是否因为他看穿了王秉钧的谎言？果然如此的话，杜大心的“失笑”“大笑”就会更加耐人寻味。

其实在笔者看来，也许巴金不知道施洋与总理的会晤。如果巴金创作小说时知道这些事实，那么在作品中他应该有所暗示，但笔者却没有找到这种文字。这或许可以说是作品的秩序与现实的秩序时而交错的一场恶作剧。

3. 王秉钧说，在二七惨案发生后他遭到吴佩孚的通缉追捕。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册中写有：

(一)被捕者

.....

(二)逃亡被通缉者

潘希贤 王宗培 鹿茂堂 陈作霖 张德惠 杨德甫 王俊

(三)常川被监视者

.....

其非工人而为工会法律顾问之施洋律师，乃系共产党，亦遭逮捕，于四月十五日^②枪毙。^③

《灭亡》中王秉钧所言“吴佩孚早就知道我是一个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听

① 均见《小说月报》版第20卷第3号，第610页。

② 该处应为2月15日，估计是作者的笔误。——译注

③ 《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册第2编第5章第1节《民国12年(1)(平汉铁路二七惨案)》，中华大典编委会、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合作，1966年6月，第256页。

说他要指名捉拿我”^①果然属实的话，那么在引文(二)的七名“逃亡被通缉者”中假如某人是湖北竹山人，其人或许就是王秉钧，或是与王秉钧生平事迹相似的人物。这是笔者今后的研究课题。笔者再次发现，通过作品的秩序与现实的秩序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作品的秩序时，有时会遇到一些连作家也预想不到的现象。如果要回答这一问题，终究只能回到作家怎样理解“虚构与创作”的问题上了。

四、结束语

笔者阅读《灭亡》，经常考虑到杜大心走向死亡的过程。

由于工作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另加病情，杜大心加快了他自走绝路的速度；只要遇到某种机会，杜大心就会走向灭亡；他的分身张为群的斩首处刑，为此提供了条件……尽管巴金仔细地描写了这些情节，但笔者总觉得还缺些什么。

笔者认为，巴金在作品中对杜大心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的建构还不够充足。也就是说，巴金还可以多在作品中写一些现实的秩序（当时上海劳动界的情况以及“纺织工人总工会”的地位与处境）。本文探讨“纺织工人总工会”的意义即在于此。这一问题刚刚入绪，今后还要增补。

文学作品到底还是要衡量作品本身。虽说这是铁则，但毕竟要看作品的类型，巴金的《灭亡》则是一部更加需要重视现实的秩序来阅读的作品。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① 《小说月报》版第 20 卷第 3 号，第 16 章《八日》，第 609 页。

注解

〔注 1〕

“平等主义”在开明书店版中均为“自由社会主义”，在《巴金文集》版中均为“社会主义”。

在毛一波《樱花时节》（新时代书局，1931年7月，第101—102页）中，出场人物在阅读杂志《民钟》所载《平等主义与恐怖主义》，该篇明显是指蒂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覆太一同志的一封信》。可见，“平等主义”即是“无政府主义”。该篇原载《民钟》第2卷第6、7期合刊，1927年7月25日。见蒂甘（巴金）《断头台上》附录，第301—314页。

关于“自由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告青年》（巴金译，平明书店，1938年9月六版）第6页，《告知识分子》中的“告医生”结尾写有“那时候你就会懂得社会主义了①”。注解①关于社会主义的解释是“①作者指的是自由社会主义，即安那其主义，下同。——译者”。

此外，另有巴金《俄国社会运动史话》（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9月，第111页）第8章标题《巴枯宁与自由社会主义》等例子。

〔注 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7月本馆一版，1970年5月二版）第1篇《组党》第418页提到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第436页示图说明了工人部为中央党部所属。关于党工人部的工作内容，详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人运动决议案》（1926年1月16日），如下（见铃江言一《中国解放斗争史》，第486—487页）：

五、本党工人部之工作

（一）各级工人部之组织，须亟促其健全。于工人运动工作重要之地方，遇有必要时，可由党部选派负责工作党员，在党的工人部指导之下，组织工人运动委员会，

以为研究工人运动方法之机关。

(二)关于工人之各种问题,中央工人部须制定进行计划,指定各级工人部执行。各级工人部须于接到中央工人部指令后,转令各负责工作之党员执行。

(三)中央工人部须出版一定期刊物及各种小册子,供给各地工人运动负责党员以各项资料,并得借以互相讨论。

(四)各地工人部须向中央工人部作经常之报告,使中央工人部明了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状况,并得以考察各地工人部工作情形。(该处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29—130页。——译注)

此外,《工人运动决议案》中的另一项指出了“党与工会之关系”。下引全文,供作参考。资料出处同为铃江言一《中国解放斗争史》(第486—487页)。

四、党与工会之关系

(一)党为政治目的相同的组织,工会为经济目的相同的组织。本党对于工会,在政治上立于指导地位,但不使工会失其独立性。

(二)工会中之党员,应做成工会之中心。其组织与党的组织不应混合,其经济尤须划分。

(三)党之政策可以影响于工会之政策,但不能使工会全无政策,失却民众之主张地位。(该处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29页。——译注)

第三辑 史料篇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

前后的巴金*

——巴金文学的萌芽

一、引言

一九二一、二二年前后，巴金（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①）满十七八岁，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

在这一时期，巴金已经接触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发表了数篇论文、

* 该篇原载《西南学院大学文理论集》第26卷第2号，1986年2月，第111—128页。

① 巴金歿于2005年10月17日。——译注

诗、短篇小说,并在与《文学旬刊》^①编辑的《通讯》中表明了他个人对当时文学界的看法。

关于巴金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及其活动,大致可以通过《小小的经验》^②来掌握,笔者也曾在《巴金与安那其主义》^③第二章《五四运动时期》第二节《杂志〈半月〉〈警群〉〈平民之声〉等》讨论过其大致情况,因此,本文不再重复这些内容,仅列出论文篇目,并在第二章节介绍诗、短篇小说,在第三章节介绍巴金与《文学旬刊》编辑的《通讯》全文。解说以注解为准。

论文:

1. 芾甘《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半月》第十七号,成都半月社,一九二一年四月上半期。
2. 芾甘《五一纪念感言》。《人声杂志》第二号,重庆适社,一九二一年四月。
3. 芾甘《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半月》第二十号,成都半月社,一九二一年五月下半期。
4. 芾甘《IWW与中国劳动者》。《半月》第二十一号,成都半月社,一九二一年六月上半期。

①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之一。第1期(1921年5月10日)至第171期(1925年5月4日),为上海时事新报社《时事新报》副刊。在此期间,自第81期(1923年7月30日)起改名为《文学》,周刊。自第172期(1925年5月10日)起,改名为《文学周报》,独立于时事新报社,由上海文学周报社发行。在这一时期,文学研究会的重心从北京移转到上海。1929年12月22日,以第380期停刊。该刊鼓吹为人生的艺术,提倡现实主义。刊物在《时事新报》副刊时期偏重于发表评论、研究文章(形式、用词)、介绍外国文学;刊物改名为《文学周报》后,创作的分量增多,并涉及了一般社会问题。最初,由西谛(郑振铎)担任主编。另有茅盾、叶绍钧、谢六逸、赵景深、胡愈之、王剑三、唐性天、瞿菊农、耿济之等人参加(参考: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12月,第128—129页;《〈文学周报〉独立出版预告》,《文学》第171期,1925年5月4日;《辞海试行本》第10分册[文学·语言文字],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修订、出版,1961年10月,第19页)。

② 《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19—130页。

③ 西南学院大学学术研究所纪要第14号,1978年10月1日。

5. 《均社宣言》。《半月》第二十一号，成都半月社，一九二一年六月上半期。
6. 芾甘《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警群》第一号，成都警群月报社，一九二一年九月。
7. 芾甘《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平民之声》第四期，一九二二年，发行日期不详。
8. 芾甘《支加哥殉道者》。《平民之声》第六期，一九二二年，发行日期不详。

二、诗、短篇小说

1. 佩竿《被虐待者底哭声》^①(诗)。《文学旬刊》第四十四期，时事新报社，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第四面。

(一)

被虐待者底哭声何等凄惨而哀婉呵！/但能感动暴虐者底残酷的心丝毫吗？

(二)

天公！/想你也不忍听被虐待者底哭声了，/不然你怎么会流出这许多的眼泪哟？

(三)

战胜者！/留心你底失败的敌人底悲哀！

(四)

在睡梦中的人们！/不要过于快乐罢，/你应当知道将来还有梦醒的时候。

(五)

真正的爱，/也许只在小孩底天真里藏着罢。

^① 标题中的“被虐者”在该诗(一)、(二)中为“被虐待者”。估计标题排版有误，应改为《被虐待者底哭声》。

(六)

听高树上不停地叫着的蝉声，/我便明白人生底真义了。

(七)

雨呵！落罢，不停地落罢！/把这世界洗成一个极美丽的罢！

(八)

火一般的悲愤在我底心里燃烧着，/我怎么能不瘦呢！

(九)

小孩子底天真/与老年人底经验，/是何等地相反的啊！

(十)

一株被花匠扎过了的梅花/在盆里死了。

(十一)

风能吹熄的，/水能淹没的/不过是寻常的火罢了；/但这是我底心里底火呢！

(十二)

青年人！/要想美丽世界底实现，/除非你自己创造罢！

2. 佩竿《路上所见》(诗)。《文学旬刊》第四十九期，时事新报社，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第三面。

一只瘦的牛负着几袋在前面走着，/一个雄壮的人拿着鞭子在后面跟着，/牛似乎负不起这几袋米了，/他的步武愈走愈慢，/却恼了后面的人；/“一！二！”鞭子举起而且打在牛背上了，/牛惊了，跳了一下，又向前急行了几步，/但他终于不能走了。/只是可怕的鞭子又举起了。

3. 佩竿《可爱的人》(短篇小说)。《文学旬刊》第五十四期，时事新报社，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第二—三面。

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因为一件要紧的事，要到我的友人家里去。这时雨还是

不停地落，天色也阴黯。我知道要等雨于短的时间停住，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便不得已的叫了一乘轿子来。

两个轿夫抬着我慢慢地街上走着。街很寂静，仿佛在寻常的夜里一样。除却两三个打着雨伞穿着革履的先生们，和戴着斗篷下面赤足的劳动者而外，就没有看见什么了。但偶尔还有一乘三四个轿夫抬着的，四面都围着雨帷的轿子走过。我这所能听见的：就只有雨点滴在轿顶上和轿夫的斗篷上的响声，革履的囊囊声，赤足在水中走的声；至于在寻常所常听见的闹声，叫卖声，笑声，哭声，说话声，现在都没有了。我在轿里想想：“真寂寞呀！出门时又忘了带本书，不然还可以在轿里翻看。这样长的街怎么能一时就走完了呢？”我觉得有些烦恼了。便开始悔恨我一时的疏忽了。

又走了一阵。我偶然抬起头来，我的目光正射在前面的那个轿夫身上：他背上的短衣已被汗浸湿了；他的年龄像是很幼；他口中这时正发出一声微微的叹息，似乎抬不起这轿子的样子。这时忽然有一种思想来到我心里。我于是又想想：“我因要到友人家去商量要事，才受这样寂寞的痛苦。但轿夫呢？他们要到那里去做什么？为什么他们又要抬着我呢？……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抬不起我了，为什么又不敢把我放下呢？……在这样大雨的日子，谁又不愿在家中安逸地玩耍，却跑到冷静的街上呢？……”雨越落大了。他戴着的斗篷周围都流水了，他的衣裤都被雨飘湿了，他的赤足在一两寸深的冷水里“花浪”“花浪”地走着。这时我又忆起一件事了：几年前的一日，我从学校里刚要动身归家，忽落着雨，我没有穿革履，又没有见着轿子，只得借了一把伞脱了鞋袜赤足走回家。我的母亲知道了，急忙叫人烧水与我洗足；并且嘱咐我以后切不可再这样做。现在他在冰冷而且很深的水中走着，为什么他的母亲又不阻止他，却听他这样做呢？……或者他的母亲不爱他罢？

“你有母亲吗？”我不知不觉地说出这句话。

“先生！我有母亲，她现在家里。”他居然不迟疑地答应说。

“她不是你罢？”

“她是很爱我的。”

“但是为什么她听你在这样大雨下面的街上走着呢？为什么苦你赤足在冰冷的水中走着呢？”

“先生！我们穷人无论甚么苦的事都要去做，赤足在冷水里走，算得了什么事？我已习惯了，并不要紧的。当轿夫的在大雨下面怎么又能不抬轿呢？我的母亲今天看见这样的大雨，本不要我走的；但是今天我不出门找点钱回来，明天又有什么钱来买米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她还叫我早些回去，说只要把明天买米的钱找够就是了。今天雨落得这样大，街上的行人都很少，不知能不能够呢？”他的声音里带着失望了。

“这时还早得很，不要紧！”我说了这句话来安慰他，但是他并没有喜色。他这时似乎说高兴了，又接着往下说：

“我家里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兄弟，年纪都不大。我的父亲是去年三月死的，他也是一个轿夫，有四十多岁。他又吃鸦片烟；他原来本不吃，自从前年大病刚好后才‘动手’（一）吃的。母亲曾经劝过他，他说若是不吃，就没气力抬轿子了；我母亲只得由他。起初瘾还小，后来却大了。所以时常钱不够用，他每天从早晨出去，一直抬到夜里二更的时候才回来。后来得痲病死了。我当轿夫正是他死的那年动手的。那时我才十九岁，今年二十了。我的母亲本可补点衣裳，但是她前几天得病，今天还没有全好咧！这几天就靠我一个人找钱来供家了。”

“你一天找的钱够用吗？”

“有时不够用，那就只有吃稀饭了。一个月里总有六七天要吃稀饭，先生！你没看我这样的瘦么？李家二少爷——我常常抬过他的——他的年纪与我一样大，但他却比我胖得多呢！我每回抬他过后，回来总要喘气许久。不过他每回的轿钱总比别人给得多些。我们都愿意去抬他。……”

“你读过书吗？”他刚说到这里，我忽然说了这句话。

“我读过几个月，因为没有钱就没有去读了。我读了一本《三字经》，《千字文》也读了小半本。我还记得《三字经》的起头是‘人之初，性本善’咧！我想若是多读几年书，那我就可以同小的时候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张三哥一样；在什么管里当什么师爷了。现在也不来抬轿子了。唉！这也是我的命该这样的。”

“我不晓得我前世造了什么孽？菩萨罚我来受这样的罪。我记得昨天我们抬一个先生到青石桥街去。我抬前头。本来应该给我二百文的轿钱，那晓得他下了轿，只给了一百四十文。我去请他添三十文，他不但不添，反骂了我一顿；我这时说

了一句气话，他听了打了我两个耳光。他又说要叫‘警察局’（二）来拉我到厅里去。我们向来怕‘警察局’，因为他是专欺我们穷人的（三）。我听见这话，心里有些怕了；只得拿了一百四十文钱走出来。我将走出门的时候，还听见他骂我‘该死的’声音。我想我死了还要好些，免得生着受活罪。……不过我死了，我的母亲又靠着谁人来养活呢？还有兄弟姐妹呢？……”

听到这里，几乎要哭了。或者说我简直被他的话所占有了。我心中只是愤怒，只是悲哀，只是忧愁。我觉得他很可爱，虽然他每天的生活只有苦痛，但是他的心是很纯洁的；决没有害人利己的思想在他的心内藏着。他比那些戴着假面具的恶魔至少总要好一百倍罢！我对于他只有崇拜。我几乎要发狂了。

这时已到友人家里。下了轿，把轿钱交与这个轿夫后，就被一个人领我到客厅里了。

从此这个可爱的人的悲惨的故事，好像印在我心上似的，不知何时才能消灭呢？

一九二二，九，三，夜。

（注一）即开始之意。

（注二）成都劳动阶级的人呼“警察”为“警察局”。

（注三）这话是实在的，并不是我说的。

4. 佩竿《梦》（诗）。《文学旬刊》第五十六期，时事新报社，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四面。

我有一次到了一个很宽广的地方。/在灰色的天底下面，/我看见污泥的地上/横卧着许多的人。/他们是昏睡着的，/脸上还带着欢乐的颜色；/只是他们底身体已经瘦得不成样了，/他们底衣服已烂得不能蔽体了。/并且一身都是污泥。/我这时实在不愿意看了，/急忙把头掉过去；/但是各处都卧着这样的人呵！/只有把眼闭着了罢！

忽然听见了一种很微弱的呼声，“起来呀！”“起来呀！”/我又睁开眼看：/一个穿着绿衣的人，/站在他们中间叫着。/他只是叫，但却没有应声，/也没有一个人被他惊

醒。/他叹了一口气,又尽力地大叫一声,/有一两个人在翻身了;/但他们打了几个呵欠,又睡着了。/“起来呀!”声音更微弱了。/他忽然倒了。/眼也闭着了,口里发出微微的叹息。/现在他完全躺在污泥里了。/天全然黑暗了,/一切都看不见了。

5. 佩竿《疯人》(诗)。《文学旬刊》第五十六期,时事新报社,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四面。

假若有一个极富的人,/将他所有的金钱/散与一切的贫民;/这时一般人定说他是疯人了。/但是现在世界中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疯人呵!/假若有一个商人,/将他所有的货物/散与一切的贫民;/这时一般人定说他是疯人了。/但是现在世界中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疯人呵!/假若有一个大田主,/将他所有的粗米/散与一切的贫民;/这时一般人定说他是疯人了。/但是现在世界中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疯人呵!

我决意要在现在世界中,/寻出一个——只寻出一个——疯人,/但是失败了;/因为我是生在这聪明人的世界中呵!/这世界中已没有一个疯人存在了。

6. 佩竿《惭愧》(诗)。《文学旬刊》第五十六期,时事新报社,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四面。

“少爷!给我一个钱罢!/可怜我两天来都没有吃东西呵!”/路旁一个老丐底凄惨而且微弱的叫声,/深深地打入我底心坎里。/我便漠然地伸我底手进衣袋里,/摸索了许久,——许久,/但终久没有摸出钱来。/他呢?失望了,/他底眼紧紧地望着我。/我将什么礼物赠他呢?/只得无力地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儿走了。/可是我底心上便永远留着“惭愧”的痕迹了。

7. 佩竿《丧家的小孩》(诗)。《文学旬刊》第五十六期,时事新报社,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四面。

“呵！看卖人呵！”一阵微风吹过来的，带着轻蔑的笑声，引诱着我底目光向前了。/一个约莫十一二岁的小孩，/穿着一件极褴褛的衣。/乱发蓬蓬的头上，/插着一个草标儿。^① /他底小脸是深黑的，/好像许久没有洗濯的了。/他底身躯是很小的，也很瘦的，/我知道他已许久没有吃过饱饭了，/街上的人都笑他，厌他；/却没有一个可怜他。/因为他已是一个丧家的小孩，/没有母亲保护的人了。/没有母亲保护的，丧家的小孩，/在这世界中是任人踏践的。/(这是我眼见着的一件实事)

三、巴金与《文学旬刊》编辑的《通讯》

李芾甘《通讯》。《文学旬刊》第四十九期，时事新报社，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第四面。

(上略)我很希望《文学旬刊》能改出周刊，因为现在中国的文学刊物只有《小说月报》^②《创造》^③《文学旬刊》三种。《创造》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次，时间太久了。并且还不能如期出版。《小说月报》要一月才出版一次。《文学旬刊》虽然十天

① 把草标、稻草插在头或肩上，表示卖身。

② 1910年7月创刊，月刊，王蕴章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2年，恽铁樵主编，后由王蕴章接任。自1918年前后起，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之一。

自1921年1月10日第12卷第1号起，由沈雁冰(茅盾)担任主编。同卷同期发表《改革宣言》，从此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经全面改革，作为“新文学”刊物重新出发。常发表进步倾向的创作和论文，积极介绍外国文学名著，为推动新文学运动做出贡献。编辑除了茅盾以外，另有郑振铎、叶绍钧等人。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停刊。共发行二十二卷，每年一卷(参考：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所收〔2〕《小说月报》，汇文阁书店，1972年9月，第8—9页；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0月，第282—283页；《辞海试行本》第10分册〔文学·语言文字〕，第19页)。

③ 《创造》季刊。创造社的机关刊物。1922年5月于上海创刊。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主编。以发表作品为主，另刊登理论与翻译。1924年2月停刊，共发行六期。

《创造》月刊。1926年3月至1929年1月，共发行十八期(《辞海试行本》第10分册〔文学·语言文字〕，第19页)。

出一次,但每次只有一小张^①,登了几篇文章就没有余地了,所以每回要目预告要登的文章总不能照样登出。若改出周刊每月要多出一张(有时还多两张),要好多了。并且于《学灯》^②也无什么损失。想来总能实行的。

近来《礼拜六》^③《半月》^④《快活》^⑤《游戏世界》^⑥等等杂志很发达,不能算是好现象。但是这也是应该的,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所以这种东西才能受人欢迎。西谛君说得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乃在于与这腐败的社会争斗,积极的把他们的那种旧眼光变换过。”^⑦

有一些人说中国现代的“新小说”(指《小说月报》等杂志所登的创作品)不容易懂,所以一般没有高深学识的人看不懂这些才去看《礼拜六》等杂志。其实《小说月报》的创作只要读的时候稍稍用点心,就看懂了。无奈一些中国人总恨时间多,只是找消遣的事做,只是游玩、闲耍,舍不得用一点心,所以才不喜欢看非消遣的小说。我以为现在最好一面做建设的工作,一面做破坏的工作;双方齐进,那末就可

① 纸面为日本普通报纸一半的大小,两张,分四面。

② 作为上海时事新报社《时事新报》副刊,于1918年3月4日创刊,周刊,自1919年1月起改为日刊。一般涉及教育问题、社会问题(《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第697页)。

③ 旧派文艺期刊(周刊)之一。1914年6月第1期至1916年4月第200期,王钝根、孙剑秋主编,上海中华图书馆发行。约停刊五年,后于1921年3月复刊第1期,至1937年8月第703期,周瘦鹃、王钝根主编,上海中华图书馆发行。中途,自1923年起改为礼拜六报馆主编。1945年10月重办复刊第1期,以1948年7月第135期停刊(参考: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所收〔11〕《礼拜六》,第16—19页;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第290—293页;《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第283页)。

④ 旧派文艺期刊(半月刊)之一。1921年9月第1期,周瘦鹃主编,上海半月社发行,自第5期起由上海大东书局发行(参考: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所收〔42〕《半月》,第56—59页;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第330—333页)。

⑤ 旧派文艺期刊(旬刊)之一。1922年1月第1期至12月第36期,张云石、李涵秋主编,上海世界书局发行(参考: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所收〔52〕《快活》,第68—69页;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第342—343页;《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第578页)。

⑥ 旧派文艺期刊(月刊)之一。1921年6月至1923年6月,周瘦鹃、赵若狂主编,上海大东书局发行(参考: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所收〔40〕《游戏世界》,第54—55页;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第328—329页)。

⑦ 该处引自《文学旬刊》第36期(1922年5月1日,第4面)《杂谈》栏(2)所收署名西(即西谛,郑振铎)的散文《悲观》。

得很大的效果；将来中国文学便可立足于世界文学之间，并能大放光明。这就是我的意见。

我很希望你们与我常通信教导我。

西谛君的《悲鸣之鸟》^①何等沉痛呵！我读这篇时已陪了不少的眼泪了。

李芾甘 八月二十三日

芾甘先生

来示读悉。尊意欲将本刊改为周刊，本是很好的办法，只是目前因为编辑与印刷上的困难，一时还不能办到，希望原谅。其余所示，均与同人意见符合，以后尚希不吝赐教。 记者

四、尾声

其实，在第二、第三章节介绍的文章，不仅是难以收集的资料，而且巴金自己也很少谈到，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直被忽略的部分^②。

然而，实际阅读这些文章就会看到巴金文学的性质，估计今后将会受到关注。

也正因为如此，笔者才介绍了诸篇全文，并把副题定为《巴金文学的萌芽》。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① 诗，西谛（郑振铎）作。《文学旬刊》第36期，1922年5月1日，第3面。

② 文中介绍的八篇文章现均收入《巴金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译注

五四时期巴金的诸篇论文 及致袁诗荪的书信*

一、引言

标题中的五四时期，是指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爆发到巴金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前后离开成都^①这段时间。

* 该篇原载《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论集》第2卷第1号，1987年7月，第283—317页。

① 离开成都时间有误。见本书所收《〈芾甘(巴金)致袁诗荪的书信〉(一九二一年)解说》第256页注④。——译注

大概在十年前,笔者曾根据《小小的经验》^①《信仰与活动》^②《片段的记录》^③《我的幼年》^④《我的几个先生》^⑤几篇回忆录,讨论过巴金与杂志《半月》《警群》《平民之声》的关联^⑥,指出了当时巴金的思想倾向。然而,关于诸种杂志所载论文的内容,这几篇回忆录只提供了片段的信息,因此,笔者不得不参考其他资料,做出综合判断。

幸好,笔者后来一点一滴收集到了这些资料。如今,除了尚缺巴金发表于《平民之声》《半月》的几篇,这一时期的其他论文基本上已经找到。

因此,本文第二章节将介绍诸篇论文的全文。《均社宣言》据说由袁诗尧起草^⑦,由于巴金也曾参与了起草工作,以下将介绍该篇。关于《适社的意趣和大纲》,巴金既没有亲自起草也没有参与起草工作,但由于巴金曾与适社密切来往,以下也将介绍该篇。此外,《半月》第二十四号载有一篇关于剪发的报道,以下一并加以介绍。

本文第三章节将介绍《芾甘(巴金)致袁诗尧的书信》(写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这是巴金先生直接提供给笔者的。通过讨论以上几篇回忆录,笔者已对当时巴金的活动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读完这封书信却感到,巴金与中国的其他各种组织广泛地建立了关系,这远远超出了笔者的预料。

在五四时期巴金读后深受感动的作品中,有一部题为《夜未央》^{〔註1〕}的戏剧。至今,笔者一直未能找到李石曾译本,但巴金译本现已可以阅览。借此机会,笔

① 1935年春天在日本东京写成。《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第119—130页。

② 《水星》第2卷第2期,文华书局,1935年5月,第114—118页。

③ 《忆》,第163—176页。原载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第120期,1936年4月1日。

④ 《中流》第1卷第1期,中流社,1936年9月5日,第5—9页。

⑤ 《中流》第1卷第2期,中流社,1936年9月20日,第96—100页。

⑥ 见本书所收《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第2章第2节第30—47页。

⑦ 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34页写有:“这年[1921年]5月,他和《半月》的同人组织了一个‘均社’,在《半月》21期(1921年6月1日)上发表了袁诗尧(应为‘袁诗尧’。——译注)起草的《均社宣言》,这个宣言和当时重庆的‘适社’,合江县的‘无社’,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点。”

者简洁地介绍了剧情,以便读者掌握剧本的梗概,并作为附录附在本文结尾。

二、诸篇论文

1. 芾甘《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半月》第十七号,成都半月社,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①。

近来“自由”、“平等”两个名词已成一般人的口头禅。但是问他们甚么是自由?他们回答说:“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书信秘密自由。”甚么是平等?他们说:“凡是一国的国民在法律上个个都平等,没有什么尊卑的区别。”但这些绝对不是真正自由、真正平等。诸君不信,请看下文。

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我们想与世界的弟兄互相亲爱,但政府偏要我们爱国,叫我们去当兵,杀世界的同胞。在中国更不成了,甚至本国人杀本国人,像湖南、陕西、四川这几年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惨不忍见。这都是政府给我们的好处。

那些资本家,垄断世界公有的财产,使我们贫民不能生活,政府不但不去罚他,反设法律来保护他。人民没有吃的,只得抢些来吃;没有穿的,只得抢些来穿;没有用的,只得抢些来用;这都是那些资本家强迫我们人民做的。但是政府又说我们是强盗,要拿我们去枪毙。我们固然不该,但不过把我们失去的财产夺些回来罢了,却要拉去枪毙,像资本家抢世界公有的财产,反安然活着。既不要人民抢人,便不得不流为乞丐。有时政府、资本家看不过了,把他们抢来的钱赏几个与贫民,却美其名曰慈善;甚至有些还要骂我们,说不去做工,却来要饭。诸君!未必我们不想做工吗?不过他不拿工与我们做罢了,却来骂我们。照这样看起来,前头所说的“自由”、“平等”,似乎与我们人民没有关系了!这样还算“自由”、“平等”吗?我绝

^① 该篇译自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谭兴国先生所藏原件的抄写稿。(该篇转引自:《巴金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3页。——译注)

不信世界上有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平等！但什么才是真自由、平等？我说：安那其才是真自由，共产才是真平等。要建设真自由、真平等的社会，就只有社会革命。

什么是安那其？安那其就是废弃政府及附属于政府的机关，主张把生产的机关及他所产的物品属于人民全体。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并依各人的能力去分配工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医生就做医生，能做矿工就做矿工；事容易的就多做几点钟，事难的、苦的就少做几点钟。你要吃，就有个机关拿饭给你；你要穿，就有衣服给你；你要住，就有房子给你。人人都受平等的教育，没有智慧的分别。法国某安那其党说“每人每日作工二小时已足供全社会之需”；克鲁泡特金也说“每人每日作工四小时，即可支持全社会的生活而有余”。照这样看来，我想这样少的作工时间，绝没有人不愿的。

没有政府、法律，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资产阶级，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劳动界的朋友们！你们看无强权的社会何等自由啊！何等平等啊！你们想建设这种自由平等的社会吗？那么就请你们实行社会革命，推翻那万恶的政治。那时，这自由平等的社会就要实现了！望你们赶快起来联合你们的朋友们啊！若是再一味的隐忍，那么，你们就要成为资本家的鱼肉了！你们不信，请看嘛！

2. 芾甘《五一纪念感言》。《人声杂志》第二号，重庆适社，一九二一年四月，第一—三页^①。

今天是很么日子、我想诸位大概都知道的、简单说来、今天就是劳动者做人的日子、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欧美劳动者都是每天做十小时以上的工作、一天除了做工以外、就没有时间了、那资本家所享的种种快乐都与劳动者无关、但劳动者虽然每天做许多时间的工、所得的工钱反不够自己吃饭、至于穿衣更不消说了、那些资本家每天虽不做工、却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他们吃剩了的饭、也没有劳动者吃的、穿剩了的衣服、也没有劳动者穿的、住剩了的房屋、也没有劳动者住的、简直不把劳动者当人了、一般的劳动者也以为这是天赐的、遂安安逸逸的给他们做工、并

^① 该篇转引自：《巴金全集》第18卷，第4—6页。引用时依照《巴金全集》版保留了原文标点。——译注

不敢反抗他们、这就是劳动者自以为不是人的日子、

到了一八八五年五月一日、美国全体工人举行大示威运动、总同盟罢工、为要求八点钟工作制、过了几天后、就有十几万工人成了功、于是这五月一日便成了美国工界的纪念日、从此以后、劳动者便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了、后来各国社会党遂议决把五月一日作为工界的神圣纪念日、每年这一天必停工一日举行示威运动、

在一八八六年、美国芝加哥的工人曾作出了绝大的牺牲、在这一天劳动者同警察冲突、警方开枪乱击、打得血肉狼藉、结果政府方面遂把这件事栽到社会党人身上、捉了八个社会党人、绞杀了四个、一个仰药自尽、其余的两个终身监禁、一个监禁十五年、这就是一八八六年美国的五一纪念日、

上文把五一运动的历史简单说了、现在把我的感想、记在下面、

我以为人生下来必要劳动、不劳动便算不得人、那些资本家既不劳动、却又要想些法子来抢那些劳动者用血汗所得的报酬、像这样简直不是人、乃是“社会之敌”、但为什么他们能支配劳动者、使劳动者没饭吃、没衣穿、啊、我知道了、是他们把自己抢来的钱、去养起那万恶的政府的缘故、若是我们要推翻他们、非先推翻那保障他们的政府不可、中国劳动界的朋友听着、你们要晓得你们从前所受的痛苦、并不是天赐的、实是你们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你们以为自己是十八层地狱的罪犯、其实你们是社会上的主人翁、你们既没抢人、又没害人、你们怕什么、你们有力量反抗他们、你们唯一的手段就是总同盟罢工、你们要晓得今天是你做人的日子、望你们赶快起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争回你们的人格、推翻那万恶的政府和那万恶的资产阶级、你们没听见美国工人的大牺牲吗、他们何等的奋斗、何等的牺牲、他们是人、你们也是人、难道他们能够、你们却不能么、总之、以前的事、不必说了、从今天后、你们定要起来、定要把这“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变成中国劳动界的神圣纪念日、只要你们肯牺牲、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

俄国托尔斯大曾说过、“自由非赠品也、自由有代价、曰血与泪、”波兰廖抗夫也说过、“自由之代价、言之可惨、不过为无量之腥血耳、”你们想要自由吗、就请你们作出重大的牺牲、与其被资本家害死、不如为自由而战死、死得何等光荣啊、若是你们再忍受这种痛苦(或是忍见你们的同胞受这种痛苦)而不肯牺牲、那么世界的人道便灭绝了、你们的血也可以任意流了、那些自由平等的名词、都变成欺人的话了、

所以我们当联合一般同胞、同那资本家奋斗、现在时候到了、望你们努力、你们要想从任人践踏的奴隶、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民、都在乎你们的奋斗、牺牲、流血、你们肯这样做、我们也定要帮助你们、我们也定要同万恶的政府资产阶级奋斗、牺牲、流血、那时快乐的、光荣的、自由的、平等的、无政府社会就要实现了、朋友、朋友、你们快努力啊、

3. 芾甘《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的部分内容。《半月》第二十号,成都半月社,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①。

今欧战告终,和平开始。离世界大同时期将不远矣。我们主张世界大同的人应当努力学“世界语”,努力传播“世界语”,使人人能懂“世界语”;再把“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输入他们的脑筋,那时大同世界就会立刻现于我们的面前。……

4. 芾甘《IWW与中国劳动者》。《半月》第二十一号,成都半月社,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②。

(一)

我们现在尽管一味的空谈“劳动运动”,究竟对于中国劳动者有什么益处?我们尽管大吹特吹“劳工神圣”,难道劳动者享受过这“神圣”的幸福吗?“五一劳动节”这名词传到中国人耳里,也有几年了。但虽有几家报纸大大的鼓吹,究竟有几个劳动者懂得!照这样做下去,将来能得到什么效果?我们鼓吹“劳工神圣”的人,还不觉悟吗?

我相信美国的 IWW 是有益于中国劳动者的,故特把他介绍过来。

(二)

IWW 是“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缩写。译成中文就是“世界

① 该篇译自谭兴国先生所藏原件的抄写稿。(该篇转引自:《巴金全集》第 18 卷,第 9 页。——译注)

② 该篇译自谭兴国先生所藏原件的抄写稿。(该篇转引自:《半月》第 21 号,第 8—10 页。——译注)

产业劳动者同盟”。他〔指IWW。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是现在美国最占势力的一个劳动组合。美国这几年所发生的同盟罢工，差不多都与他有关系。他的势力几乎可支配美国全国。美国政府和资本家把他当作眼中钉，要消灭他，但大多数的人都是狠信服他的，所以把政府弄得没法。总之，我敢说：将来美国的社会革命定由他起始。

他起源于一九〇五年。那年秋间在美国有六个很热心的劳动运动者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当时美国工人的情形。并决定在第二年开一大会。到第二年又约三十多个劳动运动者，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同年六月在芝加谷召集了一次劳动大会。那日起会的有代表八十六名，所代表的劳动团体有三十四个，会员有几万人。猛烈的讨论了两星期，遂成立了一个团体，——就是最有名的IWW。

(三)

IWW的主义和法国的工团主义很相似，故有人说他算是“美国的工团主义”。

他起先便主张打破资本阶级，他以为不把资本阶级打破，劳动者便不能得真正幸福。因为“国家”“政府”“法律”都是保护资本阶级的东西，所以他又主张打破这些怪物。

他以为资本阶级绝对不能和劳动阶级调和。必定要等劳动者把土地和生产机器取夺回来。并且必至消灭“工资制度”而后止。(IWW旨趣书第二段)

他以为打破资本主义，必须组织生产军：一面可同资本阶级战斗；一面为将来资本阶级推倒后处理生产品之用。(同上末段)

他又主张“联络一切产业的全体劳动者，协同一致，组织产业的劳动组合，一遇某产业有同盟罢工，或厂主闭门不纳事情，各产业当共同一致援助，视一部的利害为全体的利害”。(同上第四段)

他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就是“总同盟罢工”，这是他们最有效力的武器。若同盟罢工不能胜的时候就代之以“怠业”。

以上都是他的主义，也就是他的特点。照这样看来可见他是最好的劳动组合。不过我有点不满意他的地方：因他的组织是中央集权的，执行机关之理事会的权力很大，可以任意命令某组合起同盟罢工。——这个缺点或者因为他的会员尽都是不熟练劳动者的缘故。

总之他是以激烈的手段，创造他们理想底真自由平等无强权的劳动者世界。

(四)

中国劳动者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纯粹劳动者组织的团体。这缘因，只举一个例就可明白了。如某工厂工人因工资太少的缘故，起全体罢工。但他们回到家，屋里又没有米了，若再不做工，又怎么能吃饭。然而他们的厂主，又要另外去招一起工人。所□他们便不得不去肯求他们的厂主收留他们。这回就完全失败了。这样看来，就可知道要救中国的劳动者，必定要先使他们自己起来组织一个极大的革命劳动团体，同心协力，打破“国家”“政府”“法律”等制度，推翻劳动者的最大敌人资本阶级。再把生产机关及其产物收归劳动者所有。

这是最好的方法。IWW的目的就是这样。可见他和中国劳动者的关系是再重大没有的了。

资本阶级的世界，快到末日了，劳动者的世界快来了。中国的劳动者，速速从好梦中醒来！联合你们的同胞，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庶几能生存于将来的世界。再不可做时代的落伍者了。

5. 芾甘《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警群》第一号，成都警群月报社，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第十一—十四页^①。

现在中国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一般的青年人处在这种势力下面，被它弄得全无生气，力量薄弱的只能顺世堕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气的也只有忍气吞声，听命于天，即或有时实在受不了，也只有往自杀那条路走，从没人敢反抗的。因此一天一天的弄下去，竟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中国，哪还有幸福之可言？现在有一般较为觉悟的青年，以为要把中国弄好，非提倡“爱国主义”不可，因此就把“爱国主义”当作中国人到幸福唯一的路，于是“爱国主义”之声遍于全国。我以为这种现象实在可怕。我承认“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的障碍，我既为人类中之一分子，便不能昧

^① 该篇转引自：《巴金全集》第18卷，第14—17页。——译注

着良心不去反对它，故不得不驳它一下，并且把我的“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的意见写下来。以下的话，都是本良心说的，我想这样大的中国，也许有几个不肯昧良心的人给我表同情——这并不算是苛求罢。

二

爱国主义究竟是甚么？托尔斯太说得好：“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其所练习者，杀人之术也，其所讨论者，杀人问题也，与平民生活无与焉。”这句话初看起来觉得无甚道理，若是仔细看下去，“爱国主义”的精义都在这里了。我们人类除却一般没良心的军阀政客外，没有一个不反对战争、诅咒战争的，但我们考察战争之起源，却是由于“爱国”。假使人类互相亲爱，欢欢喜喜的一伙做事，哪里还有战争呢？自从“兽欲时代”产生了国家后，就有所谓“爱国主义”出现，其原因，其作用，无一处不是作伪、自私、自利。这一国的政府想扩充它的土地，不惜牺牲人民的性命去发挥它的兽欲，叫人民去给它侵伐别国，若是打胜了，只有那般军阀政客享快乐，打败了，几百万的军费哪一些不是平民的脂膏？到底于平民有什么利益？可怜的平民，他哪里知道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杀害他们最亲爱的父子兄弟姊妹的武器呢？还有一事足以证明“爱国主义”是个杀人的怪物，就是在十九世纪末叶，德国政府奖励人民的爱国热诚，并且实行征兵制度，全国的壮年男子，都应服务兵役，就是文人、教士也要做杀人的事，听军阀政客的指挥，去杀他人，一旦有工人罢工等事发生，亦在该杀之列，有时甚至于杀自己的父母兄弟。唉！要是这样还不算暴虐、残忍，我恐怕世界上没有暴虐残忍的事发生了。

三

上文把爱国主义驳了，我的意思以为爱国主义的发达，绝不能使中国人享幸福，只有使中国人越受痛苦。中国人要寻幸福只有一条路可走，要想走那条路，非先把下列的几种制度推倒不可。这些制度是什么呢？

一、政府。政府是一种强权机关，是保障法律的，它只有杀害我们，掠夺我们的衣食住，又能侮辱我们，帮助资本家杀害贫民的。我们人类本是自由的，它却造出许多法令来束缚我们；我们是酷爱和平的，但它却叫我们去战争；我们本应同各国同胞讲互助，但它却叫我们讲竞争。它种种举动都和我们多数人类的意思相反，从没有做过一件有益于我们的事情。而且它最大的坏处，就是爱国主义的根据地。

我们要想寻幸福，第一步就要推翻它。

二、私产。私产是掠夺的结果。财产本来是人类公有的，乃有一二强有力的人，用他们的强力同知识，把公有的财产据为己有，遂使一般较弱的人流离失所，又用金钱收买别人劳力，替他们生产，所生产的物品，劳动者丝毫都不能用，他反享尽快乐。世界上不平等的事，这算是第一。且有私产，一般人遂起争夺的念头，欺骗盗贼的事常常出现，民众的道德扫地尽矣。我们又考察政府之所以能维持久远，都是有私产的缘故；我们能把私产制度废去，那政府也就容易推翻了。

三、宗教。宗教是束缚人群思想、阻碍人群进化的东西，我们要想求真理，它却教我们迷信，我们要进取，它却叫我们保守。一般教徒说：“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是真理、正道、善良、美好、势力、生机；人类是诈伪、不平、罪恶、丑陋、无能、死；上帝是主人，人类是奴隶。人类不能自己找公正、真理，永久的生机只可由神力暗示之。上帝创造世界，那些君主、官吏等都是上帝派下的，是上帝的代表，所以人民应为君主官吏的奴隶。”（英皇查理士第一说的“君权天赋”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教教的精义。教教为宗教中极有势力之教，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见了。巴枯宁说得好：“若然有上帝，我们也应把他来毁灭。”我们起来试试吧！

四

上面所列几种，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到幸福路的第一步，就要推倒这些。这些东西消灭后，再分配财产，自由组织，互相扶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图众人之利益，众图个人之安宁。这岂不是幸福吗？但我们要先出代价，然后能得到这幸福。这代价是什么？就是无量数的热血。巴枯宁曾说：“人生到世间，最痛快、最愉快的事，莫有过于革命的事业！你们都一想，与其蜷伏于淫威之下苟延残喘而幸生，何若磊磊落落、赌一点自由新血，与魔王破釜沉舟一战而亡！”这话说得何等痛快！何等壮烈！我愿我们的朋友和我们预备着满腔的热血，来干这最痛快、最愉快的革命事业，齐向这幸福的路上走！

6. 《什么话》栏。《半月》第二十四号，成都半月社，一九二一年七月^①。

《国民公报》一九二一年七月八日载，“省会警察厅出示略云：昨据汪顷波报称，近日妇女每多剪发齐眉，并梳拿破崙华盛顿等头式，实属有伤风化。应予出示禁止，以挽颓风。嗣后妇女已剪者，糜即蓄留；未剪者不得再剪！如敢故违，定以妇女坐法处罚家长！”云

7. 《均社宣言》。《半月》第二十一号，成都半月社，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②。

吾人生来是彼此均等的，本能和遗传虽有智愚高下，但这不是吾人自身的罪过，不能不有相等的待遇，那一切权利义务的享受服劳应当均等，贵贱、主奴、治者被治者的阶级应当划除，凡畸形制度为造成阶级束缚争杀的原动力，或阻碍平等自由互助的，都应一律取消。今略为分写在下面：

教育是智能的养成、德性的培养，□[估计为“都”字，指智能、德性。（《半月》第二十一号为“即”字。——译注）]是后天的生命；人之本能遗传与他动物相差不远，或且不逮，人之所以为人，全靠教育使他发展进步，即吾人不可不受相当的教育。故受教育权利，无论何人，都应当平均的享受。

劳力是吾人生活的代价，即不劳动不能得生存权。是自己生活的代价，无论何人，不能以劳力卖给人，也不能买别人的劳力供自己；无论何人，应当以相当的劳力换自己的生活，不能使劳者独劳，逸者独逸；所以工作的义务应当平均劳动。

个人有个人的完全自主权，无论何人，在精神上物质各方面，不能被人劫掠或劫掠他人，即不能以少数压制多数，亦不能以多数压制少数，要当使个性充分发展，同赴进化正轨的前途。

① 该处译自谭兴国先生所藏原件的抄写稿。（该处转引自：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第32页。——译注）

② 该篇转引自：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第534—537页。

我们确信世界是“爱”组成的，不是“杀”组成的，即世界是互助的，不是竞争的。“爱”是人类的天性，是世界进化的要素，应当极力发挥的。“杀”乃是一种病的现象，是阻碍、破坏进化的危害物，我们应当消灭他，为世界人类永久进化计，不能不消灭他，用各个人真实的“爱力”去实现我们将来的“爱的世界”。

宇宙的进化，是由黑暗而进于光明，由较不善而进于较善；其在某时期中反致较恶的缘故，这是坏制度酿成，即少数人的自私自利压迫劫杀的制度酿成的。现今一般人所诅咒的万恶社会，也并不是生成这样的；险恶的人欲，也并不是生成这样的。我们不可悲观，不可萎靡，促成世界人类的进化完美，全靠我们努力！我们要以各自的光明照破各自的黑暗，并达到世界光明的目的。

我们要达到以上各种目的，可现今世界偏却是恶劣的。这一切“杀”的病象，黑暗势力的造成，致使我们物质享受不能均等，即衣食住相差太远；精神享受不能均等，即教育智能都变成少数强有力者的专利品；劳者过劳，忧瘁痛苦；逸者过逸，肆为淫乐；智者愈智，愚者益愚；富者益赢余骄横，贫者愈无以为生；强有力者生杀宰割一切，弱者只供其鱼肉宰割。遂把一个完全的社会弄成粉碎，平等的社会划分阶级，光明的社会弄成污秽黑暗，爱乐的社会弄成残酷杀掠。这都是畸形制度产出恶劣的结果，才造成这种畸形恶劣的社会，我们不能不取消他。这畸形恶劣的制度是什么？就是：

（一）私产 财产原是人类公有的，如土地、林木、矿山、铁道、机械、轮船、火车等。若论理来，世界一切物产要劳动者才能享受，因为是他们制成的，但现劳动者完全不能享受，完全归于坐享现成者之手，这岂不是太不平均么？怎样社会至于如此？这完全是由私产制度生来的。既有私产制度，各都争权窃利，以利买权，倚权掠利。于是富者愈富愈强，贫者愈贫愈弱，富者终日安享荣乐，任性所为，贫者生活都不能得，那里能干别的事？自然贫者应当享受的一切，精神、物质各方面都被富者强者给抢劫完了。

（二）政府 政府即强权的根据地，把人民一切精神、物质的产物的需要，都拿给他少数人专用；并且以法律、军警等助其恶焰，强力压迫以遂他永久劫杀的私愿；造出君民、贵贱、治者、被治者的种种阶级，你抢我夺，总是以人民为牺牲。因为他们都是把人民抢够了的，本身就是资本家，所以与资本家联络一气，共同来欺压平民。这在专制立宪是这样，就在民主共和也是这样；在限制选举是这样，普遍选举还是这样；人民是莫有利益，或反见危害的。这在本国国内是这样，即国与国相对，

总是各张权力，互相争战，以人民为牺牲品，永远是虐杀人民的東西。

(三) 附属于政府的及其他：

甲、法律 这是政府的附属物，即是与权力狼狈为奸的东西。有权力的人，他拿法律可以欺压我们，他就拿法律来欺压；法律不能欺压我们，他就拿权力欺压；即是法律只是强有力的人专利品保护品，人民是不能受益反为受害的。并且法律根本就是限制个人不能发展的东西，不是少数压制多数，就是多数压制少数，我们只是自由契约就够了，法律是根本不能存在的。

乙、军警 军警只是强有力者的爪牙，强有力者用以保护自己，驱遣来压迫虐杀平民的。所谓禁暴止乱的话，完全是空言或增加暴乱；就是他能禁止暴乱，在我们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里，自无需乎用它。并且以充军警本人来说，他本是一个自由完全的人，乃因为强有力者所迷弄，遂变成压杀人民的器械。从前世界全部的黑暗污秽史，都是由这种杀害生出来的，不去掉它，世界永久莫得光明、净美的时候。

丙、宗教 宗教是迷误人智的，我们当以真理为归，无论如何不能拿一个渺茫不可知的偶像去崇拜皈依，我们当受我们理性的指导，不能为偶像的牺牲，即我们不当拿偶像去迷误别人，也不应以偶像来迷误自己。

以上几项——私产、政府、法律、军警、教会，都是妨害人类的进化，增加世界的黑暗的。有了它，无论如何，一切享受是不平均的：教育绝不会普及，劳作绝不会均等，富贵贫贱的阶级绝不会消除，永远是残杀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压迫束缚的世界，绝不会平等、自由、互相爱助的。我们为我们自己计，为人类进化计，不能不废除他。我们只晓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教育普及，智能均等”，努力做去，以实现我们自由、平等、互相爱助的社会。

8. 《适社的意趣和大纲》。转登在《半月》第十四号，成都半月社，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①。

现在最流行的思潮，有什么“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布尔雪维克”

^① 该篇转引自：《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527—530页。

(Bolshevik)，“苏雪尔”(Social)……一切好听底主义，书报传播是这般学说，众口鼓吹是这般论调，甚至军阀、官僚、政客等通电，也似是而非地在弄这些把戏，可算是时髦极了！其中真能自觉，根于良心作用而具有彻底改造的决心者固不乏人，然而附和、盲从、投机、利用，希图遂其私心的也不能说没有。原来在“经济制度”产出的“统治权力”之下，凡遇一种思想发生，都有这般复杂的趋势，本是不足怪的。

我们不空谈什么主义，只知道“适应人类全体生存的要求！”怎样能适应呢？在今日这个恶劣社会底环境，除了委屈、迁就、甘受环境的支配讨苟且底生活外，要解决这个问题，达到这个目的，当向积极的方面去活动，不当在消极的歧路上徘徊。如徘徊在消极的任何方面，无论抱的是什么主义，徒供狡猾政党的利用，终不能走上轨道，更说不上收什么效果；即使侥幸成了功，试问“统治权力”和“经济制度”的壁垒依然存在，各个人都能满足生存底要求么？不能满足各个人生存底要求，即是“不能适应人类全体生存底要求”，这个问题未能根本解决，目的未能完全达到，势必要“再求适应”的方法，岂不是费了力而又讨不着好吗？

世界是进化的，进化是没有止境的！人类的全体生存既有了适应的要求，是“不达到目的终不止”的。现在我们的眼光既看到了这步境界，得前进便前进，什么“保守”啊，“温和”呀，“稳健”啦……许多不对题的文章一概不管！只向积极的方面单刀直入，奋勇进行，“划除统治权力”，“灭绝经济制度”，“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底世界！”质而言之，我们“适社的意趣”是要“冲破恶劣底旧环境，改造美善底新环境，来适应人类全体生存底要求。”托尔斯泰(Tolstoy)说：“自由不是赠品啦！自由有代价，就是血与泪。”我们当投的代价，乃是“自己牺牲与奋斗！”牺牲、奋斗，正是我们改造社会之唯一无上的工具啊。

虽然，我们既具有以上的决心和精神，尤不可不持两种亟应分别的态度，就是（一）对于各方面人物之接触，应兼采“排除手段”与“感化手段”；（二）对于自己个人，应抱守“极端底严格信条”。今分说于下。

（一）现在“兽性太深”“万恶不赦”底军阀、资本家，无益于社会，有害于人群，除却“诛尽杀绝”，不能挽回，自然是归入排除之列了。但其中有在政治方面托足而天良尚未泯灭的，或因受国家主义的束缚未能彻底觉悟的，或大体业已觉悟，类多消极地赞成、因循观望、不肯积极地提倡、将责任担在肩头的，或因环境逼迫误入迷

途，突受新潮震荡，非常容受，又因种种关系不能立地退出罪恶渊藪的。这几项人质地都好，比较站在进化路旁专与新青年作梗的人大有区别，我们应将他感化吸收拢来，对于现在文化之宣传和将来社会之改造，可以减少许多障碍，也许得他们切实底赞助。这就是我们对人所以要兼采排除与感化手段的意思。

(二)我们既菲薄那些不肯牺牲专谈主义的“卫生革命耻”和那些借文化运动出风头专以投机骗人为手段的“无党猾头家”，那末，我们就不可专挂一块簇新的招牌，在门面上撑架子，却黑着心子，厚着脸皮，跑到掠夺的政治方面去活动。换句话说，我们既骂人“不应做军阀、官僚、政客”，那末，我们就应该守“不做军阀、官僚、政客”的信条！要是一面顶起崭新的头衔在讲新文化，一面又鬼鬼祟祟地做那极龌龊苟贱底政客，奴颜婢膝地仰承一般军阀、官僚的意旨，这种举动，简直是人格不够，毫无价值，不但不配谈什么主义，讲什么文化，恐怕还要受人家的轻视，认我们也像这种不三不四底坏蛋，那就违背了本社的意趣，大为人类之罪人了。这又是我们对自己所以要抱守极端底严格信条的意思。

因为有以上种种的判别、决心、精神，所以本社的意趣，决没有那个人来附和、盲从，也没有那个人敢投机、利用，这样的意趣何等纯洁呀！何等神圣啦！且把本社的大纲列在下面：

名称：依本社的意趣，定名“适社”。

同志：凡不违背本社意趣者，得为同志。

组织：本社无首领、徒众、总部、支部各阶级，但因执行事务底便利，暂由所在地同志公推“主任”一人，以专责成，并推“通信”“会计”“书写”各数人，轮流执行任务。

地址：无一定底地址，凡向本社通信，须由所在地的同志私人收转。

会期：无一定底会期，如本社的事有应须讨论者，就通知所在地同志开会。

经费：由本社各同志量力担任。

事业：本社的事业，分三期进行。

第一期：设立“编辑”“印刷”“贩卖”“教育”四组（各组另外规定），彻底革新人群的思想。

第二期：添设“破坏”“生产”“消费”“娱乐”“医疗”……等组，一面用暴烈手段对付强有力者，一面创造较小规模的公共机关。

第三期：组织“劳工团”“天讨军”实行大破坏和大建设。

联合：凡与本社意趣不相抵触的团体，可互相携手，协助进行。

报告：每年出《适社年刊》一册，报告本社经过的事实（各同志题名录、同志助资表、经费出入表、逐日通信的概略、各种出版品的大意，印刷、贩卖两组营业的状况，教育、破坏、生产、消费、娱乐、医疗……等机关实施的情形以及关于本社的一切要件），分赠各处同志。但在第一期内，以曾经资助本社者为限。

附则：本大纲如有不适应的地方，经多数同志通过后，即行修改。

适社同志公订

新世纪二十年八月十日

三、《蒂甘(巴金)致袁诗尧的书信》

诗尧兄：

来信收到。

《革命》印刷交涉失败。洪先生说要检查后才能印。我们这样东西怎么能送去检查呢？版已排好，结果由我们付了六元半钱的版费（此是先忧去交涉的详情，可问他）现在大约油印出版。

《利群》停□事，先忧要告诉你。

《社会运动》只出了两期，第一号我这里没有。（成都也没有见过这书。）第二期重庆某君寄了几份来（他说，全的只是这几份，其余的不是没有第一号，就是没有第二号，总清不齐全五张）。故现只寄上一份，请查收。《兵的话》现寄上几份，其余稍缓再寄。

得人道学社（汉口）通告，谓北京同志陈德荣等二君在京被捕，不知何故，俟探得时再报。

在远东运动会会场散传单被捕的同志自公堂判坐西牢十年（持平一人），半年（革生、唯奇等三人），（华清语多乞怜，故未得坐西牢。其余的四人皆不肯低首于民贼

之前,故都判坐西牢。)后,经天研、危舟、介眉等筹款六百五十元(半为适社印刷费,半由同志筹集)请律师辩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于前日复□,结果,还是无效!而律师费已去。奈何,奈何!

天研著了一部问答书,解释吾党学说非常详细,现归泰东书局出版,版权作送,两月内出书。

上海近来成立了个安那其同志社,有宣言发表,俟到时再寄与你。

武汉明社已成立,为武昌、汉口、汉阳三处同志所组织,宣言尚未印好。请了。

祝你努力!

蒂甘

二十二,九,一九二一

四、尾声

以上资料中,第二章节的《五一纪念感言》《IWW 与中国劳动者》及第三章节的《蒂甘(巴金)致袁诗尧的书信》等几篇,估计多少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笔者通过这次整理工作发现,与巴金写于翌年(一九二二年)的诗、短篇小说相比,这几篇论文体现了巴金对将来的希望与期待,而诗、短篇小说却完全没有表现光明。

巴金通过这几篇论文描绘了他所向往的社会,但在一九二二年创作作品时,巴金也没有忽略其与展现在他眼前的现实社会之间的差距。因此,笔者认为这些论文应该与巴金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一并探讨。

笔者收集这些资料时,以巴金先生为首,承蒙了谭兴国先生、李存光先生、艾晓明女士、花健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

注解

〔注 1〕

廖·抗夫(Leopold Kampf, 1881—?)《夜未央》，李石曾译，世界社，1908年。

廖·抗夫，1881年生于波兰克拉科夫(Kraków)。自幼爱好戏剧。化学家。青年时代曾参加社会运动。

巴金在小说《春》(《巴金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月，第382页)注解中写道：“[这部戏剧于]1907年在巴黎公演，中译本1908年由巴黎世界社出版，1920年有人在上海翻印过。我当时看见《申报》上的广告，……买了一本来。”

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8月)第58页写有“夜未央 波兰廖抗夫著。李石曾译。万国美术研究社刊”；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319页写有“波兰部分 夜未央 廖亢夫作 李石曾译 1908年广州革新书局版”。巴金阅读的版本即是李石曾译本。

关于出版社，巴金说是“世界社”，阿英说是“万国美术研究社”，双方都是李石曾于巴黎创办的出版社。

由于笔者未能找到《夜未央》的李石曾译本，以前只好以《新世纪》第30号(1908年1月18日)、第31号(1908年1月25日)、第32号(1908年2月1日)连载的《夜未央》观剧记，以及杨家骆《民国以来出版新书总目提要(上册)》(中国辞典馆复馆筹备处印行，1933年7月南京初版，1971年1月台北再版)第812—813页介绍的李石曾译、开明书店版的梗概为线索，推测剧情的发展。

尽管笔者至今也还未能找到李石曾译本，但幸好巴金译本(廖·抗夫《夜未央》，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2月桂一版)现已可以阅览，故依照该书

如下介绍剧情。笔者在读者大致能够掌握作品内容的范围内介绍了剧情，此外另引用了较为重要的原文，并附页码。

附录：戏剧《夜未央》（三幕剧）

戏剧《夜未央》为三幕剧。时间：一九〇五年。地点：俄国某大城市。戏剧围绕着一个在官府严密监视下在一家秘密印刷所发行《光明》报的团体，描述了献身于革命运动的青年们的形象。

主要出场人物：

华西里，男，二十二岁。

主人公，从第一幕到第三幕连续出场，加入《光明》报的组织，与圣彼得堡的中央机关保持联络。对安娜·利堪斯加亚抱有好感。

安娜·利堪斯加亚，女，二十岁。

担任《光明》报的寄发、宣传活动、联络工作。从第一幕到第三幕连续出场。她也对华西里抱有好感。

昂东·特拉焦夫，男，三十五岁。

担任《光明》报印刷工作。

苏菲·伊范诺芙娜，女，二十九岁。

昂东·特拉焦夫的妻子，与丈夫一起担任《光明》报的印刷工作。

马霞，女，十八岁。

《光明》报的助手。

党大乐，本名大卫·加恩，在基辅时被称为加尔散托夫。男，四十岁。

老革命家。越狱后，现遁形在秘密印刷所。因身体极度虚弱，正在休养。

阿利娜，女，五十岁。

华西里藏身之地的女主人。她的儿子亚历克西·拉特乐夫^①于一八八五年被处以绞刑。对革命运动表示支持，并照料华西里他们。

葛勒高，男，二十八岁。

工人，在此地区指导劳动运动。

沙夏，男，十六岁。

阿利娜邻居家的儿子，关心革命运动。中学生。

巴白拉，女，四十七岁。

安娜·利堪斯加亚寄居之处的女主人。背着丈夫伊凡·帕夫洛维奇，私下保管着革命家的文件。对革命运动表示支持。

伊凡·帕夫洛维奇，男，五十岁。

财政厅官员，巴白拉的丈夫。他当然不知道妻子保管着革命家的文件。视革命家为死敌。他已同意安娜·利堪斯加亚寄居于自己家里，因为妻子说她是圣彼得堡的一位朋友的女儿。

马利亚，女，三十二岁。

巴白拉的朋友，大体上对革命运动表示支持。

戴尼亚，女，二十岁。

马利亚的妹妹，与姐姐同样，大体上对革命运动表示支持。

此外另有警察署员、宪兵队长、宪兵数人、看门人、大学生、医生、银行家、宪兵队长的妻子、巴白拉家的女仆。

剧中虽未出场，但常被提起的人物还有这所大城市的总督奈西林与他的情人舞女芙洛娜。

地点：俄国某大城市。

时间：一九〇五年。

^① 阿利娜是亚历克西·拉特乐夫的奶妈，他的母亲在他出生那天去世。见廖·抗夫《夜未央》，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3月，第56页。——译注

第一幕

地点：《光明》报秘密印刷所。

昂东·特拉焦夫、他的妻子苏菲·伊范诺芙娜，还有马霞，正在折《光明》报。《光明》报已经发行了二十七期。

华西里出场。他拿到了党大乐的护照，来到这里准备交给他。

老革命家党大乐讲述了曾经经历的艰苦的革命运动。

苏菲·伊范诺芙娜是华西里在巴黎结识的朋友。由于二人是莫逆之交，他便与苏菲·伊范诺芙娜谈起爱情问题，这时，苏菲·伊范诺芙娜的眼睛似乎在诉说：“你敢拿利己的打算，无益的个人感情和愚蠢的举动来玷污我们底神圣的事业吗？”^①（第十五页）

突然，进来一名警察，说要检查护照。原来是华西里进来的时候，看门人报了警。这时，昂东·特拉焦夫向警察手里塞进一张卢布纸钞，这才脱离险境。警察一边找借口说是奉厅长之命而来，一边退场。

安娜·利堪斯加亚出场，她带来了从圣彼得堡寄来的信。

华西里与安娜·利堪斯加亚互相抱有好感，谈起了很多事情，当话题涉及革命运动不见成绩时，华西里说：“可是你把血流给他们[平民百姓]看，把泛滥横溢的血海指给他们看，那时候他们会拿起镰刀来跟随你的。那时血钟[由尊贵的牺牲者之血漆成的警醒之“钟”]会响起来，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高叫着复仇。这声音是一天天地增高，这声音永不消灭，并且不肯休息，一直到大获全胜的时候。”^②（第三十页）他发誓哪怕牺牲自我，也要为事业献身。

另一方，他向安娜·利堪斯加亚讲起了自己的“弱点”。华西里这里所讲的“弱点”，可以说成“爱情、情欲”。

① 这是安娜那双充满疑问的惊疑的眼睛似乎带着疑虑和忧愁询问华西里时所讲的话。华西里只是在此向苏菲复述了一遍而已。——译注

② 这是华西里与昂东的对话。——译注

他说：“[它是]一种非常热烈的欲望，它可以使得一个人忘掉国家，忘掉全世界。”（第三十三页）他讲话的对象是安娜·利堪斯加亚，想向她吐露恋慕之意，但她却说：“我要留心你才成，……女人对男人没有好处的，她使男人变成意志薄弱，她教男人懂得害怕[死]。”（第三十四页）华西里说“不错！你说得不错”（第三十四页），但又感到失望，便退场。

突然，宪兵队长与数名队员闯进屋里。彻底搜查一番，找到了印刷机与印刷品。

里间传来了枪声。党大乐用自己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第二幕

地点：华西里藏身之地，阿利娜家的客堂。

华西里、葛勒高、同路人的医生、银行家、大学生聚集在一起，激烈地议论着今后的活动。

不仅《光明》报的秘密印刷所被发现，到处都有宪兵在搜查住宅，很多人被捕，他们在谈论此事。

昂东·特拉焦夫逃脱了危险，但是妻子苏菲·伊范诺芙娜被逮捕了。她用玻璃碎片割断喉咙想一死了之，但却未遂，现被收容在监狱医院。

据说在监狱里，马霞衣服被扒光，遭到侮辱。

从这种情况判断，华西里强烈主张敲响“血钟”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提出的具体行动计划是：总督的情人舞女芙洛娜正在歌剧院上演舞剧，总督准备去观剧，趁此时机刺杀总督，任务直接由华西里与葛勒高执行。他们正在商量此事。

不久，葛勒高为了指挥示威游行，离开了那里。

安娜·利堪斯加亚出场，看到华西里在场，便告诉他警察正在拼命地搜索华西里，并劝告他赶快到别处隐藏起来。

华西里这时才向她坦白了他的爱。这次，安娜·利堪斯加亚坦率地接受了

他的爱。她这一选择，也许是形势变化与志气高昂所使然。

这时，窗外传来了示威游行的工人的歌声。

家的主人阿利娜听到歌声，想起了死于绞刑的儿子亚历克西·拉特乐夫，说这是儿子经常唱的歌，便唱了起来。

我旆，我旆，/翻飞于王座兮，/旗波荡漾血色红。/暴君，暴君，/歼我民以枪炮兮，/我脂我膏溅飞幢。/赤血，赤血，/洒我无辜之赤血兮，/独夫民贼将震恐。
(第七十一页。)

于是，安娜·利堪斯加亚、华西里也都随和阿利娜一起唱了起来。

我声兮怒且高，/我心兮壮且豪；/敲血钟而放歌兮/我将引同胞入自由之道。
/我声高兮我心豪，/我声直上千云霄！（第七十二页。）

突然，远处传来了放排枪声。

不久，阿利娜邻居家的中学生沙夏被抬了进来。他遍身是刺刀刺过的伤疤，令人心痛。

葛勒高再次出场，与华西里商量好，决定两日后实行刺杀总督的计划。

第三幕

地点：安娜·利堪斯加亚寄居之处，巴白拉家里。从她家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歌剧院。

巴白拉、马利亚、戴尼亚、安娜·利堪斯加亚四人在议论两天前在示威游行中发生的惨剧以及警察加强了警备、搜查。马利亚说她捡到了传单。

这时，巴白拉的丈夫伊凡·帕夫洛维奇出场，说今晚有舞女芙洛娜的告别演出，总督一定会很满意。他也要去观剧。

伊凡·帕夫洛维奇退场后，巴白拉马上把门锁好，不让任何人从外边进来，

并叫马利亚取出她捡到的传单，念给大家听。

此次全城数万工人同盟罢工，足以表示反抗之诚意，亦为大革命之先声。知识阶级多与吾辈结合。城中各执事皆弃其职务，加入吾人队中。中学学生更与工人一致行动。即彼立宪党亦起而反对政府矣。俄国政府之昏庸残暴为全世界之所共知，彼竟遣派野蛮之军队，屠杀和平之工人，虽妇人孺子亦不免遭其荼毒，马脚践之，皮鞭笞之，枪炮轰杀之，军刀乱斫之。……吾辈目击此种惨状，终身亦不能忘。……（第八十八页。）

……吾辈舍奋勇向前更无生路。即各国人士亦皆注目我辈之斗争，同情我辈之运动。与民贼战，此其时矣！……（第八十九页。）

……由任意践踏之奴隶，得为自由平等之人民；由黑暗之时期，得成光明之世界；无他，止恃少数者从容就义，偿此代价耳。……以一己之热血购还同胞之自由；以个人之牺牲争得万人之安乐，此正人生最高之义务。吾辈慕义之心，何敢后人。同志，同志，其奋起而前进乎！（第八十九—九十页。）

马利亚、戴尼亚退场。

巴白拉初次向安娜·利堪斯加亚坦白她背着丈夫伊凡·帕夫洛维奇私下保管着革命家的文件。

华西里出场。他对安娜·利堪斯加亚说：从这间屋子的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歌剧院，等总督过后从歌剧院出来时，点燃蜡烛，放在窗边，向我发信号，看到之后我会采取行动。

安娜·利堪斯加亚当初拒绝了他的要求，后来发觉不得不接受，便答应了他。

华西里笑着对安娜·利堪斯加亚说：“安娜，你叫我很难死得下去。……自由也许会跟明天的太阳一块儿升起来，可是我看不见了。我应该去了。对于将

来的胜利，……安娜，也许你可以看见自由的俄罗斯。到了那一天，安，请你还记着我！”（第九十七—九十八页）说完便离开了那里。

不久，安娜·利堪斯加亚看到总督从歌剧院出来，上了马车，周围的人向他敬礼，于是立刻点燃蜡烛，放在窗边，发出了信号。突然，炸弹爆炸的巨大声音响彻四周。

安娜·利堪斯加亚发出哀叫倒在那里，巴白拉马上抱起她，她这才醒来。

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眼泪是愚蠢的！钟响了，……血钟！……向前进！向前进！”（第一〇一页）

——幕落——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成果。

二〇一二年九月，研究巴金的我到复旦大学中文系留学，开始在陈思和老师门下进修。十月初，有一次到武康路巴金故居拜访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生，同他闲谈时，话题涉及日本的巴金研究。当时，他好像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希望我把日本研究巴金的专著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我马上想到了樋口进先生的《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理由很简单，巴金研究的专著在日本只有这一本。该书是樋口先生所执教的西南学院大学的内部纪要之一，至今出版已有三十多年。就这样，他叫我写一份内容简介，还说我可以先慢慢翻译，将来可以编入“巴金研究丛书”系列……

其实，来上海之前我还在想，在复旦留学期间除了听课之外，不必像在日本

那样每周都出去打工，可以专心读些小说，静下心来写论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除了这项突如其来的翻译工作之外，到上海不到两周，陈老师就向我介绍了日语外聘教师的工作。之后，又承蒙施小炜老师的关照，在十一连休结束后，我开始教起了日语。正在这时，我的导师坂井洋史老师所撰“巴金研究丛书”之六《巴金论集》的校样出来了，恰好我在上海，大概用了两三周时间断断续续为该书的一些细节做了核对与校勘（《巴金论集》后记已经提到此事）。有一天，一桥大学的一位研究台湾文学的老教授突然发来电子邮件，想让我翻译一篇歌仔戏的论文，貌似急迫，说一个月之内必交定稿！由于老教授亲自下令，我就一口答应了。就这样，生活一下子充实了起来，在复旦听课、到外校教书、校勘书稿、翻译论文，成了我当时的日常“课程”，再加上出外游玩、听音乐会、偶尔到故居转转，《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翻译就一直拖了下来。

十月末，我忙完了书稿的校勘和论文的翻译，从十一月初起，开始做起《巴金与安那其主义》一书的翻译。总体来讲，翻译进展得还算顺利，我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十二月末完成了初稿。由于《巴金与安那其主义》这部大学内部纪要译成中文也就八九万字，只能体现樋口先生的巴金研究的一半，所以我向周立民先生请示，是否可以把樋口先生的其他关于巴金的论文一并编入本书，呈现出其巴金研究较为完整的面貌。这一建议得到了他的同意，于是二〇一三年一月初，我利用寒假假期回日本时，顺便收集了樋口先生的有关巴金的十篇论文及两篇介绍珍贵史料的文章。二月末回到上海后，我马上开始翻译起这些论文。而到了四月初，周立民先生又邀请我到故居整理巴金收藏的日文书籍。虽然一周要过去一两次，翻译论文的时间有所减少，但还是几乎可以一周完成一篇，所以到了五月末，十二篇文章的初稿也出来了。

时至此，离我结束留学生活离开上海只剩下两个月了。我刚刚接到本书的翻译工作时，本想在回国之前向出版社提交定稿，但在我完成初稿后开始从头检查译稿时发现，这一意愿现已无望了。由于受日语原文的影响，初稿中一些文字表达尚不清楚，于是我只好一一对照原文仔细修改初稿，几乎等于重新

翻译了一遍。除此之外,查阅一手资料、核对原文等问题也还未能解决,经常要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或检索数据库。因此,在我归国离开上海的七月末,修改工作才只完成了一半。

回到日本之后,核对原文、修改初稿的初步工作又做了很长时间,几乎到九月份才告一段落。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果然有些资料的确难以收集,必须到西南学院大学查询。另外,很早以前我就听说西南学院大学图书馆有一展柜专门陈列巴金赠送樋口先生的一些签名本,图书馆内还有“樋口文库”。于是,我与西南学院大学的新谷秀明老师取得联系,十月初,拜访了该校。承蒙新谷老师的关照,除了找到了一些我所需要的资料,我还参观了图书馆内的“樋口文库”以及陈列巴金签名本的展柜。新谷老师还在他的研究室帮我翻出了樋口先生留下来的十多箱资料,据说都是樋口先生撰写论文时留下的备忘录、草稿、论文抄件等。新谷老师还向我提供了巴金与樋口先生的合影等珍贵照片。

回到东京后,我一边把这些资料反映到译稿上,一边做起了第二次的修改工作。这次时间较长,到了二〇一四年二月才做完全篇修改。恰好此时周立民先生到一桥大学做学术访问,我又请他帮我看了一遍译稿。根据他向我提出的宝贵意见,我又做了一次全篇修改。后来,我又得到一桥大学博士生吕美亲女士的细心帮助,断断续续用了相当一段时间解决了文字表达不够理想的一些细节。就这样,修改工作大概持续了一年多,终于在九月中旬,向出版社提交了定稿。

本书的编译结构如下。第一辑收录了樋口进先生的专著《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第二辑与第三辑同样按发表时间顺序分别收录了十篇论文及两篇介绍史料的文章。除此之外,樋口先生还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巴金及其作品,例如:《现实的秩序与作品的秩序》(现实の秩序と作品の秩序)(《西南学院大学文理论集》第九卷第二号,一九六九年三月)简略论及了《白鸟之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论争资料——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试论》(解放後の文学论争资料——中国近代文学を理解するための试论)(中国文学评论社,一九六四年

十二月五日)其中关于巴金的部分系统地介绍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对巴金的评价以及五四时期安那其主义相关资料,但都不是单独讨论巴金的文章,另加内容上有所重复,因此没有编入本书。

收于本书的专著《巴金与安那其主义》及十二篇文章,除了巴金本人的思想与文学作品之外,樋口先生还仔细地记述了外国思想家的经历,深入讨论了中国内外的社会运动,涉及面广泛,信息量丰富,完全超越了现代文学这一学术领域。这样一本著作,翻译下来并非易事。文学、思想、哲学、社会运动等方面的专用术语,几乎会一字不差地同时出现在几篇文章里的一些句子都需要统一,外国城市的地名与地点(地理关系)、作家及思想家的经历与著作也要逐一查清,因此,大部分的翻译时间都用在这些方面了。另外,由于需要把所有引文还原成中文,必须查阅大量的一手资料。说实话,一开始这还真有点儿让我发愁,因为有些资料在图书馆里也很难找到。如果我不是在上海留学,可以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学校提供的数据库,或是抽空到上海图书馆或巴金故居查阅资料,恐怕本书的翻译真的无法顺利完成。这样下来,加上后来到西南学院大学图书馆查阅的资料,可以说,樋口先生曾经看过的资料我也都翻阅了一遍。这样一点一滴收集资料,有时确实会觉得很麻烦,但回想起来,这让我大开眼界,接触了很多自己以前从没有见过的资料,对我今后的研究也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樋口先生的阅读量不凡,能够在缺乏中国方面的资料的那个年代保持一定的收集量,这一点令我感叹不已。

有件事情不得不向读者交代清楚:在本书的编译过程中,我删除了原为《巴金与安那其主义》所收附录三《巴金略年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众多知名作家的年谱编制工作几乎已经完成,因此,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包括我本人在内,很少会有人重新仔细整理年谱,由此呈现自己对作家的理解、评价,同时以便读者深入理解作家及其作品。这种有所忽略作家经历的著述方式可行与否暂且不谈,但至少对于樋口先生那一代——战后才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讲该是师祖——的中国研究者来讲,在了解作家

的途径不多、资料又极其有限的环境当中，他们只好同步展开收集资料、整理年谱与研究的工作；说整理年谱这项工作往往呈现了他们对某一作家的某种评价，亦不为过。其实，樋口先生这篇《巴金略年谱》也体现了这一方面。记得在新谷老师从他研究室里翻出来的十多箱资料中，有一个写着“巴金年谱”的“专箱”，里边装满了资料，每一年的部分都用厚纸隔开。据新谷老师透露，樋口先生晚年的意愿是重新编写一篇巴金年谱。其实，刚刚开始翻译《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时候，我并没有删去附录三《巴金略年谱》的想法。只是后来与周立民先生聊天时谈到这篇年谱，他多次建议我把它删去，因为这篇年谱比较旧，况且现在已经出版了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巴金年谱（上下卷）》（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以及《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所收李存光编《巴金著译年表》等，年谱方面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这些书籍。这样一来，我便有些犹豫不定了；后来又想：既然樋口先生晚年未能完成编写巴金年谱这一意愿，如今把他生前（二十年前）的旧作公之于众或许会违背樋口先生的意愿。就这样，我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觉得还可以说得过去，便放弃了翻译这篇年谱，但还是有些于心不忍。尽管如此，巴金的种种经历书中随处可见，其中有些文章又把这些经历有逻辑地串联起来，所以即便没有这篇年谱，相信读者通读本书即可体会到其之意图何在。这样，或多或少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

本书的翻译虽是一个偶然的成果，但的确承蒙很多人的帮助。首先，感谢周立民先生推举我翻译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几乎都得到了他的帮助，感谢他对译稿提出的宝贵的建议。其次，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孙晶女士给予我出版本书这个难得的机会。其实，早在一年前我就应该交稿了，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未能如期提交。在此特别感谢孙晶女士的耐心等待，同时很高兴她参与本书的审阅工作。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毛蒙莎女士审阅本书。书中引文较多，有些句子译成中文又不太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相信这肯定给审阅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非常感谢西南学院大学教授新谷秀明

老师对本书翻译的大力支持。除了提供资料之外，新谷老师还帮我与樋口先生家人取得联系，使本书得到了出版的许可，并亲自到西南学院大学学术研究所解决了《巴金与安那其主义》一书的版权问题。感谢一桥大学博士生吕美亲女士在用词、文字表达方面多次给我提出建议。除了上面提到的诸位之外，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在同一时期留学复旦的日本留学生朋友、巴金故居的工作人员、一桥大学的同窗，都纷纷给予我鼓励与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特别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老师与一桥大学教授坂井洋史老师，两位导师的热心指导和我留学生活的关心、照顾，丰富了我在复旦的每一天，使我非常愉快地、充实地度过了短暂的一年。

译后记写到这里，想到要向出版社交稿，我这才觉得终于要告别我的留学生活了。回想起整个翻译过程，很多美好的回忆便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愿把这些回忆深藏在我心中，时而回味过往的快乐时光，以勉励自己早日完成学业。

近藤光雄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三日深夜写毕，日本东京

巴金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一、巴金研究丛书是一套巴金研究资料的汇编，它体现了巴金研究的历史成果和最新趋向，既是总结性的汇编，又是开放性的文丛。期望通过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在本丛书内汇集海内外最优秀的各类巴金研究成果。丛书根据内容主要从三部分分别推进：

1. 文献、资料汇编；
2. 专著、论文集；
3. 传记、纪实类作品。

二、丛书的稿件来源：

1. 重刊有影响的既往巴金研究成果；
2. 新编各种专题资料；

3. 译介海外研究成果；

4. 推出最新的学术专著及其他研究成果。

丛书的选稿采取开放性原则，接受海内外学者自由申报的选题，公开资助优秀硕士、博士论文的出版。

丛书每年推出三至五部著作。

三、丛书的编辑由巴金研究会下设巴金研究丛书编委会主持，编委会确定丛书书目、出版计划和承担前期编辑工作。

四、欢迎与以上内容相关的课题、图书申报，欢迎提供相关稿件。

网络支持：www.bjwxg.cn；联系信箱：6487979@sina.com。

巴金研究论稿

作者：陈思和 李 辉

定价：38.00 元

ISBN 978-7-309-06655-5



9 787309 066555 >

巴金与现代出版

作者：孙 晶

定价：30.00 元

ISBN 978-7-309-08471-9



9 787309 084719 >

巴金论

作者：汪应果

定价：34.00 元

ISBN 978-7-309-06654-8



9 787309 066548 >

巴金与《收获》研究

作者：蔡兴水

定价：38.00 元

ISBN 978-7-309-08476-4



9 787309 084764 >

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

作者：艾晓明

定价：30.00 元

ISBN 978-7-309-06656-2



9 787309 066562 >

万金集——来自巴金的家书

作者：马小弥

定价：32.00 元

ISBN 978-7-309-09730-6



9 787309 097306 >

巴金《随想录》研究

作者：胡景敏

定价：34.00 元

ISBN 978-7-309-06966-2



9 787309 069662 >

巴金创作综论新编

作者：辜也平

定价：40.00 元

ISBN 978-7-309-09677-4



9 787309 096774 >

巴金《随想录》论稿

作者：周立民

定价：38.00 元

ISBN 978-7-309-08360-6



9 787309 083606 >

青青者忆

作者：杨 苡

定价：28.00 元

ISBN 978-7-309-10124-9



9 787309 101249 >

巴金论集

作者：坂井洋史

定价：32.00 元

ISBN 978-7-309-09609-5



9 787309 096095 >

永远的巴金

作者：陆正伟

定价：58.00 元

ISBN 978-7-309-11020-3



9 787309 110203 >

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

作者：张民权

定价：32.00 元

ISBN 978-7-309-08352-1



9 787309 083521 >

巴金与日本作家

作者：陈喜儒

定价：38.00 元

ISBN 978-7-309-11024-1



9 787309 110241 >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

ISBN 978-7-309-11468-3

作者：樋口进

定价：38.00 元



巴金小说形式研究

ISBN 978-7-309-11804-9

作者：田悦芳

定价：36.00 元



翻译家巴金研究

ISBN 978-7-309-11807-0

作者：向洪全

定价：35.00 元

